

机会主义、修正主义资料

# 普列汉诺夫 机会主义文选

(一九〇三——一九〇八年)

上



(供内部参考)



# 普列汉诺夫 机会主义文选

(一九〇三——一九〇八年)

上

虚容译

---

本书是供内部参考用的，写  
文章引用时务请核对原文，  
并在注明出处时用原著版本

---

**普列汉诺夫机会主义文选**

(一九〇三——一九〇八年)

上

虚容译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新华书店发行  
四二二五工厂印刷

1964年2月第1版

1973年9月北京第2次印刷

书号3002-107 每册1.00元

内部发行

5120707/17

## 出版者说明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创始人之一、“劳动解放社”的奠基者普列汉诺夫(一八五六——一九一八)，曾经是俄国和国际无产阶级运动的著名人物。一九〇三年以后，普列汉诺夫开始暴露出机会主义倾向。一九〇五到一九〇七年时期，他成了孟什维克的思想领袖和理论家。以后，他曾一度同布尔什维克结成护党联盟。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最终地背叛了马克思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堕落为一个彻头彻尾的社会沙文主义者。

普列汉诺夫四十多年来的政治生活是复杂多变的。他的政治思想变化过程可以分为四个时期：即民粹主义时期(一八七六——一八八三)；马克思主义时期(一八八三——一九〇三)；孟什维主义时期(一九〇三——一九一四)；社会沙文主义时期(一九一四——一九一八)。

孟什维主义时期的普列汉诺夫在政治上的表现最为动摇不定，经常在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之间“倒过来倒过去”。列宁曾经指出：“从一九〇三年以来，普列汉诺夫就在策略和组织的问题上极可笑地动摇着：(一)一九〇三年八月是一个布尔什维克；(二)一九〇三年十一月(《火星报》第五十二号)，主张同‘机会主义者’孟什维克建立和平；(三)一九〇三年十二月是一个孟什维克，而且是一个热烈的孟什维克；(四)一九〇五年春天，布尔什维克胜利以后，争取‘敌对的兄弟们’的‘统一’；(五)一九〇五年年底到一九〇六年年中是一个孟什维克；(六)从一九〇六年年中开始，有时离开孟什维克，在一九〇七年伦敦代表大会上斥责孟什维克……‘组织上的无政府主义’；(七)一九〇八年同取消派决裂；(八)一九一四年又



重新转为取消派。”(《列宁全集》第二十卷第 359—360 页)

大体说来,普列汉诺夫在这个时期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建党时期的调和主义立场、革命时期的最右翼的立场和反动时期的护党立场。

第二次党代表大会以后,由于要保持党内无原则的“团结”,害怕分裂,普列汉诺夫坚决主张向孟什维克的修正主义立场和无政府个人主义行为作无限制的让步。他不顾布尔什维克的警告,在《火星报》第五十二号发表了《不该这么办》一文,从而把党内的意见分歧公开暴露在敌人面前。列宁曾经把这篇文章称为“划时代的作品”,它判然地划开了普列汉诺夫政治生命史的黄金时代和堕落时代。

这一时期,普列汉诺夫同列宁的根本分歧在于究竟应该建立什么类型的政党。和列宁相反,他主张按照西欧社会民主党的方式和原则建立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普列汉诺夫不了解党内斗争的必然性和必要性。他否认孟什维克是党内的机会主义派别,声称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在组织问题上的原则分歧是“无谓的争吵”。他反对向修正主义者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主张采取“温和的手段处死修正主义者”。在他看来,“有时对破坏纪律的行为闭着一只眼睛是有益的”。对于党内斗争的策略问题,普列汉诺夫除了所谓“团结”的激昂而抽象的空谈以外,不能作出任何有益的事情。

第一次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普列汉诺夫和列宁在策略基础上的严重分歧首先表现在对待资产阶级和农民的态度问题上。普列汉诺夫从俄国革命是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的一般原理出发,得出“俄国自由资产阶级是革命的”错误结论。他认为应该把即将到来的“政治斗争的重担,哪怕是部分地从无产阶级肩上转移到资产阶级肩上”。他说:“如果我们抛弃了这个资产阶级,说现在根本不能期待它会为自由的事业作出什么成绩来,那么我们这样做就会违反革命的直接的和明显的利益”。所以普列汉诺夫反对“过早的起义”,认为这种“尝试会把有产阶级驱赶到政府的怀抱中

去”，“这种为时过早的吓退资产阶级的企图”必须受到“坚决谴责”。

与此同时，普列汉诺夫低估了农民在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作用。在他看来，农民只有放弃自己私有者的观点时才是革命的。他引申了一条“无可争辩的规律”说，“资本主义越是接近自己的终点，小资产阶级就越会愿意接受无产阶级的观点。……反之，资本主义离开自己的最终灭亡越远，则小资产阶级就会更加顽强地坚持自己的矛盾的观点”。俄国的革命既然是资产阶级性质的，因此，农民在革命中的作用，与其说是革命的，不如说是保守的。

普列汉诺夫在《论夺取政权问题》、《与友人通信选录》等文章中提出了自己的孟什维主义的革命战略原则。他所论证的俄国“革命路线”几乎是十八世纪法国革命路线的再版。他认为无产阶级在反对沙皇专制制度的斗争中应该和资产阶级“互相亲善”，“分开走，一起打”，而不要和农民结成联盟，领导他们发动过早的武装起义，以免吓退资产阶级，使革命遭受失败；在革命胜利以后，社会民主党人不应当参加临时革命政府，而只应在国家杜马一类的代表机关内做一个“极端的反对派”，以便推动它走上立宪会议的道路；然后经过相当长的时间，当资本主义经济在俄国有了充分的发展以后，再领导无产阶级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很明显，这条路线的实质就是放弃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使它充当资产阶级的助手。他在回答究竟谁领导谁、谁应当跟着谁走的问题时说道：要求无产阶级跟着资产阶级走，那就“等于给社会民主党签署了死刑判决书”，要求资产阶级跟着无产阶级走，这种呼声“一定会成为荒漠的呼声，也等于向壁清谈，毫无意义”。两者都“没有也不可能有一丝毫的愿望”跟着对方走。这就是普列汉诺夫一再重复的“分开走，一起打”的口号的根本内容。

普列汉诺夫为俄国无产阶级拟定的“革命路线”中的另一个根本性的错误，是反对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的思想。他不

了解实行这种专政乃是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取得胜利的一般的、基本的阶级条件。他说，列宁的这种思想只会导致“小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专政”，所以他坚决反对社会主义者参加小资产阶级政府。他认为，社会民主党人如果参加以小资产阶级政党的代表占统治地位政府，那么除了对他们的反动的和保守的措施承担责任并帮助他们欺骗人民以外，没有什么积极的作用。他的“极端反对派”口号就是为了对抗工农联合起来实行民主专政的思想而提出来的。

总起来说，否定俄国自由资产阶级的反革命性，低估农民在民主革命中的伟大作用，用平行领导论来反对无产阶级的革命领导权思想，提出议会主义的“极端反对派”口号来代替工农民主专政理论，——这四者构成了普列汉诺夫的孟什维主义战略思想的基本内容，也是他在一九〇五年至一九〇七年革命时期全部策略主张的理论基础。

普列汉诺夫在策略基础方面的这些错误观点，决定了他的一系列具体问题上的机会主义立场。其中最主要的问题有：土地问题、国家杜马问题、暴力和武装起义问题、对待群众运动的态度问题、党和工会的关系问题等。

在土地问题上，普列汉诺夫主张实行土地市有方案，反对列宁的土地国有草案。他认为土地国有草案“是反动的，因为它会促使半立宪制政府在它同革命党派的斗争中取得胜利”，它没有提供“防止复辟的保障”，而且“同革命家夺取政权的空想密切相关”。在普列汉诺夫看来，分配土地虽然有許多不方便的因素，但比国有化要强得多；当然最合乎愿望的措施是土地市有方案，因为土地市有是“抵御反动势力的支柱”，即使在民主革命不彻底进行的情况下也能实现。

在杜马问题上，普列汉诺夫主张不但不要抵制杜马选举，而且还应当参加到杜马内部去，应当同立宪民主党达成选举协议，应当使杜马从反革命的工具变成革命的工具，以便推动它走上立宪会

議的道路。他的基本理由是：杜馬“站在革命的大道上”，因為杜馬中占統治地位的是立憲民主黨人，而這個黨代表着“革命的”自由資產階級，如果抵制杜馬，撇開杜馬，就有使資產階級脫離革命的危險，也不能提高對杜馬還抱有幻想的廣大群眾的覺悟，結果不是孤立了敵人，而是孤立了自己。所以他認為抵制策略是錯誤的和有害的。普列漢諾夫認為俄國革命應該走議會主義的道路，硬說杜馬是“全民代表機關”，它代表“全民的意志”，因此應當在“全權杜馬”的口號下，使杜馬產生出“責任內閣”，這樣就可以用“全民鼓動的文火”來消滅專制制度。

普列漢諾夫在暴力和武裝起義問題上的基本看法是：在俄國當時的條件下“不要拿起武器”。他不承認暴力革命是無產階級取得統治地位的必經途徑。他認為暴力根本不同於實力，它只是實力的一種表現形式。革命的勝利取決於實力的發展。至於暴力，那只有在一定的條件下才能使用。俄國無產階級既不能進行合法活動，所以武裝起義是必要的。但是起義要獲得勝利必需具備兩個先決條件：一是自由資產階級的同情和支持，一是政府權力的瓦解。如果不具備這些條件，就“不要拿起武器”，而要發展實力，喚醒人們的政治意識。所以普列漢諾夫認為，在當時的情況下，黨的主要任務是進行和平的宣傳工作和工會工作。

普列漢諾夫反對組織群眾運動。他認為俄國無產階級的人數很少，覺悟很低，他們絕大多數還受小資產階級思想的影响，在這種情況下組織群眾運動，只會使革命力量遭到慘敗。所以在他看來，十月總政治罷工以後的“第二次罷工是錯誤的”，“第三次罷工也是錯誤的”，對於十二月武裝起義，他更公然譴責說：“本來不需要拿起武器”。

從一九〇六年起，普列漢諾夫發表了不少關於黨和工會的關係問題的言論。在這些言論中，他一貫堅持自己的“工會中立論”。他反對把政治分歧帶到工會中去，反對黨應當領導工會。他的主要理由是：俄國有十個無產階級政黨，如果提出工會服從黨的領導

的口号，就有造成无产阶级分裂的危险。

普列汉诺夫在这一时期最重要的革命问题上的基本观点就是如此。所有这些观点实质上反映了立宪民主党的策略路线。列宁曾经反复指出，普列汉诺夫执行的是自由资产阶级的工人政策，他宣扬的是机会主义的阶级调和论，并着重指出：“普列汉诺夫只是比别人更突出更露骨地表明了整个孟什维克政策的内部实质和基本倾向：以迁就自由资产阶级的政策来代替工人阶级的独立的路线。”（《列宁全集》第十二卷第432—433页）

由于普列汉诺夫当时享有巨大的威望，被认为是正统马克思主义的代表，由于他在文章中常常大量援引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词句，他的这些言论就更富于欺骗性。列宁写道：“普列汉诺夫的这种策略上的机会主义……是对马克思主义方法的原理的全盘否定”，“他在这方面表现的机会主义给俄国社会民主主义的工人带来的危害性，要比伯恩施坦的机会主义给德国工人带来的危害性大百倍。”（《列宁全集》第十一卷第398—399页）

揭露和批驳普列汉诺夫的这些谬论是当时布尔什维克党最重大的一项政治任务。一九〇三年十一月以后，同普列汉诺夫的论战在列宁的著作中占了相当大的比重，构成了从马克思主义在工人运动中取得统治地位以来，马克思主义同修正主义者、机会主义者所进行的第一次大论战的主要内容之一。列宁在自己的著作中尖锐地、针锋相对地批判了普列汉诺夫的所有这些机会主义的策略观点和组织路线。列宁在这方面的著作绝大部分都收在《列宁全集》第七卷至第十三卷中。其中最重要的有以下几篇：《地方自治局的迫害者和自由主义的汉尼拔》、《进一步，退两步》、《论临时革命政府》、《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个策略》、《〈工人论党内分裂〉一书序言》、《立宪民主党人的胜利和工人政党的任务》、《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统一代表大会的报告》、《糟糕的意见》、《普列汉诺夫同志是怎样论述社会民主党的策略的》、《策略上的动摇》、《论同立宪民主党的联盟》、《参议院的新解释》、《卡·考茨基〈俄国革

命的动力和前途》一书的俄译本序言》、《卡·马克思致路·库格曼书信集俄译本序言》、《论机会主义的策略》、《不应当怎样写决议》、《〈约·菲·贝克尔、约·狄慈根、弗·恩格斯、卡·马克思等致弗·阿·左尔格等书信集〉俄译本序言》、《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代表大会》、《对资产阶级政党的态度》、《普列汉诺夫和瓦西里也夫》、《反对抵制》、《〈十二年来〉文集序言》、《关于普列汉诺夫的一篇论文》、《社会民主党在一九〇五——一九〇七年俄国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纲领》、《工会的中立》、《工人运动中的思想斗争》、《论冒险主义》、《谈谈辩证法问题》、《国家与革命》等等。

本书选材于二十年代苏联国家出版社出版的俄文版《普列汉诺夫全集》，包括一九〇三年十一月到一九〇八年年初的论文、短评和发言共七十余篇。除了少数几篇是摘译外，大部分全文收录，分上下两册出版。此外还选译《马克思哲学的进化》等三篇，作为附录，载于书末。

所有的文章都按发表时间的先后顺次编排。在每篇文章之前我们加了一个简短的按语，试图对当时的历史背景、文章的基本论点、列宁的重要批评、意见等作一些交代说明，以供参考。作者所引证的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文字，几乎全部加注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和《列宁全集》中译本的出处。凡引文与中译本有出入的地方，都按照普列汉诺夫本人所引的文字译出。

## 目 录

出版者說明	
不該这么办 .....	1
对列宁同志的信的答复（《火星报》編輯部） .....	10
略論“經濟主义”和“經濟主义者”	
（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几点公开意見） .....	14
答尼·列宁同志关于他退出《火星报》編輯部的信	
（《火星报》編輯部） .....	24
关于使得列宁同志退出《火星报》編輯部的情况的信 .....	27
可悲的誤会 .....	31
評烏发人和烏拉尔人的信（《火星报》編輯部） .....	43
意大利社会党人波倫代表大会（摘录） .....	46
附：实力和暴力（論革命策略問題） .....	48
集中主义还是波拿巴主义？	
（开导替自己請来沙皇的蛤蟆的新尝试） .....	58
現在不能沉默（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的公开信） .....	73
答利亚多夫同志 .....	79
工人階級和社会民主主义知識分子 .....	84
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党员會議上的发言	
（一九〇四年九月二日） .....	112

## 論我們对待自由資產階級反沙皇制度斗争的策略

(致中央委员会的信) .....	115
分开走, 一起打 .....	136
論夺取政权問題 (不大的历史证据) .....	146
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全体党员的公开信 .....	157
退出《火星报》編輯部 (致《火星报》編輯部的信) .....	160
小册子《在两条战綫上》序言 (摘录) .....	162
关于我的《日志》的几句话 .....	164
“农夫們在暴动” .....	165
論我們的几点“不足” .....	177
与友人通信选录 (致《无产者报》編輯部的信) .....	187
相仇的弟兄 .....	223
我們的处境 .....	240
小評 (摘录) .....	271
再論我們的处境 (致 X. 同志的信) .....	272
論俄国土地問題 .....	286
論黑帮分子 .....	310
論杜馬选举 (答 C. 同志) .....	318
在斯德哥尔摩統一代表大会上的发言 .....	328
关于土地問題的发言 .....	329
关于土地問題的总结发言 .....	333
关于对待国家杜馬的态度問題的发言 .....	340
关于武装起义的发言 .....	343



## 不該这么办

本文发表在一九〇三年十一月七日第五十二号《火星报》，是普列汉诺夫的第一篇机会主义著作，是他从马克思主义者墮落为机会主义者的起点。列宁曾称它是“划时代的作品”（《列宁全集》第七卷第475頁）。

普列汉诺夫在第二次党代表大会和国外同盟代表大会上是跟着布尔什维克走的；但是在十月的同盟代表大会以后被孟什维克的破坏活动吓倒了，决定对他们采取调和主义的让步立场。本文就是这种立场的第一个公开表示。它把党内的意见分歧公开暴露在敌人面前。从此以后，普列汉诺夫就结束了他的革命生涯的“晴和的初秋”，而开始了政治道路上的孟什维主义时期。

本文的“基本思想就是，认为在政策方面不应当采取太激烈太不让步的莽撞的态度，认为有时为了避免分裂，对修正主义者……以及对无政府个人主义者实行让步，是必要的。”（《列宁全集》第七卷第362頁）

“这篇文章过去是，而且现在仍然是马尔托夫分子钻进编辑部的唯一的入场券。有两个口号——修正主义（应该用宽恕敌人的态度同修正主义进行争论）和无政府个人主义（应当用温和办法使无政府个人主义就范），特别鲜明地印在这个入场券上。”（同上第369頁）

列宁在《给〈火星报〉编辑部的信》（同上第98—102頁）和《进一步，退两步》（同上第341—410頁，特别是第361—373頁）中对普列汉诺夫这篇文章的立场和观点作

了詳細的分析批判。

随着俄国无产阶级运动的增长和巩固，它的自觉的代表所起的作用就越来越重要了。以前，在现今所謂小組习气时代（不过应当不念旧恶，因为它給我們留下了不少珍貴的遗产），我們的錯誤的有害影响还只限于一个小組或几个小組的狭小范围。現在我們同群众接触，这个影响就广泛得无法比拟了。而当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终于得到它如此必需的中央集权制組織的时候，中央所犯的每一个錯誤就必然流毒所有的地区。給誰的多，对他的要求就多<sup>①</sup>。我們的中央所需要的人物不仅必須勇敢坚定，果断頑强，而且也必須极端謹慎。他們的确要聪明得像蛇一样<sup>②</sup>。

而政治上聪明的第一个特征就是善于估計具体形势。凡是不具备这种本領的人，都沒有从事政治活动的天資。这时，如果他不再扮演任何負責的政治角色，那会更明智些。政治，要求从事政治活动的人头脑非常灵活；它沒有一成不变的永恒規則。这是不言自明的道理。但是現在，當我們的队伍里已經开始流傳一种向往这种規則的傾向而將給我們党带来巨大損害的时候，提一提这个道理并不是沒有益处的。我們知道，产生这种傾向其用心是极为可敬的。它是为了克服曾經使我們的“經濟主义者”弄得如此狼狽不堪的那种漠視政治原則的态度而采取的一种手段。但可惜的是矯枉过正了，結果完全是事与願違，因为它可能使我們整个的政治思維具有一种形而上学的性质，这种性质正是對我們的事业构成极大危害的“經濟主义者”的思維的特征。經濟主义者的推論是按照“是就是是，非就是非，除此以外，都是鬼話”的公式进行的。他們的做法說明他們完全沒有能力提高到辯証法的水平，因为辯証法的基本原理說，沒有抽象的真理，真理永远是具体的，一切都以時間和地点的情况为轉移。同这些頑固不化、无可救药的形而上学

① 語出《聖經》《路加福音》第十二章第四十八节。——譯者注

② 語出《聖經》《馬太福音》第十章第十六节。——譯者注

者进行斗争，是符合革命运动利益的需要的。但是如果为了彻底战胜他们，我们竟而模仿起他们的思想方式，如果我们本身对政治上的片面观点也迷恋起来，那么我们的胜利就远不会像我们至今所认为的那样有成效。其次，在这种场合，另一个好嘲笑的人也许就会不无根据地问我们：究竟谁胜利了——你们还是你们的敌人？

列宁同志在一篇登载于《曙光》杂志第四期上专论我们的土地纲领的文章<sup>①</sup>中机智地嘲笑了“著名的鸟儿的直线性”。不仅在讨论土地问题时应当常常记起他的机智的嘲笑。在政治实践上“著名的鸟儿的直线性”比在理论推论上还要危险。其所以尤其危险，是因为人们容易错认为这是一种坚毅的性格，其实它同坚毅的性格根本没有任何共同之处，而同通常的顽固作风倒是更容易和睦相处得多，不过这种顽固作风绝对不会保证有任何明确的政治思想，绝对不会保证对既定的目标有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的任何意向，因为大家知道，走直线的和作风顽固的人常常不是有始有终的。

政治上一成不变的永恒规则必然会迅速地招致失败。谁希望得到应有的胜利，他就应当只把自己无论如何要达到的目的的愿望看成是唯一不变的。在他那里，其余一切都是可变的，也应当是可变的，因为其余一切对他来说只有相对的价值。

我们希望，下面的例子会很好地表明，我们必需在何种程度上避免“著名的鸟儿的直线性”。

我们所有的人，所谓正统派，换言之，即革命社会民主党的拥护者们，必须同“修正主义”的一切形态和一切变种进行坚决的和不可调和的斗争。修正主义同我们的观点完全不一致。它的最后结论是完全否定社会主义。因此，只有自觉或不自觉地倾向于同现存的事物秩序妥协的人才能同修正主义和解。这是一般的规则。试问，这是不是说，我们永远都要仇视修正主义，随时随地都必须仇视修正主义者呢？有“著名的鸟儿的直线性”这个

<sup>①</sup> 指《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土地纲领》一文，参看《列宁全集》第六卷第87—126页。——译者注

思想特点的人一定会說，是的。我們則认为，無論在什么地方，我們的实际策略都应当取决于时间和地点的情况。这似乎是奇怪的。但讀者馬上会看到，其实沒有任何值得奇怪的地方。

試想，我們的中央（它自然应当由“修正主义”的坚决的和不可調和的敌人組成），是在同这样一些社会民主党人的一个或几个集团打交道，他們起先沉湎于“修正主义”的影响，并以“批評自由”的名义同“正統派”斗争过，而現在則看到了批評自由中所包含的那种危险性，并且承认了“正統派”社会主义即馬克思主义的一切基本原理，現在只是由于某些不彻底性以及所謂思想上的惰性，他們还在保卫着“修正主义者”所喜爱的这些或那些“教条”。我們的中央应当怎样对待这些集团呢？把他們革出教門么？把他們开除出党么？这也許是容易的，而且当然是再“直綫”不过了。但是这样做合不合适呢？换言之：这样做对我们党的統一以及对跟同一个“修正主义”作斗争是不是有好处呢？我們以为：否。

我們究竟为什么同“修正主义者”战斗呢？为的是剝脫他們对无产阶级的影响，因为他們把无产阶级指引到錯誤的道路上去。因此，同他們进行战斗不是为了战争，而是要达到削弱“修正主义”的目的，而如果战斗达不到这个目的，如果由于某种原因战斗不仅不会削弱上述影响，反而会加强这种影响，那么它就会成为有害的，那时最好尽快停止战斗。然而在我們上面所假定的場合下，同“修正主义者”的战斗恰恰不会削弱“修正主义”的影响，而是加强这种影响，因为它会妨碍某一部分社会民主党人同“修正主义”彻底破裂，或者甚至会驅使他們重新同它接近。因此这样做会損害党的利益，而那些仍然认为应当宣战的人，就会暴露出不可原諒的迂腐和駭人听聞的近視。我們的中央应当具备充分的尚武精神，因为这种精神对于它这个革命阶级的代表說来是必不可少的。但是凡屬我們党的利益要求和平的地方，它就必須愛好和平，温和待人，善于让步。捍卫头等重要事业的有組織的无产阶级的领导者，在自己的尚武傾向違反政治利益时，是沒有权利迷恋这些傾向的。

有一些毫无气节的人——这已经是许许多多年的事了——用一种应当得到更好得多的用场的顽强精神哭哭啼啼地建議我們“用同志方式进行辯論”，这些人是很可笑的，而且也可以說是可伶的。然而他們为什么可笑而且可伶呢？仅仅因为他們用自己的政治上的天真想法强要我們把根本不可能同我們一道走的那些……“同志”当作同志。如果他們劝我們寬恕那些可能成为我們的同志并且已經在成为我們的同志的論敌，則他們的劝告就会是很合理的，因此这些劝告本身就值得贊揚，而不是可笑的了。尖刻性只有在适当的地方才是好的。不合时宜的尖刻性与其說是“正統的”社会民主党人的作風，不如說是梭巴开維支<sup>①</sup>的作風。

关于尖刻性在某个个别場合是否适当的問題，自然只有通过权衡这个場合所固有的全部情况才能决定。但是毫无疑问，現在我們不应当尖刻地对待某个时候曾經傾向于“經濟主义”的同志。这些同志的极大的荣誉，应当說是他們絕大多数人在看到了按其思想方式同“經濟主义”有血緣关系的伯恩施坦主义会导致什么結局以后，已經开始日益同我們接近，并且承认了“正統的”社会主义的一切主要原理。不錯，我們現在也还在同他們中間許多人就什么問題进行爭論；意見分歧並沒有完全消除。但是現在这些意見分歧是很不重要的，完全不值得为着这些分歧而面紅耳赤，爭吵不休。再說一遍：如果这些并不重要的意見分歧繼續把我們分成两个敌对的陣营，这对我們的事業将是很有害的。以前我們斗争过；現在我們可以以交換思想为限。以前我們有《曙光》杂志和《火星报》的拥护者同《工人事业报》和《紅旗》杂志的拥护者；現在我們只应当有革命社会民主党的拥护者。他們的观点，無論在細節上彼此間怎样不一致，都可以方便地在同一个机关报的篇幅上表达出来。这个刊物热情地欢迎这些人或者那些人表示态度。現在还没有这样做。但这定会給我們党带来很大的利益，所以应当这样做

<sup>①</sup> 果戈理小說《死魂灵》中的一个粗魯的地主形象。他的名字后来成了莽撞、頑固、愚鈍、慳吝的同义語。——譯者注

**下去。**無論如何我們不应当做任何可能阻礙这个工作的事情。

現時，當我們黨已經脫離了，或者至少是準備脫離自己童年期的時候，我們不妨用批判的眼光回顧一下自己固有的政治觀念，並且反身自問：其中是否有一些觀念只符合兒童的身分呢？這樣的觀念無疑是存在的。我們暫且指出其中之一。我們這裡有許多人都習慣於認為，如果社會民主黨人不希望犯機會主義的錯誤就應當不作讓步。但是有各式各樣的讓步。有一種讓步，按其**實際後果說**等於一種最壞的**讓步**。對那些可能成為我們的同志的人不讓步，會削弱我們同那些絕對不會成為我們的同志的敵人進行鬥爭的力量。這些敵人會利用我們的弱點奪取那些我們有權占領的陣地。於是，對讓步的錯誤的恥辱感使得我們在讓步已成定局的時候被迫讓步。

為了全面开展工人階級的运动必需有一定的權力機關，以保障它有一定程度的**政治自由**。在沒有這種自由的地方，运动就會在不正常的條件下進行。而這種不正常性的最有害的後果之一就是**排他性的宗派精神**。它往往表現在有組織的各個無產階級派別的相互關係中。這個宗派精神既是社會主義軟弱性的一種結果，也是社會主義軟弱性的一個原因。工人階級的偉大利益要求我們盡一切力量從我們的隊伍中消除這種有害的精神。現在比任何時候都更需要做到這一點。隨着我國社會生活的發展，以及我國社會固有的階級矛盾的尖銳化，自覺地敵視革命社會民主黨的人的數量也在增長，因此這個黨在政治上的處境在某種意義上就變得越來越困難了。為着應付我們處境的這種有增無已的困難情況，我們必須把所有可能對我們有利的那些人都吸收到我們的隊伍中來，而凡是堅持無產階級觀點同時又具有進行有計劃的組織工作的願望和能力的那些人都是對我們有利的。只要我們善於理解落在我們肩上的實際義務，而不去效法“直綫的鳥兒”，我們就一定會把所有這些有益的分子吸引到自己身邊來。

另一個例子。有一些任務我們應當加以解決，否則就會陷于

最有害的停滯状态。在这些任务中，沒有比用**党的紀律精神教育我們自己的任务**更为重要的了。沒有紀律，任何有組織的政治活动一般說来都是无法想像的。在我們俄国的条件下更加必需有紀律，因为在俄国，我們沒有进行公开活动的合法条件。最后，對我們俄国革命者說来，尤其必須力求用紀律的精神进行自我教育，因为大家知道，他們的主要缺点就在于**无政府个人主义**。无政府个人主义使得友好的共同工作极难进行。我們的中央有义务十分严格地对待我們队伍中破坏紀律的行为。然而如果它暂时还不善于有节制地履行自己这一重要的义务，那是很可惜的。当問題关系到紀律时，它应当三倍地小心謹慎。我們所追求的紀律完全不是監獄里盛行的那种紀律。士兵之服从长官出于**强迫**；我們之执行（當我們执行时）党的紀律要求則出于**良好的意志**。革命者的良好的意志是我們紀律的**唯一的心理基础**。凡是巩固这个基础的东西，對於我們的革命教育就是有益的；凡是动摇这个基础的东西，对它就是有害的。这种意志是通过許許多多不同的影响巩固起来的。我們不准备一一列举它們，这太长了。我們只說一点，即在這些影响中**服从的要求**不占首要地位。远不如此！俄国革命者之所以常常有一种不可战胜的破坏紀律的願望，正是因为有人要他注意紀律。这自然很不好，而且这种現象根源于一种同为革命理想鞠躬尽瘁的精神毫无共同点的感情。但遺憾的是这是事实，而且不能不考虑这一点。如果我們忘記了它，或者如果我們认为不必要注意現代俄国革命者的心理，那么我們的努力就会引导我們达到与我們所追求的目标直接对立的目的。換句話說，**我們就不会把党組織起来，而会促使它瓦解渙散。我們就不是用紀律的精神教育自己，而是使自己的无政府傾向巩固起来。**这就会給党大大地帮一手倒忙。在这种局面下，非常明显，不适时的严格要求，就其对事业的影响說，很容易招致比任何軟弱性都更坏的后果。同样非常明显，为了支持紀律和巩固紀律，有时对破坏紀律的行为閉着一只眼睛是有益的。最后很明显，現在，當我們剛剛开始

奠定我們黨組織的基礎時，當破壞紀律的個別情況由於長時期的渙散狀態和“手工業方式”遺留下來的壞習慣而常常無法避免的時候，必須經常記住這個道理。無論何時何地絕不适宜的“著名的鳥兒的直線性”現時對於我們說來比任何時候更不适宜，因為它現在會把我們的黨直接引導到毀滅的邊緣。

總而言之，我們必須避免一切可能在我們的隊伍中引起新的分裂的活動。我們的分裂搞得太多了。它們給我們帶來的害處太多了。現在應當用一切力量保持統一。我們黨應該保持統一，否則就會完全喪失政治信譽。如果我們這裡產生新的分裂，那麼工人們（正如人人都知道的，我們以前的糾紛曾經使他們非常不安）就會完全不再理解我們，而我們就會向世界暴露出一幅被軍隊所拋棄和由於內部鬥爭而紀律紊亂的司令部的可悲的和可笑的景象。這種使我們大失所望的結果會給誰帶來好處，那是不難設想的。

某些過分樂觀的同志們說：不用耽心，未來總歸屬於我們，我們的黨經得起一切困難的考驗。對於這種說法，我們的回答是：我們也的確堅信俄國社會民主黨未來一定會勝利，但是這種樂觀的信念完全沒有取消我們用批判的態度對待自己本身行為的神聖義務。我們黨的勝利是由各種條件的總和造成的。其中一些條件具有肯定的意義，而另一些條件則具有否定的意義。如果這個代數總和中在表示我們的實踐活動的符號前面出現了一個負號，那是非常糟糕的。要知道，比命運更殘酷的嘲笑，比歷史更辛辣的諷刺，是不可能設想的。

我們中間還有一種樂觀主義者，他們對現時的局勢理解得很壞。這種樂觀主義者深信，新的分裂對我們的黨說來不是有害的，反而是有利的。要證明這個奇怪的意見，除了說俄國社會民主黨正是由於最近幾年發生殘酷的內訌而發展壯大了以外，是舉不出其他理由的。但是他們忽略了：內訌並沒有促進社會民主黨的發展，而是延緩了它的發展。此外他們忘記了：同一個黨的成員之間



**存在着的意見分歧越是意义不大，这样一些意見分歧所引起的分裂对党的危害就越大。**当我们同“經濟主义者”战斗时，每一个不愚蠢的人都可以毫不困难地懂得进行战争的原因何在。而现在，在我们的队伍里思想上的一致占居統治地位，以致新的分裂显得没有任何严正的根据，只有愚蠢的人才会理解它和原諒它。因此它对我們党的信譽的損害比以前同样很有害的分裂对它的損害就大得不能相提并論了。

一切都在流动，一切都在变化。我們的活动方式也不能始終不变。契訶夫的“套中人”其所以出类拔萃，因为他出外的时候永远穿着套鞋，带着雨傘，而且一定穿着暖和的棉大衣，甚至天日晴和也是如此。我們社会民主党人和套中人不相干。如果我們不适应政治气候的要求，那就很可笑，而且也很坏。彻底的馬克思主义者不可能是、当然也不会是集中制的**空想主义者**。

（譯自《普列汉諾夫全集》第十三卷第3—10頁）

## 对列宁同志的信的答复

(《火星报》编辑部)

一九〇三年十一月二十五日第五十三号《火星报》上发表了列宁的《给〈火星报〉编辑部的信》，答复了《不该这么办》所提出的问题：一般不该这么办以及为了不致引起分裂不该这么办的問題。列宁反对普列汉诺夫向党隐瞒造成分裂的真正原因，要求《火星报》就原則性的意見分歧进行公开辯論。

普列汉诺夫的一篇文章（发表在同一号的《火星报》上）是对列宁的信的答复。他主張停止公开辯論，說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在組織問題上的原則分歧是“微不足道的內部爭吵”，认为“力求使无产阶级来裁判各小組之間所产生的无数爭論，无異于崇拜一切假‘民主主义’中最坏的那种东西。”他誣蔑列宁要求进行公开爭論，弄清领导人的优缺点，便于分配他們的职务的主張是想抓“指揮棒”。

列宁在《进一步，退两步》第十六节中（《列宁全集》第七卷第361—373頁）批判了普列汉诺夫的观点。

我們在这里登載了列宁同志一封有趣的信<sup>①</sup>。我們认为，必須对它作若干評述。

我們很高兴，这位同志喜欢我們的文章《不该这么办》。我們

---

<sup>①</sup> 指《给〈火星报〉编辑部的信》，見《列宁全集》第七卷第98—102頁。——譯者注

也絕對同意我們必須“要光明，要更光明”<sup>①</sup>的看法。誰還能不同意这样做呢？但是在今天的时代里，当光明的方式数目众多、花色不一的时候，各种光明之間的差異是不能不知道的。以群众为依靠的政党应当保卫偉大的階級利益。它也需要一种光明，以使这些利益鮮明夺目地呈現出来。不过这完全不是习惯于用斤斤計較的眼光看待小組生活的各种芝麻瑣事和閑言冷語的人們所要求的那种光明。这些芝麻瑣事和閑言冷語只有在偉大的階級利益尚未成为社会发展的强大因素以前才能使人觉得重要，也才值得弄个清楚明白。列宁同志自己就劝人“坚持拋棄宗派小組活动的傳統”。列宁同志也很适时地坚决声明，他反对在組織問題的政策上采取“梭巴开維支”的方式。如果党内有影响的同志們随时記住这些方式的有害性，我們就再也不会听到这样的声明了；只要党的队伍中还没有把所有“崩得分子”、“工人事业分子”、“南方工人分子”（因《南方工人报》集团而得名）清除出去，我們党内就不可能开展积极的組織工作。这样的声明只能敗坏革命社会民主党的信誉。現在列宁同志着意地嘲笑了和反对了革命队伍里的梭巴开維支分子（不过列宁同志枉然把他們說成是“愚蠢的”，因为他們中間也有很聪明的人物），他作得很好。但是他好像忘怀了，正是充滿“小組习气”精神的“宗派分子”特别喜欢喋喋不休地把各种虽然微不足道却是殘酷的內部爭吵告訴群众。有时还一片痴心地硬說这些爭吵具有世界历史的意义。他們天真地以为，用嘴巴或笔杆对它們作几番議論就能够大大地推进群众的政治教育工作。列宁同志好像还忘怀了，政治上的光明也有自己的干扰規律。面对着这些規律，要是“更光明些”的格言运用得不得体，有时就会造成阴暗。力求使无产阶级来裁判各小組之間所产生的无数爭論，无異于崇拜一切假“民主主义”中最坏的那种东西。

按照列宁同志的意見，必須使党知道每个准备担任領導职务

<sup>①</sup> 原文为《Света, Больше света》（歌德），《列宁全集》中文版第七卷第101頁上譯为“要光明磊落，要光明正大一些。”——譯者注

的候选人的全部活动。列宁同志正确地认为，如果党不得不同它很少了解的候选人打交道，它就会陷入困难的处境。我們凭經驗深知个中道理。但是列宁显然过甚其詞了。他說道：党应当“經常看到自己的某个領導人的每次‘失敗’，哪怕是局部的‘失敗’”。我們以为，有一些“局部的”失敗虽然对个别領導人說来殊堪叹惋，但現在党却不宜严正注視，而不妨（用謝德林的說法）等三十年以后再去看《俄羅斯的往事》。对于这样一些失敗，暫時就让某个波舍洪尼耶<sup>①</sup>的蛤蟆們去嚶嚶叫吧。不过《火星报》編輯部絕對准备在力所能及的範圍內使全体黨員都了解我們队伍中現存的一切意見分歧，并让爭論双方均有申述己見的机会。

列宁同志以为，我們所以需要光明主要是为了便于我們分配自己的領導人的职务，讓他們中間的一个人去奏多情的小提琴，让另一个人去拉狂暴的（？）大提琴，让第三个人去揮动指揮棒。我們对小提琴和大提琴沒有絲毫可反对的，至于說到指揮棒，那么我們是在特殊見解的情况下使用它的。西方运动的历史表明，关于指揮棒的問題正是在宗派“小組习气”时期起过特別重要的作用，但是对于无产階級的階級覺悟的直綫穩步上升則喪失了自己的意义。例如在德国，打从并非永远干练的瑞士“指揮”时代起它就已經不是当务之急了。

似乎在由一把小提琴和一把大提琴組成的“巨大的”乐队中（而某些同志心目中就认为“理想的”政党越来越多地开始采取此种“巨大的”規模）并不需要特別的“指揮”。同时，小組习气的邏輯一定会招致这样的結果：党越是接近此种“理想的”規模，关于“指揮棒”的問題（或者換句話說关于“指揮棒”的地位問題）就越会显得重要。我們必須采取一切措施使我們不致被关于向誰揮动这根棍棒的問題弄得頑固、僵直、近視、狹隘、多疑和乖僻，并因此而根

---

<sup>①</sup> 波舍洪尼耶是謝德林晚年作品《俄羅斯的往事》中的一个偏僻落后的地方。謝德林这部作品的內容是叙述他青年时代所見到的农奴制俄国的風习。他常常用波舍洪尼耶来暗示沙皇俄国。——譯者注

本不能參加按其規模稍微超過由一把溫情的小提琴和一把暴性的大提琴組成的龐大樂隊的樂隊。

在結束語中，我們要斷然地和充滿信心地表示，現在我們不能設想我們黨會有什麼可以稱之為不可避免的分裂。截然相反：現在**完全有可能**統一起來。也正是因为如此，**統一**是絕對必須的。這也就是我們這篇博取了尊敬的列寧同志如此贊許的好評的文章的主要思想。

(譯自《普列漢諾夫全集》第十三卷第 11—13 頁)

## 略論“經濟主義”和“經濟主義者”

(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  
代表大会的几点公开意見)

本文于一九〇三年十二月一日发表在第五十四号《火星报》。文章认为“經濟主義”的理論結構已經彻底被摧毀了，它对俄国无产阶级的任何影响已經被剥夺了，現在許多“經濟主義者”都已成为正統的馬克思主义者，所以，为了共同对敌，“經濟派”和“政治派”应当團結起来，不要再鬧內訌了，否則就“犯了巨大的政治錯誤”。

列宁在《进一步，退两步》第十七节中批判了普列汉諾夫的論点。列宁指出，“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分成經濟派和政治派的时期早已过去了”。普列汉諾夫的錯誤在于，用“庸人的观点”“把已經开始由正統派方面轉到机会主义方面去的馬尔托夫和阿克雪里罗得所犯的新錯誤問題，偷換为今天在許多綱領問題和策略問題上也許願意由机会主义方面轉到正統派方面来的馬尔丁諾夫和阿基莫夫之流所犯的旧錯誤……問題。”（《列宁全集》第七卷第379頁）

就在前不久，我們同“經濟主義”进行了坚持不懈和殘酷无情的斗争。那时在我們的刊物上关于它所写的每一行，都或多或少坚决地对这个思潮进行了襲击。因此，如果我們这篇文章的标题使讀者产生一种对“經濟主義”进行新的攻击的預測，我們是一点不会感到奇怪的。不过，这种預測虽屬十分自然，我們却要事先声

明，它是錯誤的。這一次我們執筆為文完全沒有想要辯論的意思。我們認為，同“經濟主義”的辯論已經足夠了。這種辯論達到了自己的目的。它徹底摧毀了“經濟主義”的理論結構，剝奪了它對俄國無產階級的所有影響。如果繼續同它進行戰鬥，那就像同死尸鬥爭一樣毫無作用。但是從這裡還不能說，它現在對於我們已經完全沒有任何益處了。同尸体鬥爭是荒唐的。但是可以解剖它，而解剖尸体可以使生氣勃勃的人得到有益的教訓。在這篇文章里，我們正是希望用這個解剖學的观点來看“經濟主義”。我們之所以願意解剖死者，是因為它的組織告訴我們，它在生時必然要起的那種歷史作用。

拉丁諺語說：de mortuis aut bene, aut nihil（對於死者要么說好，要么什么都不說）<sup>①</sup>。可惜的是我們在談到“經濟主義”的時候，不能遵循這句諺語給人的善意勸告。我們不能不首先想起死者的舊惡。凡是願意費點氣力認真思索它的理論的人，都懂得這種理論曾經威脅了俄國社會民主黨存在的基础。編造和在我們的隊伍中散布這種理論的人，都是小資產階級思想家，按其本性而言，他們不能擁護無產階級的观点。正是由於這個“充分的原因”他們才力圖把馬克思的學說（他們懂得這個學說是當代最嚴謹的社會學理論）縮小到自己固有的狹隘市儈思想的範圍。像對著名的《資本論》作者進行類似的試驗時，過去一直在發生、將來永遠會發生、而且一定要發生的情況一樣，“經濟主義”的理論家們也犯了某些根本性的理論錯誤。這些錯誤中間最重要的就是眾所周知的兩個观点：第一是對經濟和法律在人類社會歷史發展過程中的关系的观点；第二是對偉大的具有歷史意义的政黨在提高自己代表其利益的那些階級的覺悟問題上所起的作用的观点，而這種观点是同剛才說过的观点密切相關的。這兩個观点曾經具有重要的實踐意义。如果俄國無產階級接受了這兩個观点，那麼這個階級就

---

① 語出第歐根尼·拉爾修(三世紀)：《名哲言行錄》。——譯者注

根本不可能进行打破資本的桎梏、彻底解放自己的斗争，而只能乖乖地跟在自由资产阶级屁股后面走，后者则不过偶尔赏给他们或多或少微小的“社会改良”，作为对行为规矩的奖励。

根据“经济主义”理论家们在思想意识领域中所代表的那个社会阶级的本性，他们是“社会和平”的理论家，这是他们没有料想到的。而无产阶级从“社会和平”中根本不能得到任何东西，恰恰相反，甚至有丧失他们通过社会战争已经取得的成果的危险。不过这种反对工人阶级的不可饶恕的罪行完全可以说明同“经济主义”进行最无情的战争是正确的。然而这还不是一切。“经济主义”理论家们由于未能理解经济和法律的一般关系，因此也由于不理解经济和社会法律的关系，而常常成了这样一些政治思想的宣扬者；如果无产阶级接受了这些思想，即使在同我国现存政治制度的斗争中，它的力量也要大大受到削弱。在这种场合，他们的阶级本能的聲音在錯誤教条的影响下便沉寂了，而且（“教条主义”的影响该多么危险啊！）他们这些如此强烈地热衷于使政治自由取得胜利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家，有时都成了沙皇制度的同盟者。不过他们这样做是不由自主的和不自覺的。但这并未减轻他们的理论的有害影响，而且这再一次地表明，我们当时是完全必须同“经济主义”开战的。每一个懂得它的真正性质和不願意背叛自己的旗帜的社会民主党人都应当向它发起攻击。

假使一切都是如此（而一切无疑都是这样），那么請問，怎样才能说明正是在我们社会民主主义集团中間“经济主义”获得了虽然是暫时的但却是巨大的成功呢？难道社会民主党当时有背叛无产阶级的倾向嗎？对于这个问题，即使是它的最激烈的詛咒者似乎也不敢（自然，一定要他願意持公正态度才行）不作极其重要的保留就断然回答。誠然，在“经济主义”的极盛时期，我们社会民主主义集团并不是像现在这样清一色的成員。当时这个集团内部刚刚形成这样一批人，在他们的影响下，不少参加这个集团的人后来公开轉到资产阶级陣营方面去了。所有这些人——即未来的“批判



者”、馬克思主义的叛徒——不能不抓住“經濟主义”，把它看成是他可以用来使馬克思本人变成資產階級从精神上奴役无产階級的武器的一种学說。但是这些人并没有影响过在工人中間进行宣傳鼓动的社会民主党人，因为这些人絕大多数当时都浸透了强烈的現代資產階級利己主义思想，对于因“非法”活动而坐牢或者流放的前途他們是根本不乐意的。他們竭力避免同勇于牺牲的社会主义思想的代表們直接交往，而只限于在所謂社交界“自己人中間”发发議論，于是社交界很快就明白了：尽管他們說的是自己所不习惯的馬克思主义的術語，但他們同自己是骨肉相亲的。和現在一样，当时在工人群众中进行活动的只有全心全意献身于无产階級和对資產階級恨入骨髓的人。这些完全站在工人階級方面、勇于牺牲的人，也暂时迷恋于“經濟主义”。究竟是什么东西使得他們迷恋它呢？既然我們不能假定他們的这种迷恋是由于資產階級的本能，那么我們就只剩下一个可能的解釋：他們沒有弄清“經濟主义”的真正性质。不过这个解釋还得加以說明：究竟为什么使我們发生兴趣的理論的真正性质仍然是它这一类的追随者所不理解的呢？是不是因为他們沒有思維能力呢？我們也沒有权利这样設想；在思維問題上，“經濟主义”傾向的中等社会民主党人絲毫也不比現時“政治”派社会民主党人弱。自然，应当說实話：一般而言經濟主义者在“理論方面”并没有好大的本事。但是正因为必須老老实实，我們就应当承认，現在的“政治派”眼下也沒有很多这样的才华。在从事实际工作的“經濟主义者”那里，理論一般都沒有得到重視。但是現在“政治”派的实际工作者也并不是怎么了不起地热心于理論。如果真是这样，那么我們說，我們現在从事实际工作的“政治派”也像不久以前从事实际工作的“經濟主义者”一样对理論是漠不关心的。这种对理論的漠不关心态度是俄国革命界的老毛病。关于这个問題我們很快就要同讀者作專門的討論。現在我們仅仅指出，像过去的“經濟主义者”一样，現在“政治派”所固有的毛病不能令人滿意地說明正是构成这些“經濟主义者”的主要特点的

錯誤。因此，很明白，對這種錯誤的說明，應當求之於“經濟主義”時期我們同志們某些其他的心理特點。我現在力求揭示這些特點。

再讀一讀從事實際工作的“經濟主義者”的主要機關報《工人思想報》吧；再讀一讀我們這些集合在這個機關報周圍的同志所有的、不過為數不多的出版物吧。你們會在那裡發現許多錯誤，你們也會懂得，為什麼《工人思想報》對“經濟主義”的論敵如此激烈地惱怒。但是既然它的錯誤現在已經沒有實踐意義，所以我們勸你們不要去鉅研它們，而要把主要注意力放在該報編輯部和撰稿人的、像紅綫一樣貫串他們全部呼喚書、文章和簡訊的基本實際意圖上。可以把這種實際意圖看成是力求**盡一切辦法使我們的社會主義運動具有廣泛的群眾性質**。在這以前，社會主義是知識分子的事業。工人中具有社會主義思想的只是個別的人物，頂多也只是**個別的集團**。而且，他們的社會主義意識越是明白，他們就越是脫離群眾。但是，脫離群眾的社會主義注定會是十分軟弱的。它會成為少數精神上的伊壁鳩魯主義者崇高的幻想、高雅的精神娛樂。脫離群眾的社會主義的這種軟弱性就是以**群眾的不覺悟性為依靠的沙皇政府的力量**。為了消滅這種黑暗力量，為了使社會主義獲得它在文明世界各先進國家中所具有的那個性質，換言之，為了使它獲得整個社會生活發展的强大因素的性質，必須使社會主義理想同俄國無產階級的日常生活需要聯繫起來，必須使它成為這個階級同自己的壓迫者經常進行的嚴重鬥爭的思想表現。但是既然這個鬥爭還處在萌芽狀態，既然它還沒有超出鬥爭者的視野而局限於他們最近的**經濟利益**的那個階段，既然工人階級還沒有完全弄清這些利益同我國現存的**政治制度**的關係，因此表現應當同所表現的東西相一致，我國的社會主義宣傳應當主要具有**經濟性質**。當這種宣傳得到開展，當經濟鬥爭取得廣泛的規模，當參加鬥爭的群眾終於懂得沙皇政府不能不保衛剝削他們的人的時候，政治鼓動的時期就來到了，這時我們就要引導無產階級反對沙皇制度。一直到那個時候，任何政治活動始終是只能使脫離生活的知識分子排

遭无法摆脱的、然而漫长的和无聊的空闲时间的毫无意义的活动。从事实际工作的“经济主义者”过去就是这样議論的。既然他們的議論沒有得到按照自己原来的地位主要傾向于作政治斗争的“知識”界的同情，所以他們就成了知識分子的敌人。我們大家都知道，在他們很多很多人的口里，“知識分子”一詞几乎成了罵人的話。他們对待可以給工人許多教益的知識分子这种敌視态度，阻碍了无产階級階級觉悟的提高，因此应当受到譴責。但是你們在譴責这种态度的同时，应当回想一下它是从何而来的。而一旦回想它从何而来时，你們就不得不承认，从事实际工作的“经济主义者”的过错由于下面这个重要的情况而大大減輕了：在我国社会主义运动过去这段时期，我国知識分子实际上是完全脱离人民群众的。凡是坚决维护现代科学社会主义观点的人，都容易看出从事实际工作的“经济主义者”轰击知識分子的全部錯誤。但問題也就在这里：这种观点既同这些“经济主义者”根本不相容，而且（特别是）同他們把自己批判的锋芒首先指向的那些人也是根本不相容的，因为他們最初所反对的几乎唯一是这样一些民意党人：他們由于同社会民主党人爭論而多少改变了自己的綱領，不过他們始終断然不能全面地充分掌握我們时代的一个最偉大的实践真理，即：社会主义只有随着它之成为无产階級解放斗争的理論表现，才会变成有影响的社会力量。从事实际工作的人歪曲了《共产党宣言》所謂“任何階級斗争都是政治斗争”<sup>①</sup>的原理，把它解釋成这样的意义：一个階級的人們（在这里是工人）同另一个階級的人們（在这里是企业主）的任何冲突都是政治斗争行为。但是，那些按照老規矩以为政治斗争即使根本不成为階級斗争也可以取得胜利的人，对同一个原理的理解要更坏些，正确点說，他們完全忽視了这个原理。后面这个更粗魯的錯誤說明前一个錯誤正是对它的必不可免的糾偏行动。这种行动沒有朝着八十年代刚开始时即已坚持馬克思的观点的

---

① 参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版第475頁。——譯者注

“劳动解放社”力图指引的那个方向走去，这自然是十分可惜的事。但是，沒有也只好沒有。“劳动解放社”团体的世界观太复杂了，所以当时大多数社会民主党人无法掌握它，因为在他們看来，它是奇怪的、可疑的，而且十分接近于他們几乎每天都与之爭吵的民意党人的世界观。現在来讲这件事不能不令人哑然失笑。但是你們是否确信，現時所有的“政治派”完全掌握过上述团体的观点呢？就我們來說，可惜呀！我們远不相信这点。無論在什么地方，即使最“能对付实际問題”的实际工作者，沒有思想是很难度过我們这个“繁难的”世紀的。可是我們的同志們曾經根据一些思想走到了他們根本不当去的地方，即走到了后来用臭名远揚的«Credo»<sup>①</sup>叙述过自己的“新”思想的哲学家們那里，于是就发生了只有我們的运动史上才出現的一种最可悲的 qui pro quo<sup>②</sup>；忠誠地而且忘我地保卫无产階級利益的人們，抱着极不信任的态度把头一扭，避开了这个主要是无产階級的学說，即避开了真正的馬克思主义，而兴高采烈地欢迎致力于用資产階級的方法窜改科学社会主义的先生們的“批評”把戏。这些幼稚的把戏所以有引誘力，是因为他們根据自己对經濟和法律的关系以及党在对階級的政治教育中所起的作用的看法（这个看法，正如已經說过的那样，在理論上是完全站不住脚的），来证实同样錯誤的、但当时从事实际工作的“經濟主义者”非常珍爱的“阶段”理論，以及替当时在工人中間进行的宣傳鼓动工作仅只具有經濟性质辯解。資产階級理論家們的錯誤再适合无产階級利益的实际保卫者的心意也沒有了。那时要对这种誤会不生气，是断断不可的。但是現在，当誤会已經完全成为陈述，那就應該記住，它毕竟只是誤会，在作为实际工作者的“經濟主义者”和作为理論工作者的“經濟主义者”双方之間，按其意图的本质而論，是有极大的差別的。尤其是現在記住这点十分有益，因為我們

---

① 信条、綱領、对一种世界观的闡述。——譯者注

② 張冠李戴的現象、誤会。——譯者注

的确必須“清算”<sup>①</sup>“經濟主义”的統治时期，而在清算的时候，既需要肯定借債<sup>②</sup>，也需要肯定资产<sup>③</sup>；否則清算就会不正确和不公平。作为实际工作者的“經濟主义者”的资产（正如我們上面已經指出过的，这对社会主义者是一个很大的数目），就是他們要使社会主义从小团体的事业变成整个階級的事业。这个很大的数目抵消了他們很大一部分借債。另一个看来是同样份量的数目則是下面这个情况：他們——作为实际工作者的“經濟主义者”——一旦看出从他們的“批評馬克思”中可以得到怎样的实际結論，就立即宣布与自己的理論代表脱离关系。在这方面，法国的米勒兰主义者和德国的伯恩斯坦主义者的壮举對他們起了极大的清醒作用。既然如此，他們也就只好走出他們在自己出現于历史舞台时可惜不能走的那一步，即成为“正統的”馬克思主义者。他們中間有許多都已經成为这样的人了。所以同这样一些人我們現在必須取得一致。我們不仅沒有权利把他們叫做敌人，甚至也沒有权利把他們叫做論敌：他們是我們的同志。虽說在思想方面他們同我們还有某些差異，这种差異是无能为害的。反之，可以毫不夸大地說，凡屬差異消失的地方，那里的思想实际上就会变成僵化的教条，也就会完全停止工作。

在所謂社会革命党人的所謂党的出版物中是看不出任何意見分歧的；在这方面，他們永远是一切都“平安无事”。但是除了对社会主义和革命連最起码的認識都沒有的某些天真的年青人以外，究竟誰会认真地对待这个“党”呢？缺乏任何像样的思想力量就是它所有为数众多的著作的最主要的特征。我們的党不能向它看齐。如果爭論表示着不順遂，那我們社会民主党人注定是不能順遂的。我們的事业比任何其他事业更多地表明：爭論是（用古希腊

---

① ликвидировать 双关詞：清算、消灭。——譯者注

② пассив 双关詞：借債、短处、缺点。——譯者注

③ актив 双关詞：资产、长处、优点。——譯者注

哲学家<sup>①</sup>的話說) **万物之父**。很可能就是現在我們也还得同某个时候在实际工作中以“經濟主义者”姿态出現的那些同志中間的某些人爭論。但是我們同他們可能进行的爭論不应当妨碍我們之間充分的同志般的合作。現在这种合作對我們乃是又一个十分重要的实际問題。我們的不可和解的敌人的数目，即自觉地敌視无产階級革命意图的人的数目，正在以累进的发展速度日益增长，而且也不能不这样。再也不要分散我們的力量了。我們已經走过了总是大大縮小人們的政治視野、使他們居然为一些渺小的理由而各行其是的那个幼稚的小組习气时期。我們已經变成了我們国内最有影响的政党，而政治影响所担負的責任是絕對不会比“貴族身分”小的。我們大家——無論是昨天的“經濟主义者”或者是今天的“政治派”——都毫无例外地应当“清算”自己的旧賬，并且友好地在規模广大的新的党組織中从事共同的工作。要知道，在这里各种人才和各种傾向都可以各得其所。我們应当全体一致地把各自为政看成是严重的政治罪行。对待工人階級的敌人要狠，对待工人階級的朋友即对待我們的同志要和——这就是我們大家、革命的劳动大軍的士兵們一定要坚持的座右銘。不要再鬧內訌了！我們必須團結起来！

过去的从事实际工作的“經濟主义者”現在自然也和从前一样地坚持我們必須經常扩大社会主义运动的規模，支持工人群众同剝削者进行日常的經濟斗争。我們中間究竟誰会怀疑这个思想的偉大理論意义和实践意义呢？不过偶然也有一些“政治派”在反击“經濟主义”的时候走得太远了。他們專門只是进行政治性的宣傳鼓动。这是一个錯誤。这个錯誤，我們的机关报早已指出来了。“政治派”和“經濟主义者”之間互相的同志式的影响越是巩固，重犯这个錯誤的可能性就越小。我們甚至可以承认，某种“經濟主义”的片面性，作为對我們迷恋“純粹的政治”斗争这个极端作風的

① 赫拉克利特殘篇 D 53: 战争是万物之父 (*Πόλεμος πάντων μὲν πατήρ ἐστι*)。——譯者注

平衡物現在也許不无益处。至于組織問題，我們觉得，如果我們回想起过去在“經濟主义者”和“政治派”之間就組織中的“民主制”問題所进行的那一切爭論，要在这个問題上取得妥协恐怕要更加困难得多。但是在这里，我們也应当从“清算”旧賬，“清算”原有的辯論癖好和旧日的片面性开始。由于这些东西，我們的“經濟主义者”有时似乎忘記了，我們不得不在古今所有警察国家中最丑恶的国家里进行活动，而我們的“政治派”有时則仿佛忽略了，我們的目的是无产阶级的阶级运动，而絕不是深信革命需要工人的知識分子的陰謀，像已故的列·吉荷米罗夫所說的那樣。無論如何我們坚信，只要双方都有良好的意願，以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制訂的党章为依据，他們就絲毫不致互相妨碍，而可以齐心协力地和最友好一致地进行工作。这个党章并非沒有巨大的缺点。但是它有一个优点，就是它具有这样一个虽然是消极的，然而却是无可怀疑的性质：它不会給广泛的工人組織造成任何障碍。因此我們的同志們——过去的“經濟主义者”，如果认为党章是自己同“政治派”接近的不可克服的障碍，那就犯了巨大的政治錯誤。

我再說一遍，不要再鬧內訌了！我們必須團結起来！

（譯自《普列汉諾夫全集》第十三卷第 14—22 頁）

## 答尼·列宁同志关于他退出 《火星报》編輯部的信

(《火星报》編輯部)

这篇文章发表在一九〇三年十二月十五日第五十五号《火星报》。文章首先說明《火星报》沒有登載列宁的《我为什么退出了〈火星报〉編輯部?》一文的原因,其次表示不同意列宁的下述意見,即认为党內在組織問題上的意見分歧,根源在于孟什維克对他們未被选进中央机关感到不滿,企图利用自己錯誤的組織政策来粉飾破坏党以达到‘有代表参加中央机关’的目的的人們的立場。文章同时还为孟什維克反党行为的道德动机辯护,并且攻击列宁是“有害的和破坏組織的傾向”的代表。

大約过了半个月,列宁在《〈給一位同志的信(談談我們的組織任务)〉一书的跋》中(《列宁全集》第七卷第119—125頁)对这封信作了答复。

### 丘必特,你在生气……①

尼·列宁同志登載了一封給《火星报》編輯部的信,題为:《我为什么退出了〈火星报〉編輯部?》②在作者看来,这个問題不止具有个人的性质。列宁同志并且认为自己有义务对此作一番公开說明。这是列宁同志的权利。如果列宁同志不在其中談論党組織生

① “丘必特,你在生气,就是說你錯了。”語出希腊諷刺作家琉善。普罗米修斯对宙斯(丘必特)說:“你用沉默作答,就是說你錯了。”——譯者注

② 參看《列宁全集》第七卷第103—110頁。——譯者注



活中的一些事實的話，編輯部就會認為自己有責任在《火星報》上刊登他的信件。因為關於這些事實，黨中央和它的幾個成員（包括《火星報》的四個編輯在內）之間根據中央的提議，達成了“忘記它們”的協議。因此編輯部在決定刊登列寧同志的信件以前，問過中央駐國外的代表：這位黨的成員宣布過的、中央可以“忘記”現在列寧同志提到的事實的願望是否撤消了。對於這個問題所得到的答復只能稱之為模稜兩可的。於是編輯部通知列寧同志直接去找中央。只要中央對於在《火星報》的篇幅上發表本來不打算公開的實際工作情況的消息正式承擔責任，“信”就可以登載。列寧同志沒有理會這個預告，立即出版了自己的“信”。而上面說到的那個中央委員則決定在黨的印刷所里（瞞着中央機關報編輯部）刊印了這封信，同時又不在小冊子上使用黨的標志。

在發現列寧和中央駐國外代表這種行為方式不正確，並且對列寧在談到“拒絕”刊登他的信時沒有引述所以“拒絕”的緣由（正如讀者所看到的，這種“拒絕”只不過延期到弄清中央的真正意圖而已）表示了自己的驚訝心情以後，編輯部根據列寧同志提出的問題的實質，聲明如下：

列寧在自己的信中駁斥了《火星報》第五十三號上《我們的代表大會》一文。他堅決地斷言，代表大會上產生的和至今在黨內出現的組織問題上的意見分歧，其根源在於**部分黨員的不滿情緒**，因為他們和他們的朋友沒有選進中央機關，以及在於我們企圖在《火星報》第五十三號中指出的那些原則上不同的組織政策傾向，這些傾向是為了“粉飾”黨內少數派的立場，即“粉飾”破壞黨以達到“有代表參加中央機關”的目的的人們的立場而虛構出來的。

列寧企圖用自己的武斷使人對黨內兩派中的一派和《火星報》編輯部大多數成員的行為動機產生**道德上的懷疑**，并把兩個組織派別在黨內進行的鬥爭歸結為“爭奪地位”而進行的卑鄙可恥的鬥爭。

這是趣味問題，我們不打算跟列寧走這條路。我們知道，他過

去和現在也都很努力地為中央委員會和中央機關報的特定人選而鬥爭，不過以前我們一直覺得，這個鬥爭之所以進行，是由於企圖用一種我們認為錯誤並且對黨有害而列寧同志則視為唯一有效的方法來鞏固黨內一定的原則。即使列寧同志宣布自己的政治對手是為了“有代表參加中央機關”而破壞黨的“將軍”，我們還是願意抱同樣的看法。我們可以向列寧同志擔保的只有一點：為了同我們認為有害的和破壞組織的傾向（他就是這些傾向的代表）作鬥爭，我們任何時候也不會由於缺乏更令人信服的論據而援引對手動機醜聞。

我們現在聲明，我們所編輯的黨的機關報，是不會把篇幅留下來對目前黨內緊急的問題進行這種“討論”的，因為正如我們在第五十三號<sup>①</sup>中已經說過的，這種“討論”不會帶來“光明，而是造成黑暗”。在回答列寧同志的信時我們不得不實事求是地分析一下他的一本小冊子中的“材料”和論據，而他的大可注意的“信”就登在這本小冊子里。我們認為自己必須騰出《火星報》的几欄給那些打算討論使黨激動的一切問題但對它們採取常言所謂“意氣用事”的態度的人。

（譯自《普列漢諾夫全集》第十三卷第 41—42 頁）

---

<sup>①</sup> 指《火星報》第五十三號上《對列寧同志的信的答復》一文。見本書第 10—13 頁。——譯者注

## 关于使得列宁同志退出 《火星报》編輯部的情况的信

这是普列汉诺夫于一九〇四年一月二十九日针对列宁的《我为什么退出了〈火星报〉编辑部?》一文写给馬尔托夫的一封信，第一次发表在一九〇四年日内瓦出版的馬尔托夫著《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的〈戒严状况〉的斗争》一书中（《戒严状况》是孟什维克在組織問題上反对布尔什维克的一本主要著作）。信中为自己非法进行的补选辩护，并且充满着对列宁的輕蔑和嘲諷。列宁在《关于退出〈火星报〉编辑部的一些情况》一文中曾給予詳細駁斥（見《列宁全集》第七卷第179—184頁）。

尊敬的同志！

关于使得列宁同志退出《火星报》編輯部的情况，我只能說一点：看来这种情况他忘記得差不多了。我赶紧替他溫习一下。

他說：“在同盟代表大会以后，分裂的气氛非常濃厚，因此普列汉诺夫决定补选前任編委”<sup>①</sup>。这是不确切的。根据党章，普列汉诺夫沒有任何权利“决定”这件事，因为补选只能是一致同意的。我简单地“决定”，党中央的不让步会給党带来巨大的損害，因此应当及时作出让步。既然我深信列宁同志不同意这个看法，所以我“决定”辞职，并把这个决定通知了列宁同志。他忘記回忆这件事，或者是发现回忆这件事是不方便的。

他繼續說：“我預料反对派是不会满足于这一点的，并且认为

<sup>①</sup> 參看《列宁全集》第七卷第107頁。——譯者注

改变党代表大会的決議去迎合一个小组是不允許的。但是我又认为給可能實現的党内和平造成障碍是更加不能允許的，因此，从《火星报》第五十一号以后，我就退出了編輯部，同时声明我并不拒絕担任撰稿工作，甚至并不坚持公开宣布我的辞职，如果这样能在党内建立真正的和平的話”<sup>①</sup>。

这又是不确切的。当我对列宁同志說，我希望退出編輯部，因为我不认为可以通过参加編輯部的方式来支持使党导致毁灭的不让步政策，列宁同志反駁說：“不，最好我退出，因为如果您退出，那么任何人都會說：显然，列宁是錯的，如果普列汉諾夫都同他分手了的話。”<sup>②</sup>第二天列宁同志就在自己的辞职书上签了字。

几天以后，他来到了我这里，并且說道，他完全不把自己的退出編輯部看成是对少数派的让步。他补充說：“張伯倫之所以退出內閣正是为了更加巩固自己的障地，我也是如此。”我那时对这些話留了一下神。此后，凡是有人向我談到列宁同志的爱好和平，我就想起張伯倫，而当我在报纸上看到張伯倫的名字时，我就想起列宁同志的爱好和平。

至于說到把列宁同志退出編輯部这个事实通知公众的問題，下面就是一些文件：

—

党总委员会委員、中央机关报編輯部委員格·瓦·普列汉諾夫认为，在目前情况下，对馬尔托夫派让步和补选六个人有利于党的統一，我不同意这种意見，因此我声明辞去党总委员会委員和中央机关报編輯部委員的职务。

尼·列宁

P.S.<sup>③</sup> 在任何情况下，我决不拒絕用自己的工作給新的党中央

① 參看《列宁全集》第七卷第107—108頁。——譯者注

② 同上，第180頁。——譯者注

③ 附言。——譯者注

机关以力所能及的支持。<sup>①</sup>

## 二

……在刊登代表大会的声明的那一号《火星报》上，請把我随信附去的声明也登出来。如果党内建立了完全和平（这是我所希望的），如果你认为需要的話，除了其他的和平条件之外，当然我可以考虑不刊登这个声明。

忠实于您的列宁

十一月十八日<sup>②</sup>

声明的原文如下：

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机关报編輯部

尊敬的同志！請把下列声明登在《火星报》上：

“从一九〇三年十一月一日（新历）起，尼·列宁不再在《火星报》編輯部工作。” 致

社会民主主义的敬礼

尼·列宁<sup>③</sup>

我个人一分钟也不觉得是否把列宁同志退出編輯部一事通知讀者群众是一个重要的問題。但是第二封信的最后几行却告訴我，列宁同志自己是认为这个問題具有最大的重要性的，他打算用对这件事表示沉默来换取相当的等价物。这頗令我惊讶。我抱着惋惜的心情想道，他在某种程度上沾染上了他在《火星报》第五十号上《最低的邏輯推理和最高的厚顏无耻》<sup>④</sup>一文中与之进行斗争的那些人士的习惯。我不认为必須购买他的沉默。这就是我目前可

---

① 参看《列宁全集》第七卷第75頁。——譯者注

② 参看《列宁全集》第三十四卷第195頁。——譯者注

③ 参看《列宁全集》第七卷第96頁。——譯者注

④ 即《最高的厚顏无耻和最低的邏輯推理》，参看《列宁全集》第七卷第44—50頁。——譯者注

以告訴您的一切。我以為這是可以大大地**補充和糾正**列寧同志說過的話。

還有一點。列寧同志的行為使您生氣。依我看來，您對他太嚴格了。我以為，他的行為之所以有很多奇特的地方不過是因為他**完全沒有可笑者的感情**。

忠實於您的**格·普列漢諾夫**

一九〇四年一月二十九日於日內瓦

P.S.您自己清楚地知道，我所進行的補選**並不違反**代表大會的**決議**，因為代表大會通過的黨章准許編輯部可以根據自己的考慮補充自己的成員。

**格·普·**

(譯自《普列漢諾夫全集》第十三卷第 43—45 頁)

## 可悲的誤会

本文发表在一九〇四年一月十五日第五十七号《火星报》。文章继续为《不該这么办》和非法补选《火星报》編委一事辩护。普列汉諾夫用偷天換日的手法否认孟什維克是党内的机会主义派別。他硬說列宁主張立即把他們“驅逐出党”。他攻击布尔什維克是教条主义者，說他們“最重視的是分裂工人”。在“克服形式主义”的借口下断言他进行的补选是符合党的事业的利益的。他的理由是：一半所选举出来的中央机关不能领导全体。列宁在《进一步，退两步》等著作中批判了这些观点。

……这就是我们的生活：  
起先是可笑，  
后来是可悲！

維·格·別林斯基

在《有趣的誤会》（登載在第五十五号《火星报》上）一文中，我嘲笑了对我的文章《不該这么办》作出很奇怪的解釋的自由派政論家。現在我要談一談由同一篇文章所引起、然而在我心里产生了完全不同情感的誤会。那里，我駁斥了敌人；这里，我不得不和同志們爭論。过去，敌对陣营的人天真地歪曲我的思想，我哈哈大笑；現在，我的——可以說是——同事們不願意理解或者不能够理解我的思想，我就变得忧郁起来。如果以为應該把这种不理解归咎于我一人，对我倒是很大的安慰。但可惜的是我們控制不了自己的思想……

使我伤心的誤会不但很大，簡直是浩瀚无边。一位“从群众中来的同志”在給《火星报》編輯部的一封充滿最无情的尖刻諷刺的极端阴險毒辣的信里，用如下的方式說明我这篇倒霉的文章在他身上产生的印象。

“上哪里去申訴呢？每当人們不得不同著作上或实践中的‘異端邪說’发生冲突的时候，我們总会出现这样的問題。——上《火星报》去；人們常常馬上这样回答。虽然没有說出口来，但是只要問題一出现，心里总是这样想……回答是机械地作出来的，就像阳光突然直射眼帘时为了保护眼珠机械地用手遮盖眼睛一样。必需的东西永远在手边，我們也善于珍惜它。今天，当我們讀了第五十二号上《不該这么办》一文的时候它也是必需的。但是它必須加以反对的东西却出现在……《火星报》上。奇怪的視錯觉啊；看来《火星报》这标题登歪了。奇怪的情調啊；看来你讀的是某种虽然厮熟却是異己的作品。在这种異己的作品之上冠以《火星报》的标题，是有点儿歪了，疏忽了……”

虽然正像讀者所看到的，这封信的作者自己就說得有些“疏忽了”，但是我摘引的这一段話毕竟对我产生了最强烈的印象。我开始耽心，人們很快会怀疑我同情伯恩施坦先生、米勒兰先生以及其他“馬克思批判者”。这个耽心由于写这封信的人的下面的一些思想而更加增强了。

他把我的文章中如下的話用最挖苦人的引号勾出来：給誰的多，对他的要求就多，我們的中央所需要的人应当耍聪明得像蛇一样<sup>①</sup>。然后进一步說，除此而外，中央的人应当“不做真正的 salto mortale<sup>②</sup>，salto mortale 不可能把俄国无产階級有觉悟的代表們吸引到自己方面来（这是第五十二号以前的《火星报》十分清楚地教会他們懂得的道理），却能馬上使你們大吃一惊，而当你們再度站起来并且恢复清醒的头脑的时候，你們面前就会摆着一个必

① 参看本书第2頁。——譯者注

② 翻筋斗行为、冒險行为。——譯者注



不可免的問題：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真是越來越糟糕！我發表的異端邪說原來甚至能夠使受過《火星報》良好教育的有覺悟的俄國無產階級代表大吃一驚。因此，這是十足的、令人吃驚的異端邪說。究竟是怎樣被譴責為這樣的異端邪說的呢？必需盡快予以証實。

然而這個可怕的異端邪說究竟是什麼呢？

大概就是對我國社會民主黨人中間這樣一些人採取了過於寬容的態度。這些人，正像我在我的文章里所說的一樣，起先沉溺於“修正主義”的影響，後來看清了其中所包含的危險性，承認了馬克思主義的全部基本原理，現在只是由於思想上的某種不徹底性和惰性，才保衛“修正主義者”所喜愛的某些“教條”。我曾經提出過我們的中央應該怎樣對待這些社會民主黨人的問題，並且回答說，如果它忽然想把他們開除出黨，那就會犯很大的錯誤。突然被我嚇了一大跳的同志很不喜歡這個說法。這一次他不僅用加重點和挖苦人的引號引用了一句意思在於說明某個時候傾向於“修正主義”的一些社會民主黨人的特點的長複合句，而且在這個長複合句的中間還攔進若干尖酸刻薄的括弧，括弧里塗上几句尖酸刻薄的評語。例如：在我談到他們的某種不徹底性時，他就在括弧里放進“僅僅”（我們的着重號）二字；在承認思想有一定的惰性以後，一個括弧擋住了思路，其中提出了一個又是憤怒又是嘲笑的問題，“在有覺悟的無產階級代表那里麼？”（我們的着重號）總而言之，這位同志片刻也不讓我休息。但是，真丟臉，我應當承認，無論是挖苦人的引號，無論是吹毛求疵的着重號，也無論是尖酸刻薄的括弧都不會使我嚇一大跳。我摸不着頭腦的只是：敢情寫這封信的人認為我們本來應當把僅僅犯了某種思想惰性和不徹底性的過錯的人們驅逐出黨麼？這真是太人情淡薄了，像格·伊·烏斯賓斯基小說中的一個人物所說的。這麼一來我們剩下的人多不多呢？就是寫這封信的作者本人是不是能夠算入幸剩者之數呢？對此我沒有確實的信心……誠然，他有不容忍異端邪說的精神。但是要

知道，仅此一端还是不够的……

不过，应当指出，信的作者并没有直接地说：“驱逐”；这就是说，可以假定他也认为不应该驱逐。但是既然如此，为什么他惊讶得魂飞魄散呢？为什么他要用引号挖苦我，用括弧来刺激我，用着重号来吓唬我呢？这样一来，我的令人大吃一惊的异端邪说同他自己的意见又会有什么不同呢？

他大声疾呼：“但是他们<sup>①</sup>不存在了，‘经济主义者’死绝了，而我们祖国的‘马克思主义批评者’早已站到‘是非善恶的彼岸’去了。或者也许有一种征兆表示他们在迅速地用新的形式复活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中央自然会懂得怎样行动。我们认为它是知道怎样行动的。”

首先我要指出，“经济主义者”当时也是属于我们祖国的马克思主义批评者之列的，不过这种情况多半是由于误会造成的。<sup>②</sup>不过这是顺便说说罢了。主要使我感到兴趣的是信的作者所谓经济主义者死绝了这句话的意思应当怎样理解。如果他是想说，“经济主义”作为我国的一种社会主义思潮和作为我国社会民主党的一个派别已经不复存在了，那他就是对。但要知道我所说的也不是思潮，也不是派别，而只是“一个或者几个集团”。也许作者以为，现在我国甚至连这样一些集团也早就不存在了么？假使这样，我可以轻易地告诉他，他弄错了。所以说轻易，是因为我的文章中所说的不是我当年曾经坚决（这种坚决性大概不会比信的作者差些）与之斗争过的那些“经济主义者”，不是对伯恩斯坦先生和他的俄国同道们的理论业绩曾经表示欢迎的那些经济主义者，而是（请读者原谅我这个不得已的重复）懂得“修正主义”所包含的危险性并且承认了“正统”马克思主义的一切基本原理的那些人。这样

---

① 即那个时候沉溺于经济主义的同志们。——著者注

② 关于这种情况是怎样发生的和因为什么发生的，请看我的文章《略论“经济主义”和“经济主义者”》，载第五十三号《火星报》（参看本书第14—23页。——译者注）。——著者注

的“經濟主义者”已經不再是“經濟主义者”了。只是由于傳統，我們才管他們叫“修正主义”的拥护者。“修正主义者”区别于“正統派”的地方也就在于借口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則必須重新审查(Revision, 修正)而不予承认。一旦他轉过来承认了这些原則，他因此也就放棄了“修正主义”。如果我向他伸出手去，那么所謂叫喊我同修正主义进行妥协是会使人觉得奇怪的，而由于惊奇以致魂飞魄散，那就无異于根本不理解这整个問題，或者无異于腦子得了羊癇病，这时我的“異端邪說”自然就完全沒有“因果关系”了。

我要問写这封信的人：我們的队伍里是不是存在着这样一批具有我上面所說的特点的同志呢？要是他对我們党內的实际情况稍为有些了解，那么他对这个問題只会給以肯定的答复，因为不能不这样回答。如果存在这样一批人，那么我們这些“正統的”馬克思主义者应当怎样对待他們的問題就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了。現在，当統一成了我們日程上的實踐問題的时候，如果我們忘記了我們过去不得不跟自己的某一部分同志进行的那个斗争，也沒有問問自己，現在，当他們已經明显地改变了立場，即当他們公开放棄了“修正主义”的时候，能不能跟他們締結和平，以便在可以保证我們原則的全部純洁性的同时結束这种可悲的内訌状态呢？——如果这样，那就会是可笑的。如果有可能通过这样的和平結束这种内訌状态，而我們又不去利用它，那我們就会沒有理由称为严肃的人。我深信，这种可能性現在是充分存在的。我在刊物上表示过这个信念，也准备再做几次这样的表示。如果这个或那个同志以为我錯了，那他尽可以向我指出这一点，他尽可以費一点气力向我证明，我們队伍里現有的这一批过去的“經濟主义者”至今仍然敌視“正統的”馬克思主义观点。这是“事实問題”。这个問題，甚至可以滿腔热情地展开爭論。但是任何一个思想健全的人都不会一想到它的时候就魂飞魄散，就不会认为他周圍的事物“有点儿歪了”，也不会大喊大叫：“不得了哇，有人背叛原則呀！”

的确，我承认，在我国过去的經濟主义者身上仍然还有一些不

彻底的地方和思想上的某种惰性，因此他們依然繼續在重复修正主义者的另一些“教条”。信的作者就是在这个地方加上自己的吹毛求疵的着重号。但是讀过上述一切的人都会明白，无论如何不能把这些“教条”算作修正主义者用来反对我們学說的基本原理、从而迫使我們同这些先生进行殊死斗争的謬論。过去的“經濟主义者”有时同我們发生的意見分歧，是在我們的理論和实践的次要問題上，或者甚至是在更次要的問題上，比方关于知識分子在参加創造工人的社会主义意識中起多大的作用問題、关于組織的类型問題等等就是。在这些問題上，过去的“經濟主义者”同我們发生了分歧，直到現在他們还間或引证一些任何一个最彻底的馬克思主义者都不会想去引证的論据。同时他們間或按照老例从“修正主义者”那里抄襲这个理由或者那个理由。我肯定这一点的时候并不是指这些同志任何什么著作物而說的，而只是我想起了我曾經有机会同他們中間的某些人进行的一些談話。正是同他們的这些談話使我相信，这些同志（他們中間有很可尊敬和很可贵的活动家）的缺点只是思想上有某种不彻底性和惰性，对于这些是必需展开爭論的，但是因此而各行其是的話那就簡直荒唐透頂了。<sup>①</sup> 我沒有主張过向“修正主义”作任何让步，而只是断定过去的“經濟主义者”几乎彻底放棄了“修正主义”。当然，在确定他們現在的观点的性质时我可能有錯，但是怎能談得上異端邪說，而且还是駭人听聞的、叫人吓一大跳的異端邪說呢？

假使責备我有異端邪說（任何有識之士对此一定要哈哈大笑）不是可悲地表現出我国某些“正統”同志們具有某些恶劣的思想习惯，这一切就值不得多加解釋了。被我的“異端思想”吓一大跳的同志說，当他遇到这个或那个異端見解而問自己“上哪里去申訴

---

① 还应当指出，甚至从我們中間那些誰也不会怀疑他們有修正主义的人关于这些問題的議論中，也可以看出相当显著的不彻底性和相当大的思想惰性。只要拿出由于誤会才在我們中間享有絕對无可指摘的声誉的某些出版物，就可以很容易地說明这一点。这是我随时都可以办到的。——著者注

呢？”的时候，他首先（即在我們的机关报由于我的異端見解而陷入原罪的深淵以前）就会立即“机械地”回答說：上《火星报》去。我耽心，信的作者的思想比他自己对这一点的怀疑更經常是“机械的”。我觉得好像他之責备我有異端思想也完全是“机械的”，換句話說，他根本沒有思索我說过的話是什么意思，而是盲目地服从一种联想，在这种联想的控制下，“修正主义者”一詞通常都会使他高呼：“異端思想！”这是非常非常遺憾的。正統的馬克思主义是非常好的真理；但是“机械性”則很不好，特别是在“正統派”的思維里。“正統派”应当辯证地思考，而辯证法同“机械的”、一成不变的思想过程是不相容的。所以，我才对我的《不該这么办》一文在我們自己的陣容里引起的誤会感到如此强烈的痛心；所以，我才同信的作者进行这样一番冗长的說明。我願意对这位作者以及所有抱和他相同見解的人說：当心啊，同志們，你們运用的是这样一种思維方式：过去某些“經濟主义者”的不彻底性同它比較起来，其实还是最輕微的缺点；你們轉瞬就会变成真正的形而上学者，而不善于用不同于“是就是是，非就是非，除此而外，都是鬼話”公式的方式进行思考；这对我們的事情是最糟糕的。

我不知道这样的警告会产生什么結果。但我认为，應該提出这种警告。对力图毫无例外地联合一切人、不分界綫的空想主張的攻击，使我們的某些同志走到相反的极端上去了。他們开始利用两三个他們认为本身包含着“正統派”的全部精髓的短小公式来評判我們的运动中正在实现的一切。然而我們的运动現在却是如此广泛和如此深入，以致这类短小的公式无法包括它。因此利用这些公式的同志們在进行推論时必然会“歪”，而且即使在最好的意願的鼓舞下，他們的行动有时也只会使无产階級的敌人拍手叫好。他們表现出沒有“建党”的能力。他們的視野沒有超出小組的範圍。于是乎毫无必要地怀疑屬於不同集团的人們的相互关系，在一点異端思想的影子也沒有的地方去发现異端思想，在人們本来應該合作共事的地方各行其是。造成这些可悲的后果的公式是如此的狭

隘，以致只要利用它們就可以責備馬克思本人背叛了馬克思主義。事實上，馬克思就在某個地方說過，教條主義者最重視的是分裂工人，而沒有沾染教條主義的人則力求聯合他們。這敢情不是機會主義么？馬克思在建立國際工人協會的時候是怎樣行動的呢？他在為這個協會所寫的章程中多么努力地避開當時工人運動中所有那些如果加以討論、統一的無產階級立即就會分裂為互相敵視的派別、從而給事業造成巨大損害的問題啊！這封信的作者對此有何高見呢？這難道不是系統的機會主義的勝利么？我很遺憾，我們的“強硬派”當年沒有誰在馬克思的周圍。他們大概不會同他开玩笑。他們會在高尚的義憤的刺激下魂飛魄散，然後清醒過來，用這樣一個非常不幸的問題來打擾他，“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①

最糟糕的是某些同志把這樣一些思維方式所產生和培植的近視作風看成是一種幾乎了不起的東西。有例為證。在編輯部的一篇評論一期《火星報》上登載的列寧同志的信的文章中，表示了一個願望：希望追求指揮棒時（在這封信里談到了指揮棒）不致使我們變得乖僻、僵硬、固執、近視、狹隘、多疑，等等。這個願望是我提出來的。當我提出它的時候，我萬沒有料到我會在亞歷山大羅夫同志《致編輯部的信》（我們現在正經歷着給編輯部寫信的时代）的下面一段話中再度遇見我使用的這些形容詞：

“請問對於生活有深刻認識和豐富經驗的人，如果中央機關里出現一些乖僻的、僵硬的、固執的、近視的、多疑的人（世罕其匹的、頑皮的、碩大無朋的、百般叫喊的、百般辱罵的怪物），這些人——可惜呀！——偏愛揮舞指揮棒；如果他們力求模仿瑞士人，為了表面上沒有妨礙也沒有害處、然而實質上陰險的活動（即揮舞指揮棒），按照梭巴開維支的方式用拳頭把……所有不純粹的火星報分子即沒有充分覺悟的分子逐出黨外，那又怎麼樣呢？”等等②。

① 不錯，馬克思也善於不讓步。但他並不是始終利用這種本領。這也是機會主義嘛。難道不是這樣嗎？——著者注

② 參看第五十五號《火星報》副刊。——著者注

这里所謂对生活有深刻認識和丰富經驗的人是指在某些組織問題上跟亚历山大罗夫同志有意見分歧的同志們。我引证的这段話在何种程度上正确地轉述了这些同志的意見，并不是我要解決的問題。我只认为必須指出，亚历山大罗夫同志沒有理解我用乖僻、僵硬等等形容詞加以說明的那些人使我心里产生怎樣的印象。亚历山大罗夫同志以为，我对这些人的看法可能是（虽然是为了嘲笑）同对某种怪物的看法相当的。他大錯特錯了。我們不应当做我曾經用上述形容詞表示其特点的人，这种人自然很惹我討厭，但是我根本不认为他們有什么譎怪之处。我一想到怪物，就总是世罕其匹的和碩大无朋的，換言之，是体积很龐大的<sup>①</sup>。Человек en question<sup>②</sup>都是非常非常矮小的人。“誰相信怪物存在，怪物就能吓唬誰；这样的人至少在我的心目中不能引起任何別的感情，只有對他們本身加以鄙視，并对这样的党表示最深切的惋惜，因为在这个党内他們不仅可以占据一定的地位，甚而至于可以为着‘指揮棒’进行爭吵”。我嘲笑这样的人，而亚历山大罗夫同志以为，只要他們吓唬我一下，我就会觉得他們是某个浪漫小說中的凶神，看来他（而且远不止他一个人）喜欢把这些“小人的儿戏”理想化。这是极坏的征兆。这对党是很大的危險。

我在《不該这么办》一文中說过，我們的中央應該勇敢、坚定和坚决，但是也应该善于让步，如果事业的利益要求这样做的话。对此亚历山大罗夫同志提出一个他觉得“狡猾的”問題：

“設想有一个正統的集团，为了无论如何要在党内表現出自己的特殊性质，而提出选派代表到中央的要求。为了‘无论如何’保持党内和平，《火星报》編輯部难道不向它让步么？”同志們，这岂不

---

① 亚历山大罗夫同志不知道为什么給这个怪物加上一个古怪的屬性：百般辱罵（столаяй），而不是辱罵（лаяй），也就是說不是罵罵（лающе）。这只是順便說說。在我的短文中根本没有說什么用拳头逐出。这是亚历山大罗夫同志裝飾上去的話。——著者注

② 我們所談到的人。——譯者注

是狡猾的然而的确完全适当的問題么？“你們在第五十二号上发表的、引起我們許許多多党的工作人員的誤会的文章，使人有理由产生这样一种‘和平的’思想結合。”

在前一号《火星报》上，編輯部已經向亚历山大罗夫同志說明，他的問題并不像初看起来那样狡猾。我亲自以个人的名义对这种解釋补充說，这与其說是多少狡猾的問題，不如說是十二万分老实的問題；它說明亚历山大罗夫同志根本沒有理解《不該这么办》一文。这位同志繼續用公式主义的态度思考，按照是就是是，非就是非等等的公式进行推論，但是我曾經用一切力量企图证明用这种公式是走不远的，我們現在必須掌握另一种思維方法。我再一次詳細地說明自己的思想。

亚历山大罗夫坚持形式的观点；他只掌握**党章**；他从**法律的观点**进行推論：这个同志的这个願望是同**党章**这一条发生矛盾呢还是不发生矛盾。我們很多人就坚持这样的观点，他們就是这样推論的。我則认为我們应当善于**克服形式主义**，我們現在必需坚持的**不是法律观点，而是政治观点**。这就是我們的分歧所在。

善于**克服形式主义**的人**具体地**进行推論；善于接受政治观点的人所掌握的不是**党章**，或者更正确地說，**不仅是党章，而且也是事实的实际形势**，一定的力量对比。我們党內的这一形势是怎样的呢？这种力量对比关系告訴我們什么呢？

我要直截了当地說，否則他們又会不理解我的話。我在党代表大会上是屬於**多数派**，这个多数派（这从剛剛出版的代表大会記錄中可以看出來）也进行了党中央的选举。但是这个多数是一个根本无足輕重的多数。所以，当最后一次會議上我們中間的一个人轉向少数派以后，代表大会就分裂为**两个相等的部分**，这个多数无足輕重的情況反映在大会的一項決議的条文中。結果出現这样一个局面：**一半所选举的人要领导全体**。我当初就感到这是不正常的。但是那个时候我还不明白这种不正常的現象会导致怎样的实际困难。后来我发现这些困难大得厉害，于是企图尽力消除它們。



我进行了同志們都知道的补选工作。我清楚地認識到，我們的中央必須这样做，因为它应当采取措施成为我們全党的代表，而不只是它的一部分的代表。从党章的观点看来，这自然是不必要的，但这无疑是符合事业利益的要求的。只要我們的中央委员会仍然是（可以說是）**偏离中央的**<sup>①</sup>，那些“該管轄”的人就不会执行这个要求。中央委员会必須实际上成为**中央的**<sup>②</sup>。

这个要求是否会执行呢？这一点我不得而知。但我清楚地知道，执行这个要求乃是引导我們党走出严重危机状态的唯一办法，因为这种危机正在大大削弱我們的陣地和加强我們的为数众多的敌人和对手的陣地。誰需要这种危机呢？無論如何不是我們党；無論如何不是它所代表的那个階級。

您这一次懂得我的話的意思了嗎，亚历山大罗夫同志？如果还是沒有懂得，我劝您記住克雷洛夫老爷爷的話：“敌人出的**主意一定是坏的**”<sup>③</sup>，并且讀一讀最近几号的《革命俄国报》<sup>④</sup>；它們会告訴您很多道理。

这家可靠敬的机关报的政論家們对于我們的內訌高兴得話都說不清楚了。什么緣故？因为这对他們有利。这家机关报的政論家們譴責我有机会主义。其故何哉？因为我們的“**强硬派**”的**不让步态度**對他們有利。

我們所經歷的危机喚起了社会革命党人的希望，如果危机結束，他們自己就会感到希望是完全无法實現的。

社会革命党人再一次對我們的不幸进行投机，正像我們同“經濟主义者”作斗争的时候他們對我們的不幸进行过投机一样。（順

---

① эксцентричный——双关詞：偏心的，沒有共同中心的；奇怪可笑的，反常的。——譯者注

② центральный——双关詞：中央的，中心的；正常的，起領導作用的。——譯者注

③ 參看《克雷洛夫寓言》《獅子和豹子》篇。——譯者注

④ 当时在日內瓦出版的俄国社会革命党的中央机关报。——譯者注

便說說，他們曾經熱烈地支持過經濟主義者。)請聽一聽這些先生們在說什麼吧，亞歷山大羅夫同志，那時您也許就會懂得我的意思。敵人高興的事情一定是壞的。

够了！我還能同口稱社會主義者的反動派先生們談談，但是篇幅不允許我這樣做。我只說兩句話。

對於我們無產階級政黨說來，將來要經歷的危機也許還不止一次。但是這算得了什麼！羅馬的建設非朝夕之功。建設羅馬較之把葉卡捷琳娜二世在巡幸新俄時代曾經大為贊賞的那些美麗如畫的城市和鄉村<sup>①</sup>描畫出來要無比地、無限地困難。在這些城市和鄉村里，一切都井井有條；其中不可能有任何內訌。在社會革命黨內，一切也是如此井井有條的。要知道它本身不過是一幅描畫出來的美妙圖畫而已。我們不會嫉妒它的井井有條！

(譯自《普列漢諾夫全集》第十三卷第46—56頁)

---

① 葉卡捷琳娜二世到南方出巡，大臣波將金為了顯示新併入俄國版圖的克里木的繁榮，沿途假造村落，進行欺騙。——譯者注

## 評烏发人和烏拉尔人的信

(《火星报》編輯部)

本文是一九〇四年四月一日普列汉諾夫以《火星报》編輯部的名义为該报第六十三号写的一篇社論。文章对烏发、中部烏拉尔和帕尔姆委员会的代表写给《火星报》的批評信作了四点“評論”。普列汉諾夫在这里对布尔什維克大肆攻击，說列宁站在幼稚的“小資产阶级的立場”上，說布尔什維克的“組織观点……紧紧接近資产阶级民主派观点”。他为自己的背叛行为辯解，硬說在《紅色国度里的紅色代表大会》一文(在这篇文章里他曾經要求德国党开除修正主义者伯恩施坦，并且批評了考茨基的“橡皮性的”決議)和《不該这么办》一文之間沒有任何矛盾。

这里刊登了烏发、中部烏拉尔和帕尔姆“委员会的代表們”为了答复我們所写的一封信(为什么是委员会的代表們，而不是委员会本身来答复我們，这个问题暫且放在一边)，我們认为自己来做几点評論是有好处的。

一、信的作者們責备《工人事业报》說，“不是它教育了党，而是党教育了它。”这就是說，按照他們的見解，奢望起多少重大作用的机关报，应当有领导党的胆量，并且不害怕在必要时給党的某些“代表”以或多或少严厉的教訓。我們以为，这个意見应用于根据党章应当从思想上领导党的中央机关报是特別公正的。所以我們直接地和公开地告訴写这封信的人們，他們关于一八四八年事件和巴黎公社的議論显然是自相矛盾的，这是以极端貧乏的历史知

識为前提的。有些人把法兰克福議會軟弱无力的原因說成是那里有“一八四八年德国的一切革命流派”的代表，如果这些人不是去“代表”这些或那些委员会，而是决定去温习一下旧課，那他們就会做出好事情来。反之，他們是不会对工人階級說出任何有用的話来的，虽然他們希望引导这个階級“前进”。我們知道，信的作者們可能忘記了自己原来的見解，这才抱怨我們不該提出直率的劝告，甚至本着他們固有的坚决态度，希望用这种或那种方式“解散”我們。但是無論他們怎样用憤怒来威胁我們，都是毫无作用的；因为义务高于一切。

二、信的作者們在闡明“經濟主义者”的特点时說：“他們用高傲的眼光看待知識分子，亦即用高傲的眼光看待革命社会民主党”。这个“亦即”是很出色的。在写这封信的人們的头脑里，“革命社会民主党”的概念显然是被“知識分子”的概念吞并了。这才是最不容置疑的无稽之談，而且还是远非任何社会“革命党人”現在都能够接受的无稽之談。为了“不顾一切”地坚持这种无稽之談，应当坚定地站在“知識分子”的立場上，即站在从事“自由职业”的小資產階級的立場上。但是信的作者們却自以为是正統派。啊，孩子們，你們的年齡多么危險啊！<sup>①</sup>不幸的列宁同志！他的“正統的”拥护者們是多么的高明啊！

三、信的作者們陷入了尷尬的处境，这种处境清楚地表明，巴·阿克雪里罗得的說法是完全正确的，他在自己最近的一篇小品文中肯定地认为我們某些同志的組織观点有最后使他們紧紧接近資產階級民主派观点的危險。巴·阿克雪里罗得对于他的耽心这样快就开始得到证实大概是非常不高兴的。

四、看来，信的作者們以为第四十九号《火星报》上刊登的《紅色国度里的紅色代表大会》一文是列宁写的。实际上它出自本文笔者之手。而我們机关报的第五十二号上刊登的《不該这么办》一

---

<sup>①</sup> 語出德米特里也夫寓言《公鷄、公猫和小耗子》。——譯者注

文也是屬於筆者。上述同志会对这个披露感到很惊奇，他們并且会責备我們不彻底。但是这种責备只是再一次地告訴我們：他們自己的彻底性是非常低劣的。現在，德国的修正主义者完全不像我国过去的“經濟主义者”。他們今天在党内的地位也完全不同。因此，現在对他們的态度必須和对待“經濟主义者”有所区别，这是不奇怪的。似乎这道理不言自明。然而信的作者們是通过蒙蒙大雾来看事物的，所以即便最不容置疑的真理对他們也仍然是不可了解的。就是稍微驅散这层雾，也必須讲一篇相当长的，甚至是最起碼的道理。由于篇幅不够，我們只好把这件事擱到下一号去做；現在我們仅以說明下面这个思想为限（我們以为这个思想的正确性就是这封信的作者們也不会怀疑的）：我們的彻底性，即真正的馬克思主义者的彻底性，換言之，掌握了一定的概念而且能够运用这些概念的馬克思主义者的彻底性，任何时候絕對絲毫不应当像（謝德林的作品《彭帕杜尔》中的）那些死脑筋党人的“信念的毫无道理的坚硬性”那样，这些人认为自己的光荣就是会“用响亮的叫喊震动敌人”，他們的全部政治智慧可以归結为一个信念，即：“对于領導人說来只需要一点：他会勇往直前地行进。”Sapienti sat<sup>①</sup>。

（譯自《普列汉諾夫全集》第十三卷第57—58頁）

---

① 对聰明人來說已經很够了。——譯者注

## 意大利社会党人波倫代表大会

(摘 录)

本文于一九〇四年四月一日发表在第六十三号《火星报》。

一九〇四年新历四月八日——十一日，意大利社会党在波倫举行代表大会。会上，以亚瑟·拉布里奥拉和恩利科·費利为首的革命工团主义者同以伊万奈·波諾米和菲利浦·屠拉梯为首的改良主义者进行了斗争。这篇文章以大体上同情前者的态度叙述了两派的观点。这里摘译的是他在暴力问题上的机会主义言论。

普列汉諾夫在这里实质上否定了剝削者不会自願退出历史舞台、社会革命要由暴力来实现的馬克思主义根本原理。他把暴力和实力截然区别开来，认为暴力只是实力的一种表现形式，新社会的产婆是实力，而不是暴力，革命“斗争中的許多問題”是靠“外交手腕”来解决的，而不是靠“大队入馬”来解决的。

为了更清楚地了解普列汉諾夫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特把他在—八九四年春天写的《实力和暴力(論革命策略問題)》一文和在一九〇五年前后为该文所写的序言附在本文之后，以供参考。这篇文章在当时反对无政府主义的斗争中曾起过很好的作用，但在暴力问题上却暴露出严重的錯誤观点，这些观点部分地决定了他在—九〇五年至—九〇七年革命时期在武装起义问题上，以至整个策略路綫上所采取的立場。

.....

但是为了公平起见，应当指出，关于暴力的行动方式问题，就是革命者也不是始终都能成功地解决的。他们中间有些人（例如亚·拉布里奥拉）就在前不久还把暴力说成是行动的方法。这是一个错误，或者至少可以说它是正确思想的错误表达。对于孕育新社会的旧社会来说，实力永远是产婆。这是不能动摇的事实。但是这个事实还不是说革命阶级在自己的解放运动中经常都采取暴力。完全不是这样。它们的行动方式就像为了求生存而同其他政治组织进行斗争的国家的行动方式一样。在这种斗争中，实力始终是最后的、必不可少的根据，因为胜利总是属于“人多势众”这一方的。但是这种斗争方法并非永远都是暴力，因为在斗争中许多问题都用小得多的代价来解决，并不是凭借“大队人马”，而是依仗外交手腕……<sup>①</sup>“大队人马”是外交手腕的后盾。如果一个国家甚至不通过战争也能够取得这时所要得到的东西，或者，一个国家甚至在它的“大队人马”还没有进行征战的准备的时候，仍然要拿起武器，那么这种“方法”不但不会增加它的力量，反之，倒会迅速地使它走向彻底的毁灭。把暴力提升为“方法”，恰如把合法的行动方式提升为“方法”一样，也是不适宜的。这两者都只应当是革命斗争的不同方式，都只应当是革命方法的不同方面。时间和地点的情况——而且只有这些情况，而不是某种什么抽象的理由——决定着革命的政党应当采取这些方式中间的哪一种。

.....

（译自《普列汉诺夫全集》第十三卷第69页）

---

<sup>①</sup> 此处的删节号是原有的。——译者注

## 附：實力和暴力(論革命策略問題)

### 序 言

一八九四年春，當法國無政府主義者用自己“行動的宣傳”引起了整個文明世界的憤怒，當我接受德國社會民主黨的Vorstand<sup>①</sup>的委託寫了一本小冊子《無政府主義和社會主義》的時候，李卜克內西老人建議我就革命策略問題給我們的德國同志的中央機關報寫一篇文章。我高興地實現了這一建議，給李卜克內西寄去《實力和暴力》一文，後來發表在《Vorwärts》上。李卜克內西寫信告訴我，他很滿意這篇文章，而且意大利的同志們把它譯成了自己的語言，用《La tattica rivoluzionaria》(Forza et violenza)<sup>②</sup>為題出版於米蘭。現在3.同志把它譯成俄語，並要我負責校正他的譯文。我很樂意做這件工作，因為我這篇用小冊子形式出版的論文，最初是用法文寫的，隨後譯成德文，又從德文譯成了意大利文，現在則從意大利文譯為俄文。因此，不完全確切地轉達我的思想的可能性是很大的。

因為在我寫這篇文章的那個時候，無政府主義的策略曾經道路相傳，所以我在論證自己的思想時不止一次地提到了它。現在西方也許早就沒有很大的必要作這樣的引證了，因為那裡的無政府主義已經杳無聲息了。但是在俄國，引證是有益的，因為無政府主義（熱利雅鮑夫在自己的辯護演說中十分中肯地稱無政府主義是我國革命運動中年青人的錯誤）又開始在我們的祖國蔓延起來。因此，我國有覺悟的工人必須知道，我們的策略和無政府主義者的策略有什麼根本區別。

只要弄清了這種區別，我國有覺悟的工人也就不難看到，為什

① 《前進報》。——譯者注

② 《革命的策略》(實力和暴力)。——譯者注



么我不那么赞成我们过去的“布尔什维克们”的策略。这种策略里面，马克思主义太少了，反之，布朗基主义却太多了，甚至可以說无政府主义太多了。

过去的“布尔什维克们”說，由于我们经历过种种事变，我现在所坚持的策略并不是我从前所坚持的那种策略。但是这种說法证明，他们并不了解我以前的策略观点是怎么一回事。讀一讀这本小册子，你们就会看到，当我写它的时候（而这还是在1894年的春天，像我已经說过的那样），我过去对社会民主党的策略的看法完全和现在一样，就是在细节上也并无不同。

我很高兴地知道，李卜克内西和意大利的马克思主义者赞成我的策略观点。我也同样高兴地看到，他们不喜欢列宁的追随者；在我看来，这两种如此不同的情况都分別地、同样可靠地证明了我的策略观点的正确性。

（譯自《普列汉諾夫全集》第十六卷第189—190頁）

—

社会主义者在爭取工人阶级完全解放的斗争中的策略应当是怎样的呢？

誰都明白，各地的条件必然要对这种策略发生影响。但是社会党既然是一个国际政党，就应当制訂出一些共同的、不变的規則，而不問在时间和地点的情况下有什么差别。

此外，应当指出，我们这里所說的不是大家都十分清楚的国际社会党的最終目的，而是这个政党的策略，或者也可以說，这个政党的手段。目的和手段是两个彼此完全不同的概念，纵然手段应当和目的一致，而且凡是企图达到任何一种目的的人，都应该利用各种适当的手段，但是常常会发生这样的情形，各个政党所采取的手段，远不符合它们给自己提出的那些目的。社会主义史上也有类似的錯誤。罗伯特·欧文和傅立叶无疑是追求革命的目的的，但是他们希望用和平手段来达到这些目的。目的和手段之間这种

矛盾，乃是空想社会主义一个最薄弱的方面。

如果我们也犯了这种错误，如果在我们的目的和我们的手段之间存在着根本就不应当有的矛盾，我们的社会主义便不当称为连我们的敌人也予以承认的科学社会主义。

光只说我们的目的是革命的是很不够的。在人类现在所知道的一切目的中间，我们的目的的确是最革命的。但是必须使和这个最革命的目的的内在本性相适应的手段也是革命的，必须使这些手段成为从来的革新派所使用的一切手段中间最革命的手段。

\* \* \*

然则这些目的应当是怎样的呢？

无政府主义者回答说：“唯有非法的手段才是革命的手段。只要你们还坚持参加选举，只要你们的代表还完全从事于由资产阶级手上夺取有利于工人阶级的这些或那些改良，只要你们还在继续承认剥夺你们的言论自由或某些行动的权利的那些法律，——你们就同革命毫不相干，你们就只会变成立法派和和平改革派。

“革命的活动只是在破坏法律的地方开始的；因此这种活动是从起义、从单独的个人或全体群众的暴力行动开始的。你们越是赞成起义和暴力行动，你们就越会变成革命者”。

非常明白的答复。不过需要考察一下这个答复是不是那么正确。

首先使人注意的是：在无政府主义者看来，革命手段和暴力行动是一个意思，是一件东西。但是，这样等量齐观根据何在？

比其他的手段更快地使我们接近我们的目的即接近革命的那种手段，是最革命的。假使这个原理是对的（这里不能有任何怀疑），则由此应当做出下面两条结论：

一、也可能有一些最革命的行动同起义，同暴力行动风马牛不相及。

二、当起义和暴力行动并不使我们接近我们的目的，而是使我们离开我们的目的的时候，它们就永远是反革命的。

只有瞎子才会看不见，无政府主义的暴力行动恰恰是使我们离开我们的目的。

不管无政府主义者真的在某个地方扔下一枚炸弹也罢，不管他们煽动罢工工人采取暴力也罢，不管他们干出任何一桩谋杀案件也罢，——他们的一切行动只会得到一个结果：加强反动势力，也就是说，给工人运动造成新的障碍。无政府主义那种唯恐不是暴力的行动，无非是一种反革命的手段。

\* \* \*

不难理解，使无政府主义者在自己的暴力行动中看到和这些行动的真实本性相反的某种东西的那个真理错在什么地方。

我们随便拿一次革命来说：十七世纪英国革命或者十八世纪、一八三四年和一八四八年的法国革命。在这些革命中，我们每一次都发现许许多多血迹斑斑的暴力行为、起义、巷战、武装冲突和屠杀事件。正是这些暴力行为使无政府主义者犯了错误，这个错误可以大致地表述如下：

“既然在每一次革命中都发生暴力行为，那么只要采取暴力手段就可以引起或加速革命”。

无政府主义者的议论很像某种人的说法：“既然每一次下雨的时候一定撑开伞，那么只要打开这把有用的雨具，雨就会落下来的”。无政府主义者的全部策略就以这种奇怪的诡辩为轴心。不过它也有好的一面，那就只是最好地证明了把暴力手段同革命手段混为一谈是极其天真的。

我们已经说过，比其他的手段更快地使我们接近我们的目的，即接近革命的那种手段是最革命的。因此，凡是削弱支持现代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的力量和增强未来社会制度的信奉者的力量的活动，都应当认为是革命的活动。

这两种力量的相互关系归根到底是由每一个个别国家的经济

关系决定的。任何方式的行动，只要它朝增强拥护新社会制度的人的力量的方向改变这些关系，按其结果来讲，就是革命的行动。

不过說某种手段按其结果来讲是革命的，还不等于說，革命者应当采取这种手段。

\* \* \*

实际上經常有这样的情形：我們的敌人打算用种种反动措施消灭我們，結果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而且还使我們变得比以前更加强大。但是从这里还得出我們应当支持这种反动活动的結論。

毫无疑问，凡是資本主义統治的地方，迟早一定会引起反对現存秩序的武装起义。毫无疑问，資本主义本身就孕育着未来社会的經濟因素，当它产生无产者阶级的时候，也就創造了自己本身的掘墓人。可是我們决不想因此就称資本家先生們是革命者。

当資本家使現有制度的經濟发展完全破产，当他們造就出未来革命的种种因素的时候，他們这样做是事与願違的，不自觉的。恰好相反，他們的自觉的活动則是极端保守的；只要他們的力量办得到，他們就不擇手段地坚决保卫現存秩序不受不滿分子的侵犯，他們就一定会常常为这种侵犯而使无产阶级付出很珍貴的代价。十分明显，这种活动和革命事业是沒有絲毫共同点的。

另一个例子。无政府主义者（我們說的是一些現代的无政府主义者），按其方向是贊成革命的。不过他們事实上只是为反动派的目的效劳。

維持 status quo<sup>①</sup>，主張保持現存秩序的資本家实际上却不随己願地在加速革命的进程。一种人是暴徒，另一种人是守旧分子；这两种人之距离革命者都同样遙远。

只有一方面增强革命力量，另一方面又符合采取这种行动的那些人的意图的那种行动方式才是革命的。

---

① 現状。——譯者注

\* \* \*

利用工厂立法限制資本主义的剝削，通过这些限制使雇佣劳动的政治经济学战胜資本的政治经济学，——这就意味着用革命的精神来改变国内的經濟关系。任何追求这一目的的活动都是革命活动，不管它采取什么形式，它可以用暴力的手段达到这一目的，也可以通过和平的宣傳达到这一目的。

其次，无产阶级的力量越大，一般說来，它就越容易用和平的和合法的手段达到类似的改革。在西伯利亚金矿，工人完全处在企业主的权力下，企业主享有用肉刑惩罚工人的特权。对于这些不幸的人說来，暴力就是自卫的唯一手段，至少也是对資本家之斥罵他們和侮辱他們进行报复的手段。

西欧和北美的工人，为了不受主人的鞭打，没有必要破坏机器，因为他們拥有許許多多合法的手段，可以同自己的剝削者进行斗争。拒絕利用这些手段——这些手段是工人阶级战斗的收获——无异于按照资产阶级的利益拒絕用无数重大牺牲的代价夺来的权利，无异于去做一件絕頂愚蠢的事，无产阶级绝对不会干这样的事，而幻想着为暴力而暴力的无政府主义者先生們則到处說这样的蠢話，做这样的蠢事。

\* \* \*

在这里，也許有人要反駁我們，說我們是在宣傳**国家社会主义**。

“有人告訴我們，既然你們賦予工厂法和各式各样的改革以如此巨大的意义，然則在这种情况下，你們的活动和俾斯麦的活动，或者和任何一个正在草拟工厂法方案的俄国部长之間又有什么区别呢？”

对于这个問題，我們的答复是：

一、所謂国家社会主义其內容就是社会主义者从剝削者政党手上夺得整个一系列的让步。誰不了解国家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的社会主义之間的区别，他任何时候也不会懂得这个經常愉快地

把这些让步一个一个地收入自己的版图的邻国人<sup>①</sup>的行动方式中間存在着怎样的特点。

二、国家社会主义者向民主主义社会主义者让步的目的，按其本质說是**完全保守的**。他們希望通过这些让步結束階級斗争这个現代社会主义运动的灵魂。国家社会主义者企图用一切力量不让无产阶级知道它的利益和资产阶级的利益之間存在着不可調和的敌对性。他們竭尽全力設法阻止工人的階級觉悟的提高，而社会民主党人則认为提高这种觉悟是自己首要的义务和最根本的使命。

## 二

物质力量永远在被剝削者的手里。如果这些被剝削者沒有把物质力量当作自我解放的手段使用，則这只是证明，物质力量本身还不是革命的武器，光只利用这种力量是不能实现革命事业的，它完全不是任何变革的必要条件。要使工人階級善于利用自己的物质力量，就必须使它清楚地了解自己現在的处境，知道自己能够得到解放的条件。我們越是提高无产阶级的階級觉悟，被压迫者的力量就越强大，而現時的事物的秩序就越不穩固。

上世紀的革命家和法国哲学家在其进攻旧制度的当时，决不在任何障碍面前止步。他們无情地破坏一切种类的权力——地上的权力和天上的权力，他們为资产阶级的胜利作了准备。但是既然资产阶级的存在以无产阶级的存在和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剝削为前提，那么当时思想家們的事业只能是半革命的。尽管这些启蒙派有“教养”，他們内心深处是很藐視群众的，他們只把自己的知識交給资产阶级。工人群众当时都在沉睡未醒。

空想社会主义者們已經沒有对不幸的劳动群众的这种藐視态度了。他們如此热情地梦想劳动者得到解放，他們做了这样多的

---

<sup>①</sup> 指俾斯麦。——譯者注

工作来提高劳动者的觉悟，不过話又说回来，他們这样做几乎是不自觉的。他們追求的东西不是阶级斗争，而是试图调和阶级矛盾，因为他們相信只要社会上所有的阶级通力合作，资本主义制度是可以消灭的。所以他們不分青红皂白地时而向剥削者呼吁，时而向被剥削者呼吁，甚至对那些剥削者特别尊重，好像这些剥削者的财富和知識保证他們在社会改造事业中能起很大的作用。

如果说法国启蒙派按其最终目的和他們所采取的手段说只是半个革命者，那么，空想社会主义者按其最终目的说已经是完全的革命者了，不过，正如我們已经说过的，他們唯一只希望用和平的手段达到这些目的。

\* \* \*

科学社会主义的創立者——社会主义民主派——第一次直接向“启蒙”时代的革命者如此害怕和如此輕視的工人群众呼吁。他們的全部任务在于号召这些群众站在工人自己的旗帜下，他們的全部任务在于組織現代的无产阶级。他們向无产阶级宣傳的道理不是不切实际的阶级调和，而是阶级斗争，在这方面他們不仅按自己的目的是革命者，而且按自己的手段说也是革命者。

只要无产阶级懂得它自己的解放应当是什么意思，它迟早就会懂得自己本身的利益和资产阶级的利益是不可调和的。社会主义者向它說明阶级对立的本性，以及这种对立所能有的种种政治的和社会的后果，他們用自己的学說訓練了一支至今还没有过的革命力量，尽管这支力量能够采取的是最合法的形式。提高无产阶级的阶级觉悟是现代社会主义者最革命的手段，是全世界所有社会党共同具有的一个主要特征，或者用更精确的話來說，是每一个个别国家的社会党的一个主要特征。無論时间和地点的条件多么不同，这个手段总是始終不变的。

自从存在着世界和人类企图沿着进步的道路前进以来，被剥削者第一次开始理解到自己受压迫的原因，他們决心要結束人剥

削人的現象。同这种偉大的运动比較起来，世界上一切暴力发动、旧日浪漫派革命家的一切陰謀，都不过是一种天真的儿戏。因此当我们坚决地认为現代社会主义者所使用的手段是只能如此的最革命的手段，而无论这些手段采取什么方式——合法斗争方式或暴力行动方式——的时候，我们是完全正确的。

\* \* \*

許多人都說，社会主义者不应当同资产阶级有任何妥协。說这种話的人是完全对的。不过，把什么叫做同资产阶级的妥协呢？当无产阶级和自由资产阶级共同进行反封建斗争的时候，这不是表明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有了勾結么？根本不是这么回事。因为同资产阶级的任何妥协，都是一种政治协定，它在某种形式上会妨碍工人阶级觉悟的提高。既然任何一个国家里社会党的策略有助于提高这种觉悟，則不问社会主义者对待其他政党的临时态度怎样而妄談妥协，那是可笑的。

我們的比利时的同志們为了普选权同小资产阶级并肩地进行斗争。但是有沒有人会天真地責备他們同小资产阶级妥协呢？爭取普选权的斗争在他們手上是提高工人阶级觉悟的一种强有力的手段，并且使他們有足够的力量担負起革命的事业。

比利时工人的斗争尊重任何形式的暴力，不过在这里，像在所有地方一样，把暴力和实力混为一談是可笑的，而无产阶级实力的泉源就在于提高自己的阶级觉悟。

\* \* \*

空想社会主义者原則上否定了暴力手段，因此犯了学理主义的毛病。社会民主党人并不否定暴力手段，正如他們不放棄和平宣傳一样；他們懂得在一定的条件下暴力手段是不可避免的。同时他們也懂得并且承认，弄清和公开宣布实力和暴力之間有一道很深的鴻沟是极其重要的。社会民主党人所追求的仅仅是发展实力——只是实力而已。至于暴力，那只有在一定的条件下才能使用。在各个文明国家的目前形势下，为了无产阶级本身的利益，不



要醉心于暴力行动<sup>①</sup>。所以我们才进行和平的和合法的宣传鼓动工作。不过即使在我們否定暴力的行动方式的时候，我們仍然不断地发展无产阶级的革命实力，训练无产阶级去夺取未来的胜利。

有人喜欢把阶级斗争比作战争。战争中自然会有许多暴力行动。但是决没有任何一个并不愚蠢的军士会不知道军队的实力和这个军队所使用的任何暴力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别，也决没有任何一个并不愚蠢的军士会不知道非时而用的暴力行动只会损害采取这种行动的那个实力。

\* \* \*

某些报纸上评五一示威游行的文章引得我們发挥了这样一些議論。这个节日的目的，在于通过提高无产阶级觉悟的方法来增强无产阶级的实力。不过也还有一些人，而且是相当聪明的人，把实力和暴力混为一谈。他们天真到不明白为什么社会主义者要尊重各地的具体条件和拒绝为了没有任何意义的娱乐去破坏两三条警厅禁令，把自己党的未来当作儿戏。

(譯自《普列汉諾夫全集》第四卷第 250—258 頁)

---

① 作者为俄文版写的注释。所谓文明世界的目前形势，我自然是指西欧和北美当时的形势。在今天的俄国，无产阶级可以进行合法活动的范围是太小了。不过俄国的无产阶级必须记住，醉心于暴力的行动方式可能导致十分惨重的失败。我国工人阶级的有觉悟的朋友们也应当牢牢记住，暴力和实力不是一个东西，而在一定的条件下，无产阶级的暴力行动可能会阻碍它的实力的发展。

## 集中主义还是波拿巴主义？

(开导替自己請来沙皇的蛤蟆<sup>①</sup>的新尝试)

本文发表在一九〇四年五月一日第六十五号《火星报》，是继《不該这么办》之后又一篇在組織問題上反对列宁主义的重要文章。文中充滿揶揄、嘲笑、諷刺和謾罵。

普列汉諾夫认为孟什維克是“正統的馬克思主义者”，他們在綱領和基本策略問題上都站在正确的立場上。虽然在党章第一条上他表示繼續支持列宁的条文，說馬尔托夫的条文“为各式各样的机会主义分子混进我們党内开了門”，但是他不承认这是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原則性問題，而只把它看成是一个“小节”，并以此攻击列宁：“小节就是一切，为了小节他可以毫不顾惜地什么都干”。布尔什維克的組織观点也是本文歪曲和攻击的主要对象。它认为，列宁主义的民主集中制乃是“紧紧套在我們党的脖子上的絞索”，是“波拿巴主义”，是“涅恰也夫专政的新版本”，布尔什維克“显然把无产阶级专政和对无产阶级的专政混为一談了”。普列汉諾夫对第二次代表大会上两派斗争的錯誤评价表明他根本不懂得这次大

---

① 寓言故事。出自《克雷洛夫寓言》《青蛙們要一个国王》篇。不欢迎民主的青蛙們請求天神給它們派来一个沙皇。第一次派来一段温和文靜、寬洪大量的木头。但是頑皮的、肆无忌惮的青蛙們对它厌烦死了，要求天神另派一个。新来的国王是一个又殘酷又厉害的鶴。它要吃掉有罪的，而在它苛刻的审判下竟没有一个是无罪的。于是沼澤国里青蛙的戶口总是在縮減。——譯者注

会上出現的机会主义和馬克思主义的新的分野何在。

列宁在《告全党书》中指出：“所謂波拿巴主义的誹謗”純粹是“不值一駁”的“胡說”。（《列宁全集》第七卷第428頁）

嘿，这是怎样一种尖刺性啊？！当说话的不是舌头，而是人的灵魂时，难道可以安宁吗？不能！谁都有一个地方怕人碰。

契里科夫先生的《犹太人》<sup>①</sup>中的纳赫曼

讀者自然記得亞·伊·赫尔岑在《往事与回忆》中用何等幽默的笔調描述三十年代我国先进的莫斯科青年界風行一时的对哲学問題的那种热情。“互相热爱的人們整整几个星期由于在‘所把握的精神’的定义上发生分歧而緊張起来，他們抱怨关于‘绝对个性和它的自我存在’的意見。所有在柏林以及其他省城和县城出版的最不足道的有关德国哲学的小册子，只要其中提到了黑格尔，就都被摘录下来，入迷地讀着，几天之內就破了，髒了，頁子也掉了。”整个生活，甚至最不足道的事物，都是通过哲学的眼鏡来看待的。“有人在索科里尼克来回散步，意在专心体验自己与宇宙合而为一的泛神論情感。要是他在路上偶然碰見一个略带醉意的士兵，或者同人交談的妇女，哲学家就不单同他們說話，而且就其直接的和偶然的現象規定人民的实体。各个时代所流的眼泪本身，都严格地被归屬于自己的一个系列，归屬于‘情感’，或者归屬于‘心灵中悲痛的东西’。艺术中的情况也是一样……音乐的哲学被提到了首位。”等等。

現在我們党内（这个党反映着当代先进的意图），也可以看出

---

① 叶甫盖尼·尼古拉也維奇·契里科夫（一八六四——一九三六）：俄国作家，《犹太人》（一九〇四年）是他在高尔基的影响下所写出的比較著名的剧本。——譯者注

与这种热情类似的某种现象。不过现在的热情用在完全不同的远离哲学的对象上面。我国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现在迷恋着**組織問題**。但是现在的热情是和当时一样的强烈；正像当时的人入迷地讀哲学論文和小册子一样，现在的人也如饥如渴地貪讀着談論**組織問題**的小册子和論文。正像当时的朋友們在某个哲学概念的定義上发生分歧时緊張起来一样，现在亲密的同志們在确定某一条党章上不能取得一致意見时也彼此爭執，甚至互相充滿敌意。正像当时一样，现在我們的热情，尽管具有它的全部重要历史意义，还是有某种古怪的性质。如果当时最自然的印象，因为人們通过哲学的眼鏡看待它們而失去了任何自然性，那么现在最簡單的革命實踐問題，由于人們一定要力求使它适合时髦的**組織公式**，有时就获得一种滑稽可笑的經院主义性质。看来我們注定避免不了可笑的极端性，“俄罗斯式的火炉就是这样燒的”，——波戈金說过。但是有各式各样的极端性。年青的莫斯科黑格尔主义者所产生的那些古怪行为只有在极其特殊的場合下才会造成有害的实际后果。这多半是好心的古怪行为。因此，莫斯科的哲学家們互相爭吵为时也就不长；正像亚·伊·赫尔岑所证实的，人們緊張了几个**星期**。而我們为了**組織問題**互相进行的爭吵，一則時間长得无比，二則由于我們某些“实际工作者”狹窄的眼界和不合理的热心，大有給我們党造成很大損害或許还是无法补救的損害的危險；它們甚至还可能导致分裂。所以，它們并不永远簡簡單單地是可笑的；有时它們甚至比滑稽可笑更加可憎許多。如果我有的地方用尖刻的話批評它們，讀者尽可以不觉得奇怪。納赫曼說得对：“当說話的不是舌头而是人的灵魂时，难道可以安宁嗎？”涅克拉索夫用美妙的詞句表达了同样的思想：

誰沒有忧虑和憤怒的生活，  
誰就不愛自己的祖国……

应当意識到叫我們丟臉的是，近来我們这里发生的有害的古怪行为竟然多得这样厉害。看来我不得不經常同它們較量。但是

現在我只想看一看可以說已經使得烏发、中部烏拉尔和帕尔姆委员会的“代表們”永垂不朽的那些不可寬恕的古怪行为。我已經答应过同他們詳細談談，現在我就来实现自己的諾言。

这些有趣的“代表們”无论如何不允許同一个人不自相矛盾就写出《紅色国度里的紅色代表大会》的文章和《不該这么办?》的文章。他們觉得这是完全不可想象的。他們知道第二篇文章是我写的，但认为第一篇是列宁写的。他們滿腔热情地說：“列宁曾經写道，并且教导說，党内敌人——修正主义者、机会主义者和經濟主义者会給党带来怎样的損害。这墨迹还没有干，《火星报》中就有人出来談論对待这些内部的敌人要讲究策略、溫和待人、爱好和平、寬宏大量。”

在第六十三号《火星报》上<sup>①</sup>我已經告訴“代表們”，《紅色代表大会》一文不是列宁的“墨迹”，而是鄙人的“墨迹”。現在我力求向他們說明他們觉得十分不合邏輯的事情的邏輯性。

他們說：“《紅色国度里的紅色代表大会》这篇社論的主要內容是：指出不仅修正主义而且修正主义者給德国社会民主党造成的損害；欢迎第二柏林区的主張把伯恩施坦、赫尔和布劳恩开除出党的決議；指出修正主义者伯恩施坦如果繼續留在党内就会給党造成更多麻煩……社論遺憾地指出，巴黎国际社会党代表會議通过了考茨基的‘橡皮性的決議’<sup>②</sup>，用彬彬有礼的态度对待修正主义者和修正主义。”

正是这样，他們正确地轉述了我的观点，不过使用着一种我們在写政治案件的控訴状时所使用的奇怪的語言罢了。但是問題在于我至今仍然极力坚持这些观点，就是写《不該这么办》一文时也同样坚持它們。如果“代表們”痛苦地喊道：“修正主义者可以庆賀

① 指《評烏发人和烏拉尔人來信》一文。參看本书第43—45頁。——譯者注

② “橡皮性的決議”，双关語，原文作«Каучуковая резолюция», Каучук，意为橡皮，发音与考茨基相近，德文也如此。橡皮性的決議，即意义曖昧的決議。——譯者注

自己光輝的勝利，因為他們終於欺騙了和降服了最不可和解的和最有能力的（自己的？——格·普·）敵人中的一個”，那麼這是一個“誤會”，像格·伊·烏斯賓斯基的遭到憲兵痛打的商人所說的一樣。在《不該這麼辦》一文中我主張“講究策略、溫和待人、愛好和平、寬宏大量”完全不是對伯恩施坦、赫爾之流的先生們說的，也不是對無疑為考茨基的決議所分析的那些政客們（橡皮性一詞即因我而得名），這些政客在“重新審查馬克思主義”的幌子下把德國無產階級推入資產階級民主派的懷抱。這些先生和這些政客都是我們的敵人，因為他們是革命社會主義的敵人。誰要是對他們採取寬容的態度，誰要是想同他們和解，他就會因此表明自己是在同背叛我們整個事業的行為和解。但是我過去所說的那些人同他們完全不一樣。第一，我說的是這樣一些俄國社會民主黨人，他們某時候曾經沉溺於修正主義，沒有認識到它的反無產階級的本質，後來，從他們看到和認清了它的這種本質的時候起，他們就放棄了它，而承認修正主義者所“批判”的正統馬克思主義的一切基本原理，現在只是由於思想上的某種惰性才保存了一些不好的（我的意思是說：形而上學的）思想習慣。第二，我說的是我們一些所謂少數派同志，他們不僅任何時候都不曾沉溺於修正主義，而且相反，始終都站在反對修正主義最堅決最有能力的人物之列。我說過，我們事業的利益——即同一個正統的馬克思主義的利益——要求我們既不要排斥過去的經濟主義者，也不要排斥我們現在的“少數派”。我要繼續不斷地說明這個道理，一直到不合理地熱心於維護“正統思想”的人們責備他們有異端思想並且叫嚷要“釘死他們！釘死他們！”的呼號銷聲斂迹時為止。

事實上，請看看“少數派”吧。在綱領問題上，他們站在同我們一樣的理論立場上。更有甚者：他們的首領——斯塔羅維爾、巴·阿克雪里羅得、維·查蘇利奇、爾·馬爾托夫等同志——都最積極最有成效地參加了我們的綱領的制訂和保衛工作。在基本策略問題上，他們甚至是我們黨（想必是正統的吧？）的觀點的主要表達

者，因为我們的第二次代表大会甚至未經討論即予通过的那些決議的极大部分就是他們提出来的。虽然，輪到討論策略問題的时候恰是代表大会的最后一天，这时已經沒有工夫就它們进行爭論了。但如果我們不是被迫地草率了事，那么我們仍然会毫不迟延地通过少数派提出的決議草案，只是也許要对它們作某些完全次要的、主要是修辞性质的改动，因为这些草案很好地表达了我們在《曙光》和《火星报》上叙述过的和保卫过的策略观点。有些人指出，我关于自由派問題提出的決議草案不像斯塔罗維尔同志提出的草案。<sup>①</sup>但是，第一，代表大会上几乎所有的“多数派”都曾投票贊成过斯塔罗維尔的草案，因此，如果它本身包含了什么異端思想，那么許多“强硬的”火星报分子也有異端的罪过；第二，用任何試剂也絲毫不能在其中发现什么異端思想。我本人在代表大会上曾經对它提了几点个别的意見。但是我做梦也沒有想到，可以把我这些个别的意見解釋成責备斯塔罗維尔同志有修正主义傾向。在这种解釋中，我們早已領教过的**不合理的熱心**又过于多了一些。<sup>②</sup>

既然談到“少数派”，我认为在这里說明一下应当怎样理解我在我們党章第一条問題上對他們提出的那个責备是有益的。我在代表大会上說过：馬尔托夫同志提出的并且得到通过的那一条党章条文为各式各样的机会主义分子混进我們党内开了門。为了消除这个危險，我說过，应当接受列宁同志所主張的那个条文。我現在仍然认为列宁的条文更得体些。但是要知道，这是細节問題，如果据此把我們的同志分为山羊和綿羊<sup>③</sup>，分为不可和解的人和溫

① 这两个草案提付表决时均获得半数票通过。两个決議的全文参看《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會議和中央全会決議选輯》(三)人民大学出版社一九五六年版第18—19頁。——譯者注

② 这是針對列宁批判斯塔罗維尔的“錯誤的決議案”的言論說的。参看《列宁全集》第七卷第321—326頁。——譯者注

③ 語出《聖經》《馬太福音》第二十五章第三十二—三十三节。意为分別良莠、分別有益的和有害的。——譯者注

良柔順的人，則是絕頂荒謬的。最妙的是許多現在不仅可以称为“強硬派”、簡直可以称为“頑固派”、并且准备消灭所有他們认为过分“溫和的”“少数派”的同志，自己就曾經投票贊成馬尔托夫的条文。可以想像得到，連他們自己也不怀疑自己这样做会有任何“溫和性”、任何机会主义。

“对月亮說来光荣是一回事，对太阳說来光荣又是一回事。”关于这一条党章或那一条党章的个别問題是一回事，而因此使得文明世界一切国家里的修正主义者同正統派进行爭論和互相斗爭的那个一般問題又是一回事。根据我鼎力贊成从社会民主党的名单中把否定革命社会主义一切基本原理的伯恩斯坦先生开除出去，还完全得不出我应当敌視提出自己的第一条条文的馬尔托夫同志。伯恩斯坦先生是不可救药的修正主义者，为了无产阶级的利益我們必須同他斗爭到底；馬尔托夫同志却是修正主义的不可和解的敌人，地地道道的正統派，为了同一个阶级的利益我們必須同他携手并肩前进。对待伯恩斯坦先生应当尽量不作让步，对待馬尔托夫同志則应当尽量多作让步。难道这一切不都是简单的么？难道这一切不都是明白的么？难道这一切不都是不言而喻的么？

这一切，既简单，又明白，而且不言而喻。可惜的只是并非对每一个人都是如此。为了普遍的和整体的利益，就要善于在个别問題上让步。然而只有思想不固执于个别問題而能够提高到理解运动的普遍利益的人，才善于在个别問題上让步。如果誰的整个視野不比直徑为半俄寸的地方更大，則在他看来，小节就是一切，为了小节，他可以毫不顾惜地什么都干。謝德林在某个地方提到一个叫伊万諾夫的謀士，他身材十分短小，所以根本“容不下任何广大的东西”。可惜我們这里也有这样一些伊万諾夫。这种身材短小的人物有时給我們党造成恶劣的影响。并不是說他們有因循习惯和保守思想。恰恰相反，他們很是机警灵活，变化无常，“像田野里的微風一样”。今天他們同“經濟主义者”一起走，明天“一股脑



儿”搬到“政治派”方面去；今天他們不願意听那些向他們說明組織的必要性的話，明天除了組織問題他們什麼也不願意听；今天他們根据“民主制”原則解決組織問題，明天他們就变成頑固的**集中主義者**。但他們沒有同任何人一起走过，他們沒有保卫过任何原則，他們沒有向往过任何理想，——在自己的精神发展中，他們任何时候也不会前进一步，而他們的头脑永远总是根本不理解任何“广大的东西”。他們希望引导工人階級，而自己如果没有引路的人，甚至沒有能力从自己的一个可笑的极端过渡到另一个可笑的极端。他們摆脱不开对这种无能的痛苦的意識。他們这些力求尽快向任何“一”靠攏的“零”，像克雷洛夫的替自己請来沙皇的蛤蟆一样，力求为自己寻找“領袖”。而当他們終於找到这样一个人时（有时总是找到一个不愧来引导这些天生瞎子的**独眼人**），他們就以为，救世主降临了。于是乎用这个或那个方法，拿出这个或那个借口，在这个或那个名义下要求让他来**专政**。我已經有幸看到不止一个这样的救世主，我耽心将来我还要不止一次地体验到这种不能用言語来形容的愉快心情。

分裂我們的党，对于我們的伊万諾夫之輩的謀士們說来，是分文不值的。原因简单：关于党的統一的概念也就是“广大的”概念，而他們的头脑，像我們已經知道的那樣，是絕對容不下任何“广大的”东西的。

要是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命运取决于这些不可救药的呆公子，那它無論如何也不会成为严重的社会力量。但是幸而其中还有许多有觉悟的分子；否則它就不会是当代最先进的意图的表达者。这些有觉悟的分子是不会欢迎伊万諾夫之輩的謀士們的；他們捍卫着我們党的統一和榮譽。

然而且回头談談“代表們”吧。除了我对待“少数派”的态度以外，我对待我們过去的“經濟主義者”的态度也使他們不安。

当“經濟主義者”在我們党内占了优势，当所有伊万諾夫之輩的謀士們（这是不言而喻的）都站在他們方面的时候，我曾經同他

們进行过剧烈的斗争。当时他们不怀疑他们将是胜利者。结果并不如此。他们成了战败者。而现在我有时还得保卫他们不受伊万诺夫之辈的那些谋士们的攻击。这些伊万诺夫辈从前与他们为伍，因为我对“经济主义”持否定态度而责备我有異端思想，拼命地叫喊我是布朗基主义者、“民意党人”。现在伊万诺夫之辈的谋士们改变了方针，无论如何开始要“撤消”自己过去的导师和同盟者，责备我有“经济主义”。我并不认为有必要在这里替自己辩护。但是对于我们过去的“经济主义者”，我要说明，既然他们已经认识了自己的错误，并且改正了错误，放弃了他们一个时候由于误会而同情过的修正主义，那么，如果我们继续把他们叫做修正主义者，我们就会是诽谤者。既然他们承认了我们的纲领，他们就是我们的同志。如果谁忽然想拿他们当做没有全部权利的党员看待，他的作法就极不公平了，而且是万分没有好处的。我们革命社会民主党人还有许许多多真正的、不可和解的和改变不了的敌人。所以，如果我们人为地给自己树立敌人，把同我们并肩维护革命无产阶级观点的那些人排斥出去，那是很不理智的。排斥了他们，我们就削弱了自己本身的力量，从而相对地增加我们的敌人的力量，这些敌人并非出自误解，乃是由于正确无误的阶级本能的指使，而一直在同我们进行斗争。我们排斥过去的“经济主义者”，这实际上就是损害我们希望加以保卫的革命社会民主党，而帮助我们希望与之战斗的那个机会主义；我们本来想走进一间房子，结果却走进了另一间房子。难道还有比这更可笑的失算么？难道还有比这更不幸的境况么？

我不愿意让现在大肆攻击过去的“经济主义者”的伊万诺夫之辈的谋士们有任何一个借口来错误地解释我的话，因此我预先说明几句。

我坚决地断言，现在，我们那些不大聪明地热心于“强硬性”的人毫不顾惜地决心使我们党的一类同志像小叶子一片一片地离开朝鲜蓟一样离开另一类同志，这种做法是在为机会主义效劳，甚至

于是替保守的资产阶级和警察局效劳。但是請注意：**我根本不是說他們自觉地这样做。**他們簡直不知道他們在干什么。當我們同“經濟主义”的斗争繼續进行的时候，他們背会了一些名詞：机会主义、修正主义、伯恩施坦主义。現在他們牛头不对馬嘴地乱用这些字眼，不管这些字眼用在誰身上以及根据何在。他們不了解情况已經变了，甚至还要責备任何一个告訴他們情况变化的人是机会主义。这好比你們那里吊着一只关着鸚鵡的籠子，當你們看見在下雨，就当著鸚鵡喊道：“恶劣的天气！”阴雨的天气連續不断，一天，两天，三天，这样长此以往，于是鸚鵡終于記住了你們的喊声，并且每天早晨同你們一起重复說：“恶劣的天气！”后来阴雨的天气結束了，天朗气清，阳光燦烂，你們說：“好日子到底来了！”而你們的羽族同居者仍然喊道：“恶劣的天气！”并且睜着圓圓的眼睛，帶着責备的神色瞅着你們，好像是在指責你們的机会主义。怎么对付它呢？自然，将来它会学会說“好日子到底来了！”但是也許只有阴雨天气再次到来的时候它才学会这样说。而且要知道，直到現在它仍然繼續不断地用不合时宜的喊声：“恶劣的天气！”来打扰你們，并且荒謬地怀疑你們是机会主义。吁，同鸚鵡有什么可爭論的！

拉丁諺語說：“丘必特可做的，牯牛不可做”<sup>①</sup>。我則认为：鸚鵡可做的，“火星报分子”不可做，即使他具有伊万諾夫之輩的謀士們那样的“强硬性”也罷。我們的第二次代表大会是正統馬克思主义的彻底胜利。恐怕只有某个阿基莫夫才会在代表大会上說出反对正統馬克思主义的話。但是誰也不怕阿基莫夫。現在他連菜园里的麻雀都吓不走。我們应当利用自己的胜利。而有人却叫我們遵循这样一种政策，在这种政策的影响下，我們自己的队伍中，即“正統派”的队伍中，发生了和增加了种种分歧和爭执，而且我們的“建党”意图大有終遭慘敗之虞，就像把塔起到天上去的著名的尝

<sup>①</sup> 据古代神話，丘必特变成牯牛偷走了腓尼基国王阿根諾尔的女儿欧罗巴。  
——譯者注

試終遭慘敗一樣。這不是戰勝者的勝利。這是通常只有在戰敗者隊伍中才會大量出現的混亂現象。釀成這種荒唐的混亂現象的禍首自以為是組織者！不。如果他們那里也有什麼才智之士，則這個人所具有的乃是完全否定的、破壞者的品質。

烏發、中部烏拉爾等等的“代表們”把事情說成好像“經濟主義者”至今還沒有放棄對修正主義的同情，而且希望盡力損害革命的社會民主黨，好像他們影響了“少數派”的著作界代表，如阿克雪里羅得、馬爾托夫和維·查蘇利奇等人，這些人反過來又使我受到了惡劣的影響，使我陷入某個時候我所痛恨的機會主義的深重災難中。而最有趣的是，這個極端詭譎的陰謀竟然發生在我進行的眾所周知的自行補選以前，因為《不該這麼辦》一文在我單獨編輯《火星報》的時候就已經出世了。利用這種說明，“代表們”不難恰當地解釋自行補選這個事實：它本身就是“代表們”如此具體刻畫的陰謀的產物。這真是天巧良緣，恰如其數。可惜的只是這樣的說明太使人想起《莫斯科新聞》所謂到處都看到“波蘭人的陰謀”的著名說明。凡是善於用懷疑的態度對待“波蘭人的陰謀”的人，自然也會用不信任的態度對待好像“經濟主義”的陰謀使我大受損害的廢話。他簡直會嘲笑這個“瘋狂的”廢話。

在第六十三號《火星報》上刊載的一篇短評中，我請“代表們”注意這樣一個情況：他們關於西歐各種革命運動的議論說明他們對這些運動的歷史驚人的無知。我不打算在此地去觸動他們世界觀的痛處（如果在這裡可以這樣表達的話）。我只想談一談他們的組織觀點。因為現時這是主要的問題。

“無論是黨的委員會或者個別黨員都可以得到很廣泛的全權，但是這應該取決於中央委員會。反之，如果中央委員會認為有必要和有好處，就可以利用自己的權力解散委員會或另一個組織，它可以剝奪這個或那個黨員的權利。不這樣就不能成功地組織無產階級鬥爭的事業。”

“代表們”的這番話表達了他們的組織觀點的全部本質。並且

不仅是他們的組織观点而已。我深信，几乎所有拥护“多数派”的人都同意他們的观点。連中央委员会本身也不止一次地表示自己深信：为了“无产階級斗争”的利益，它应当享有“遣散”家仆的无限权利。

我們党的“少数派”正是拒絕承认它有这个权利。中央委员会的主張是否有根据呢？我們現在且来看看。

假定我們大家暂时承认中央委员会有“解散”的绝对权利，那时会发生什么情况？一到代表大会临近的时候，中央委员会到处“解散”所有它不满意的分子，到处培植亲信。而一旦这些亲信把持了所有的委员会以后，就可以毫无困难地保证自己在代表大会上占有绝对多数。由中央委员会的亲信組成的代表大会齐声向中央委员会高呼“万岁！”，贊成它的全部成功的和不成功的行动，和鼓掌欢迎它的计划和倡議。那时我們这里的确不会有党内的多数或少数，因为那时我們这里已經实现了波斯国王的理想。謝德林說，当馬克一馬洪沙問早就享有“解散”权利的“强硬的”伊斯兰教徒的这位統治者，在欧洲的国家中間他最喜欢哪一个时，他毫不犹豫地回答說：“俄国”，并且馬上简单地說明了自己的看法：“jamais politique, toujours hourrah! et puis фюкть!”<sup>①</sup> 我們的情况也恰恰是这样：“jamais politique, toujours hourrah! et puis...раскассирование...”<sup>②</sup>

“代表們”把这称为集中主义。算了吧，謀士們！这簡直是紧紧套在我們党的脖子上的絞索，这是**波拿巴主义**，如果不是革命前旧“式”的专制君主主义的話。你們以为这个所謂的“集中主义”是无产階級奋斗的事业所必需的。我要告訴你們，它同无产階級的斗争毫无共同之处。这种思想产生在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头脑中这件事情本身就表明，我們党可惜还没有脱离自己的童年时期。这样的集中主义，已故的謝尔盖·涅恰也夫大概会喜欢，但是它任

① “有政策的时候永远有胜利！然后赶走！”——譯者注

② “有政策的时候永远有胜利！然后……解散……”——譯者注

何时候也不会得到繼續保有自己的智力的正統馬克思主義者的贊同。

“代表們”繼續說：“無產階級進行專政的準備工作是十分重要的組織任務，其他一切都應當服從它。主要的準備工作在於創造一種有利於強大的、有權力的無產階級組織的情緒，在於說明它的全部意義。有人可能反駁說，專政者從來都是東家本人。但是這並不會永遠如斯，也不是天然的，在無產階級的政黨中不應當有社會主義的想法。在這裡應當把高度覺悟同絕對服從結合起來；其一應當引起其他。”（他們在注釋中補充說：認識必然性就是自由意志。）

關於自由意志的哲學性的注釋乃是純粹的胡說八道。這只是表明，伊萬諾夫之流的謀士們根本不可以議論哲學。至於專政，我要向“代表們”指出，他們顯然把無產階級專政和對無產階級的專政混為一談了。不，甚至這樣說也還不確切。在他們的“集中主義”組織的波拿巴主義計劃中，一般說來是沒有無產階級事業的地位的；它是按照前無產階級時期“知識分子”陰謀家矮小的身材剪裁下來的；它不過是涅恰也夫專政<sup>①</sup>的新版本罷了。<sup>②</sup>

代表們繼續說：“自然，我們的中央委員會應當是最有經驗、最有能力、久經鍛煉的戰士的集體，應當是革命社會主義思想最聰明的和經過考驗的繼承者的集體；因此，可以讓他們過問，也應當讓

① 涅恰也夫的組織“人民的懲罰”（一八六九年）是建立在為涅恰也夫及他的感召者巴枯寧所宣揚的耶穌會主義、吓唬、恐怖主義諸原則之上的。涅恰也夫派的黨章說：“該組織的一般原則不是說服，換言之，不是培養力量，而是團結已有的力量”。按照巴枯寧的說法，涅恰也夫的任务不是“教導人民而是使他們暴動”。馬克思和恩格斯曾經堅決地反對過涅恰也夫主義，而涅恰也夫的諸計劃被形容為“軍營的共產主義”。普列漢諾夫把布爾什維主義的民主集中制學說荒謬地說成是“涅恰也夫專政的新版本”。——譯者注

② 無怪乎在“代表們”的頭腦中“知識分子”的概念包括“革命社會民主黨”的概念。這完全不是簡單的筆誤，像因為擁護他們而感到羞耻的人們現在談到他們時所說的那樣。他們準備把自己的使人驚嘆的“專政”當作重要的發現獻給西方無產階級。好一個喜劇演員啊！不用說是頂呱呱的！——著者注

他們过問事務的每一个細节，可以給予他們也应当給予他們最广泛的全权。”

最有經驗和最聪明的战士的集体啊！你們、謀士們，你們究竟在嘲笑誰呢？如果一个集体，按照你們的計劃，本身不过是謀害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生命的罪犯，哪一个有經驗的和聪明的人会願意参加这样的集体呢？！只有胸无点墨的沽名釣譽之徒才会願意参加这样的集体。其所以說是沽名釣譽之徒，因為他們決心要牺牲党的利益来满足自己个人的虛荣心理。其所以說是胸无点墨，因為他們不理解，这种做法是十分低級的、脆弱的和卑鄙的。不行。如果我們党当真让自己成为这样一种組織，那么聪明的人和久經鍛炼的战士很快在它的队伍中就不会有立足之地：那时留在党内的就只会是終于得到心爱的沙皇的蛤蟆們和暢行无阻地一个一个吃掉这些蛤蟆的中央的鶴。Jamais politique, toujours hurrah! et puis…再見了，可怜的、不聪明的蛤蟆們！

“代表們”深信，經濟主义者使我受了恶劣的影响，以至我因此作了过多的让步。人們常常总是責备我寸步不让，所以，能够得到让步者的荣誉倒很叫我高兴。但是为了保持我剛剛获得的这个荣誉，我要告訴“代表們”說，在这个問題上我永远不会让步<sup>①</sup>。我是集中主义者，但不是波拿巴主义者。我主張建立强大的集中制的組織，但我不希望，我們的党中央吃掉整个的党，好像法老瘦弱的母牛吃掉肥胖的母牛一样<sup>②</sup>。我深信审慎明理的社会民主党人中間誰也沒有任何权利在这个問題上让步，因为这个問題关系我們党的存在本身，关系这个有觉悟的、正在成长和发展的无产階級政

① 我十分遺憾，不該在同盟代表大會上支持中央委員會的某些同“代表們”所保衛的組織原則有密切聯系的要求。當時我還沒有弄清這些要求的真正性質。我還不知道我們的超中央委員會可能產生什麼後果。我當時認為自己的道德義務就是維護它的威信。——著者注

② 語出《聖經》《創世記》第四十一章第四節。法老作夢，夢見七只又丑陋又干瘦的母牛吃盡了七只又美好又肥壯的母牛，但它們並未因此變成肥壯的和美好的。——譯者注

党的存在本身。

在这里能够让步而且应当让步的只是那些提出和保卫刚才考虑过的这类主张的人。这些人早就该作出让步了，因为他们对我们的整个运动，对整个俄国解放斗争事业已经造成了多到太多的损失！

我暂且同“代表们”告别吧。我很愿意相信，他们不会拒绝好好地考虑一下我说过话。理解这些话其实是根本不困难的。只要做一点点努力，像狄更斯的唐比小姐所说的那样。

但愿各式各样的“代表们”好好地记住这点：我指出的这个问题是我们在组织问题上一切争论的焦点。只要这个问题得到了正确的解决，其余一切有争论的问题几乎都会迎刃而解。要知道中央委员会之所以不愿意把“少数派”的同志们自行补选到自己的队伍里去，是因为它担心他们会反对它现在的这些古怪的和“可笑的”主张。它清楚地知道，“少数派”之所以希望把自己的代表们派到它那里去，是在为时还不算晚的时候制止它和开导它。就是因为这个缘故，它才呼吁过去有个不得善终的皇帝如此喜欢加以号召的那个«Monsieur le plebiscite»<sup>①</sup>起来反对“少数派”！

(译自《普列汉诺夫全集》第十三卷第 81—93 页)

---

① “全民投票先生”。——译者注



## 現在不能沉默

(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的公开信)

此信发表在一九〇四年五月十五日第六十六号《火星报》。信中为《集中主义还是波拿巴主义?》一文辩护。并进一步激烈地抨击了中央驻国外代表的工作，建議各中央委員同列宁和列宁的小册子《进一步，退两步》划清界限。他繼續把布尔什維克称为“波拿巴主义者”，认为必須將他們“連根拔掉”，說他們所奉行的“絞索政策”的“各种原則的最著名最彻底的表述者一直是列宁”，而列宁則利用自己作为中央国外代表的权力“繼續竭盡全力地把我們党直接推到分裂的边沿”，他要求中央委员会撤消列宁的这种权力。

由于普列汉諾夫的压力，調和派三名中央委員，在布尔什維克派委員缺席的情况下，非法通过了所謂《七月宣言》，《宣言》决定：剝夺列宁的中央国外代表的权力，反对召开第三次代表大会，解散为召开代表大会而进行鼓动工作的中央南方局，不經批准不許出版列宁的著作，承认普列汉諾夫补选的孟什維克《火星报》編委是合法的，等等。

对这些棘手的问题  
给我们直率的回答……

海 涅

同志們!

我党一位最积极的黨員讀者关于我的一篇刊登在第六十五

号《火星报》上的小品文《集中主义还是波拿巴主义?》向我写道：我把你们的政策说成是有觉悟的和正在发展中的无产阶级不应当采取的“波拿巴主义”的政策，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从他的话中可以得出结论说，你们委员会清楚地认识到我们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交托给它的任务的全部巨大性，也很好地懂得，为了解决这个困难的任务，必须团结我们党的一切生气勃勃的力量来进行欣欣向荣的、我们大家共同的和对我們大家同样珍贵的事业。最后，他的信使我有理由认为，你们坚决反对的那个荒谬的思想就是双倍荒谬的专政的思想，它被三倍荒谬的乌发等等、等等、等等的“代表们”宣布是我国革命思想的最有成效的发现，它能够使西方社会主义思想最伟大的发现暗淡失色。

这封信使我不得不思索一下。假使给我写信的同志没有错，假使你们委员会真正同“波拿巴主义”毫无共同之处，那我对你们的态度确是不正确的，而我的小品文理应使你们产生极不公正的想法和深受委屈的情感。如是这样，我首先就准备真诚地对此表示遗憾。但是我越是琢磨我可能错误的思想，一个问题就越是令人厌烦地挡在我的前面：错误的责任究竟要由谁来负呢？对于这个令人厌烦的问题，我——凭着这颗公平无私的良心——只能作如下的答复：

**要是我果然犯了我的通讯人友善地责怪于我的那个错误，则错误的责任整个地恰恰是落在你们中央委员会的同志们身上，而非落在我身上。**

我很清楚地了解到，这样的答复又会引起你们不愉快的惊异，你们可能又觉得是什么律师的花招。但是我请你们相信，同志们，我在这里所以写出和强调这个答复，不是为了来个“金蝉脱壳”（概而言之，我无有毫无意思的“金蝉脱壳”的习惯。若是我发现自己错了，我会干脆承认自己不对），而是为了要你们注意注意策略的特点，只要我这位硬说你们对“波拿巴主义”持否定态度的通讯人讲的是实情，你们自己就应该承认，你们的策略是不适当的和

不必要的。

如果他說的是实情（这是我最最願意相信不过的，因为此种信念使我产生新生的而且极端愉快的希望，它可以令人庆幸地平息我們所有的內訌），然則同志們，請說說，當你們有充分的可能大聲疾呼，立即結束这个可悲的和——主要是——危險的誤会时，你們干嗎一声不吭呢？只要你們說一句强有力的“不！”就可以把我們的“波拿巴主义者”連根拔掉，从而大大有助于保证內部的和平和我党一切力量的实际的团結，这个时候，为何你們无語地沉默呢？現在，当不只是理应表示一下你們对“波拿巴主义”持否定态度，而是要到处放开嗓門直言不諱地宣布你們的这种态度的时候，你們为什么不吱声呢？

你們在俄国采取什么样的“对内政策”，我无法根据直接的观察进行判断。过去我不时收到一些用相当不好的口吻說明这种策略的消息，而現在仍然繼續收到这样的消息。同时你們不願意自行补选“少数派”代表这件事情本身就可以使人认为你們的爱好和平——如果你們真是爱好和平的話——只有很狹窄的范围。写信給我的同志力图用一些我觉得毫无根据的理由为你們的这种态度剖白。从他的辯解中可以看出，你們对現在是我們这个微观世界的高級參謀伊万諾夫的馬利婭·阿列克賽芙娜說的話<sup>①</sup>过于战战兢兢地洗耳恭听了。但是你們实际上是用不着怕这位大人物的，因为他目光短淺，纵令叫喊几句，也不会有任何严重的意义。从我的通訊人的辯解还可以看出，不正确地想像你們委员会这样一个党中央机关的尊严妨碍你們的补选：你們以为不应当向本身沒有形式上的合法性的“要求”让步。果若如此，則你們又錯了。我懂得，类似剛才指出过的說法的理由是可以約束把形式看作头等重要的事情的滿大人<sup>②</sup>的；但我不懂，它何以能約束认为合乎目的性高于—

① 馬利婭·阿列克賽芙娜是格利鮑也多夫的剧本《聪明誤》中的公爵夫人，后世用这个名詞泛指大人先生。——譯者注

② 参看本书第299頁注①。——譯者注

切、而形式微不足道的革命者。这不过是順笔带出来的話。在这个問題上做文章会使我离題太远，故且調轉笔鋒，談一談我凭自己的直接經驗所領会的道理，談一談我在这里，即在国外所亲眼見到的事情。

你們在国外的代表們的活动至今都充滿着我在自己的小品文中称之为波拿巴主义政策，称之为紧紧地套在我們党的脖子上的絞索政策的那种政策的精神。这种政策的各種原則的最著名最彻底的表述者一直是列宁，他的剛毅的然而并不聰明的活动不止一次地使我想起伊万公爵<sup>①</sup>在涅克拉索夫的《現代人》上对“某个追隨者”說的話：

小有聰明什么都不在乎，  
崇拜者把他看成救世主；  
偶然間掌管了閣部，  
整个俄国都受欺愚！

你們自然記得我曾經提請你們委員會注意一下列宁政策的不适当之处。但遺憾的是我沒有从你們那里得到一种可以使我相信你們真正認識到这一点的答复。因为你們沒有撤銷列宁的权力。而他却利用这种权力繼續竭盡全力地把我們党直接推到分裂的边沿。他这样做是有自己完全可以理解的划算的。但是我依旧是怎样想的呢？只不过是：你們贊成列宁的行动，因此，你們支持我认为荒謬可笑的那些奢望。写信給我的同志硬說这个結論不符合实际情况。也許是的。在这个問題上鄙人是非常非常高兴自己弄錯了。但要是我錯，那原因恰恰就在你們的沉默。因为这样一沉默，我和我所知道的所有其他的人就都认为列宁的政策亦即中央委員會的政策。請你們打破你們的沉默吧。請你們直截了当地告訴我們，你們是怎样了解集中主义的，你們对“波拿巴主义”有何看法，或者簡單地說，你們贊不贊成列宁的政策？

---

<sup>①</sup> 伊万公爵：涅克拉索夫作品中的主人公。——譯者注

对这些棘手的问题，  
给我们直率的回答。①

现在这样做尤其适宜、必要和有益，因为正如你们当然知道的，列宁出版了一本在我们的内部纠纷史上会起火上加油的作用的小册子②。至少绝大多数读者都会从这本小册子中得到一个信念：它反映着你们共同的观点，它的出版本身就是你们共同的事业。如果你们不同意列宁的意见，如果他的小册子不反映你们的观点，那么你们应该尽可能迅速地和尽可能明确地表示态度。

在我问你们愿不愿意这样做时，我请你们，同志们，注意以下几点：

第一，当我请你们就列宁的小册子表示态度时，我的着眼点并不是他捧出的那些反对整个现时的中央机关报编辑部或者反对它的个别的成员的责难。根本不是的！我们本身——整个编辑部以及具体说来每一个人——都善于用恰当的方式答复这些责难。从这方面说，列宁是属于我们的。我们不希望任何人来染指我们的著作财产。我请你们对列宁的小册子表示态度是就另一方面说的，即：它可能使人对中央委员会的政策作出不正确的判断。如果你们在这个问题上避不作答，那么大家都会把你们的沉默看成是同意的表示。

第二，同志们，请不要认为我向你们提出这些问题是想进行某种辩论。我以革命者的良心请你们相信，我离任何要同你们进行辩论的想法相去十万八千里。我不过是想说明一下。在我们的相互关系中积累了很多的误会，这主要应归咎于至今作为你们在国外的代表的那些人。这些误会乃是我党软弱无力的根源。在政治斗争中，软弱无力一般说来是很严重的罪行。而现在，当历史事变向我们提出十分严肃的要求时，则是完全不可原谅的罪行。现在

① 出自海涅的《给拉查尔》一诗：丢掉神圣的比喻吧，丢掉空洞的假定吧，对这些棘手的问题，给我们直率的回答。——译者注

② 指《进一步，退两步》。——译者注

我們必須成为强大有力的。为了做到这一步，我們必須巩固我們的團結。而为了巩固我們的團結，我們应当消除足以破坏團結的种种誤会。让列宁去制造誤会吧；因为这是他的利益；而我們事业的利益則要求反其道而行。

請你們努力地使这些誤会烟消云散吧。請支持我們为了我們党内巩固的和平而創立基础的意願吧。請幫助我們保障党的統一，从而使它对事变掌握着它应当获得的那种影响吧，要知道它代表有觉悟的无产階級要求革命的意願。我多次引用过的这位同志的来信，使我有权认为，在这方面，我們的意願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同你們的意願一致的。那就更好。你們就可以更容易向我表明我把荒謬可笑的奢望加在你們身上是錯誤的。駁斥我吧，毫无姑息地駁斥吧！你們的論据越是令人信服，你們对我的反駁越是坚决有力，我就越会大声地和經久不息地向你們鼓掌叫好。但是，請說吧，請說吧！現在不能沉默，因为現在沉默会成为破坏黨員义务的行为。

致以同志般的敬礼

格·普列汉諾夫

(譯自《普列汉諾夫全集》第十三卷第 106—110 頁)

## 答利亚多夫同志

《现在不能沉默》一文发表后，著名的布尔什维克利亚多夫给普列汉诺夫写了一封信，要求他公布事实和文件以证实他对中央国外代表的工作的评述，并且要求他说明要中央委员同列宁划清界限的真正理由。

这篇发表在一九〇四年六月一日第六十七号《火星报》上的文章是普列汉诺夫对利亚多夫的信的公开答复。

作者在答复中避开利亚多夫质问他为什么非难列宁和中央委员会的问题的实质，而傲慢地用嘲讽的口吻训斥利亚多夫，继续为自己的错误立场辩护。

文章发表以后，三十七个侨居日内瓦的布尔什维克再次给普列汉诺夫写了一封公开信，指出他迴避用文件和事实来证明他非难中央和中央国外代表的原因，斥责他的这种行为以及他对布尔什维克一贯采取的态度。列宁在一九〇四年七月二十六日给邦契-布鲁也维奇的信中提到这篇文章时写道：“对普列汉诺夫的答复……一定要出版（要出小册子，而不出小报，并且写一个简短的序言）。请不要耽误，否则就没有意义了。”（《列宁全集》第三十六卷第115页）

最敬爱的同志！我给您的答复不会长。

首先，我要提醒您一下，您的信是用我国过去法律实践中进行所谓刑讯时的那种奇怪的、而且在这种情况下是很可笑的审问口吻写成的。我根本不知道谁给您权利利用这样的口吻同我谈话。难道是因为您是党员以及您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投了我的票这两个

情况么？但是請稍微想一下（只要您那形之于色的气忿还没有完全使您丧失对思考的爱好的話），您自己就会明白，这些情况还不足以使您有权像您忽然想加以审問那样审問我。

当我称之为**紧紧套在我們党的脖子上的絞索政策**的那个政策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取得胜利（如果胜利），那时您的奇怪可笑的口吻（这种口吻現在甚至连俄国官厅也认为是**过时了**）也許就会成为党员同党的著作家（那时这些著作家大概要改名叫“党的編造者”<sup>①</sup>）的相互关系中公认的东西。但是这同我根本不相干。因为那时我自然就不会继续在編輯部里了，也不会继续在党内了。現在，这样的时代还没有到来（对于我們党說来，那将是屈辱和可耻的时代）。而且还很可以怀疑一下它是否会到来。在这个时候，您，最敬爱的，必須举止放礼貌一点，并且記住，**刑訊的口吻是不允許的**，也是行不通的，因为吓唬我或者《火星报》其他任何一位編輯并不如您也許想像的那样轻而易举。所以，您不过是徒然置身于可笑得荒唐和荒唐得可笑的境地罢了。

至于您**訊問的各点**本身，我，这个没有任过公职的唐波夫省的貴族、瓦連廷諾夫的儿子格奥尔基·普列汉諾夫，虽然很早就沒有举行过懺悔和圣餐礼，却要予以答复。这不仅是出于恐惧，而且也本乎良心。

#### **逐項說明所謂我对列宁的“暗示”：**

我没有要求过中央不信任他，也根本不知道閣下对我的这种誹謗因何而起。我从来只是认为，**假使中央不贊成列宁的政策**，那它就应当撤銷这位同志所享有的**作为該机关駐国外代表的那些权力**，而任命另一位代表，以便更好地表达它的（即中央委员会的）意图和願望。仅此而已。这是十分简单的道理。甚至容不下任何广大的东西的伊万諾夫謀士也无需特別运用腦力即可理解。如果这是謀士（对不起，即是利亚多夫同志）所不理解的，則其原因在于他

① “партийный сочинитель”：刻薄的文字游戏。сочинитель一詞有两重意义：作家，著者；編造者，造謠者，臆造者。——譯者注



以及(如果我沒有弄錯)我們相当大一部分“強硬的”同志具有一種特別的情緒。他們感到，他們不可能用邏輯的論據來保卫自己的立場，因此他們急急忙忙地抱怨別人。他們在過分地因小事而見怪方面走得非常迅速，結果很快就超過了我們的社會革命黨人。大家知道，每當自己陷於困難的境地時，這些社會革命黨人就開始叫嚷別人欺負了他們。但是社會革命黨人可做的，社會民主黨人則不可做。因為社會民主黨人對待雕刻出來的、非常美麗的人物(像有一次馬克思在自己的一篇論戰著作中所說過的那樣)的這個可憐的角色，除了无情的蔑視以外，不應當有任何其他感情。

如果過去或者將來在我的哪一篇文章中有什麼委屈列寧的地方，他自己可以出來向我說明。我也會拒絕就我談到他時所講的那些話給他公開的答复。希望他也不拒絕在刊物上就他談到巴·阿克雪里羅得，維·查蘇利奇以及我們黨其他有功勞的黨員時所講的那些話加以說明。我認為列寧不需要訴訟辯護人。因此關於他，我不願意同利亞多夫謀士談任何話。

## 第二點。

至於中央委員會和它的駐國外代表的活動，我在致該委員會的信中已經談到它了<sup>①</sup>。我認為自己正是必須同它，而非同任何其他他人討論這個問題，即使這個第三者在第二次黨代表大會上曾經投過我一票也罷。如果中央委員會願意公開同我討論這個問題，我是有準備的。在這裡，利亞多夫同志並沒有弄錯。因為我有足夠的材料。不過在我對這個問題表示意見以前，中央委員會本身必須出來講講話，而不是某個訴訟辯護人講話，即使他很有訊問的能力也罷。然而如果中央委員會願意公開同我討論，根據邏輯的要求以及按照禮貌的規則，它自然不會拒絕預先答复我在第六十六號《火星報》上向它公開提出的那個問題。在我看來，利亞多夫同志的信起了再一次促使我們的中央委員會答复我的這個問題的

<sup>①</sup> 參看《現在不能沉默》，本書第73—78頁。——譯者注

作用。从这方面說，我认为这位同志的信有利于我們共同的事业，尽管信的口吻同社会民主党人不相称，而对于奥斯特罗夫斯基的登場人物中間任何一个好打官司的人則适合得多。

現在中央委员会的沉默越来越不可能了。

第三点訊問称：“列宁同志，这位您所謂最彻底地体现了这个政策的原则的人，究竟有哪些不合理的行为使您想起了涅克拉索夫的伊万公爵关于閣部和由此而干出的种种欺愚行为的話呢？”

我对写出这一点訊問的那种当权者咄咄逼人的“風格”是有充分的認識的，并且不由自主地再次同涅克拉索夫一起喊道：

什么时候我会有这样的体裁啊！

其次，我认为利亚多夫同志提醒列宁注意那些使我想起他的活动的涅克拉索夫的诗句的做法不見得是合乎謀略的。这种提醒再一次向列宁表明，虽然在需要的时候为我們效劳是珍贵的，但并不是任何人都善于担負起这个任务。

但是根据这一点的本质，我荣幸地提醒閣下注意我在答复第一点訊問时已經說过的那个理由：如果我委屈了列宁，我准备向他說明，但我不认为有必要在同他的訴訟辯护人进行說明上面浪費時間，何况我还不知道該辯护人是否持有合法的公证手續所证实的委托书。

总观上述，我可以靜心地让讀者去判断，看我拒絕就利亚多夫同志向我提出的各点訊問的实质作出答复是否破坏了党员义务。

再說两句話。我在代表大会上并没有投票反对旧編輯部的选举。也不能这样做。原因很简单：我，作为同一个編輯部的成員，沒有参加过这个问题的投票。

如果我这个所謂多数派选举出来的人不贊成它現在的行为，那唯一是因为在我看来这种行为是不合理的和有害的。利亚多夫同志也許认为我没有权利按照自己的信念行动，而必須每一次都按照在代表大会上投票拥护我的同志們的想法行事么？要是这样，我是不难指明这个奇怪的“集中主义者”大大地弄錯了。他是

否真的这样想呢？我可以拿出他援引他曾經投过我一票作佐证。其实这种情况絲毫不会增加他对于我的权利；無論他在代表大会上投誰的票，他的这些权利并不大于也不小于我們党所有其他党员对我的权利。

够了！特維尔委员会看出，我們不拒絕刊登所謂多数派的著作界代表的作品。如果这些代表們……至今並沒有十分成功地把意思表达出来，那不是我們的过錯。

P.S.①說到少数派的所謂机会主义，我并不认为有必要同利亚多夫同志爭論。因为我已經多次证明过，要說像巴·阿克雪里罗得、馬尔托夫、斯塔罗維尔等这样一些同志有机会主义，那无異于不懂得这个名詞的意义。如果他們硬要一个劲儿地去找机会主义，可以断言是毫无希望的。

怪事！我們有人开始把那些不願意使自己的观点去适应列宁的观点和“性情”的人，即把那些沒有这个倒行逆施的小梭倫所中意的机会主义的人称为机会主义者。而那些具有这种机会主义的人却不知为何称作强硬派。他們越是有这种机会主义，他們就觉得自己和其他人是强硬的。名詞也像书籍一样有自己的命运！但是利亚多夫同志知道，我并不坚持这个奇怪的术语，因为我对“强硬派”（即他們中間那一部分名副其实的人）是另有叫法的。

P.P.S.②除了利亚多夫同志以外，还有一个什么尼洛夫也給我來了一封信。此生我压根儿不認識。因此我不仅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投过誰的票，甚至也不知道他有沒有权利投我們中間任何一个人的票。換句話說，我不知道此生是否屬於我們党。如果利亚多夫是审問，則尼洛夫簡直在謾罵。我們編輯部并不认为自己有义务在《火星报》各栏中登載这种謾罵。这种謾罵从上述情况看来似乎是匿名的。

（譯自《普列汉諾夫全集》第十三卷第111—115頁）

① 附言。——譯者注

② 再者。——譯者注

## 工人階級和 社会民主主义知識分子

本文于一九〇四年七月二十五日和八月一日分两次連載在第七十和七十一号《火星报》。它是一篇說明普列汉諾夫对列宁主义的組織路綫和策略观点的錯誤理解的理論根源的重要文章。

作者从列宁的《怎么办?》中抓住列宁“个别的表述不完全恰当或不完全确切的說法”(主要是“社会民主主义的理論完全不依赖于工人运动的自发增长”一語)，“根本不管小册子的一般内容和整个精神”，“吹毛求疵，断章取义”(均列宁語)地乱罵一通，硬說列宁像布魯諾·鮑威尔把物质、“批判者”同精神、群众对立起来，或者像民粹派把英雄同群氓对立起来一样，把領袖、“知識分子”同无产階級对立起来，說列宁企图用“狹隘的和可怜的小組的政客作風”来“代替广泛的、自由的階級政治”，說列宁的实践活动就是“旧的涅恰也夫主义和巴枯宁主义的阴謀的实践活动”，列宁是巴枯宁式的集中主义者、“小小救世主和小小的‘专政者’”，等等。他认为列宁在社会意識和社会存在的相互关系这个历史唯物主义根本問題上背棄了馬克思主义，陷入了唯心主义，列宁的这个“錯誤观点”“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决定了”列宁主义者的“策略的和組織的概念”。

斯大林在評論这篇文章时指出，普列汉諾夫“用英雄与群氓”的詞句混淆了問題，即把存在对意識的关系这个

理論問題同被領導者對領導者的關係的這個策略問題混為一談。（《斯大林全集》第一卷第52頁）

本文從社會存在和社會意識的關係這個“歷史哲學”的根本問題出發“指出列寧對‘政治’和經濟鬥爭的觀點錯誤”，並且“揭露他的理論錯誤同他的組織計劃的聯繫”。

本文還概述了在這個問題上意見分歧的歷史。

對於普列漢諾夫的攻击，列寧僅在一九〇五年三月二十三日第十一號《前進報》上加了一個短評式的按語（《列寧全集》第八卷第218頁）。後來在一九〇七年九月寫的《〈十二年來〉文集序言》中再次簡略地提到這個攻击，並說明了“問題的實質”（同上第十三卷第89—91頁）。斯大林在《庫泰依斯來信》和《略論黨內意見分歧》中對本文根本論點的實質和意見分歧的根源作過比較詳細的分析。（《斯大林全集》第一卷第47—49、51—52、107—117頁）

遲做比不做好……①

—②

這裡提出的社會民主主義知識分子同工人階級的關係問題是我們要加以探討的。這個問題只是“歷史哲學”的根本問題即社會“存在”同社會“思維”的關係問題的一種不同的說法。可以說在整個十九世紀，後一問題並未從社會科學的日程上撤銷，甚至成了某些神學爭論的基礎：例如當時在施特勞斯和布魯諾之間關於福音書上各種虛構的起源所進行的著名爭論，實質上就是關於“思維”（即布魯諾·鮑威爾的《Selbstbewusstsein》③）同“存在”（即施特勞斯的《Substanz》④）的關係如何的爭論。在俄國革命運動史上，每

① 語出狄特·李維（公元前五十九年至公元十七年）《羅馬人民史》。——譯者注

② “一”、“二”分段系譯者所加。——譯者注

③ 自我意識。——譯者注

④ 實體。——譯者注

当我国的革命者开始思考知識分子同“人民”的关系时就要发生这种爭論。未来更深奥更有多方面教养的米留可夫<sup>①</sup>会在我們对这个問題所进行的无休止的和混乱的全俄爭論中发现大量饶有兴味的“俄国文化史”的材料。我衷心希望这位未来的米留可夫获得成功，但是我自己現在既沒有願望也沒有可能来探察“时代的脉搏”。我只打算在涉及我們党最迫切的、实际的利益的范围內考察一下这个問題。

我国的“經濟主义者”前不久还說过，“革命的霉菌即知識分子”，在他們自己沒有得到无产阶级的任何帮助而想到社会主义理想以前，是不应该向无产阶级提出社会主义綱領的。这是一个由于粗魯的、理論上的疏忽而产生的巨大的实际錯誤，即不理解先进的个人在革命阶级发展史上一直所起的而且不能不起的那种作用<sup>②</sup>。現在几乎所有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人都反对“經濟主义者”的观点。对于这种情况我是再高兴不过了。因为“經濟主义者”粗魯的和有害的錯誤曾經使我十二分的伤心和生气。但是从我們現在誰也不同意經濟主义者的观点还完全不能作出結論說，对社会主义知識分子同“人民”的关系問題我們現在已經毫无錯誤地解决了。錯誤的方式——唉！！——可以多种多样，形形色色，甚至截然相反。我国有許多人在解决这个問題时現在所采取的观点可以称之为对“經濟主义者”的观点的补充；这两种观点互相补充才成真理，犹如几何学上两个特定的角互相补充而成直角一样。但是，正像一个余角不能成其为直角，一定再要加一个或大或小的銳角一样，一个补充的观点絕對不能是正确的，它永远会由于自己的片面

① 即巴維尔·尼古拉耶維奇·米留可夫(一八五九——一九四三)。立宪民主党首脑。一九一七年曾做过反动的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第一任外长。他也是有名的历史学家。《俄国文化史》是他的主要著作之一。普列汉諾夫在《俄国社会思想史》等著作中批判过他的主观唯心主义历史观。——譯者注

② 早在我的《Vademecum》(《指南》，按指《供〈工人事业报〉編輯部参考的《Vademecum》序，参看《普列汉諾夫全集》俄文版第十二卷。——譯者注)中我就指出了这一点。——著者注

性而或多或少是錯誤的。这一次，錯誤的因素平均地分配在“經濟主义者”所坚持的观点和我們某一部分同志头脑中取代經濟主义的那个观点之間，恰似每一个观点都是四十五度的銳角一般。

在我們这里，代替被否定的、“經濟主义者”的观点的观点是：沒有著名的“霉菌”，社会主义胜利的可能性就会等于零，因为工人階級本身不能得出社会主义的結論。这其实也是“經濟主义”，不过翻了一下边：人們对社会“思維”和社会“存在”的关系的認識絲毫沒有进步。在認識这个关系上真正要“进一步”，而不是所謂的“进一步”，我們首先应当改正这个新錯誤，倒掉新酒，打碎旧瓶。

这个問題按其理論上和实践上的重要意义來說非常值得注意，我們試作一观。

我所謂旧瓶新酒也者，是对“經濟主义者”片面的和不合理的观点的不合理的和片面的反动。它在列宁的小册子《怎么办？》中得到了自己最鮮明的反映。我們就来分析一下这本小册子。

該书第二十頁“群众的自发性和社会民主党的自觉性”一章<sup>①</sup>中，我們遇到下面一段論及我国九十年代著名的罢工的有趣的見解。

“这些罢工本身只是工联主义的斗争，还不是社会民主主义的斗争；这些罢工表明工人已經感觉他們同厂主利益的对抗，但是工人当时还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意識到他們的利益同整个現代社会政治制度的不可調和的矛盾，即还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識。从这个意义上讲，九十年代的罢工<sup>②</sup>終究还是純粹自发性的运动。”<sup>③</sup>

参加这些罢工的几万工人当时还远沒有高度的社会民主主义意識，这个道理自然是不能否认的。但是我們且看一看列宁往下是怎样論证自己的見解的。

① 參看《列宁全集》第五卷第 340 頁。——譯者注

② 引文漏掉“虽然比起‘騷动’来有了很大的进步，但它”等字。——譯者注

③ 參看《列宁全集》第五卷第 342 頁。——譯者注

“我們已經說過，工人當時**也不可能**有(着重点是列宁加的)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識。这种意識只能从外面灌輸进去。各国的历史都证明：工人階級单靠自己本身的力量，只能形成工联主义的意識，即必須結成工会、必須同厂主斗争、必須向政府爭取頒布工人所需要的某些法令等等的信念。而社会主义学說則是由有产階級中學識丰富的人<sup>①</sup>創造的哲学、历史和經濟的理論中成长起来的。現代科学社会主义的創始人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按他們的社會地位來說，也曾經是資產階級的知識分子。同样，俄国社会民主主义的理論也是完全不依賴于工人运动的自发增长，而从革命的社会主义知識分子的思想发展中自然和必然地产生出来的。”<sup>②</sup>

我国社会民主主义的理論无疑也的确是从“革命的社会主义”知識分子的思想发展中自然和必然地产生出来的。但是列宁根据什么說这个思想的发展“完全不依賴于工人运动的自发增长”呢？这是一个有趣的問題。

假如列宁稍微清楚地知道一点我国革命运动史，他就会懂得，“工人运动的自发增长”正是在旧民粹主义理論由于新的、它預見不到的生活需要而破綻百出的时候，对社会民主主义理論发生了强大的影响。在七十年代末期的革命文献中可以找出一些极有教益的例子，說明无产階級由于它固有的社会需要而突然出現在我国历史舞台，曾經把民粹派著作家弄得莫名其妙，于是切实认真地修改民粹派綱領的时期就到来了。我第一次介紹列宁去看《土地与自由》第四期为彼得堡奥夫沃得运河的罢工而写的社論。

列宁繼續說道：“到我們現在所讲的这个时期，即到九十年代中期，这个学說不仅已經成了‘劳动解放社’的十分确定的綱領，而且已經把俄国大多数革命青年爭取到自己方面来了。”(第二十一—二十一頁)<sup>③</sup>。

① 引文漏掉“即知識分子”等字。——譯者注

② 參看《列宁全集》第五卷第342—343頁。——譯者注

③ 參看《列宁全集》第五卷第343頁。——譯者注



作为过去的“劳动解放社”奠基人，我断然肯定地认为，如果我们这些过去的黑分党人从民粹主义过渡到了马克思主义，这在很大的程度上应该感谢“工人运动的自发增长”。只要从《黑土平分》中作一些引证，就可以有凭有据地证明这种增长给予我们的影响。不过我不这样做。我希望我说的话读者会相信。所以我只要指出，我这个在“劳动解放社”生命史上起过某种作用的人，在我还是一个民粹主义者并且属于“土地和自由”组织时，主要是“同工人们周旋”的。我深信，正是通过这些“周旋”所取得的经验为掌握马克思主义打好了基础。很值得注意的是，“劳动解放社”的另一个奠基人，巴·阿克雪里罗得，也是把自己的主要力量用在“同工人们周旋”上。

可惜篇幅不允许我在这个题目上做文章。我请对此有兴趣的读者去看我的小册子《革命运动中的俄国工人》<sup>①</sup>。他们从其中可以看到，列宁为了满足其古怪理论的需要，多么狠心地歪曲了无庸置辩的历史真理。现在我转而谈“西方”。

说马克思和恩格斯属于知识分子，这自然是正确的。不过这个正确的思想在列宁那里表达得不完全确切。例如，恩格斯“按其出身”是富有的工厂主的儿子，完全不属于知识分子。但这是无关宏旨的小节。无比重要的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观点也是在德国、法国和英国的“工人运动的自发增长”的最强大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这是世人皆知的。值得惊讶的只是列宁怎么会不知道这种事情。只要读一读恩格斯为自己的《Die Lage der arbeitenden Klassen in England》<sup>②</sup>一书写的英文本序言，他就足可以理解英国“工人运动的自发增长”怎样刚强有力地影响了这一位科学社会主义奠基人的观点的发展。至于马克思，凡是只要读过《Zur Kritik der Hegelschen Rechtsphilosophie》<sup>③</sup>一文的人都知道，未

① 收载在俄文版《普列汉诺夫全集》的第三卷上。——译者注

② 《英国工人阶级状况》。——译者注

③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译者注

来的《資本論》作者的革命期望一开始就紧紧地依靠着“自发的工人运动”。最后，如果列宁曾經做过这类文献探討工作，他本可以借助下列簡單的推論 a priori<sup>①</sup> 檢证自己大胆的理论。

馬克思和恩格斯認識到无产階級是当代主要的革命力量，它的历史使命在于用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代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但是，要使他们能够認識无产階級是这样一种力量，必须具备两个条件：第一，階級对立和迅速的“工人运动的自发增长”，第二，他們自己細心地对待这些現象，因为他們的任务是把社会主义放在科学的基础上<sup>②</sup>。所以很明显，认为科学社会主义的发展“完全不依赖于工人运动的自发增长”是**完全不可思議的**。如果列宁願意稍微費些气力猜想这一点，他就会立即勾銷自己的这个原理，因为只有**在唯心主义作家的笔下它才能有某种意义**。当一个不无成就的自觉的**唯物主义历史观**的保卫者提出和捍卫它时，那不过是出人意外的荒謬行为罢了。

“社会主义理論”的确“是由有产階級中学識丰富的人即知識分子創造的哲学、历史和經济的理論中成长起来的”。但是当知識分子“創造”自己的社会主义理論时，并不是“完全不依赖于工人运动的自发增长”，这是**絕對沒有也不可能有的事情**。只要不对这个增长給以应有的一切注意，社会主义就仍然是空想的，按照梅林关于法国空想社会主义的說法，它只会模糊无产階級的階級意識，而不是提高这种意識<sup>③</sup>。列宁怎么能够忽視这一点呢？他怎么能够如此卖力地效法克雷洛夫那个**連大象也看不見的英雄**<sup>④</sup>呢？

① 先天地。——譯者注

② “現代社会主义就其內容說来，首先一方面对于支配于現代社会中的有产階級和无产階級、資本家和雇佣工人之間的階級对立进行观察的結果，另一方面是对于生产中存在的无政府状况进行观察的結果。”（恩格斯）——著者注〔參看《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六年版第 35 頁。——譯者注〕。

③ «Aus dem literarischen Nachlass etc.»〔本书全名为：《卡尔·馬克思、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和斐迪南·拉薩尔軼文集》。——譯者注〕，第二卷第 4 頁。——著者注

④ 見《克雷洛夫寓言》“參觀者”篇。——譯者注

思想家之“創造”“哲学、历史和經濟的理論”以及一般的观念，絕對不是“完全不依賴于”社会历史，也不是“完全不依賴于”作为它們产生的根源的那个人民的“自发运动”。而“工人运动的自发增长”是十九世紀欧洲社会内部生活中最大、最重要和最有影响的現象。試問，能不能有任何一分钟，任何百分之一秒钟承认科学社会主义这个百年来欧洲社会科学史上最大、最重要和最有影响的現象是“完全不依賴于工人运动的自发增长”而产生和发展的呢？当然不能！現在，連卡列耶夫教授<sup>①</sup>也不承认这一点。列宁写出这样……奇怪的話时怎么不感到羞耻呢？

其次，他凭什么說，仿佛“各国的历史都证明：工人阶级单靠自己本身的力量，只能形成工联主义的意識”呢？这个历史一点也沒有“证明”类似的东西。它根本沒有证明列宁的这种历史見解。这也是不足为奇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原理认为人們的“存在”决定人們的“思維”。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定理說，社会主义革命是資本主义固有的矛盾的必然結果。如果这条根本原理是正确的，如果这个基本定理也沒有欺騙我們，那么很明白，在社会发展的一定阶段上，即使各資本主义国家的工人“单靠自己本身的力量”，也会达到社会主义的。馬克思和恩格斯清楚地懂得和說明过这个道理。还在一八四五年馬克思同布魯諾·鮑威尔爭論的时候就指出过：“无产阶级作为无产阶级”，換言之，无产阶级由于自己在資本主义社会中的地位必然要廢除私有制，也就是說，实现社会革命<sup>②</sup>。同时，馬克思补充說：“問題不在于目前某个无产者或者甚至整个无产阶级把什么看做自己的目的，問題在于这个阶级究竟是什么，以及它由于自己的这个存在 (diesem Sein gemäss) 必然

① 尼古拉·伊万諾維奇·卡列耶夫(一八五〇——一九三一)：俄国自由派历史学家、政論家、馬克思主义的敌人。普列汉諾夫曾經在一系列的著作中批判过他的主观唯心主义的历史观。——譯者注

② 參看《神圣家族，或对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駁布魯諾·鮑威尔及其伙伴》。梅林出版的《軼文集》第二卷第132頁。——著者注(參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卷第44、45頁。——譯者注)

在历史上有些什么作为。它的目的和它的历史行动已由它自己的生活状况以及现代公民社会的整个结构最明显地无可辩驳地决定了。英法两国的无产阶级中有很很大一部分人已经意识到自己的历史任务，并且不断地努力使这种意识达到完全明显的地步，关于这点在这里没有必要多谈了。”<sup>①</sup>正如读者所看到的，这同列宁所谓无产阶级“单靠自己本身的力量”只能达到“工联主义意识”的说法根本不是一码事<sup>②</sup>。

恩格斯在这个方面完全同意马克思的意见。他在说明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时指出，英国工人不能满足于自己的状况，这种状况一定会迫使它力求消除现有的事物秩序。他说：“英国工人几乎都不会读，更不会写，但是他们自己的和全民族的利益是什么，他们却知道得很清楚。资产阶级的特殊利益是什么，他们能够从这个资产阶级那里得到些什么，他们也是知道的。”<sup>③</sup>被压迫阶级不满的最早的表现形式，用恩格斯的话说，就是反对私有财产的罪行，而随着工业的发展犯罪事件也在增加<sup>④</sup>。但是工人很快就相信，这样做是没有什么用处的。犯罪只是一个人单枪匹马地反抗现存的制度。工人作为阶级只是在他们开始反对使用机器生产时才站在资产阶级反对派的立场上。但是这种反对立场只在个别的地区实践

---

① 参看《神圣家族，或对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驳布鲁诺·鲍威尔及其伙伴》，梅林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卷第133页。——著者注（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卷第45页。——译者注）

② 比较同书第432页：“Die Arbeiter, von den Verhältnissen getrieben… allgesamt als eine Klasse mit ihren besonderen Interessen und Grundsätzen… der Bourgeoisie nach gemeinsamen Plane und mit vereinter Macht zu Leibe rücken.”〔受地位所驱使的工人，整个地作为具有自己的特殊利益和原则的阶级，按照共同的计划，以统一的力量攻击……资产阶级。——译者注〕——著者注

③ 《Die Lage etc》第一版第143—144页。——著者注（《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卷第398页。——译者注）

④ 同上，第258页。——著者注（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卷第502页。——译者注）

了，并且仅仅针对着现存制度的一些个别的方面。这也是没有什么用处的。必须找出一种新的反抗形式，后来在**工会**中找到了它（即工联主义——格·普·）。这些工会不能从根本上改变雇佣劳动和资本的关系；但是它们帮助工人取得某些局部的改良，而主要的是它们提高工人的觉悟，使它们认识到资产阶级的统治只是建立在工人互相竞争的基础上；当工人不再互相竞争的时候，当它们不愿意受资产阶级的剥削的时候，私有制王国（das Reich des Besitzes）的末日就来临了<sup>①</sup>。恩格斯清楚地懂得，如果工人局限于不再互相竞争，换言之，如果它们不超出“工联主义”，现存的制度仍然不会改变。然而它们“是……不能这样做的。有一种必然性在迫使它们根本消灭竞争，而不是消灭一部分竞争，而且它们是会这样做的。现在工人已经一天比一天懂得竞争给它们带来了什么害处，它们比资产阶级懂得，有产者之间的竞争会引起商业危机，因而对工人也有影响，所以也必须消灭这种竞争。很快它们就会懂得，它们应当怎样去做这件事情。”<sup>②</sup>

自然，如果把恩格斯的意思理解为经济必然性只要推动无产

① 《Die Lage etc》第一版第265页。（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卷第507页。——译者注）这个十分重要的地方（它对说明工人运动的历史作用和它取得胜利的机会的意义大多数社会民主主义著作家迄今都估价不足）几乎逐字地重复在《共产党宣言》中（参看我的译本第二版第16页）（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卷第475页。——译者注）——著者注

② 同上，第265页。（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卷第507页。——译者注）“批评家们”在这个问题上指出，但是经济必然性至今还没有使国内资本主义比任何地方都更发达的英国工人达到社会主义。既然任何一个“强硬派”同志现在都可能提出这个论据来反对我，所以我要指出，在恩格斯写了他的论英国工人状况一书以后，同一个经济必然性把英国放在一个特殊的地位上，从而使它的无产阶级丧失了三四十年代鼓舞他们的革命意图。关于这点请看恩格斯本人为该书英译本美国版写的“附录”，特别是第V与VI页。（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二版第二十一卷第260—266页。中译文见《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六年版第7、17—34页。——译者注）现在经济必然性排除了英国独特的经济地位，再次使工人的视线转向社会主义，不过暂时还不明显罢了。——著者注

階級同**資本主義**進行越來越堅決的鬥爭，好像就會在他們的頭腦中自然而然地產生**科學社會主義**理論，那是絕頂荒謬的。恩格斯任何時候也沒有這樣說過。**科學社會主義**理論只能在有這種**科學修養**的人的頭腦中產生。但是經濟必然性產生工人階級的運動，並使之達到它的邏輯終點——即達到社會主義革命，而科學社會主義就是這個運動的理論表現。這就是馬克思和恩格斯從他們的社會觀點形成以來一直堅持的觀點。從這個唯一科學的觀點看來，根本不能用列寧在自己的小冊子中給我們提出的那種論點來說明工人階級的歷史作用；列寧企圖使讀者相信，無產階級單靠自己本身的力量不能超出工聯主義的狹隘範圍。

按照列寧的意見，工人階級單靠自己的力量只能在**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基礎上進行改善出賣自己勞力的條件的鬥爭。按照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意見，這個階級一定要力圖消滅這些關係，即實現**社會主義革命**。

誰對呢？

要是您高興，請評判評判吧。不過您要以為列寧對的話，請別自稱為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追隨者。

馬克思主義，這“完全是另一出戲”。

沒有必要再補充說，科學社會主義的奠基者們任何時候都是同後來我國“經濟主義者”所宣揚的觀點相距十萬八千里的。馬克思和恩格斯很善於珍視“革命霉菌”的偉大意義。

當恩格斯研究英國工人階級的狀況時，他堅決相信，那里已經開始了的工人運動正在“自發地”走向社會主義革命。但這並不妨礙他意識到並且肯定地說，如果無產階級掌握了社會主義思想，這個階級的革命鬥爭事業就會大有收獲。他勸告當時很少積極參加工人同廠主的鬥爭的英國社會主義者主動地起“霉菌”的作用<sup>①</sup>。

① 還請看：他在該書上述美國版序言中建議美國的社會主義“霉菌”起怎樣積極的作用。這篇序言註明是一八八七年一月二十六日〔參看《英國工人階級的狀況》第7—16頁。——譯者注〕。——著者注

但是他指出，为此英国社会主义应当根本改变自己的性质，而成为純粹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后面这个指示也就再一次证明，所謂革命社会主义的发展可以“完全不依赖于工人运动的自发增长”的古怪思想同恩格斯是多么的格格不入。

再說一遍，馬克思和恩格斯很懂得“革命霉菌”的意义。但是如果他們这些革命霉菌沉湎于自命不凡和主观主义的霉菌的有害影响，忽然想把自己同工人群众对立起来，并且断言只要他們沒有用自己觉悟性的革命的神恩保佑这些群众时，群众在精神上和物质上就总会依赖于资产阶级，不但不能推翻资本主义，簡直連“剝夺剝削者”也不可能，——他們就会十分严厉地訓誡这些革命霉菌。当“布魯諾·鮑威尔及其伙伴”竟然弄出和这样的对立类似的花样时，馬克思曾經用辛辣的諷笑猛烈地攻击他們。他十分公正地断言，“批判的批判”同群众的对立无非是精神和物质之間老对立的新变种。他写道：“如果批判比較熟悉下层人民阶级的运动，那么……出自英法两国下层人民阶级的新的散文和詩作将会向批判表明，即使沒有批判的批判的神圣精神的直接庇佑，下层人民阶级也能把自己提高到精神发展的更高水平。”<sup>①</sup>

馬克思繼續写道：“精神和群众的对立也就是批判的‘社会組織’，在这个社会里，精神，或批判，是組織工作，群众是原料，而历史則是产品。”<sup>②</sup>

馬克思对列宁的理論也不会作另一种評論，因为列宁和“批判的批判家”一样，认为群众只是不活动的原料，打上圣灵的贈品的印記的知識分子就在它上面进行自己的工作。

一个“强硬派”的讀者叫喊道：“唉呀！你們歪曲列宁的思想呀！你們把他說成是类似主观主义者的那种人，可他只不过发挥

---

① 《Die heilige Familie》，第 243 頁。——著者注（參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卷第 171 頁。——譯者注）

② 同书，同上頁。——著者注（參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卷第 172 頁。——譯者注）

了考茨基在《Die Revision des Programms der Socialdemokratie in Oesterreich》<sup>①</sup>中詳細叙述过的思想！这样不行！我現在向其他的强硬派呼吁，建議他們写出反对你們的抗議书！”

安靜点，“强硬派”同志。我知道写抗議书現在對你們說來是不費吹灰之力的。这种輕易性前此还是“社会革命党人”的壟断品。但是在写“抗議书”之先，还是請听我把話說完。那时也許你們自己会发现，这样抗議是沒有什麼道理的。

列宁在自己小册子第二十七頁<sup>②</sup>上的确从考茨基关于当时（一九〇一年十月）所討論的奥地利社会民主党新綱領草案的文章中摘录了很长一段話。而且这段話里的确說到，社会主义意識是一种从外面灌輸到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中去的東西，而不是一种从这个斗争中自发产生出来的東西。但是除非列宁用漫不經心的态度看待考茨基对无产阶级运动的观点，否則他是不能引证这个观点证实自己的臆造的。

首先我請讀者——“强硬派”讀者和非强硬派讀者——注意同一个考茨基同一篇文章的下面一段話。

“但是無論如何要增长的是劳动和資本之間的这种对立、資本主义追求扩大依賴性（雇佣劳动对資本的依賴性——格·普·）的傾向和无产阶级身上增长着的对独立的需要之間的矛盾。只要資本主义存在，这种矛盾就一定会产生阶级斗争，就一定会产生推翻資本家阶级的意图。只有解决了这种矛盾它才会消失。”<sup>③</sup>

我們看到：这里指出的矛盾，按照考茨基清楚地說明的意見，在无阶级身上产生出推翻資本家阶级的意图，而且这个矛盾越是增长（考茨基正是指矛盾的增長），它所引起的无阶级的这个意图自然就越会加强。是不是这么回事呢？看起来是的。这个推翻資本家阶级的意图究竟是什么意思呢？显然无非是消灭資本主

① 《修改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綱領》。——譯者注

② 參看《列宁全集》第五卷第351頁。——譯者注

③ 《新时代》一九〇一——一九〇二年第三期第75頁。——著者注



义生产关系的意图，即结束资本主义的意图，也就是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意图。是不是这么回事呢？看起来是的。现在我要问一问：列宁所说的是不是这个意思呢？不是，完全不是这个意思。考茨基同恩格斯（我在上面引证了他的论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一书）和马克思（他写了反对布鲁诺·鲍威尔的著作）完全一样，他说，资本主义固有的矛盾必然会使工人产生消灭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意图，而不成功地引证他的列宁，硬要使人相信这个矛盾只能推动无产阶级在这些关系的基础上进行斗争。考茨基忠于马克思主义；列宁背叛它。歌德的塔索听了安托尼奥的话以后喊道：

Mit Beifall und Verehrung hör' ich dich.①

安托尼奥回答说：

Und dennoch denkst du wohl bei diesen Worten

Ganz etwas Anders, als ich sagen will.②

考茨基当自己的话被列宁“抱着赞同和尊敬的心情”加以引用时，也可以这样对列宁说：“你对它们的了解同我所说的意思完全不一样。”

我看到，“强硬派”的读者又“愤怒”了，像最庸俗的“社会革命党人”一样又打算写“抗议书”了。然而我再次请他继续听下去。

考茨基在同伯恩施坦争论时驳斥了可怜的爱德华③ 继资产阶级经济主义者如舒尔采-格弗尼茨④ 之后对马克思的观点所作的荒谬解释，他用下面的话叙述了他正确地认识的马克思的真正的观点，而且他自己也绝对同意这个观点：

“随着构成以前占统治形式的小生产的消灭，产生了无产者、

① 我是抱着赞同和尊敬的心情聆听你的话的。——译者注

② 但是你对这些话的了解同我要说的意思也许完全不一样。——译者注

③ 即伯恩施坦。——译者注

④ 舒尔采-格弗尼茨，格尔哈特（生于一八六四年）——德国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政治经济学家，布伦坦诺学派的门徒，写了许多关于俄国经济状况的著作。普列汉诺夫在《反对哲学中的修正主义》一书中详细批判过他的观点。——译者注

雇佣工人。在手工业的廢墟上资本主义生产越发展，对于雇佣工人說来，在私有制的基础上作为孤立的生产者达到摆脱剝削和資本奴役的可能性就越小，他想消灭私有制的意图（考茨基在这里甚至說得更有力：Verlangen<sup>①</sup>——格·普·）就越会加强。于是同无产階級一起，在无产者本身和那些站在无产階級观点上的人那里就以自然的必然性产生种种社会主义傾向。”<sup>②</sup>

考茨基补充說：“这就說明社会主义意图的产生。”的确，对这种意图的产生的說明正是如此。而这种說明也就是一个“直角”、一个永恒的真理，它完全符合唯物主义历史观，但是同列宁以及“經濟主义者”所固有的片面性的“銳角”相距遙远。无产階級完全不是神秘地注定要陷进“工联主义”的迷宫，只有靠着“精神”、“霉菌”、“知識分子”的帮助才会走出这座迷宫的“物质”。不！在現代社会关系不可战胜的力量的推动下，他們本身会或快或慢地向社会主义方向运动，他們本身就会暴露出社会主义的意图。但是“霉菌”可以加速运动，使之更自觉和更能达到目的；它可以在同資本家階級进行斗争的无产階級队伍中起一种极其有益的教育作用。它的偉大的历史意义也就在这里。

“劳动解放社”的社会民主主义观点就是直接依賴“工人运动的自发增长”而形成的。这个团体始終认为“霉菌”正是具有这个意义。在这方面它也一直是忠于馬克思主义的。所以，我們运动的“第四时期的消灭”（这个时期的特点是列宁的形而上学的影响，正如它的“第三时期”的特点是“經濟主义”的影响一样）主要就是要最后提高到这个团体的理論观点的水平。即使最无远見的人也会很快看到这点。

正是这样，“强硬的”同志們！我希望你們自己現在会看到，你們的“首长”大大地而且——用不着隱瞞！——可耻地失算了。或

① 要求、需要。——譯者注

② 《Bernstein und das sozialdemokratische Programm》（《伯恩施坦和社会民主党綱領》），施图加特一八九九年德文版第 53 頁。——著者注

許你們還看不到這點么？好吧，那就再讀下去。

考茨基在奧地利黨維也納代表大會一九〇一年十一月四日下午的會議上談到該黨的同一個綱領草案時說過：

“工人運動從自身中不能產生社會民主主義思想，這種說法是對的。工人運動產生社會主義本能；它使無產階級產生對社會主義的需要，因為無產者日益感到，他作為個別的人單靠自己的力量是不能掌握生產資料的。而使這個本能變成明白的意識所必需的理論認識並不是從無產階級隊伍中間產生的，因為無產者沒有產生這種認識所必需的進行科學工作的一切條件。這個信念是在有充分的誠實精神和正直態度而不為資產階級的需要所蒙蔽的資產階級學者的頭腦中產生的。我們所有第一流的大社會主義者都屬於這個階層：聖西門、傅立葉、拉薩爾、馬克思、恩格斯。但是如果這個有才能的無產者階層沒有把他們的理論交給無產階級群眾，如果他們不給工人運動帶來好處，不同工人運動結合為一個整體，這些理論就始終會是一些平常的理論。”<sup>①</sup>

這些話首先表明，和我們已經十二分熟悉的列寧的錯誤意見相反，考茨基認為，社會主義理論的發展絕對不是“完全不依賴於工人運動的自發增長”的。考茨基直接地聲稱：“從工人運動同社會主義理論的結合中產生了新的、社會民主主義的思想方式，在發展這種思想方式時不但工人向社會主義理論家學習，而且社會主義理論家也向工人學習。”<sup>②</sup>其次，考茨基在奧地利黨代表大會上的發言表明，應當在怎樣的意義上來了解他以前所說的社會主義思想是“從外面”灌輸到無產階級隊伍中去的。“從外面”灌輸進去的恰恰只是明白的意識，只是科學理論，而在工聯主義範圍內的歷

---

① «Protokoll über die Verhandlungen des Gesamtparteitages der Sozialdemokratischen Arbeiterpartei Oesterreichs, abgehalten zu Wien vom 2 bis 6 November 1901» (《一九〇一年十一月二——六日在維也納舉行的奧地利社會民主工黨代表大會會議記錄》，第124頁。——著者注)

② 同上。——著者注

史运动(連同它所产生的“社会主义本能”)則是由无产阶级的地位本身引起的,也是在这个阶级自己的队伍中产生的。原来这就是說,我們这里所涉及的考茨基的那个思想本身,也就是在他的反伯恩斯坦先生的著作中說到应当怎样理解馬克思对待这个问题的观点时我們早已經遇到过的那个思想。不过他在这里是从另一个角度說明問題的,因此說法就不一样。以前他写道,资本主义除了产生无产阶级以外,还使无产者本身和那些站在他們立場上的上层阶级人物身上产生社会主义意图;現在他說,无产者的社会主义意图如果沒有得到社会主义理論的闡明,就仍然是**本能**,而不会成其为**社会民主主义的觉悟性**。也許新說法沒有旧說法成功,因为其中包藏着某些不确切和不明白的地方:例如傅立叶根本不屬於资产阶级学者,而圣西門只是在有限的意义下才可以算作资产阶级学者。但是与社会主义意識对立的社会主义本能究竟应当怎样理解却是十分清楚的,因为社会心理学上很容易区别本能和意識的界限。不过在这里这一点对我們并不重要。我們应当知道的是列宁有沒有权利引证考茨基来证实自己的思想。現在我們清楚地看到,他完全沒有这样的权利。

按照考茨基的意見,“本能的社会主义”应当进行**社会革命**。而且甚至不仅“**本能的社会主义**”。考茨基在同伯恩斯坦先生爭論时說他坚决地相信:资本主义社会中的阶级斗争由于自己固有的确定不移的邏輯甚至会向敌視社会主义的无产者提出这样的任务,这些任务的解决“会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于死命”<sup>①</sup>。这个信念他完全是从馬克思和恩格斯那里借用过来的。正是这个信念构成他的著作《Die soziale Revolution》<sup>②</sup>的基础,該书在列宁的編輯下譯成了俄文。下面就是考茨基的原話:“我想知道从无产阶级的政治統治中由于它的阶级利益和生产需要**必然**(mit Notwendigkeit)会产生怎样的后果,而完全撇开无产阶级在自己取得胜利时

① 《Bernstein etc》(《伯恩斯坦和社会民主党》)第180頁。——著者注

② “社会革命”。——譯者注

会坚持的那个基本理論原則。因此在这里我正是排除了任何关于社会主义学說对无产阶级的影响的假設。(請听,“强硬的人儿”,請听!——格·普·)我在开始研究时直接提出一个問題:无产阶级应当怎样利用自己的政权?并不是根据某个理論甚至某种情緒他們想要什么,而是在自己的阶级利益和經濟必然性力量的推动下他們应当采取什么措施。”①

够了。列宁既不理解考茨基,又不理解恩格斯,也不理解馬克思,換言之,一般說来他在对待这个問題的态度上并不理解科学社会主义。他的不理解这一点就表现在他认为无产阶级不能超出“工联主义”的范围,而且“工联主义”在他看来乃是某种从天上掉下来就完整无缺的、一成不变的东西②。

在我們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列宁反駁自己的一个論敌时說过:“有人說:列宁从来没有提到过任何互相敌对的趋向,而绝对地断定工人运动一直‘在受’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支配。事实究竟如何?我是不是沒有說过工人运动在舒尔采-德里奇之类人的誠意帮助下倾向于资产阶级思想?”③毫无疑问,列宁的确說过这个話。但是这絲毫沒有改善实际情况。不言而喻,——任何人、任何一分钟绝对不会怀疑这一点,——舒尔采-德里奇之流的资产阶级和这样或那样、自觉或不自觉地同情舒尔采-德里奇的思想的那些“知識分子”力求使无产阶级服从自己资产阶级思想影响。如果一般說来我們可以爭論这个道理,我們就会像黃口孺子一样毫无政治經驗。但是从这里还根本得不出任何結論来。爭論的問題恰恰在于是否存在着这样一种經濟必然性,它引起无产阶级“对社

① 《新时代》第二十二年度第一卷第十九期第 591 頁。——著者注

② 为什么在这本引起了这样多騷乱其实在一切方面都十分軟弱的小册子剛出版的时候我没有立即揭露它的謬誤,这个問題在本文后半部結尾时即予答复(按此文最初在《火星报》上发表时分两期連載。参看本书第 105—111 頁。前半部分可能到这个注結束。——譯者注),請讀者注意。——著者注

③ 参看代表大会《记录》第 131 頁。加重点是原有的。——著者注(参看《列宁全集》第六卷第 444 頁。——譯者注)

会主义的需要”，使它变成“本能的社会主义者”，并且推动它（甚至在它单靠“本身的力量”的那种场合下）走上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而不顾资产阶级坚持不懈地努力使它从属于自己的思想影响。和所有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家清楚地说明过的意见相反，列宁否定这点。他的巨大错误，他在理论上的罪过也就在这里。这种错误在他极不成功地引证“舒尔采-德里奇之流”时更多更鲜明地表现出来了。

事实上，这些“舒尔采-德里奇之类”的先生是什么人呢？在这个问题上不能有两种意见。他们也是“知识分子”，但只是仍然忠实于资产阶级而没有转到无产阶级方面来的知识分子。如果我们考虑一下这种知识分子的影响（这是我们一定要做的），结果会怎样呢？结果就是：无产阶级的历史作用永远决定于有这种或那种思想方式的知识分子，而这个受历史苛待的阶级则完全不会有由它自身的地位的经济特点产生的、自己的意图，因为它是惰性的，用拉伯雷的形象的说法就是：像死驴一样。列宁是否希望这样说呢？倘若如此，那他就错得更厉害了。因为只有不理解科学社会主义对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有何看法的人才能这样说。

总之，列宁在代表大会上引用的主要理由并不证明他是**对的**，而是**证明他不对**。

我完全不是由于论辩的癖嗜而无目的地说出上面这番话的：马克思会觉得列宁对无产阶级同知识分子的关系的观点是布魯諾·鲍威尔对“批判者”同“群众”的关系的观点的新变种。事实上一定会这样。请回忆一下马克思关于布魯諾·鲍威尔的观点所说的话吧。

这个“批判者”从黑格尔的绝对唯心主义出发，对黑格尔作了自己的批判。不过在黑格尔那里，是绝对精神创造历史，在布魯諾·鲍威尔这里，用马克思的话说，绝对精神的位置则为批判的批判所替代。“布魯諾·鲍威尔宣布批判是绝对精神，而 he 自己是批判。批判的因素被排斥于群众之外，同样，群众的因素也被排斥于

批判之外。所以批判认为自己并不是通过群众体现出来的，而仅仅是通过一小撮杰出人物即布魯諾·鮑威尔先生及其門徒体现出来的。”①

这究竟会产生什么結果呢？結果如下。

“一方面是群众，他們是消极的、精神空虛的、非历史的、物质的历史因素；另一方面是精神、批判、布魯諾·鮑威尔先生及其伙伴，他們是积极的因素，一切历史行动都是由这种因素产生的。”②

好生面熟的图画啊！我們在列宁那里看到的恰好就是这个：一方面是工人群众，他們是消极的、本身不运动的因素，他們自动地朝着“舒尔采-德里奇輩”引导他們去的那个方向走，而另一方面有时就是社会主义知識分子；知識分子、社会主义、列宁及其伙伴，他們是积极的因素，无产阶级的解放运动和社会主义革命获得成功的一切可能性就依赖于他們的活動。

我們在列宁的观点中看不到**馬克思主义**，而是看到（恕我用一个不好听的名詞）**鮑威尔主义**、新版本的**英雄和群众**的理論，不过按照当前市場上的需要經過了一番修改和补充③。

本身毫无根据，只有在社会阶级斗争形势不发达的时代才在某种程度上具有表面上像是真理的外观的**英雄和群众**的理論，給职业革命家的实践工作造成种种十分严重的障碍。

馬克思說，布魯諾·鮑威尔糾正黑格尔时“宣布批判是绝对精

① 《Die heilige Familie》第 187 頁。——著者注（參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卷第 109 頁。——譯者注）

② 同上，第 188 頁。——著者注（參看同書，第 109 頁。——譯者注）

③ 有趣的是，甚至資產階級的桑巴特也走得比社会民主党人列宁更远，他承认，工人的生活“必然”（mit Notwendigkeit）会使他們产生要求社会主义的意图。（參看《Sozialismus und soziale Bewegung im 19. Jahrhundert》〔《十九世紀的社会主义和社会运动》〕第三版第 8 頁）大家知道，“社会革命黨人”覺得列宁是**英雄和群众**理論的拥护者，所以急忙宣布他接近民意黨人。既然他歪曲了馬克思主义，那就理有应得了。但是自然，在綱領方面，他离民意黨人毕竟是很远的，因为在他那里“英雄”的活動必須以无产阶级的群众为前提。——著者注

神，而 he 自己是批判。”試設想一下：这类“批判”从事政治活动，去实现一定的实践计划。既然他宣布自己是历史唯一的积极的因素，那么他只有在希望群众成为他手上强大有力但是百依百顺的工具并且按照“有觉悟的”批判家先生愿意引导他们前去的方向行进时才会考虑到群众。其实这个“有觉悟的”先生通常都不会对群众产生多少严重的影响，同时他也无论如何不能有这种影响。起来反对一个特选人集团的另一些集团，也充满着同样天真的和顽固的自负心理。他们中间进行着一连串最激烈的争论和最无情的冲突。这些争论和冲突控制着他们的全部注意，吞没着他们的全部力量，破坏着他们的全部努力。代替广泛的、自由的阶级政策的是狭隘的和可怜的小组政客作风。只有当正在加强和巩固的群众运动具体地证明小组“专政者”狭小的眼界十分可笑和他们徒劳的努力十分可怜时，这种作风才会为更广泛的思想方式和更合理的行动方式所取代。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同英雄和群众的理论是不能并存的；英雄和群众的理论同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是不一致的。所以马克思和恩格斯才对这个理论如此深恶痛绝，不论在它没有超出抽象的“批判”的范围时也罢，或者特别是在自己的实践活动中受到各个国家和各种倾向的小小救世主和小小“专政者”的鼓舞时也罢。恩格斯在同我的几次谈话中（而且不仅是在同我的谈话中）不止一次坚决地指出，在俄国，由于国内开始进行的工人运动，旧的涅查也夫主义和巴枯宁主义的阴谋家的实际活动已经过时了<sup>①</sup>。但是我们不会离开这个过时的实践的，除非我们摆脱了这个新型的但我们希望它是最后一种英雄和群众的理论，除非我们不支持列宁关于“群众的自发性和社会民主党的觉悟性”的理论。这个理论大大地粉饰了我们运动的“第四时期”。在某些方面，它使我们比运动的第三时期更后退了。

为了“消灭”第四时期，首先绝对必须彻底认识到这个理论是

---

<sup>①</sup> 讀者大概知道，在实践上无政府主义者巴枯宁也是像马克思主义者列宁一样坚决的和不肯让步的集中主义者。——著者注



断然沒有根据的。这是 *conditio sine qua non*<sup>①</sup>。

列宁把社会主义从群众中驅逐出去，又把群众从社会主义中驅逐出去。他宣布社会主义知識分子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創世主，而他自己和自己忠实不渝的追随者則是主要的社会主义知識分子，即所謂超知識分子。他責备所有“思想不同”的人为无政府个人主义，而在同他們的斗争中則向群众申訴。这些群众在他的理論中，正如我們所看到的，起着消极的物质的作用。他慷慨激昂地拍着胸脯，滿腔义憤地大肆叫囂，說只有无产階級才懂得組織和紀律的一切意义。这类的叫囂充滿着他的新的小册子《进一步，退两步》。他在这本小册子中合乎邏輯地發揮了自己的思想。同时正是由于这些思想的独特的然而确定不移的邏輯，甚至同小册子《怎么办？》比較起来也后退了許多步。

列宁之向无产階級申訴使我想起来我国“保卫者”有时用来向人民呼吁的那些观点。在“保卫者”看来，人民，这正是历史的非历史因素，它是由上层階級小心翼翼的和明智的保护推动的。但是只要这些階級开始稍微同情“爱好自由”的思想，“保卫者”立即就想起人民的明智，并且要受到这种明智的鼓舞的人民“用自己的判断”使爱好自由的人灰飞烟灭。他們和列宁一样认为，人民群众主要是用来恫吓和“慑服”任何——內部的和外部的——“对手和仇敌”的。

## 二

在說了所有这些话以后，我感到讀者打算向我提出极其严重的指責。他觉得：“如果是这样，如果列宁的观点是完全錯誤的和十分有害的，如果它違反科学社会主义，然則您以前为何默不作声呢？为何您以前不揭露这个观点的錯誤性和危害性呢？或者您自己只是現在才相信它的錯誤性和危害性吧？”

我回答說：不然，不止是現在。自从我認識它的时候起我就发

---

① 必要条件。——譯者注

現它是不正确的。当我讀了小册子《怎么办?》的手稿时,我立即对列宁和我們編輯部其他成員說过,我认为其中有相当多的理論錯誤。至于“自发性”和“觉悟性”部分,我曾向列宁指出,这个后者在他那里,用黑格尔著名的說法是: wie aus der Pistole geschossen<sup>①</sup>,我并且坚持要修改我觉得不正确的地方。列宁反对我,說小册子的出版由他签名,这样編輯部就可以对它卸去很大一部分責任。同时,編輯部有些同志說,我对列宁太严格了,即便有时他的說法不恰当,但他事实上是坚持正統的馬克思主义的。我当时觉得这个理由不无可信之处。我从不认为列宁是多少杰出的理論家,而总是发现他本性上不能作辯证思維。但我以为,他毕竟重視理論的利益,而且他重視其利益的理論毕竟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論。在我看来,如果使用本文中常常遇到的名詞,与其說他是自觉的馬克思主义者,更不如說他是本能的馬克思主义者。但我相信他的“正統的”本能会产生良好的效果。我也希望,当更加明白的馬克思主义意識从外面灌輸到他的头脑中去的时候,他会更好地掌握即便不是馬克思主义的方法,也是馬克思主义的結論。因为这东西連形而上学者也是可以理解的。况且列宁虽然坚持自己的立場,仍然答应“改正”自己小册子中我向他指出的那些沒有道理的地方。最后,——last not least<sup>②</sup>——我可以认为竟然会有这样多的讀者特别喜欢这本小册子的錯誤的地方,即喜欢作者世界观中軟弱的方面么?現在經過痛苦的經驗的教育,我才懂得,假使在一个著作中很正确的意見和很錯誤的意見同时并存,那么我們的讀者首先贊成的不是那些正确的意見,而是那些錯誤的意見。不过那个时候我还不知道这个可悲的真理,而是比現在更多地信賴讀者自己的判断。我希望,我們的“实际工作人員”会从小册子《怎么办?》中掌握那些有益的,虽然完全不是新穎的思想;組織对我們

① “像手枪发射那样”。參看黑格尔:《精神現象学》上卷,商务印书館一九六二年版第17頁。——譯者注

② 最后,但不是最不重要。——譯者注

是必要的，社会民主党无论在自己历史的哪一个“阶段”上都不能避开政治斗争，而且他们无需我来指出也会发现列宁借以坚持自己可敬的但已属老生常谈的真理的那些理论根据。既然我国社会民主主义文献中的意见分歧本来已经太多了，既然助长没有迫切的实际需要的意见分歧在当时至少是多余的，于是我决定不要公开出来反对列宁。不过我对他的观点远不满意这一点可以从下面的情况中最清楚地看出来：有一次，当我回顾他的小册子以及我同他就当时草拟的我们的纲领草案所进行长时间的争论时，我对马尔托夫同志谈到自己的耽心：“现在我们开始了土林的形而上学马克思主义和别尔托夫<sup>①</sup>的辩证唯物主义的斗争。”<sup>②</sup>马尔托夫同志大概没有忘记这次谈话。我想他会记得的，虽然他力图在这个问题上宽慰我，但我远不是放心的。

小册子《怎么办？》出版了。原来列宁对它几乎压根儿什么也没有改动。这自然使我不高兴。于是有一段时间我们的关系很紧张。但后来关系改善了。一九〇二年秋天我在伦敦呆了一个多月。那时《火星报》就在伦敦出版。我从同列宁的相当频繁的交谈中得出一个信念：即马克思主义的**意识**的确很快灌输到他的头脑中去了，而且小册子《怎么办？》的观点对他本人来说已经成为“被超越的”观点。后来发生了著名的罗斯托夫罢工。我给《火星报》写去两篇文章<sup>③</sup>。文中故意重新提出**英雄和群氓**在我们的事业中的关系问题，并且完全用非列宁的方式对它作了解答。据我所知，列宁在编辑部会议上没有对我这些文章提出任何异议。这更使我

---

① 别尔托夫指普列汉诺夫自己，他用这个笔名发表过一些哲学著作。——译者注

② 土林是论文集《说明俄国经济发展状况的材料》中一篇文章（按指列宁的《民粹主义的**经济内容及其在司徒卢威先生的书中受到的批评**》。——译者注）的作者。该文集刊印于一八九六年春，当时遭到书报检查机关的禁止。他的论文的形而上学气味两里路以外都闻得到。——著者注

③ 按指《罗斯托夫罢工的意义》和《三月望日》两文。前一篇登载在一九〇三年一月十五日第三十二号《火星报》上；后一篇登载在三月十五日第三十六号《火星报》上。两文都收在《全集》第十二卷中。——译者注

相信，我們的本能的正統派越来越变成自觉的正統派了。最后，在最近的一两篇文章中，我从另一个角度駁斥了和嘲笑了列宁在我們就我党綱領草案进行爭論时曾經提出过的那些狹隘的形而上学論据中的許多論据<sup>①</sup>。这些文章并未遭到列宁的反对，反而博得他的贊揚。这一切都使我毫不怀疑，他在自己的发展中已經大大地“进几步”了，并且拋棄了自己的旧錯誤。

我是怀着这种印象到我們的代表大会上去的。在大会上我不得不加入对于我在本文中予以批評的、列宁的同一个观点的討論。我相信列宁已經拒絕了这个观点，因此不认为有必要反駁它，甚至力图停止对它进行討論，认为这在討論我們的綱領时是完全无益的。但是我并不指望我能做到这点，于是我才（像法国人所說的）*plaider les circonstances atténuantes*<sup>②</sup>。我说过：“列宁不是写的历史哲学論文，而是政治著作。”换言之，这意思就是說，从历史哲学的观点看来（例如我在这里就是从这种观点考察它的），列宁的观点經不起任何批評。如果我沒有弄錯，馬尔托夫同志当时把我的这些說明理解成我用委婉的話宣布自己同小册子《怎么办？》作者列宁是不一致的。这种理解是正确的。但是在代表大会上，我关心的問題主要不是推卸对小册子《怎么办？》的这个責任，而是不要滋生多余的爭論和意見分歧，以便找出一个理論上正确的公式，能够把馬尔丁諾夫同志攻击列宁的意見和我当时觉得列宁在他从外面逐漸获得的社会民主主义意識的影响下开始贊成的那点新观点結合起来。我反駁馬尔丁諾夫同志說：“您說社会主义是整个无产階級創造的，这里也包括它的有觉悟的一部分，即所有那些轉到无产階級方面来的人。如果您希望这样說，那么我就认为不仅沒有理由同列宁脫离关系，而且也沒有理由同您脫离关系。”

---

① 由于不依賴于我的一些原因我不能指出这些文章的篇名。——著者注（按指《“正統的”咬文嚼字》一文，原載第四十一、四十二、四十三号《火星报》，后来收入《全集》第十二卷。——譯者注）

② 直譯是：引证減輕罪行的情况。——譯者注

最后这个提法使我们大家都站在理論上正确的观点上，而完全不涉及列宁在自己的小册子中有多少錯誤的問題。如果我們要詳細分析這個問題，我就不得已会同列宁进行爭論，并且也要反駁攻击他的同志們，因为他們不善于暴露他的判断的真正弱点。但是我觉得在討論我們这个并非列宁起草的草案时是不宜考察這個問題的。而且一般說来这也是多余的。因为列宁虽然如上面提到的，很不成功地企图替自己辯白，但他自己已經認識到，他在同經濟主义者爭論时走得太远了，“做得矯枉过正了”。干嗎要爭得面紅耳赤呢？我們唯一只有拥抱某个时候曾經在理論上放蕩的儿子，并且在列宁的“意識”发出光輝的时候宰杀肥壮的牛犢<sup>①</sup>。

不过，在力求停止关于我当时认为已經一去不复返的分歧意見的爭論时，我自己走得太远了，太偏袒列宁了。有时我說的話就像媠姆对淘气的孩子說的話一样。媠姆希望孩子变好，但是不采取懲罰手段：“万尼亚（在这里是：沃洛佳<sup>②</sup>）沒有淘气，小猫淘气；沃洛佳（在那里是：万尼亚）是聪明的孩子，他不会淘气。”这种古老的教育方式是錯誤的。我現在很惋惜这个錯誤。現在我看到，当时如果我明确地指出小册子《怎么办？》在理論上的淘气行为，对于事业是会更有益得多的。若有哪位同志願意責备我这个錯誤，我絕不会爭辯，不会回嘴。不过我可以安慰自己說，人們总是常常責备我好辯，为了丰富多采起見，听听对多余的爱好和平的責难也許是不坏的。

順便談談我的好辯。我之开始同司徒卢威先生和“經濟主义者”进行辯論，也只是在我相信（司徒卢威先生的）理論錯誤和詭辯

---

① 这句刻薄俏皮的話是从一段聖經故事中翻改出来的，相当于我国成語“浪子回头”的意思。某人生活放蕩，浪費了全部資財，后来回到父亲身旁，表示懺悔。父亲动了慈心，寬恕了他，宰杀肥牛犢，以为庆賀。參看《聖經》《路加福音》第十五章第十一——三十二节。——譯者注

② 万尼亚（伊万的別名）、沃洛佳（弗拉基米尔的爱称），均俄人通称，如中文的張三李四。列宁的全名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烏里揚諾夫。——譯者注

对我们可能产生有害的**实际**后果的时候。的确，我永远不会为了“**純粹的理論**”去辯論；而許許多多的原因常常迫使我放棄这种快乐。恩格斯公正地說过，純乎其純的理論現在只有在反动分子中間才遇得到。

只有在代表大会以后，我才看到，我对列宁的极端爱好和平的态度以及同他“**不脱离关系**”<sup>①</sup>的坚定信念是**有害于**我們党的。只有在代表大会以后，我才彻底弄清了小册子《怎么办？》对我们的“实际工作者”有怎样巨大的影响，以及在怎样的程度上**正是它的那些錯誤**影响了他們中間的許多人。只有在代表大会以后，我才从观察中知道，列宁把工人群众看成是“历史的非历史因素”，看成是被从外面起作用的“精神”推向社会主义的“物质”的这个**錯誤**观点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决定了列宁本人和我們的許多“强硬的”实际工作者的**策略的和組織的概念**<sup>②</sup>。最后，只有在代表大会以后，我才明白我认为列宁在“**向前进**”是錯得多么厉害。事实上他想也沒有想朝这个方向走。他同馬克思主义的不一致使得他的思想更容

---

① 参看《會議記錄》中我对阿基莫夫的回答。——著者注〔狂妄的工人事业派分子阿基莫夫在代表大会上极力要引起普列汉諾夫和列宁的爭执。普列汉諾夫在回答他的时候开玩笑地說：“拿破侖很想使自己的元帥們和他們的老婆脱离关系；有些元帥对他屈服了，虽然他們愛自己的老婆。阿基莫夫同志在这方面很像拿破侖，他費尽心机想使我同列宁脱离关系。但我比拿破侖的元帥們要表现出更多的骨气；我不会跟列宁脱离关系，我相信他也不会打算同我脱离关系。”当时列宁笑了笑，否定地搖了搖頭。参看《普列汉諾夫全集》第十二卷第418頁。——譯者注〕

② 錯誤的理論同有害的實踐的这种联系是十分明显的。贊成社会民主主义思想的发展可以“完全不依赖于工人运动的自发增长”这个观点的人們，可能让自己在很大的程度上“不依赖于”工人运动，并且一般說来，可能在自己的實踐中模仿旧日黃金时代的陰謀分子。为了公平起見，我要指出，某个时候屬於“經濟主义者”陣營的某些同志还在代表大会以前曾經要我注意过分“强硬的火星报分子”在实际工作中的**錯誤**和极端行为。虽然我自己在給《火星报》編輯部的一些信中指出了并且說明了其中的一些极端行为，但是我当时仍然认为过去的“經濟主义者”的看法过分夸大了。現在看来，他們的夸大沒有我过去所以为的那样厉害。——著者注

易为在理解馬克思主义方面最少修养的“实际工作者”所接受。这种情况給他造成了一种声誉。他对这种声誉是再滿意不过了。但是，他不仅沒有把在同“經濟主义者們”論辯时被他弄弯的棍子放到一边去，而是一屁股騎在这根弯棍子上，并且确定不移地暴露出（在我們党内所有伊万諾夫之流的謀士們的热烈欢呼声中）騎着它跑向……“专政”方面去的意图。这一切从根本上改变了我对事态的看法。于是我决定遵循在此等場合下绝对正确的**迟做比不做好**这条規則进行斗争和开展辯論。

在上一号的《火星报》<sup>①</sup>上，我指出列宁对“政治”和經濟斗争的关系的观点錯誤，接着我又揭露他的理論錯誤同他的組織计划的联系。我认为沒有必要隱瞞：在这篇批判性的著作中我的出发点是：坚信必須消灭我們党的历史上的“第四”时期，以便把列宁的“弄弯了的棍子”抛到廢物堆中去。

（譯自《普列汉諾夫全集》第十三卷第 116—140 頁）

---

① 指本文前半部。——譯者注

# 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党员 會議上的发言

(一九〇四年九月二日)

普列汉諾夫在这篇发言中繼續为自己在自行补选和瘋狂的反布尔什維克言論問題上的調和主义立場辯护。

不可調和的人現在把我們的中央机关叫做陰謀家的薈集所。我，作为編輯部編委和总委员会委員，忝列于这些陰謀家之中。正是作为“陰謀家”，我現在要說几句话。我的第一个陰謀在于我曾經把馬尔托夫、阿克雪里罗得、查苏利奇和斯塔罗維尔同志补选到編輯部。有人說我这样做破坏了多数人的意志。但这是不正确的。我遵循了党章，党章給中央机关提供了自行补选的权利。同时在代表大会上，我們的著名的多数是怎样一回事呢？我們多一个人。結果，当这个人轉到少数派方面去以后，代表大会就分为两半，这表现在它最后一項決議中，這項決議涉及會議記錄的命运。繼續奉行所謂“多数派”的政策，就意味着在党内組織接連不断的而且對我們的事業极端有害的內战，在几乎相等的两种力量之間組織斗争。思想斗争会有什么意义呢？据說这似乎是同机会主义的斗争。但是必須使語言具有人类的意义。馬尔托夫究竟是怎样一个机会主义者呢？阿克雪里罗得或者斯塔罗維尔是怎样一个机会主义者呢？当考茨基听到有人称他是机会主义者时，他曾經哈哈大笑。責备他們是机会主义根本没有意思。然而兄弟相殘的斗争就是用这种責备掩飾起来的。这种斗争的結果，我們的政治活动衰落了，社会革命党人和《解放》杂志的活动高漲了。必須停止



这种有害的斗争。还在去年秋天我曾经向中央委员会指出过这一点，而且按照同一个方向采取了行动，利用自己的合法权利进行了补选。这就是我的第一个阴谋。

有人责备《火星报》编辑部同我们的“顽固派”辩论得尖刻了。这种尖刻的辩论显然是我的第二个阴谋，因为我比任何其他人都辩论得更尖刻。为什么我这样做呢？契里科夫的纳赫曼的话就是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我在自己的《集中主义还是波拿巴主义？》一文中曾引了这句话作为题辞。一想到“顽固派”使我们党遭受过的那些无法医治的创伤我就痛心。Л. 同志说过，我们应当要像教师对待学生一样对待不自量力的委员会。但是我不知道需要有怎样一种教育制度才会使教师宽恕那个反而对他大肆谩骂的学生？无论如何我不是这种制度的拥护者。不自量力的委员会言辞上没有同我们客气过，这是每个人都可以相信的。

这里有人表示耽心列宁同志会因为恢复党内和平而痛苦。但是第一，这种耽心使我想起奥斯特罗夫斯基一位女主角的著名的话：“我的爷，基特·基特奇，谁能欺负你！你自己才可以欺负任何人。”<sup>①</sup> 第二，我不理解，他怎么能够痛苦？难道有谁提出反对他的什么专门措施么？这是根本谈不到的！如果列宁同志的心理是这样：只有在党内内讧的时候才自我感觉良好，那情况对他就会更坏。我们感到遗憾，但我们不能帮助他。

中央委员会的“阴谋”在于：好像它采取了使我们党进入和平状态的某种非法措施。原则上我不否认中央委员会（也像任何其他委员会或任何个别的人一样）有采取非法措施的可能性；*errare humanum est.*<sup>②</sup> 但是应当通过合法的程序来分析和改正它的错误，而“顽固派”（这些看来是一贯拥护纪律的人）的行为却完全是非法的，他们大肆谩骂中央委员会，并且建议同志们不要服从它。

---

① 语出亚·尼·奥斯特罗夫斯基喜剧《为他人作嫁衣裳》。基特·基特奇是顽固商人的典型。——译者注

② 人不会没有错误。——译者注

这就是“頑固派”的紀律！中央机关报的罪过仅仅是它不希望让內訌繼續下去。但是这在“頑固派”看来却是不可饒恕的死罪。他們使我想起来一些阿尔巴尼亚人，我今天在《Journal de Genève》<sup>①</sup>讀到一則关于他們的奇怪的消息：阿尔巴尼亚人派了一个代表团去見苏丹，代表团应当提醒他注意，**如果他不收回他向回教徒作出的那些让步**，他們阿尔巴尼亚人就要暴动。阿尔巴尼亚人不为自己要求任何东西，他們是无私的人民；他們只希望“紅色的苏丹”繼續屠杀回教徒。試問，如果不破坏公正性怎么能使阿尔巴尼亚人喜欢呢？这是不可能的。完全一样，如果不伤害党也不可能使我們的阿尔巴尼亚人（即我們的“頑固派”）喜欢。

但是我們不应当，不可能，也不会去伤害它。要知道，阿姆斯特丹代表大会通过了一項決議，決議声称：在每一个国家里只应当有一个社会主义政党，正像每一个国家里只有一个无产阶级一样。我們維護无产阶级的观点的人应该尽我們的能力所及使我們俄国只有一个社会主义政党，正像其中只有一个工人阶级一样。

（譯自《普列汉諾夫全集》第十三卷第 376—378 頁）

---

① 《日内瓦报》。自由派的报纸。——譯者注

## 論我們對待自由資產階級 反沙皇制度鬥爭的策略

(致中央委員會的信)

這封信於一九〇五年一月以秘密小冊子的形式由黨的出版部在日內瓦印行。作者在這裡第一次發表了機會主義的策略觀點。

作者在對待資產階級的态度問題上為新《火星報》的策略路線辯護，反對列寧在《地方自治派的運動和〈火星報〉的計劃》一文中對它提出的批評意見。

他認為：如果自由資產階級不背叛民主事業，不反對有覺悟的工人的政治要求，無產階級政黨就應當全力支持它，因為這對無產階級是有利的，因為臨來的革命不是無產階級革命，而是資產階級革命；過早的起義嘗試會把有產階級驅趕到政府的懷抱中去，所以應該堅決地譴責這種過早的吓退資產階級的企圖；恫吓策略主要是無政府主義的策略；俄國資產階級革命的使命應當由俄國無產階級和俄國資產階級共同來完成，而不是由俄國無產階級獨力完成。

這封信剛一發表，列寧就表示希望將來分析一下普列漢諾夫的糊塗思想，因為這是“很有教益的”（《列寧全集》第八卷第61頁）。可惜後來列寧沒有實現這個願望。不過列寧在《工人民主派和資產階級民主派》、《社會民主黨和臨時革命政府》、《社會民主黨在民主革命中的兩種策略》（第六、十二節）等著作中都批判了普列漢諾夫發揮

的这些“馬尔丁諾夫主义思想”。

这封信还在組織問題上繼續攻击列宁。

亲爱的同志們！

我写这封信的原因是我认为自己有义务出来保卫《火星报》鉴于現在发生的地方自治派的运动而加以宣傳的那个策略。

当这个运动开始时，我們的队伍中就开始发出了一些强烈的抱怨声（我本人曾經就得听一听这些抱怨）：以这个运动为前奏的革命将具有**资产阶级的**性质。这是毫无根据的抱怨。它們只有出自害怕**资本主义胜利**的我国民粹派之口，或者只有出自《共产党宣言》如此尖刻地嘲笑过的、四十年代的那些**真正的德国社会主义者**之口，才是适合的。你們記得《宣言》上当然与此相关的一段尖刻的話么？这段話如下：“这种德国的社会主义曾經大言不漸地吹嘘自己的那一套可怜的經院式的臆造，現在却漸漸失去了自己的学究气的天真无邪。德国资产阶级，特别是大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主和君主专制的斗争，一句話，自由主义的运动，已經采取了更加龐大的規模，于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就有了盼望已久的机会，把社会主义的要求同政治运动对立起来，因循慣例地詛咒自由主义、代議制政体、资产阶级的竞争、资产阶级的言論自由、资产阶级的自由和资产阶级的平等，并且向人民群众大力鼓吹，說什么在这个资产阶级运动中，人民群众不仅一无所得，而且还有失掉一切的危险……它（即真正的社会主义）就成为德意志各邦专制政府及其一班随从——僧侶、学监、地主和官僚順手抓来吓唬那来势汹涌的资产阶级的一个稻草人。它是同一些政府用鞭子和树条給工人起义吃吃苦头时所加的一种甜味。”<sup>①</sup>

誰要是自命为馬克思的继承人，同时却像我国民粹派或者永垂不朽的“真正的”德国社会主义者一样，把社会主义要求同政治运动对立起来，誰就再明白不过地表明：他連馬克思主义的起碼知

<sup>①</sup> 參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卷第496—497頁。——譯者注

識都不知道。

資產階級革命將第一次在我國創造一些社會政治條件，只有利用這些條件，才能認真考慮無產階級進行社會革命。馬克思在自己的《Revolution und Kontrerevolution in Deutschland》<sup>①</sup>一書中說道：“人數眾多、強大、集中和有覺悟的無產階級的生存條件，是與強大、集中和有勢力的資產階級的生存條件同時發展的。”<sup>②</sup>如果為我國資本主義的發展哭鼻子是可笑的，而為這種發展在政治方面並非無益且終將造成沙皇專制制度的崩潰而傷心，那就更其可笑了。我們應該高興的是，俄國正面臨着資產階級革命，它力求使這次革命具有尽可能廣泛的規模，力求使無產階級之必不可免地參加這次革命具有尽可能自覺的性質。這就是、也應當是我們黨當前策略的基本問題的主要內容。

遺憾的是，這個問題甚至連許多懂得必須提出它的人都解決得很不正確。例如列寧就對《火星報》“新”編輯部提出了一系列的指責，說它仿佛是用機會主義的觀點來解決上述問題的。而其實，新編輯部所提出的答案連一點機會主義的氣味都沒有。

列寧很喜歡把《火星報》“新”編輯部同舊編輯部加以對比。舊編輯部是按照正確的路綫走的，而新編輯部則墮落到機會主義的泥坑里去了。《火星報》新編輯部同舊編輯部有什麼不同呢？僅僅是其中沒有列寧。由此可見，唯有列寧才能拯救《火星報》不受機會主義的有害影響。而哪里沒有他，那里就一團糟。這對列寧說來自然是很榮耀的。但是……且看看“何事起喧嘩”。為了這個目的，我們試把“舊”列寧和“新”列寧比較一下，把小冊子《怎麼辦？》同傳單《地方自治派的運動和〈火星報〉的計劃》比較一下。

在前一本小冊子的第五十一頁和五十二頁上，我們發現下面幾行有趣的文字：“當工人還沒有根據各種具體而且確實現實的（當前的）政治事實和事件學會觀察現社會中其他各個階級在其思

① 《德國的革命和反革命》。——譯者注

② 參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八卷第11頁。——譯者注

想、精神和政治生活中的一切表現时，当工人还没有学会在實踐中用唯物主义观点来分析和估計一切階級、阶层和集团的活动和生活中一切方面的表現时，工人群众的覺悟是不能成为真正的階級覺悟的。誰把工人階級的注意力和覺悟完全或主要地集中在工人階級自己身上，他就不是社会民主党人，因为工人階級的自我認識是与那些不仅在理論上……更确切些說：与其說是在理論上，不如說是根据政治生活經驗明确了解現社会一切階級的相互关系的認識密切联系着的。”<sup>①</sup>

总之，工人階級需要政治生活的經驗，才会使自己弄清現代社会一切階級的“相互关系”；誰妨碍工人获得这种經驗，他就不是社会民主党人。这是对的，不过說法非常笨拙。但是这种經驗究竟在什么地方呢？难道在于讀一些“政治上的揭露”么？为了坚持进行这样的揭露，列宁曾經同馬尔丁諾夫进行过爭論，并且在自已的小册子《怎么办？》中有时还陷入了的确相当可笑的极端。难道工人階級积极参加同专制制度的斗争（这个斗争只有在它成为全民斗争的情况下才会取得胜利）不能使这个階級得到比讀（即使讀得最勤奮）揭露性的著作更有力量得多和从經驗的观点看来更令人信服得多的某种东西么？馬克思說，德国工人参加一八四八——一八四九年各种事变的最重要的結果之一是无产階級对资产階級民主制感到失望。我个人觉得，这种失望远不是普遍的，后来拉薩尔开始进行宣傳时工人們或則采取多少是漠不关心的态度、或則采取多少是将信将疑的事實就可資证明。但是只要这种失望存在过，它的确是那个时代的經驗的一个最重要的历史成果，也的确是德国无产階級一个最珍贵的政治收获。如果“新”《火星报》編輯部現在向工人階級宣傳的那种行动方式使工人階級得到的只是一个取得这种收获的可能性（然而我深信，它使工人階級得到的并不只是一个这样的可能性），那就必須用充分贊同的态度对待这种

---

<sup>①</sup> 參看《列宁全集》第五卷第381—382頁。——譯者注

行动方式，因为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自由主义以及对资产阶级民主制度感到失望的标度就是它自身政治上成熟的标度。我们现在向俄国无产阶级宣传怎样的行动方式呢？其实也就是《共产党宣言》用下面一段话所指出的那个方式：“当资产阶级还采取革命的行动的时候，共产党就同它一起反对君主专制、封建土地所有制和反动市侩。”<sup>①</sup> 我们没有宣传过任何其他的方式，**誰像新列宁一样力求使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离开这条道路，他就不是社会民主党人。**

往下讲。在列宁的同一本小册子的第五十九頁上說道：“阶级政治觉悟只能从外面灌輸給工人，即只能从經濟斗争范围外面，从工人同厂主的关系范围外面灌輸給工人。只有从一切阶级和阶层同国家和政府的关系方面，只有从一切阶级的相互关系方面，才能汲取到这种知識。所以我们对于‘为了給工人灌輸政治知識应当怎么办？’这个问题，决不能只是提出往往可以使一般实际工作者——尤其是那些倾向于經濟主义的实际工作者——滿意的那种回答，即所謂‘到工人中去！’社会民主党人为了向工人灌輸政治知識，就应当到居民的一切阶级中去，应当把自己的队伍分派到一切方面去。”<sup>②</sup>

大家知道，列宁所謂阶级政治意識“只有从外面”才能灌輸給工人的看法引起了多大的誤解。我在第七十一、七十二两号的《火星报》上用整整两篇小品文評述过这个看法<sup>③</sup>，所以我不打算在这里分析它了。我只要指出一点：**旧列宁曾經劝告社会民主党人“到居民的一切阶级中去”，“把自己的队伍分派到一切方面去”，而新列宁則殘酷地反对他，攻击“新”《火星报》編輯部，因为它劝告我們的党把“工人的队伍”例如分派到对沙皇制度多少有所不滿的地方自治会會議中去。**

**新列宁自己感觉到，他在这里同旧列宁相矛盾，于是努力用这**

① 參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卷第 503 頁。——譯者注

② 參看《列宁全集》第五卷第 391 頁。——譯者注

③ 參看本书第 84—111 頁。——譯者注

样的方式来解决这个矛盾：

他說：“当自由派有了自己的机关刊物，提出了特別政綱的时候，无产阶级影响‘社会人士’的任务自然也就改变了：这时，工人民主派就不能只限于‘震动’自由民主派，激发他們的反政府精神，而应该把革命地批判自由派在政治立場上明显暴露出来的不彻底性，摆到首要地位。我們影响自由派的方式，就是反复指出自由派先生們的政治抗議是不彻底的，而且远远不够（只要引证一下《曙光》杂志对司徒卢威先生为維特的回忆录写的序言的批判以及《火星报》的許多文章就够了）。”<sup>①</sup>

这当然是很好的，如果……不是很糟糕的話。列宁批評司徒卢威先生的序言的文章<sup>②</sup>发表在一九〇一年十二月出版的第二、三期合刊的《曙光》杂志上。这篇文章是在該杂志出版前四个月内写成的。<sup>③</sup>而提出自己所謂到一切階級中去云云的全部劝告的小册子《怎么办？》則只在一九〇二年才問世。它的序言标明是这一年的二月。由是观之，司徒卢威先生的无疑的“不彻底性”不會妨碍“旧”列宁坚持誰如何如何“他就不是社会民主党人”的那个信念。由是观之，这个无疑的“不彻底性”根本不会使“新”列宁和“旧”列宁調和起来。由是观之，引证批判司徒卢威先生为《維特回忆录》写的序言的《曙光》杂志是完全不够的。以及諸如此类。

引证《火星报》的許多文章同样也是不“够”的：比方列宁在自己的登載在我們的机关报第十六号上的文章中說道：“无产阶级政党应当善于在紧要关头抓住任何一个自由主义者：当他打算移动

① 見《列宁全集》第七卷第489頁。——譯者注

② 指列宁的《地方自治局的迫害者和自由主义的汉尼拔》一文。“列宁的这篇論文在《火星报》編輯部內引起了严重的意見分歧。普列汉諾夫和編輯部的其他几个成員都反对列宁的文章。《火星报》編輯部成員在通信中圍繞这篇文章所进行的爭論几乎达一个月之久。列宁接受了个别的建議，在措詞上作了部分的修改，但坚决拒絕改变文章无情揭发的口吻和它的傾向”（引自《列宁全集》第五卷第503—504頁俄文版編者注）。——譯者注

③ 这篇文章写于一九〇一年六月。——譯者注



一寸的时候，就强迫他移动一尺！”<sup>①</sup>这一号的《火星报》也是在一九〇二年二月出版的，就是说，毕竟**还在**列宁攻击“不彻底的”彼·司徒卢威先生**以后**。因此，这篇很能说明旧列宁的特点的文章清楚地表明：根本不能用彼·司徒卢威先生的不彻底性来解释传单《地方自治运动和〈火星报〉的计划》打（像德国人所說的一样）小册子《怎么办？》的耳光这个事实。

不用说，以彼·司徒卢威先生为代表的自由主义反政府派的“不彻底性”无论如何不会使我们感到意外。所以我们对“社会人士”的态度以及对我們关于我們是否应该向他們“呼吁”和究竟应该怎样“呼吁”的意见也不会因此受到多少决定性的影响。我国未来的自由主义反政府派的“不彻底性”，根据同一个司徒卢威先生在自己出现于政治舞台以前很久所从事的那种“批判活动”，本来是不难预见到的。或许在“旧”列宁看来，这些“批判的”把戏不“足”以对我国政治上的反政府派可能是什么构成一个明白的概念么？大概如此。我记得，还在一九〇〇年夏天，即当彼·司徒卢威先生已经十分出色地显示了自己的“批判”才能时，列宁一定要邀请这个“批判者”来做《曙光》杂志的撰稿人。我不得不竭力同他争论，迫使他放弃这个令我非常惊讶和苦恼的希望。

列宁在这里也是依照自己一成不变的习惯根据恩格斯在同杜林争论时当作**形而上学思维**的标本而提出来的“是就是是，非就是非，除此以外，尽是鬼话”的那个公式进行推论的。在列宁看来：我們**要么就推开资产阶级反政府派，要么就暴露它的不彻底性**。马克思主义者的推论则不同：他們的策略善于**把推开和揭露结合起来**。《共产党宣言》早就写道，虽然共产党人在资产阶级进行反对君主专制制度的革命斗争时同它一起走，但同时他們一分钟也不停止“培养工人尽可能更加明确地认识资产阶级利益和无产阶级利益间敌对情形的意识。”<sup>②</sup>显然（甚至从上面引自《怎么办？》中的

① 見《列宁全集》第五卷第310頁。——譯者注

② 參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卷第503頁。——譯者注

一段話的意義看來)，不揭露自由派的不徹底性就不可能培養這種意識，因為這種不徹底性正是決定於這個階級同無產階級的經濟關係的性質，正是決定於它的利益同工人的利益不可調和的那個情況。

再往下談。請仔細想想下面這段話吧：“我們也應當善於把一切階級中間凡是願意聽民主主義者講話的人都召集來開會。”（《怎麼辦？》第六十二頁）<sup>①</sup>

“我們當然不能領導學生、自由派及其他各種分子為他們的‘目前的利益’而鬥爭，但是要知道……我們所說的並不是這個問題！我們所說的是各種社會階層可能參加而且必然參加推翻專制制度的問題；而‘各個反政府階層的’這種‘積極行動’，我們不僅可以領導並且必須領導，如果我們想做‘先鋒隊’的話。至於使我國學生、我國自由派及其他各種分子‘直接感到我國的政治壓迫制度’，那麼不僅他們自己會設法做到這一點，而且警察和專制政府的官僚自己首先就會特別努力地做到這一點。而‘我們’，——如果我們想做先進的民主主義者的話——則應當設法推動那些只對大學現狀或者只對地方自治局現狀等等表示不滿的人們感到全部政治制度的不合理。我們應當負責組織這種在我們黨的領導下進行的全面的政治鬥爭，使所有一切反政府階層都能够盡力幫助並且確實盡力幫助這個鬥爭和這個黨。我們應當把社會民主黨的实际工作者培養成為政治領袖，使他們善於領導這種全面的鬥爭的一切表現，善於在必要時向憤激的學生、不滿意的地方自治派，忿忿不平的異教徒和受侮辱的國民教員以及其他各種人‘指出積極的行動綱領’。”（第六十四——六十五頁）<sup>②</sup>

現在請你們把這段話同列寧在傳單《地方自治派的運動和〈火星報〉的計劃》中所寫的話比較一下，你們就會得到如下的結論：如果我們希望成為一個先進的民主主義者，那我們就應當“推動”本

① 見《列寧全集》第五卷第 394—395 頁。——譯者注

② 同上書，第 397—398 頁。——譯者注

来只对地方自治制度不滿的人产生整个政治制度都毫不中用的思想；但是当这些被我們“推动”的不滿的人們忽然想到“同整个政治制度”斗争时，如果我們忽然想到为了工人阶级的利益“推动”他們产生更民主的要求，我們就会成为机会主义。真是惊人的邏輯！真是深刻的政略！

这还不是最重要的。

我們应当在我們党的领导下担负起組織全面的政治斗争的任务，并且力求迫使“一切反政府阶层”在同沙皇制度的斗争中帮助我們；但是当地方自治派“反政府阶层”采取行动时，如果我們希望迫使这种分子在无产阶级同沙皇制度的斗争中帮助无产阶级的話，我們竟成了机会主义者，而且險些儿成了叛徒。再說一遍，真是惊人的邏輯！……真是不可捉摸的正統思想！

然而这还不是最重要的。

我們应当从我們的实际工作者中間培养出这样一些政治領袖，他們要善于在必要的时刻强迫不滿的地方自治派分子接受积极行动綱領；而当我們劝告我們的实际工作者要关心于用声势浩大的示威队伍使“不滿的地方自治派分子”注意到无产阶级的政治綱領，却有人出来責备我們是机会主义，以至列宁拼命地喊道：“不得了哇！”“叛变啦！”怪事，真是怪事！

自然，我并无意于捍卫列宁在自己的小册子《怎么办？》中所发表的一切原理；我也根本沒有保护我摘引的文句中包含的那一切原理的想法。但是既然所有这些原理都是根据《共产党宣言》早就說过的那个根本原則来的，这原則說，我們必須支持“一切旨在反对現存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的革命运动”<sup>①</sup>，——所以我同意旧列宁的意見，所以我对于新列宁几乎推翻他崇拜过的一切东西，而崇拜几乎一切他推翻过的东西感到遺憾。

新《火星报》編輯部提出自己的“計劃”时是以国际革命社会民

---

① 参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卷第 504 頁。——譯者注

主党的那些基本策略原理为指导的，这些原理早在我們以及列宁和彼·司徒卢威先生还没有降生人間即已制定，而且弗·恩格斯在談到它們时說过，他整整一生中沒有任何一点理由可以怀疑它們的正确性。同一个恩格斯根据这些原理于一八九四年一月——当时可以期待意大利爆发革命——給屠拉梯写了如下一段意味深长的話：

“所以，这种在酝酿中的革命运动的胜利<sup>①</sup>只能使我們更加强大，并且給我們創造出一种更为有利的**环境**。假如我們站在一旁，而且把我們对各“亲戚”党的态度局限于消极的批判，那么我們將犯最大的錯誤。”<sup>②</sup>

但是列宁以恩格斯的名义，以馬克思的名义，以列宁自己的名义，以及一般說来以一切正統的馬克思主义者的名义劝告我們犯的正是一切錯誤中这个最大的錯誤。究竟誰对呢：恩格斯还是列宁？难道还不是怀疑《反杜林論》的著名作者的机会主义的时候么？

新列宁嘲笑新《火星报》編輯部不願意恫吓任何一个反对沙皇制度的反政府派，他的这种似乎革命的嘲笑在他发起的反对这个編輯部的“运动”中起着不小的作用。因此弄清同他这句话有联系的概念和驅散我們的“新”論敌制造出来的种种誤解的迷雾是有益的。

列宁写道：“害怕街头傳单、害怕超出有資格限制的宪法的范围的自由派先生們，永远要怕‘民主共和国’的口号和全民武装起义的号召。但觉悟的无产阶级会激憤地駁斥这种想法，以为我們可能拋棄这个口号和这个号召，我們可能使自己的活动不致引起资产阶级的胆战心惊和張惶失措的情緒。”<sup>③</sup>

这里的每一个字都是最惊人的和最有煽动性的概念混乱。

① 前面恩格斯指明，这次运动还不可能是社会主义的运动。——著者注

② 見《馬克思恩格斯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一九六二年版第 522 頁。——譯者注

③ 見《列宁全集》第七卷第 492—493 頁。——譯者注

第一，让列宁告訴我們，在他写自己的小册子《怎么办？》那个时候，“自由派先生們”是怎样对待所有超出有資格限制的宪法的范围的人的。他們是不是害怕“所有”这些人呢？如果他回答說：“不是”，——那么我就要問他，究竟为什么現在这样急剧地改变了他們的本性呢？如果他回答說：“是”，——那么我就要恭恭敬敬地請他向我解釋一下，既然如此，为什么他还认为此时必須强迫他們接受“积极的行动綱領”。

第二，难道在《火星报》編輯部的信<sup>①</sup>中談到了放棄“民主共和国”的口号，放棄武装起义的口号么？让列宁費心把他在信中发现有这个意思的地方給我指点出来。他指不出这样的地方，因为**根本沒有，也不会有**。《火星报》編輯部所叙述的思想截然相反。它是这样說的：“革命的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应当提醒开始同沙皇制度作斗争的反政府的自由资产阶级注意，現在我国的局势已經不像以前那个可悲的和可耻的局势，那时人民对待知識分子一切要求解放的意图仍然漠不关心（正像車尔尼雪夫斯基当时在《沒有地址的信》中痛苦地确认过的一样），而且那时只要几个貴族就足以使所有起义反对专制制度的人‘屈服在飯碗之下’；它应当提醒自由资产阶级注意，新的和再大不过的‘人民’力量已經以它本来的面目出现在我国历史舞台，这种力量善于评价政治自由的意义，能够牢固地捍卫这个自由，并且决心为它而斗争，必要时甚至举行武装起义；最后，它应当提醒自由资产阶级注意，只要它不把政治上背叛民主事业作为自己的政治綱領，只要它不站出来**反对有觉悟的工人的政治要求**，它就完全可以指靠无产阶级强有力的支持。”这就是“新”《火星报》編輯部說过的話。这同列宁强派給它的那种观点是不是有任何哪怕是最微小的、哪怕是最牵强的相同性呢？

一般說来，我們的活动不能以资产阶级的惊慌失措和恐惧为轉移。自然如此！当然不能！这是公理。但是我們在自己的活动

<sup>①</sup> 指孟什維克的新《火星报》編輯部的《給各級党組織的信》，一九〇四年十一月出版。——譯者注

中應該以关于我們沒有必要就不应当吓退在这个时候可以对我們有利的那些人的那个考虑为指导的那个思想，也就是这样一种公理。如果无政府主义者至今还在否认这个公理，那么我希望一切“有觉悟的”社会民主党人早已不再对它有所疑惑了。

順便談一談惊慌失措。不久以前的唐波夫事件也許能够使某些反对专制制度的人得出这样的看法：《莫斯科新聞》用反对立宪主义的全民起义威胁自由派是正确的。我要問，世間是否有哪个人会不懂得这种思想所引起的“惊慌失措”对于俄国的政治自由事业說来是极其有害的，而我們的义务在于举行工人示威以具体地、切实地告訴自由資產階級：《莫斯科新聞》在誹謗“人民”，工人階級之准备起义不是为了支持沙皇制度，而是为了同它作斗争呢？要知道《火星报》編輯部在自己的信中所指出的主要也就是这种惊慌失措的情緒。

的确，它所指的不止是这种“惊慌失措”情緒。的确，一般說来它过去和現在都认为企图使資產階級相信我們現在所面临的革命任务不在于推翻我国的“旧制度”，而在于社会主义的胜利的那个策略是有害的。但是难道旧《火星报》編輯部什么时候赞成过这种策略么？难道它不是曾經认为这种策略違反現代社会主义的全部精神么？下面就是我这个旧《火星报》編輯部的成員在《曙光》上写过的話，列宁就是在同一期杂志上跟“司徒卢威先生的序言”进行了战斗。

“从現代科学社会主义的观点看来，任何关于社会主义变革是俄国革命运动的最近目的的空談都是完全和絕對沒有根据的。

“革命运动的最近目的是推翻专制制度，推翻了专制制度就可以保证俄国无产階級的政治权利和政治自由，使他們有广泛的机会生长、成熟、发展和組織起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的胜利不能同专制制度的崩潰同时并举。这两个时刻之間必須有一个相当长的時間間隔互相分离开来。而正是因为它們在時間上是互相分离的，社会民主党人在自己同专制制度的不可調和的斗争中

就有充分的权利而且毫不反对自己地可以向所有应当知道和懂得这个道理的人指出，他們的利益現在同俄国社会中主張自由思想的那一部分人的利益是一致的。”<sup>①</sup>

如果在我写这段話（一九〇一年）的时候，我們的同志中間有人說社会主义变革的时刻是同专制制度崩潰的时刻吻合的，那么旧《火星报》編輯部就会认为自己有义务駁斥这个思想。第一，因为从科学社会主义的观点看来它本来是不正确的。第二，因为这种主張在实践方面是有害的，因为这可能使自由资产阶级人士产生一种对我们不利的耽心。总之，我們的旧委员会宣布了这个思想是有害的，这主要是由于它可能在一定的程度上吓跑自由派。当时也許只有“社会革命党人”才会因此而責备我們的編輯委员会。这些社会革命党人的心灵深处越是充滿小资产阶级的意向，他們就越是坚决地給我們許諾社会主义变革。現在“正統的”和“急进的”列宁却因为这种对不必要的恐吓行为的否定态度而譴責我們。我們在我們的政治思想发展道路上已經走得多么远啊！

列宁一心想着攻击新《火星报》編輯部，看来完全忘記了每一个有觉悟的社会民主党人都“应当知道的和应当記住的”道理，也就是說，完全忘記了恫吓策略主要是无政府主义的策略。无政府主义的策略是每时每刻尽量制造一片喧鬧、叫嚷、恐怖、慌乱和烏烟瘴气的气氛。西方的无产阶级早已很好地懂得，这种荒謬的策略給他們的解放运动造成多大的損害。

俄国工人早就該知道这个道理了。如果准备一起这样或那样地反抗专制制度的所謂“社会人士”硬說我們主張无政府主义的策略，則我們只要出現在他們中間，即或只是出現在他們附近，都只会把他們吓跑，因为无政府主义者先生們什么名堂都干得出来！我們应当提醒他們注意，我們不是无政府主义者，我們自身就譴責无政府主义的策略。这是符合我們事业的明显的利益的。但是要知

① 参看《普列汉諾夫全集》俄文版第十二卷第 162—163 頁。——譯者注

道，提醒他們注意这一点也就意味着采取各种不去恫吓“自由派”的措施。

这有什么不好呢？为什么列宁这样为我們不主張进行恫吓所恫吓呢？

列宁叫道：“如果我們要考虑到他們（指自由派——格·普·）的惊慌情緒，我們可真是傻瓜了。”<sup>①</sup>对。若是要考虑这种情緒，我們可真是傻瓜。但是我們不是考虑它，而是考虑工人运动的利益。如果我們立意要代表这些利益，却不善于理解坚持恫吓策略就无异于不支持同沙皇制度作斗争的人，而支持保卫沙皇制度的人，那我們就是三倍的傻瓜。

列宁以为，只有“新时报分子”才能考虑不要被反动派所利用才好。如果他不被自己那种无论如何要揭穿新《火星报》編輯部的机会主义的願望弄得晕头轉向，他就会明白任何初出茅庐的政治自由的拥护者都必须考虑这点。

科学社会主义的奠定者們清楚地懂得恫吓行为的有害意义。恩格斯在同特卡乔夫辯論时写道（在七十年代中期），俄国具有革命的一切条件，并且补充說：“只有两个事件才能使革命迁延下去：或是反对土耳其或奥地利的战争进行得手（但为此需要有金錢和可靠的同盟者），或是过早的起义尝试又会把有产階級驅赶到政府的怀抱中去。”<sup>②</sup>恩格斯之所以坚决譴責这种为时过早的企图，正是因为它会吓退有产階級，換言之，正是因为它会为反动派所利用。早就該宣布恩格斯这个“新时报分子”是机会主义者了，也早就該請“正統的”和“急进的”邦契-布魯也維奇这个始終不变的列宁的 alter ego<sup>③</sup> 監視他了。

新《火星报》編輯部在自己的信中表达的那些思想无疑是絕對

① 參看《列宁全集》第七卷第 493 頁。——譯者注

② 參看小册子《弗·恩格斯論俄国》日內瓦一八九四年俄文版第 19 頁。——著者注（參看《馬克思恩格斯文選》兩卷集第二卷第 60 頁。——譯者注）

③ 第二個我。——譯者注



正确的，連奚落、指斥和叫嚷它的机会主义的列宁本人也不得不承认它們是“不言自明的”。他說：“无視这个同盟者（即自由资产阶級——格·普·）是愚蠢的，一味想要威胁和恫吓他們是荒唐的，这一切都完全是不言自明的，再来解釋这一点，就会使人感到奇怪了。但是，我要再說一遍，我們鼓动的中心点和主导綫，不是影响这个同盟者，而应当是准备同敌人进行决战。”<sup>①</sup> 但是如果这是“不言自明的”，然則“雄辯家因何大发宏論呢”<sup>②</sup>？如果这是“不言自明的”，然則列宁凭什么叫喊我們有机会主义呢？敢情他的全部喧嚷和叫喊完全沒有任何理性意义是“不言自明的”么？

不，还是請等一等。列宁之所以喧嚷和叫喊，是因为在新《火星报》編輯部的信中，这些“不言自明的”真理并不包括例如下列之“不言自明性”列宁“不言自明地”认为还不是完全“不言自明的”原理：“我們应当考虑的是我們力量的状况（原来这样！我們竟沒想到我們应当考虑它！我們才头一次听列宁这样說。——格·普·），人民的觉悟和不满的增长（煥然一新的列宁的新真理！——格·普·），把无产阶级对专制制度的直接进攻同哪个自发的和自发发展的运动結合起来的时机。”<sup>③</sup> 是呀！說得对，极可尊敬的先生！但可惜的只是你們本身不会“考虑”。你們說：

“为了討好地方自治局，政府向他們作了些微的让步，但它实际上並沒有向人民做任何让步，它还完全可以重新采取反动手段（确切些說：繼續采取反动手段），就像过去在俄国，在某个专制君主的統治时期，在自由主义思潮一瞬即逝之后所发生过的几十次几百次的情形那样。”<sup>④</sup>

这是对的。但是正因为政府可能重新采取反动手段，“不仅对人民”不作重大的让步，而且甚至对地方自治局本身也不作重大的

① 參看《列宁全集》第七卷第 495 頁。——譯者注

② 語出普希金詩《給俄羅斯的誹謗家》（一八三一年）。——譯者注

③ 參看《列宁全集》第七卷第 493 頁。——譯者注

④ 同上書，第 495 頁。——譯者注

让步，我們就可以不无根据地希望我們可以成功地推动例如地方自治派同专制制度进行比较坚决的斗争。正因为这样，我們才应当竭力迫使——像旧列宁所說过的一样——心怀不滿的地方自治派接受“积极的行动綱領”。

新列宁继续說：“正是在这个时候，在政府討好地方自治局，轉移人民的視綫和用空話安撫他們的时候，应当特別提防狐狸尾巴<sup>①</sup>，特別坚决地提醒人們注意敌人还没有打垮，特别是要坚决地号召人們继续同敌人斗争，并且百倍加强这个斗争。”<sup>②</sup>

又說对了！正是現在这个时候应当特別提防沙皇政府的狐狸尾巴，并且提醒大家注意敌人还没有打垮。

但是新《火星报》編輯部是怎样說的呢？它說，有觉悟的无产阶级在迫使——按照旧列宁的劝告——心怀不滿的地方自治派接受“积极的行动綱領”时，应当提醒他們注意有这个尾巴的正是狐狸，而不是任何其他不那么凶猛的野兽，并且邀請他們共同来捕捉这只凶猛的和有害的野兽。

新列宁发现，正是在現在这个时候把重心从同政府打交道轉到同地方自治局打交道是一种罪行。在这个問題上我就不会說“对！”了，因为这里若无有意制造的堪称为老奸巨滑的狐狸的混乱，定系无心的“誤解”，但是这种誤解，用恩格斯在反駁特卡乔夫时的說法，只有对于不曉世事的中学生才是可以原諒的。有各式各样的交道，我們同政府“打交道”，是力求推翻它，而我們同社会“打交道”，則力求鼓励它更坚决地同政府作斗争，并且……并且，——像旧列宁所說的，——强迫它接受“积极的行动綱領”。可見，問題本来是非常简单的。

因为新《火星报》編輯部的信而攻击它的同志們，自认为是极

---

① 狐狸尾巴很大，可以扫平自己的足迹。在俄国日常生活中“狐狸尾巴”意指狡猾，即干了坏事又加以掩盖。古老的俄罗斯俗語中有所謂“狐狸的尾巴狼的嘴”。——譯者注

② 參看《列宁全集》第七卷第495頁。——譯者注

端的革命者，但是，他們所宣傳的那個策略從無產階級的观点看來，因之也就是從革命的观点看來，是有害的。他們本來想走進一個房間，結果却走進了另一個房間。當年民粹派經常重犯這種錯誤，但是社會民主黨人犯這種錯誤却是完全不能容許的。

攻擊《火星報》的信的同志們究竟犯的是什麼錯誤呢？只要他們肯稍微花一些氣力用幾分鐘時間想想爭論的問題，他們立即就會明白的。

事實上，向我們提出責難的同志們同我們一樣認為俄國現在所面臨的革命不是無產階級革命，而是資產階級革命。不過我們勸無產階級（它注定要在這次資產階級革命中扮演主要的角色）及時地關心使唯一能參加鬥爭的所有那些資產階級分子都參加這個正在進行的鬥爭，我國假急進派的同志們則希望資產階級革命由無產階級的力量來獨立完成。好一個急進主義，這還用說！如果無產階級聽信了我們這些同志向他們提出的“急進的”勸告，那麼我們的牽動衷情的眼睛也許很快就得領受下面令人高興的情景：革命的無產階級不惜自己的性命同專制制度進行鬥爭，而讓“半途而廢的”資產階級袖手旁觀，說這是對它的“半途而廢”的懲罰；而當專制制度崩潰時，這個無產階級則要退到後台（因為它所完成的革命具有資產階級性質，而非社會主義性質），卻讓“半途而廢的”資產階級完全享受它所完成的革命的成果。多麼傑出的急進主義啊！說採取這個立場的人們正在力求“急進地”為“半途而廢的”資產階級的利益而工作，那是定而無疑的。

向我們提出責難的同志同我們之間的分歧可以用下面兩句話來歸納：

我們——“機會主義者”——希望把臨來的政治鬥爭的重担哪怕是部分地從無產階級肩上轉移到資產階級肩上。

他們——“急進主義者”——希望這個重担全部由無產階級挑起來。

這裡的分歧是很大的，但是它對假“急進派”並不是有利的。

馬克思当年說过，資產階級承认无产階級一种权利：即同专制制度进行篡位斗争的权利。但是在四十年代末期資產階級“承认”无产階級具有的这种权利，正是无产階級那些沒有觉悟的朋友現在强要他們接受的权利。我們坚决不让自己沾染上任何覬覦这些沒有觉悟的朋友的“急进主义”的情緒。

如果任何一个至死不改的經濟主义者表现出这种“急进主义”，那是自然的，因为經濟主义者不理解我們党的政治任务。但是新列宁也暴露出这种“急进主义”，从而同旧列宁这位小册子《怎么办？》的作者产生了不可調和的矛盾，这却是一个悶葫芦，要揭开它惟有凭仗下面两个假設中的一个。

**第一个假設。**以前列宁之責备新《火星报》編輯部有机会主义唯一是根据在組織問題上自己同它的意見分歧。現在他看到，甚至在他自己的陣营內，过去的这些指責已經令人非常厌烦，而不再产生应有的印象了。因此他决定利用任何“原則性的”意見分歧来证实这些指責，并且想出了对地方自治运动的策略分歧。

我以为，这个假設远不是沒有根据的。我以为，所謂原因就是如此。在列宁的傳单出世以后，不久我就見到了一位屬於“强硬派”的同志。我同他談到我們党內的混乱現象。我主要是責备他的同道們政治上不成熟：他們对自己同志們完全合乎情理的要求不願意作出让步。同我交談的人反駁我說：“好吧，就算我們在組織問題上的要求是沒有根据的；但是現在又暴露出策略分歧。”可以看得出来，他是多么滿意地承认有这些新分歧的“暴露”啊！似乎由于这个突如其来的“暴露”，他就如釋重負了。我当时有一个想法：要是列宁沒有猜想到去譴責“新”《火星报》編輯部在策略問題上有机会主义的話，同我談話的这个人繼續做“强硬派”是不会长久的。我錯了，这位同志的心理在“强硬派”中不是独一无二的現象。

**第二个假設如下。**新列宁其实并不像初看时可能显得的那样同旧列宁不相一致。大家知道，旧列宁从来沒有对无产階級采取

过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他那所謂无产階級单凭自身絕對不会越出工联主义的臭名远揚的原理，从馬克思的观点看来乃是名副其实的对工人階級的誹謗。只有根据列宁**还不善于全面掌握馬克思的理論**才能部分地說明这种观点的来由。同志們，为了使你們不致认为我在夸大其詞，我請你們仔細想想下面这段話的意思：

“这样的人(即职业革命家，他們对資產階級制度恨入骨髓，并且擯棄了它。——格·普·)，这样的人是不多的。因此他們是难能可貴的。不过这自然只是当他們敌視整个資產階級追求統治地位的意图，在自己的心灵中根除了个人虛荣的最后残余时才是如此。我要再說一遍，只有在这种情况下，他們才真正是难能可貴的。人民給了他們生命、最初的力量和立足点；他們反过来使人民得到有用的知識、抽象和解析的習慣以及組織和建立联合会的本領，这些联合会又造成一种自觉的战斗的力量，如果没有这种力量，要取得胜利是不可思議的。”写这段話的人是誰呢？是列宁嗎？不，不是列宁。从哪里看出来不是列宁呢？就根据下面这一点：列宁不会用“**人民**”而是用“**工人階級**”，不会用“**抽象和解析的習慣**”而会用“**社会主义意識**”；列宁用的是馬克思主义者的一套名詞。至于說到职业革命家同群众的真正关系，那么旧列宁絕對沒有同我剛才所引用的这段話的作者的看法发生过分歧。关于这位作者，馬克思說过，在他看来职业革命家是一个圣灵，惟有他才能使僵死的群众过着革命的生活。列宁头脑里的职业革命家完全是这样一位可以使僵死的无产階級群众复活的圣灵。同我剛才引用过的这一段話的作者一模一样，列宁也认为，职业革命家可以建立“联合会”，随心所欲地摆布整个工人运动的命运。因此无怪乎列宁的这个应当建立职业革命家“联合会”的“計劃”同列宁的《給一个同志的信》<sup>①</sup>出版前三十年为使我們感到兴趣的这段話的作者所想出和实现的那个“計劃”就像两滴水珠一样相似。然則贊揚“正統的”和“急进的”馬克思

① 按指《給一个同志的信，談談我們的組織任务》。參看《列宁全集》第六卷第204—221頁。——譯者注

主义者列宁的观点和计划的这位作者究竟是谁呢？这就是急进的和正統的无政府主义者米·巴枯宁、《国家制度和无政府》一书的作者，我引用的关于职业革命家和群众的关系那段話就在該书的第七頁上。在列宁的《給一个同志的信》发表前三十年，巴枯宁就用这封信的精神組織了“强硬的”联合会，即所謂“世界社会民主联合会”（請看，甚至沒有忘記社会民主哩！——格·普·）。当时馬克思不得不在国际内部同它进行十分殘酷的斗争。好一幕滑稽戏！<sup>①</sup>

具有巴枯宁式的思想的、“正統的”和“急进的”馬克思主义者列宁，坚决地捍卫了职业革命家“联合会”的成員应当影响社会的“一切階級”（在巴枯宁看来，他們也应当竭力取得这种影响）的思想。但是具有巴枯宁式的思想的、“正統的”和“急进的”馬克思主义者列宁的政治眼界永远局限在一小撮职业革命家“联合会”的狹隘範圍內。列宁和巴枯宁一样也不能站在工人階級的观点上。因此，当我国历史向这个階級提出了严重的政治任务的时候，列宁就显出沒有解决这个任务的能力，就是因为沒有这种能力，他才决心譴責那些用科学社会主义精神解决了这个任务的那些人为机会主义。

这就是我的第二个假設。您要是认为这里和第一个假設一样并不是列宁的光荣，那我就奉告閣下，我在此处并无过错。过错在于列宁自己和他的考虑欠周全的理論，阴谋家的计划和毫无根据的指責。您若問这两个假設中我本人接受哪一个，我便答曰：兼而有之。

我想，列宁在策略問題上对新《火星报》編輯部的不策略的攻击，其原因第一是，在他現在这个处境不妙和困难的情况下，正如人們所說，他是极其迫切地需要想出一个同新編輯部的“原則性”的意見分歧的；第二还在于：当旧日黄金时代，他自己还屬於《火星

---

<sup>①</sup> 这个“联合会”完全建立在“領導集中”和“責任分散”的原則的基础上。但是一般說来，应当承认，作为創造“知識分子”阴谋家的、巴枯宁的“计划”比列宁的计划要龐大得无法比拟。虽然巴枯宁是无政府主义教会的一个教父，也应当替他說这句公道話。公正高于一切！——著者注

报》編輯部，并且如此坚决地劝我們（“否則就不是社会民主党人云云”）到社会的一切階級中去和强迫心怀不滿的地方自治派接受积极的行动綱領时，他对这些劝告的看法就是狹隘的、片面的、空想的，即是巴枯宁式的，也就是說，他把这些行为看成是个别的（虽然也是严格服从中央的“拳头”的）职业革命家一系列多少“秘密”的措施。因为这个緣故，他才在历史已經向我們提出不是某个个别的阴谋家而是全体有觉悟的俄国无产階級究竟应当和可能用什么方式同正在反对专制君主制度的自由資产階級“并肩行进”的問題时开始談論根本不值一提的事情。在列宁那种不完全觉悟的头脑中必然要想到这些根本不值一提的事情。但是这种必然性絲毫沒有妨碍，也絲毫不会妨碍他利用它們来进行其反对新《火星报》編輯部的蠱惑宣傳。剛好相反，他像快要淹死的人抓住一根麦秸一样抓住了它們。在这种場合下，和一般規則相反，麦秸对于快要淹死的人原来并非沒有用处。由此可見，我提出的两个假設不但沒有抵触，反而互相补充、彼此证实。

但是如果列宁現在的处境使得他自己政治思想的不明确性对他甚为有利的話，那么我們的情况就完全不一样。我們的义务不在于使知識分子的思想产生混乱和在他們所建立的“联合会”内部制造糾紛，而在于用我們力所能及的一切办法来指明現在有觉悟的俄国工人一定要走上的那条道路，这条道路的一般特点，馬克思和恩格斯早已向全世界革命的无产階級指出过了。这个义务我們會很好地执行的，尽管存在着各式各样荒謬的指責和猜疑。現在，忘記这个义务就无異于玷污公民的称号<sup>①</sup>（就这句有力的話的充分意义上讲）！

紧紧地握手

您的格·普列汉諾夫

（譯自《普列汉諾夫全集》第十三卷第 169—187 頁）

<sup>①</sup> 語出十二月党詩人雷列耶夫（一七九五——一八二六）的詩篇《公民》（一八二五年）。——譯者注

## 分开走，一起打

本文于一九〇五年二月十日登載在第八十七号《火星报》。文章控訴了沙皇反动政府的暴行和对人民的暴力政策，号召人民起义。作者认为当时俄国资产阶级革命(即武装起义)要取得胜利，必须具备两个“完全必要的条件”。第一个条件是“社会人士”(即自由资产阶级)的同情和支持，第二个条件是尽可能瓦解敌人的力量。他这样推論：“起义的成功完全系于军队的行为”，“军官的行为对士兵的行为会发生强大的影响”，而“军官到底是我国‘社会人士’的亲骨肉”，所以“武装起义的成功取决于革命者同‘社会人士’的接近”。列宁后来指出，普列汉诺夫对军官在起义中的作用问题采取了“市儈的看法”(《列宁全集》第十二卷第402—403页)。

这篇文章的基本思想是：无产阶级应当同资产阶级分开走，一起打击沙皇制度。

你们要准备好，因为时间临近了……

上一号《火星报》的社論已經指出了一個絲毫不应当怀疑的情况：我国革命的危机正在越来越尖锐化，說什么“暂时平静”的人是大錯特錯了。在这篇文章中，我們想首先指出沙皇的禁卫軍也同意这个观点。在第七十七期的《我們的生活报》上，从《西北边区报》轉載了如下一段意味深长的报道：

“警察司已經通知省长先生們，前此規定过，只要提出要求把武器和彈药撥給民政部門的中央管理局的申請，总軍械部就可以



把这些物資撥給該部門。現在對以前實行的制度所作的改變就在於總軍械部決定立即滿足地方當局的直接要求，而所謂地方當局則指省長、市長和警察總監。撥出武器和彈藥是為了武裝警官，並且武器的選擇仍然由地方當局決定。”

這個“通知”的意義是最明白不過了。政府不願意讓步，同時又清楚地認識到，這種不讓步是對社會的不滿火上加油。所以它積極地準備戰鬥，急急忙忙把那些“根據職務”和出於個人意願而站在它這一邊的人武裝起來。反動派人士不是饒舌者，而且確切些說，正因為這樣，他們就不是沒有能力的。他們決不猶豫，也決不會猶豫；彼得堡一月九日的駭人聽聞的大屠殺說明了這個道理；其他地方的血腥的慘狀繼續說明着這個道理。在華沙，正如我們的通訊人所報道的（他的通信登載在第八十六號《火星報》上），一月十六日，“所有的大街小巷，不問有罪無罪，都有槍殺事件發生。我們附近的街道上躺着三具尸首，肝腸都流出肚外。晚上，凡是通過街道的人首先要受到搜查，而且他們的一切物品，自然包括錢包，都要留在警察手里。除此而外，他們經常是立即遭到槍殺……我在最近時期所經歷的慘象是不能用筆墨形容的。躺在泥濘和血泊中的被殺者所呈現出來的場面使觀眾膽戰心驚。星期天一早就開來了大批軍隊，他們無緣無故地見人就射擊，簡直是射擊孤單的人，因為沒有成群的人”。

在我們的同一號機關報上，登載着一篇來自莫吉廖夫省的通信，這封信用鮮明的筆調描述了甚至在俄國也是史無前例的“保衛者”的猖獗行為。“沒有任何理由就把人們從街上帶到消防所，隨後就開始進行迫害；為什麼——不知道。最新式的一種迫害辦法是扭臂膀。星期五和星期六就有近百人變成了殘廢。這種折磨是頗有講究的、有趣的和有條理的……一個叫克羅依寧的老頭因事在星期六到了警察局——被打得半死，折斷了鼻梁。一個十四歲的男孩被折斷了胳膊；人們把他帶到消防所，因為他星期六在街上走過，而警察局長認為應該注意他。凡是想到了的人都被抓走

了。据说巡警可以因此得到赏赐，所以他们也肯卖力。这样的事件在我们这里从星期四（一月二十日）起就开始发生了。真没有办法……彼得堡杀死了人；这里却是残酷的折磨、虐待、侮辱。在那里杀死了似乎危险的人物。在我们这里，人们从街上被抓走，并被带到刑讯室。”

如果我们国家对于君主专制的吃人生番的所有这些血迹斑斑的罪行不感到义愤填膺，那是多么可悲啊！如果拥护政治自由的人们现在不奋发起来同一切前进运动的死敌进行你死我活的斗争，那该多么可悲啊！对统治俄国的匪帮们的血腥暴行的回答只能有一个，那就是大声疾呼地、友好地、同心协力地号召俄国一切敢作敢为的人、沙皇专制制度的一切敌人都武装起来进行反抗。过去，我们战斗的口号是“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这个口号表示我们属于国际社会民主党。现在我们应当补充以另一个战斗的口号：“反对沙皇制度的人们，武装起来！”这个口号表示已经认识到今天落在我们这个代表现代俄国最先进、最革命的阶级的利益的党的肩上的政治责任是什么，这个口号应当从我们的队伍中发出来，并且作为坚决的革命号召嘹亮地响彻整个俄国。

也许有人会向我们指出，武装反抗的思想在自己的逻辑发展中必然会变成武装起义的思想。这当然是正确的。但同样正确的是这种看法一刻也不会使我们感到不安。所谓我们的学说坚定不移地命令我们采取“和平”的行动方式的神话，是我们那些来自民粹派阵营中的敌人捏造出来的，因为他们任何时候都没有能力理解这个学说。后来由于我们的辩论，民粹派分子自己几乎忘记了这个神话，现在只有饱读伯恩施坦的著作而又不善于恰当地替自己的社会民主党主顾辩护的自由派律师才偶尔在自己的发言中加以重述。实际上社会民主党在每一个特定的时间和每一个特定的国家内都捍卫着从时间和地点的情况看来认为最合目的的那些斗争手段。凡是“和平”手段最合目的的地方，它就反对暴力行动；凡是暴力行动合目的的地方，它就不理睬“和平”手段。在这个问题

上对于我国社会民主党說来，俄国的现实无论如何不会使它对“合法性”产生偏好。第一个俄国社会民主主义团体——“劳动解放社”——在自己的綱領中早就預見过这样一个时刻的到来：革命的俄国无产階級一旦发动对沙皇政府的进攻，就必然会采取最坚决的行动。本文笔者完全用“劳动解放社”綱領的精神在第十四号《火星报》<sup>①</sup>上向自己的同志們宣傳了武装示威，提出了一个笔者认为无可置疑的真理的原理：这种示威会逐渐地教育群众在我国实行必不可免的武装起义。当时——即在一九〇二年一月，这个原理既沒有遇到《火星报》任何一个編輯的反駁，也沒有遇到它的任何一个讀者的反駁。在我們編輯部全体同事的心目中，它一直是一个明显无疑的真理，現在只有十足无聊而且不知道怎样消閑自适的思想家才能把它当作新发现。問題不在于起义是否必不可免，而在于起义的时机是否临近，在于使准备起义的工作成为正經的革命家正經的事业、而不是高唱革命的執袴子弟消閑娱乐的那个时期是否終于已經到来。現在这个問題是沒有爭論的余地了。一月九日的运动只是政治上如梦初醒的工人黑尔庫力士<sup>②</sup>第一个信心不足、考虑不周和觉悟不高的步驟。警察嫖姆們徒然企图用經濟改革的諾言来安慰年輕的巨人。在他的第一步之后，觉悟越来越高、考虑越来越周密、态度越来越坚决的步伐很快就会接踵而来。如果不摧毁沙皇制度丑恶的大厦，无产階級就别想动彈。正是这个为我国旧制度的保护者清楚認識因而使他們惊恐万状、凶相毕露的情况現在必然会在我国造成人民同政府的武装力量的流血冲突。我們必須做好准备工作使得人民在这场冲突中不去仰仗教堂的神幡和十字架，而用某种更严肃更现实的东西武装起来。我国无产階級同沙皇政府的武装冲突問題正在由势不可当的历史邏輯提上日程了。我們的任务只能是一个：力求使这个問題的解

① 參看《論示威游行》，《普列汉諾夫全集》俄文版第十二卷第188—192頁。——譯者注

② 希腊神話中力大无窮的英雄。——譯者注

## 决有利于无产阶级。

請不要对我们說，当前高度发达的軍事技术早已注定人民的起义必将失敗。就算这种說法絲毫不容置疑，即使如此，我們仍然不应当放棄支持举行起义的思想，因为假若我国人民对他們的統治者干下的丑行采取消极的态度，那么这就会是他們一切可能的失敗中最可怕的失敗，就会使得他們淪为不可挽救的奴隶，并且注定要使他們政治上永远不能成熟。其次，必須記住，起义不可能成功的信念完全不像初看起来那样有根据。弗·恩格斯在自己給馬克思論法国階級斗争一书写著名的序言中曾經說到这个信念，他认为**只有运用于西欧某些国家发展的一定时期**它才是正确的。他本人对于那些凭借他的权威宣称人民的起义現時在任何地方和任何条件下都不可能获得成功的人，是很不滿意的。

西欧无产阶级的領袖現在如果傾向于武装起义的思想，就会犯巨大的策略錯誤。西欧各国政府暫時在敌視无阶级的其他居民階級中还有坚固的支柱。因此西欧无阶级的起义現在的确沒有成功的机会。我国的情况暫時还不是如此。我国还只談得上夺取一些社会政治条件，以便在这些条件下进行西方式的无产阶级斗争，这些条件一方面使得这个斗争具有广泛的規模，同时在若干時間以后会使革命无产阶级在其他社会階級中間处于孤立地位。我們的处境虽然本身具有許多巨大的不利因素，但是也有一个明显的和重要的有利因素，这就是我国无产阶级在自己同政府的斗争中**暫時还不是完全孤立的**。不为沙皇政府的金币所收买的整个俄国的社会輿論公开地斥責了一月九日的大屠杀，从而說明，在这个斗争中无产阶级可以指望其他居民阶层或多或少积极的支持。这就大大地增加俄国武装起义胜利的机会。凡是了解法国武装暴动史的人都知道他們的成功始終是完全取决于“社会人士”对他們的同情。我們的处境——极端革命党的处境——現在并不像一八四八年六月起义的巴黎工人的处境，倒像一八三〇年六月起义反对波旁分子和一八四八年二月起义反对七月王朝的法国革命者的

处境。

如果在西方无产阶级暂时是孤立的，那么在我国处于孤立状况的恰恰是我们现在与之进行殊死斗争的那个敌人即沙皇政府。这在很大的程度上增加了起义的机会。但是为了利用这一点，我们应当弄清因此而产生的那个策略。

如果对我们说来在军事方面“社会人士”的支持不仅是有利的，而且简直是必要的，那么我们的一切行为都应当符合我国无产阶级当前的处境，以便争取“社会人士”继续同情它的革命运动。为此我们根本不需要放弃阶级观点和“拒绝社会主义”。完全相反！我们现在应当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顽强地捍卫自己的社会主义立场。道理很简单，就是：革命运动的河流越是波澜壮阔，无产阶级将要受到的那些非社会主义的甚或反社会主义的影响就越是为数众多和花样百出。在这方面生活已经向我们——主要也就是今年一月九日——作出了十分确定的警告。但是从我们的社会主义立场的高峰来看，我们可以明白地看出，现在的问题不是实行社会主义变革，而是夺取那些自由的民主的机关，使得我们可以在光天化日之下对群众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凡是同情革命斗争的先进“社会”人士都会理解这一点，或者至少本能地意识到这一点。因此无产阶级的政党可以保证自己得到他们的支持，而完全不会使自己失节。我们只需要开诚布公、明白而且清楚地提出自己最近的政治任务和坚决地制止另一些人认为是极端社会主义急进主义的表现但实际上恰恰会给后者造成最大的损害的那些不策略的越轨行为。例如，假使力求保证自己得到“社会人士”的支持，同时又以机会主义的名义痛斥和抨击我们给予这个社会某些分子所从事的解放“运动”的支持是一种背叛无产阶级的行为，那就无异于陷入毫无意义的矛盾和用左手破坏右手所做的事。

谁不懂得起义的成功完全系于军队的行为呢？又有谁不知道军官的行为对士兵的行为会发生强大的影响呢？但军官到底是我国“社会人士”的亲骨肉，而“社会人士”的同情越是倾向于起义者

方面，軍隊就越不可靠，他們的反抗就越微弱。“社會人士”會比我們更好地向自己的身著軍官制服的兒子說明：向人民開槍即使從誓詞的狹隘概念的观点看來也是一種罪行，因為軍人不僅宣誓要為沙皇服務，而且也要為祖國服務，他在道義上沒有權利為了沙皇的利益而去為祖國的劊子手。現在已經有一切理由可以認為一月九日的槍殺事件所引起的公憤使得許多軍官在努力思索他們應當怎樣對待“內部的敵人”。不言而喻，俄國的社會輿論越是响亮地和經常地譴責那些充當劊子手的軍官，自願擔任這個可耻角色的軍人在我國就會越來越少。而這樣的軍人越少，沙皇制度的事業就越不可靠，起義的機會就越會增多。

在八十年代初期，“民意黨”同軍人有过良好的交情，當它開始考慮武裝起義時，它自然產生一種想法：同情它的軍官在這個事業上可能會給它巨大的幫助。如果我們沒有弄錯，根據該黨執行委員會擬定的計劃，凡是有关起義的技术方面的組織工作，大部分職務都交給了軍人。我們認為現在向我們的讀者介紹這個情況是有益的。<sup>①</sup>

凡是斗争的人都希望勝利。凡是希望勝利的人都應當遵守取得勝利的那些必要條件。武裝起義的成功取決於革命者同“社會人士”的接近。因此武裝起義的擁護者應當接近他們。我再說一遍，這完全不是意味着，我們應當把自己的旗幟藏在口袋里，或者同任何其他政黨合併。分開走，——起打——也只需要這樣。但是那些認為必須一起打的人一定要互相親善和彼此協調。親善和協調不是為了抒发情怀，也不是為了發表堂皇的長篇宣言，而只是為了打，即為了在行動的場所、在子彈呼嘯和信奉東正教而殺人不自覺的魔王逞凶肆虐的那個地方進行共同的斗争。

其次，大家知道，凡是進行戰爭的人都認為自己的義務是盡可

---

<sup>①</sup> 我們在這里沒有談到對士兵的影響，這只是因為對他們的影響不應當通過社會人士，而應當通過人民。至於這種影響的必要性，我們大家都是知道的。——著者注

**能瓦解敌人的力量。**在軍事活动方面这个瓦解工作所具有的意义的大小取决于当时的策略，而**策略**，大家知道，它归根結底取决于**武装**。我們敌人的武装是非常精良的，所以若不**預先瓦解他們的力量**<sup>①</sup>，就不可能在公开的战斗中向它反击。因此这个瓦解工作乃是起义成功的第二个条件。我們在上面提到的《論示威游行》一文（登載在第十四号《火星报》上）中已經論述过这一点。我們在文中对《論街头風潮（一个軍人的看法）》这本小册子进行了分析，并且引用了小册子的一个看法，即作者建議一旦人民同軍隊开始进行斗争就要“撤銷民政、警察和軍事首长的职权”，我們曾經指出，当給奄奄一息的沙皇制度以最后的致命的打击的时机到来的时候，社会民主党大概是不得不采取这个勇敢的步驟的。当时提請讀者注意这个步驟还为时过早，我們只是用假設的口吻談到了它。現在討論这个步驟的时候已經到来，所以我們断然宣布：**从現代軍事技术的观点看来，瓦解政府的权力（任何“撤銷”都符合这个要求）乃是武装起义获得成功的完全必要的条件。**因此革命者应当善于在他們认为必要的时机瓦解政府的权力。

但是瓦解敌人显然是以一系列我們所謂**恐怖主义**的那些行动为前提的。因此我們拿起武器时就要改变自己对恐怖的态度。道理很简单，就是：那时恐怖的意义根本改变了，它成了革命斗争的手段。如果我們在平时忽然想起把它实践一下，那么我們就会完全背离自己的直接的和最重要的任务：在群众中間进行宣傳工作。因此在平时我們把它当作**不合目的的斗争手段**予以擯棄。但在起义的时候它会促使我們革命的群众宣傳工作**取得胜利的結局**；因此，我們在准备起义的时候应当在我們的軍事行动計劃中給它以适当的

---

① 請“敏感”的讀者注意：預先一詞可能造成誤解。因此且說明一下我們的看法。在开出步兵以前，預先用炮火射击敌人是有益的。但是在这种射击之后应当紧接着发动步兵攻击。如果比方說，我們在我們的步兵投入战斗以前一个月开炮，那么敌人就会完全恢复炮兵給它的創伤，而我們只不过是白白地耗費彈药。——著者注

地位，不过正如讀者所看到的，它的地位具有严格的**从屬意义**。

在七十年代，“恐怖主义”的第一批宣傳者正是把恐怖看成是瓦解政府权力的手段。他們就是这样称呼它的**瓦解者的活动的**。很长一个时期以来，“恐怖”并没有瓦解过政府，倒是瓦解了革命者自己。在起义的时候它会瓦解革命的敌人。找不到任何一个社会民主党人在这个时候会拒絕采取恐怖手段。凡是进行斗争的人都希望胜利；凡是希望胜利的人都应当遵守取得胜利的那些必要条件。

承认“瓦解者的活动”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这就給社会民主党开辟一条同各种恐怖主义集团达成協議的道路，这些集团不是已經存在就是最近将来可能产生。然而我們所說的自然也不是綱領，而是純粹的实际協議：你做你的事，我干我的活；你去夺取敌人的輻重，但是我却要从某个翼側襲击他們，如此等等。

只要遵守我們指出的两个条件，——即社会人士对它的同情态度和政府权力为革命者所瓦解，武装起义就大有成功的机会，在这两个条件下甚至还預言起义不会成功的那些人很有成为冒牌預言家的危險。但是有**各式各样的起义**。《火星报》始終尖銳地反对革命的冒險主义，它认为自己的义务是提醒自己的讀者注意，在准备武装起义的时候沒有比沉湎于冒險主义更容易的了。法国革命史证实，法国阴谋分子号召在某个預先决定的时期举行起义的一切企图都落得了彻底的、有时相当悲慘的失败的下場。产生这种情况的原因是法国的秘密团体任何时候都沒有得到过人民群众广泛的支持。

全部問題都在这里。如果現在我国的起义得不到“社会人士”对它的同情，沒有瓦解政府的力量，就不能获得成功，那么即使遵守这些条件，只要这起义是比較不大的一撮阴谋分子的事业，要获得成功也是完全不可思議的。**武装起义只有作为广大群众的起义才会得到胜利，換言之，如果不具备任何先决条件它就决不会得到胜利**。所以在准备武装起义和号召一切反对沙皇制度的人武装起来的时候，我們党应当記住——正如第八十五号《火星报》的社論



所說过的——起义要获得成功，其根本的和绝对不可替代的条件是人民群众热烈要求手执武器地攻击专制制度。

沒有群众，我們就一文不值。如果群众不跟我們走，即使我們多么勇于牺牲，即使我們的“秘密”手段多么高强，我們都应当預先承认：自己的事业已經彻底地輸了。在群众中間进行宣傳工作對我們說來現在比任何时候都更重要。不要欺騙自己：根本还不是全体群众都对沙皇制度恨入骨髓；他們还远不是全都贊成我們的政治主張。我們要更广泛地更清楚地說明：群众在政治方面大都还是沒有觉悟的。只有政治上的冒險主义者才会忽視这点，因为他們指望在适当的場合下甚至沒有觉悟的群众也可以被陰謀分子某种巧妙的手段卷入革命斗争。但是我們根本不会因此而困惑不安。革命的危机以神速的进展教育群众。巴黎人民甚至在夺取巴士底獄以后还一味兴高采烈地向路易十四欢呼，但是八月十日，同一个巴黎人民在强烈仇恨君主制度的情緒推动下夺取了推勒宮。正如上面所說过的，无产階級現在在政治上还是如梦初醒，如果不震动专制制度，它就不能动弹。而加速我国无产階級的政治教育就依靠我們；要使得仇視专制制度的浪潮越来越广泛地在人民群众中泛滥，从而越来越充分地為他們反对专制制度的武装起义做好准备工作，也依靠我們。

总之，一方面要在群众中进行广泛的、坚持不懈的革命宣傳工作，这就必然会使群众同政府发生决定性的冲突；另一方面要准备好上面指出的那些必要条件，以使这个冲突取得胜利的結局，——这就是現在这个历史时刻摆在我們面前的两大任务。我們說过，我們应当发动革命，現在我們补充說，还应当准备胜利。

任务是艰巨的……但是我們应当完成它。因此，我們應該用十倍的精神进行工作。而且我們一定会完成它，因为这是我們的义务。历史不会等待……

（譯自《普列汉諾夫全集》第十三卷第188—197頁）

## 論夺取政权問題

(不大的历史证据)

本文于一九〇五年四月五日发表在第九十六号《火星报》。文章所討論的問題是：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胜利的条件下参加临时革命政府原則上是否容許。这个問題实际上是对待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的态度問題，是无产阶级政党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战略問題，也是革命的路綫問題。作者从錯誤的立場出发，对这个极其重要的問題得出了机会主义的結論。他用了很大部分篇幅歪曲地引证馬克思的《告同盟书》和恩格斯的致屠拉梯的信，企图证明“和小资产阶级的代表一起参加革命政府就是背叛无产阶级”，《前进报》宣揚的是“最坏的、最有害的机会主义”。

列宁在一系列的著作中，特別是在《論临时革命政府》（《列宁全集》第八卷第430—449頁）及《評普列汉諾夫的論文〈論夺取政权問題〉》（参看《列宁全集》俄文第五版第十卷第384—387頁）中对普列汉諾夫的观点作了詳細的駁斥。列宁指出，普列汉諾夫的結論是恩格斯所痛斥过的无政府主义的原則，他把民主主义变革和社会主义变革混淆起来了，把民主主义专政和社会主义专政混淆起来了，他的言論破坏了无产阶级革命的气魄，挫伤了它的革命热情。列宁把普列汉諾夫在民主主义专政問題上所犯的錯誤同伯恩施坦在社会主义专政問題上所犯

的錯誤相比，认为这是一种犯罪行为。

斯大林在《临时革命政府和社会民主党》中也批判了普列汉诺夫的观点。

C.同志給我來了一封信。他問我對於無產階級奪取政權有什麼看法。我本來也想復他一封信。不過經過一番考慮後，覺得可以把它寫成一篇不無普遍興趣的文章，因為C.同志涉及的問題，在我們黨內的出版物中至今還沒有詳細闡明過。

政權是從根本上改造生產關係的無可替代的手段。因此，任何一個想要進行**社會革命**的階級當然會力求**掌握政權**。這是一條普遍的規律，無產階級並不例外。**資本主義生產關係**使無產階級緊緊依附於企業主階級，為了排除這種生產關係，無產階級絕對必須取得政權。換句話說：**無產階級專政應當是社會主義革命的**第一個行動****。這是伯恩施坦之流的先生們所反對的，而且他們當然一定要反對。但是從忠於自己綱領的革命精神的社會民主黨人的觀點看來，這是完全不容置辯的。所以無需乎對它多費唇舌。

然而，如果所談的不是**社會主義戰勝資本主義**，而是一次**資產階級革命**，這次革命也許我們在最近的將來就要經歷，而且它將第一次在俄國創造出**社會主義革命**所必需的全部條件，那時問題就完全兩樣了，而且遠沒有明顯地闡明過。在這次**資產階級革命**中，無產階級也一定要起決定性的作用，因此，如果有人一面極力支持無產階級的革命意圖，同時却不贊成號召無產階級奪取政權的策略，他們的觀點是會使人覺得奇怪的。看來他們的論敵可能並非沒有根據地責備他們不徹底、機會主義以及其他同樣嚴重的罪過。不但有此可能，而且已經在**這樣做**：提一提《前進報》上發表的一些同《火星報》針鋒相對的文章就足夠了。

究竟誰對？要弄清楚。

我們的黨主張**馬克思主義**觀點。我們且看一看馬克思本人對於革命無產階級在和我們當前的情況類似的歷史時期應當堅持什

么策略所說的話是否适当。

一八五〇年初，尽管西欧“秩序党”到处都得到几乎全面的胜利，馬克思和他的追随者们不但不认为革命的事业彻底打输了，反而期待西欧最主要的一些国家中爆发新的革命。在展望革命时，著名的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向自己的德国盟员发出了《告同盟书》(Aussprache)<sup>①</sup>，它在《告同盟书》中叙述了自己对当时局势和这时局给无产阶级规定的政治任务的看法。《告同盟书》是馬克思写的，他当时参加了同盟的中央委员会。这是一篇十分珍贵的文件，足以作为必要的历史证据。因此在这里叙述一下它的内容将是有益的。

首先应当指出下面一个新奇的事情。

第十四期《前进报》社论的作者坚决地宣称：“只有像小学生那样了解历史的人，才能把事情想像成缓慢而均匀的、沒有‘飞跃’的上升的直綫：先是自由派大资产阶级争取专制制度退让，然后是革命小资产阶级争取民主共和国，最后是无产阶级争取社会主义变革。这幅图景一般和整个說来是正确的，像法国人所說，‘从长远看来’，从整整一个世紀（例如，法国从一七八九年到一九〇五年）的期間看来，是正确的，但是只有庸俗透頂的人才会按照这幅图景来制定自己在革命时期的活动計劃”<sup>②</sup>。

馬克思恰恰是这样的“庸俗透頂的人”，而且恰恰就这样“像小学生那样了解历史”。他写的《告同盟书》<sup>③</sup>指出，一八四八——一八四九年的运动使自由派大资产阶级夺得了政权，这个资产阶级利用工人的革命力量推翻了事物的旧秩序，它在刚刚得到一些让步（用《前进报》政论家的术语說叫做“退让”）以后立刻轉过来反对无产阶级，接着就决心和封建党派联合起来同新的革命企图进行斗争。但是往后的发展将失去大资产阶级希望赋予它的那个和平

① 参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七卷第288—299頁。——譯者注

② 参看《列宁全集》第八卷第269頁。——譯者注

③ 請注意，这正是在“革命时代”写的。——著者注

性质：現在新的革命迅速迫近了，在这次革命中民主派的小资产阶级在和人民的关系上将扮演一八四八年自由派扮演过的同样的角色。

这个小资产阶级現在自称为“共和党人”或“极端派”，它是相当强大的一种社会政治力量。它不但包括大城市的絕大多数资产阶级居民，即不但包括絕大多数小企业主、商人和手工业者，而且还包括农民和农村无产者，因为后面这些人还没有参加独立的城市无产阶级。小资產者根本不願为革命无产阶级的利益而根本改造社会，他們只希望把現存社会改革得使他們在其中过着滿意而且舒服的生活。首先他們要求限制官僚制度以縮減国家开支，把主要稅收重担轉嫁到大土地占有者和資产者肩上。其次，他們要求消除大資本对小資本的压迫，并且希望通过頒布取締高利貸的法令和設立国家信用机关的办法来达到这个要求，因为設立这样的机关就使小資产者和农民有可能从国家方面根据不苛刻的条件取得貸款。此外，他們希望在农村建立资产阶级財產关系的統治地位，和从这里彻底鏟除一切封建主义的残余。为了削弱資本的統治，和阻擋它的积累，他們建議限制遺产权；为了改善工人生活——这些工人应当像現在一样当雇工——他們主張让尽可能更大一部分的工作由国家来保证和更好地組織社会慈善事业。为了实行所有这些措施，他們需要有一种民主的——無論是君主立宪的或共和的——政体和公社自治的民主組織。

馬克思絲毫也不怀疑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在德国革命今后的发展过程中会暂时取得优势，会取代大资产阶级已經获得的統治地位。既然我們认为，他是庸俗透頂的人，并且像小学生那样了解历史，这就一点也不会使我們感到惊奇了。而且，按照这位庸俗透頂的人的意見，革命无产阶级政党应当对小资产阶级民主党采取什么态度呢？

在《告同盟书》中，这个問題分为下面三个問題：

一、在小资产阶级也处于被压迫地位的現存事物秩序的条件

下应当对它采取什么态度？

二、在最近将来会使他们获得优势的革命时期应当对它采取什么态度？

三、在这次革命之后应当对它采取什么态度？

对于第一个问题马克思回答说，目前，在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到处都感到自己受压迫的时候，他们向无产阶级宣传协调和团结，并且邀请无产阶级和他们一起创立一个联合一切个别派别巨大的反对派政党。按照我们这位“庸人”的见解，这就意味着，小资产者极力想引诱无产阶级参加这样一个政治组织，在这个组织里，无产阶级的特殊的阶级要求在和平的利益的口实下付诸脑后了。他说，这种联合只会对民主派有利，而严重地损害无产阶级。无产阶级会丧失它辛辛苦苦争得的独立地位，而重又变为官方的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单纯的附属物。因此，共产主义者应当坚决地起来反对这种联合。为了和共同的敌人进行直接斗争，各种力量暂时的合作当然是必要的，不过为此并不需要同民主派联合起来。

总之，马克思这里的结论是：虽然应当一起打，但也必须分开走。

对于第二个问题的答复是：在当前的流血冲突中，和过去一样，政府的战败，主要是由于工人的坚决勇敢和自我牺牲的精神，而绝大多数民主派则和从前一样，长期采取犹豫不决和消极的态度，以待将来从敌人手上取得胜利的时候，利用这个胜利机会来谋自己的利益。要阻止这种现象发生，工人还没有力量，但是工人可以强迫小资产阶级接受一些条件，使得将来资产阶级民主派的统治很容易就为无产阶级的统治所取代。工人——即有觉悟的无产者——应当关心使群众的革命起义不会在刚刚胜利后就被平息下去；工人应当在每一个适当的场合都提出自己本身的阶级要求，并与资产阶级民主派的要求并列，而且如果必要的话，甚至应当用实力力求使新政府向他们保证实现这些要求。简言之，他们应当——像“新”《火星报》所说的——尽量放手发动革命。但是在我们的

作者看来，这个发动革命的任务一点也不排斥組織革命的主要因素即无产阶级的力量的任务。无产阶级应当組織起来和武装起来，否則它就不能在将来当资产阶级民主派推翻現存秩序以后立即背叛无产阶级时对它进行抵抗。

在沒有叙述馬克思对他提出的問題中的第三个問題即最后一个問題所作的答复以前，換句話說，在沒有叙述馬克思对无产阶级在胜利后对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态度問題所作的答复以前，我們先要指出一个事实，这就是：科学社会主义的这位奠基者甚至对革命无产阶级的政治代表可以同小资产阶级的代表一起共同致力于建立新的社会制度的思想，也显然不能容忍。完全相反：按照馬克思的計劃，在战胜大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夺取了政权以后，工人应当形成一个强大有力的反对派政党，这个党要利用自己的批評和宣傳鼓动推动小资产阶级政府前进，而主要是日益提高它所代表的阶级的革命自觉性。馬克思說，工人最初自然不能提出純粹的共产主义要求。然而他們一开始就有可能：

(一)迫使民主派用革命的方式破坏現存的社会关系；

(二)推动只想进行社会改良，不想进行社会革命的民主派前进，以及在民主派提出的种种措施中加入比較激进的內容。比方說，假如民主派主張贖买铁路和工厂，无产阶级就應該要求把这些工厂和铁路作为反动派的财产加以沒收；假如民主派主張征收所得稅，无产阶级就應該要求征收累进所得稅，等等。

馬克思在結論中說道，德国工人不可能直接地取得統治地位，但是他們可以而且應該力求加速自己的最后胜利的到来，这就必須认清自己的阶级利益，不要让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花言巧語迷惑住自己的理智，而要作为一个特殊的独立的政党出現。他們的口号應該是不斷革命。

馬克思在期待小资产阶级的变革时是这样說的。他的《告同盟书》不久前还博得伯恩施坦先生一頓最劇烈的批評(參看后者的一本臭名远揚的书)。的确，它充滿着深刻的不可調和的革命精

神，只要讀它一讀，任何一个善良的小資產階級都会勃然发作的。但我們和小資產階級政治家毫不相干。此刻我們认为重要的是，这篇极富于革命性的《告同盟书》所主張的策略，正是《火星报》向俄国同志們宣傳的策略，这种策略被《前进报》斥之为可怜的庸人們的可怜的臆想。讀者一定会承认，我們作了一次很有益的发现，为了这一次发现，我們在这里提出历史证据是值得的，而且早就應該这样做了。

同时，請注意，假使您有任何一分钟設想，仿佛我們认为我們的证据可以說明一切問題，那就大錯特錯了。絕對不是这样。我們决不认为，我們應該在所有的問題上都盲目地模仿馬克思的榜样。馬克思可能有錯，如果我們中間有誰看出錯誤，他就应当公之于同志們。只有用心不良的或者愚蠢的人才敢于断言，“正統的”馬克思主义者对自己的导师不容許任何批評。不，“正統派”所憤恨的只是这样一种所謂的对馬克思的批評——这种批評像伯恩施坦先生、新康德派以及馬赫和阿万那留斯的拥护者們所實踐的批評一样，只是对資產階級攻击現代科学社会主义的基础的完全非批評的重复。这种“批評”的确使我們深感憤恨。凡是对馬克思提出确有实据的反对意見的人都可以相信，我們会用最認真最鎮靜的注意态度听取他的意見的。但是凡是批評馬克思的人也会这样說：“我在某某地方不同意馬克思的观点。”誰批評馬克思，誰就应当以批評者的面目出現，而不应当以“正統派”的面目出現。

如果我們的論敵們发现《火星报》所捍衛的策略是不正确的，他們就应当这样說：“即使这个策略完全符合馬克思当年所保衛的策略，但它仍然是錯誤的。”接着，当然應該加以证明。但是我們的論敵們偏不这么做：他們自封为馬克思的忠实信徒，而把《火星报》宣布是不能領会馬克思学說的真諦的机会主义者和庸人們的机关报，他們在这个問題上的证明只限于（參看《前进报》上的許多文章）他們这些信口开河的人认为是一針見血而实则极其軟弱的若



干不断重复的漂亮話，說极其軟弱，正是因为不断的重复代替了严肃的論据。

順便补充一句，倒有两位最精通馬克思主义的行家曾經批評过此地所叙述的这篇《告同盟书》中的一些观点，这就是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

如上所說，《告同盟书》是在期待欧洲各先进国家爆发新的革命时写的。但是很快——在同年，即一八五〇年，馬克思就看出了，这样的期待是沒有根据的，当时他立即在自己的杂志上宣布了这一点<sup>①</sup>，这个杂志于一八五〇年在汉堡出版，它和一八四八——一八四九年著名的报纸一样也叫做《Neue rheinische Zeitung》<sup>②</sup>。

但在一八五〇年，馬克思只承认他期待新的革命是錯誤的，而他向德国工人阶级提出的那些任务他当时仍然认为是完全正确的綱領，如果他很快又产生欧洲小资产阶级革命临近的信念的話，他会再次如法炮制地提出这些任务的。只有經過一个长时期，他才相信，在他写《告同盟书》的那个时代，资本主义实际上远不是如他想像的那样过时的和衰老的生产方式。

这种观点的改变在恩格斯为馬克思的《Die Klassenkämpfe in Frankreich》<sup>③</sup>一书写的著名的导言中指出来了<sup>④</sup>。鉴于这种改变，大概可以假定，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后来并不贊同他們向德国共产主义者提出的那个策略。人們也許会对我們說：当馬克思和恩格斯已經采取另一种行动方式的时候，为什么你們偏要像馬克思和恩格斯一样行动呢？

对于这个问题我們的答复却是：馬克思和恩格斯不贊成的只

① 參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七卷第 514 頁。——譯者注

② 《新萊茵報》，一八四八年六月一日創刊，一八四九年五月十九日停刊，一八五〇年一月至十一月底馬克思主編的杂志《新萊茵報。政治經濟評論》共出了六期。——譯者注

③ 《法兰西阶级斗争》。——譯者注

④ 參看馬克思：《法兰西阶级斗争》，人民出版社一九六〇年版第 3 頁。——譯者注

是自己在1850年的策略的一个方面，其所以有这个方面是因为他们当时相信资本主义已经老朽不堪了，因此他们相信社会主义革命已经近在咫尺了，而小资产阶级革命只会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个序幕而已。正是由于这一信念他们才提出来了**不断革命**的口号。后来，当他们不再认为社会主义革命近在咫尺时，他们甚至在期待小资产阶级革命时也已经不说“**我们的口号是 Revolution in permanenz**”<sup>①</sup>了，因为他们看到没有“不断革命”的客观条件（因此也没有“不断革命”的主观条件，即心理条件）。仅仅根据民主制度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仍将占统治地位这个推测，他们就会确定出无产阶级的政治任务。然而正因为如此，他们就会更坚决地谴责社会主义者参加小资产阶级政府的行动。换言之，他们更清楚地表明自己是《前进报》所敌视的庸俗透顶的人。

慢来！——另一位读者叫道，——这是你们的一些推测，你们丝毫没有证明它们是正确的。

不，你们错了，——我们反驳说，——我们手里有无法反驳的证明，它就恰好在恩格斯一八九四年写给屠拉梯的一封信里<sup>②</sup>。

这一年，整个意大利半岛对政府反动的政策充满了极其强烈的不满情绪，革命大有一触即发之势。我们刚才提到的这封信就是在这种革命形势下写的。

国际社会主义的这位老理论家提醒屠拉梯注意这样一个情况，即在意大利经济发展的现阶段上，临来的革命不可能是社会主义革命，而将是小资产阶级革命<sup>③</sup>。在胜利前，无产阶级应当同小资产阶级一道反对现存的制度，但一定要作为一个独立的党派出现（即我们现在所说的：“分开走，一起打”）。而在胜利后，如果社

① “不断革命”。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七卷第299页。——译者注

② 按指一八九四年一月二十六日恩格斯致菲·屠拉梯的信。参看《马克思恩格斯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一九六二年版第519—523页。——译者注

③ 看来恩格斯即使年逾古稀还是一个“庸俗透顶的人”，并且继续“像小学生那样”了解历史。——著者注

会党人参加新政府那是极其危险的（“questo è il pericolo piu grande”<sup>①</sup>——恩格斯说）。这样他们就会重复一八四八年路易·勃朗和其他法国社会主义者所犯的錯誤。如果意大利社会党人参加新政府，即民主派的政府，他们就要对这个政府的一切錯誤負責，就要对这个政府背叛工人阶级的一切行为負責，同时工人阶级的革命能力就会因此而被社会党人参加政府这个事实所破坏。

信中对意大利同志们提出的这一劝告是以一些普遍的策略見解为依据的，而这些策略見解的正确性，用恩格斯的话說，已經为他的全部生活經驗证实了。这封信的作者說道：“它們一次也沒有（non una volta）使我犯过錯誤。”<sup>②</sup>

总之，和小资产阶级的代表一起参加革命政府就是背叛无产阶级。这就是我們的证据告訴我們的道理。而从这里应当得出結論說，从馬克思主义的观点看来，不是《火星报》宣揚机会主义，而是《前进报》宣揚机会主义，并且是最坏的、最有害的机会主义。

不，先生們，你們爱怎么諷刺就怎么諷刺吧，你們可以任凭尊意地重复那些仿佛一針見血而实则陈腐不堪的漂亮話。但真理总是真理：馬克思和恩格斯会譴責《前进报》的策略而贊同《火星报》的策略。如果你們想证明后一种策略沒有根据，你們就免不了要批判馬克思。《前进报》先生們，练习一下你們的批判本領吧。我們會全神貫注地听取你們的見解，因为对于我們所感到兴趣的重要的爭論問題是值得这样做的。开始“祝福”吧，各式各样的馬赫們和阿万那留斯們一定会来帮助你們的！不要忘記，难就难在头一步，而你們的头一步大得很，真堪与伏尔泰的米克罗麦加<sup>③</sup>并駕

① 这是最大的危险。——譯者注

② 參看《馬克思恩格斯书信选集》第 523 頁。——譯者注

③ Макромегас——Micromegas，伏尔泰哲学小說中的一篇。米克罗麦加为小說中的主角。“人們都管他叫米克罗麦加，这个名字非常适合于所有的巨人。他身長八里約，我所謂八里約等于二万四千几何步，每一个几何步等于脚走五步。”（見伏尔泰《哲学小說集》，苏联文艺書籍出版社莫斯科一九五三年版第 77 頁）。——譯者注

齐驅；你們证明了唯物历史观的奠基人像小学生和庸俗透頂的人一样了解历史。往前走吧；勇敢的人神明会保佑的！

在結束这篇证据的时候，我願再次提醒C.同志，并向他表示一个希望，希望他現在会明白我对夺取政权的問題抱有怎样的看法；我决不觉得在这方面有批評馬克思的必要。

(譯自《普列汉諾夫全集》第十三卷第 203—211 頁)

## 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 全体党员的公开信

孟什维克在普列汉诺夫的帮助下夺取了所有的中央机关。他们奉行分裂主义的組織路線和机会主义的策略路線，严重地妨碍了党的正常工作，破坏了无产阶级的战斗力量。为了保卫党性，迎接迅速发展的革命形势，必须召开新的（即第三次）代表大会。根据党章，大会应由总委员会召开。但是孟什维克把持的总委员会一再否决了布尔什维克的要求。后来布尔什维克的常务局出来召开这次大会。一九〇五年三月八日，由普列汉诺夫任主席的这个反党的总委员会正式通过了一项決議，宣布即将于四月十二日召开的代表大会是非法的。

这封发表在一九〇五年四月五日第九十六号《火星报》上的信，说明了作者反对召开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反布尔什维克主义立場。

列宁在一系列的文章中批判了普列汉诺夫的反党活动和言論：如《我們爭取什么？（告全党书）》、《告全党书》、《关于普列汉诺夫在党内危机中的行为的決議草案》、《无休的遁詞》、《波拿巴分子的鬼把戏》、《被揭穿的总委员会》以及《給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总委员会主席普列汉诺夫同志的公开信》等等。

同志們！

我认为必須向你們說明一个問題，这个問題虽然只同我相关，

但对我们大家也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事情是这样的。某些同志来信告诉我，我们的国外组织中有人竭力散布流言蜚语，说我党总委员会就所谓“布尔什维克”著名的常务局在现在的中央委员会某种善意的赞助下召开代表大会一事所作的决议<sup>①</sup>不是一致通过的，好像正是我在这里同自己的其余的同事发生了意见分歧。

这是不真实的。只要拿出决议的原文就可以轻而易举地驳倒这种说法。因为其中说道，决议是总委员会一致通过的。或许这是伪造么？但是，且把这种假定究竟在何种程度上对我们的党是公正的这个问题的话放下不谈，我要问一句：究竟谁能妨碍我在刊物上揭露类似的伪造呢？我还没有忘记笔是怎么抓的，我并不怕坚持自己的观点。

事实上我不但赞成总委员会的决议，而且还积极地参加了起草决议的工作。同时，我能不赞成它吗？要知道甚至“布尔什维克”的机关报也承认，从我们党章的观点看来，它所希望的代表大会是不合法的。我又有什么理由来承认这个代表大会是合法的呢？既然我们的第二次（合法的）党代表大会委任我为第五名——唯一的经过选举的——总委员会委员，那么它这样做自然不是为了让我嘲笑它所赞成的党章和破坏关于召集党代表大会的那些党章条文。

假若我不起来反对在某些人的发起下非法召集的代表大会，我就没有履行自己所承担的总委员会委员的义务，我就辜负了党代表大会的信任；他们认为自己的利益就在于不通过党章为我们大家清楚而且明确规定的正当途径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如果总委员会内部在这个问题上真的产生了意见分歧，如果（我故意举出极端的场合）我的所有其余的同事都决定参加非法的

---

<sup>①</sup> 一九〇五年三月八日，由孟什维克把持的党总委员会通过了一项反对召开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决议，这里所指的可能就是这项决议。参看《列宁全集》第八卷第198页。——译者注

代表大会，則無論这种情况多么使我伤心，也絲毫不会改变我的行为：我仍然反对根据自己的党内职务和个人的良心所应当反对的东西。

我知道，“布尔什維克”会說，如果这合乎党的利益的要求，就不应该为**形式主义**所拘束。但是第一，只要我們还没有摆脱半党的可怜状态，我們就没有学会尊重自己本身的法規，也不会在其中看到某种比“**空洞的形式主义**”更重要得多的东西；第二，党的利益可以通过合法的途径得到滿足；第三，党的最重要的利益（党的整个未来就依赖于这个利益是否得到滿足）迫切地要求我們在**无产阶级的队伍中积极地进行工作**，而不是搞那些卑鄙可笑、毫无价值，然而却是有害的小組**阴谋活动**，这些活动在上述常务局召开的代表大会上恰恰会达到自己的最高峰。

这个特殊的机构的企图可能在我們党员中間至少得到某种同情，单单这一个情况就足以說明，我們永远担負不起自己偉大的和神圣的历史事业。

这就是我想向你們說的話，同志們。

我知道，我可能因此受到調儿不同和粗魯程度不等的責罵。但是……真理高于一切。

（譯自《普列汉諾夫全集》第十三卷第 212—213 頁）

## 退出《火星报》編輯部

(致《火星报》編輯部的信)

这封信于一九〇五年六月一日发表在第一〇一号《火星报》。作者在信中声明辞去中央机关报編委和总委员会委員的职务。

列宁指出，普列汉諾夫是一个“泥潭派分子”，在党内斗争中經常从一方倒向另一方。一九〇三年十一月从多数派倒向少数派，这一次又退出《火星报》編輯部，倒向多数派。尽管布尔什維克不贊成这种倒过来倒过去的行为，但是泥潭派分子經過长期的动摇以后决定追随布尔什維克，那总是一件好事情。（《列宁全集》第九卷第128、144頁）

由于普列汉諾夫的某种程度的转变，列宁給他寄去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邀請他参加在彼得堡新創办的公开报纸《新生活报》編輯部的领导工作，并表示希望同普列汉諾夫会晤一次（同上第三十四卷第367、368—371頁）。普列汉諾夫沒有同意会晤，也沒有写信答复。

同志們！

代表會議的決議致命地打击了我們党的中央机关，所以我不得不辞去中央机关报編輯和(合法的第二次代表大会选举的)总委员会第五名委員的职銜。

格·普列汉諾夫



P. S. 我利用这个机会在刊物上問一下党内承认“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決議有約束力的那一部分人，你們是否希望我像以前一样在社会党国际执行局中代表这个現在——可惜！——已經分裂了的党。只有在两派都願意的条件下我才能繼續做俄国社会民主党的代表。

格·普·

一九〇五年五月二十九日于蒙特勒

(譯自《普列汉諾夫全集》第十三卷第 226 頁)

## 小册子《在两条战线上》序言

(摘 录)

这篇序言是一九〇五年在日内瓦写的，这里摘译的是他对列宁的组织路线的攻击。

现在我的一些政治性的论著要用单行文集的形式出版了，然而我既无可能又无心愿给这本论文集写一篇长序，且谈几点意见算了。

.....

这本论文集的最后一篇文章是：《往后怎么办？》<sup>①</sup>.....

.....

说到原来意义的组织问题，那就应当承认，对于我们社会民主党人来说，它至今仍然是一个没有解决的问题。臭名远扬的“列宁计划”不但没有“建设过”任何东西，相反，倒破坏了很多。而且正像现在所看到的，也不能不如此。

关于列宁，我不止一次回想起阿德勒教授在他的《Geschichte der ersten sozialpolitischen Bewegungen in Deutschland》<sup>②</sup>一书中讲过的笑话。说马克思的一些追随者曾请求他为他们写一篇问答书，其中包括马克思全部观点的叙述，但是他不仅拒绝写这样的东西，而且还嘲笑请求者根本不懂得他们要求加以叙述的那个理论是什么。Se non è vero, è ben trovato!<sup>③</sup> 马克思主义的问答

---

① 《往后怎么办？》，载于一九〇一年十二月第二——三期《曙光》杂志。——译者注

② 《德国初期社会政治运动史》。——译者注

③ 假设不真，也想得巧妙。——译者注

书乃是同馬克思学說的全部精神針鋒相对的著作。馬克思本人当然会比所有的人更好地懂得这个道理。而列宁为我国的实际工作者所写的正是問答书，不过不是理論方面的問答书，而是組織方面的問答书。为了这个緣故，他們許多人对他充滿了极虔誠的尊重，并且宣布他是社会民主党的梭倫。但是要为自称是工人党的政党写組織方面的問答书的思想，比关于馬克思主义策略問答书的思想(如果这是可能的話)更加荒唐，更加怪誕不經。現在看来，“**坚硬如石的**”列宁的拥护者們也**軟化了**：他們看到他的“組織計劃”是毫无根据的。这并不妨碍他們像以前一样认为他是梭倫。这很奇怪，但这到底是他們的問題，他們的邏輯的問題，这种邏輯此处我完全不感兴趣；我只想說，凭借某个“**首領**”写的問答书来解决我們的組織問題的任何企图預先就注定不会成功。要解决這個問題唯有仰仗經驗，而且是仰仗一种特殊的經驗，这种經驗的获得是由于坚决地扩大我們黨組織的旧有的、不适用的規模和使这个組織**不仅在口头上而且在事实上变成无产階級的組織的結果**。現在，坚毅地努力进行这种工作的时期恰好已經到来了。

(譯自《普列汉諾夫全集》第十三卷第 227—230 頁)

## 关于我的《日志》的几句话

一九〇五年俄国革命前夕，孟什维克分裂党的活动越来越猖獗。普列汉诺夫当时“在党外创办新的杂志社”，进行“成立新的第三党或集团”（参看《列宁全集》第九卷第154页）的分裂活动。普列汉诺夫的杂志《社会民主党人日志》在一九〇五年三月创刊，这是他在第一期上发表的“开场白”。

这个刊物的名称充分地说明它的性质。这将是一个主张社会民主主义、对现在俄国发生的事件有热烈兴趣的人的日志。而俄国社会民主党只是无产阶级国际大军中的一支队伍；因此我在自己的日志中也要叙述其他各国工人运动的进展情况使我产生的各种印象。我的健康情况现在不允许我定期出版自己的《日志》。我仍然希望在不久的将来能做到这点。

经常同读者交流思想，是作家极大的幸福。因此，我将十分感谢那些愿意同我就《日志》中涉及的各种问题互致书信的人。

（译自《普列汉诺夫全集》第十三卷第233页）

## “农夫們在暴动”

本文登載在一九〇五年三月出版的第一期《社会民主党人日志》上。

这是普列汉諾夫在土地問題上的第一篇机会主义著作。他反对土地国有化草案，主張土地市有化，如果市有化实现不了，則倾向于土地分配。立論的根据是：“应当坚决地抵抗一切阻碍资本主义发展的企图”。作者在土地問題上的錯誤立場是同他低估农民群众在革命中偉大作用直接联系着的。他认为“小资产阶级生产者在新的社会条件下”会“丧失自己的革命意义”，这种观点部分地决定了后来他对待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否定态度。

本文的內容可以分为理論部分和实践部分。在理論部分，普列汉諾夫的叙述是正确的（参看《列宁全集》第十卷第140頁）。在实践部分，則表明作者根本不懂得馬斯洛夫的草案的主要錯誤何在，不了解土地变革的經濟条件 and 政治前提的相互关系。列宁指出，“干脆否定”国有化这种措施“不仅是政治上近視，也是从理論上歪曲馬克思主义”（同上第153頁）。“市有制是錯誤的，也是有害的，分配作为一个綱領是錯誤的，但并不是有害的”（同上第312頁）。

列宁在《修改工人政党的土地綱領》一文中批判了普列汉諾夫的观点。

恩格斯在逝世前不久写信对我说过：“如果说革命抓住谁的衣领，那么这个人就是你们小小的尼古拉。”<sup>①</sup>的确，革命不但不承认宫廷礼节，而且一般说来有时还要极端严厉地惩治阻挠它的道路的那些人，它对最渺小的皇上“最崇高的”衣领是不讲客气的。今天，地方自治会的人士言语粗暴；明天，无产阶级魁梧的身躯几乎整个挺立起来了；后天，最近以前还是专制制度可靠的同盟者的工业资产阶级（专制制度曾经利用他们作为自己发财致富的良好工具）开始谈论起政治上的自由，——总之，每天皇上都要听到他的“忠顺的臣民”中间越来越多的阶层开始沉醉于“荒谬的幻想”的消息。这类新闻中最新颖的就是已经在若干省份内顺利地传流开来的、关于农民暴动的消息。自然，为了绥靖“暴动分子”派去了一些所向无敌的军事长官，这些长官正在用他们……在同手无寸铁的“内部敌人”的斗争时素有的那种英勇气概和机变才能恢复秩序。很可能，“敌人”这一次又会被征服，无所畏惧的和机智善变的军事长官这一次又会把永垂不朽的桂冠戴在自己的头上。但是沙皇制度从这个胜利中会得到什么利益呢？这个胜利是不是会巩固它的地位呢？绝对不会！塔莱兰<sup>②</sup>说过，可以利用刺刀做出许多事业，但是不能有恃无恐。尼古拉第二很快就会相信这一箴言的正确性。一切都使人认为，现在被绥靖的农民“暴动”，和“圣主”由于“内部敌人”的阴谋诡计而经历过的所有那些无数不愉快事件完全一样，不过是行将到临的全民风暴暂时还比较微弱、但是将会极其迅速加强起来的第一次讯号而已。我国的“旧制度”已经过完了自己的世纪，任何火枪、任何马刀、任何大炮、任何步卒、任何骑兵、任何炮队都挽救不了垂死的制度。

在这个制度占统治地位的条件下，我国农民所处的境况是大

---

①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同俄国政治活动家通信集》，一九五一年俄文版，第338页。文字略有差异。——译者注

② 塔莱兰，查理·莫里斯（一七五四——一八三八），法国外交家。——译者注

家都知道的。用几个字来概括它的特点就是：**农奴制的依附关系**。甚至当政府在塞瓦斯托波尔大破坏<sup>①</sup>的影响下认识到必须为国内生产力的发展提供某种广阔的场所的时候，当它大吹大擂地着手所谓解放农民的时候，它仍然没有打算取消农奴制的权利，也绝对没有取消过这种权利。当时在我国“有势力的上层社会”发生的意见冲突归结为这样一个问题：属于地主的农民今后将由谁来控制，由自己的老爷来控制还是由国家来控制。国家占了上风，而从那时以后无论过去属地主的农民或者所有其他名称的农民都同样处于对国家的农奴制依附关系中。对“解放”<sup>②</sup>的这种观点自从我国社会民主主义出版物存在的时候起就在其中说明过了，现在只有最天真的人才加以反驳。巴拉朔夫县建立农产品加工工业委员会很确切地表达过这种观点，它说：“在农民的体制中保存了解放前存在着的农奴制依附关系的几乎全部特点，不同的只是从前是农民对地主的个人从属，现在则是同政府的义务关系”<sup>③</sup>。农民自然很明白这些关系对他们是多么不利。在我刚才引证过的关于农村需要的那本书里从各地委员会的**农民来信**中摘录了一句很有趣味的話（B·罗森貝先生用这句话作为《地政官們》一文的题詞）。“主要原因和我們的过錯在于我們农民在权利方面受到种种限制，而始終处在別人的保护下，换言之，我們这些活着的动物名义上自认为是主人，但是没有权利自己支配自己。”因此农民比任何其他的人都更需要一次革命，以便把我国旧式的、或多或少为时代的进程改变了形式的国家制度从俄国彻底消灭掉，因为这样的革命会第一次打碎套在农民身上的枷鎖，使他变成“人和公民”。无怪乎农

---

① 指克里木战争时期英法土联军圍攻塞瓦斯托波尔的战争：俄軍与之奋战三百余日，城虽守住，但破坏无余。克里木战争彻底暴露了沙皇制度的落后和腐敗。——譯者注

② 指一八六一年沙皇政府宣布的所謂“农奴解放”。——譯者注

③ 参看《农村在建立农产品加工工业委员会工作方面的需要》一书，圣彼得堡一九〇四年版第一卷第115頁。——著者注

民被資本主义的迅速发展把自己从世世代代的睡梦中喚醒以后<sup>①</sup>就开始充滿着对这个即将来临的革命的同情。他的健全的理智現在十分明显地告訴他，只有从革命中他才能指望改善自己的命运。然而他不止同情革命而已。正在抬头的农民騷动证明，他自己就准备以革命最重要的一分子的姿态出現。他在自己的革命旗帜上究竟写着怎样的要求呢？

为了回答这个問題而又不陷入过去民粹派的幻想，应当記住，农民不是階級，而是阶层，一个卑賤的、无权的阶层，不过它包括按其經濟地位來說极不相同的分子。資本主义的发展破坏了国民生活旧有的經濟“基础”，使生活中出現了我們在城市中所看到的同一些階級（不过彼此之間的界綫不那么明显罢了）：資產階級和无產階級。在这里必須把所有那些主要靠出卖自己的劳动力过活的人都算作无产者，而把所有那些主要靠剝削这种劳动力来取得收入的人都算作資產者。在这两大階級之間存在着由許多几乎看不出来的过渡梯級把他們联結起来的阶层，这个阶层就是中等“殷实农夫”，他們主要是“靠自己双手的劳动”生活，但是不放过可以靠自己邻人的双手过活的机会。这种农夫的革命情緒《革命俄国报》的通信者（第二十一号，《在农民中間做什么》一文）用很同情的笔調作过說明，而根据同一位寬宏的通信者寬宏的意見，这种农夫只是間或利用雇佣劳动，同时在冬天他的剝削对象是“少年”<sup>②</sup>。

至于无产者，他們中間最大部分不是把自己的双手出卖給农业企业主，而是出卖給工业企业主。这些农村市民同土地的联系

---

① 資本主义正在深入最遙远的偏僻地区。（《农村的需要》，第128頁。）——著者注

② 《革命俄国报》这位寬宏的通信者所指出的下面这个情况是非常值得注意的：“在各地散播的警告富农的小册子”在貪饒地閱讀革命的傳单和小册子的殷实农夫心里产生了不愉快的印象。他們认为这些都是对自己的警告。現在請判断不仅希望站在无產階級的 viewpoint 上而且也希望站在殷实农夫的 viewpoint 上的社会革命党人吧！

难道这不是小資產階級政党么？——著者注



完全是微不足道的，也沒有据根认为土地会慫恿他們除了使他們同其他公民有平等权利的那种要求以外，即除了使他們摆脱难以忍受的做农民的快乐的那种要求以外，还会提出任何特别的“农民的”要求。他們的利益同工人的利益是完全一致的。因此这里用不着詳細談論它們。仍然靠“土地的出产”过活而且永远准备貪婪地抓住每一个使自己成为“殷实农夫”的方便机会的农村雇农和半雇农則是另一回事。而这个“农夫”本身則更是另一回事，他有时会为了一奥西米那<sup>①</sup>的东西而同自己的农民兄弟“真刀真枪地打起架来”，而且早就抱着嫉妒的眼神看着地主的土地。当农村中发生大規模的起义的时候，这两个阶层不会局限于自由派地主的“荒唐的幻想”（因為他們第一个提出这种甚至在很讲究自由的地主的沙龙中也要被宣布是“荒唐的”“幻想”）：他們要求土地“平分”。

这一点無論讀者觉得多么奇怪，但我还是要說，农民的这种“荒唐的幻想”将得到很大一部分农村资产者的支持。为了說明和证实我的看法，請让我引证一下十分了解农村情况的恩格尔加爾特的話。

他說道：“有錢的富农，这是农村中最极端的自由派、老爷們<sup>②</sup>最凶恶的敌人。他們不但痛恨这些老爷，而且鄙視他們，认为他們是一无所能、毫不中用的人。有錢的富农在农村中虽然有时也受人痛恨，但是作为自由派，他們說的話总是有人听的，因此在这个意义上他們的作用是巨大的。除了关于分配、关于平等的一切高談闊論以外，有錢的富农比所有的人更多地談論什么什么地方老爷們的土地荒蕪着，而农夫們則无地可耕，要是把土地交到农夫手上，它就不会荒蕪，粮食也不会这么貴。”<sup>③</sup>請注意，根据恩格尔加爾特的观察，农村中的有錢人完全不相信一般的剝夺土地私有者的可能性。恩格尔加爾特繼續叙述他們的观点說：“現在这已經是

① 旧俄散体物的容量单位，約等于一百零五升。——譯者注

② 按指地主、貴族。——譯者注

③ 《农村通訊》，第 563—564 頁。——著者注

不可能的了，因为許多土地都被农夫和商人买去了。”他們（看来其余的农民也是如此）把問題了解为仅仅从地主手里夺回土地。这种能够使某个天真的“知識分子”感到驚訝的區別說明对下面一点有本能的認識：地主的土地占有制适应于社会政治关系已經过时的制度，而土地之轉交到商人和“农夫”手中則标志着事物新秩序的到来，这种新秩序同旧秩序是根本不同的，它只是“殷实农夫”坚决支持而农村无产的“庄稼人”在适当条件下也准备接受的那同一个生产方式的进一步发展而已。簡言之，这种區別說明旧的、前资产阶级的俄国同新的、资产阶级的俄国的对立。

可以拿大师巴尔扎克在他的小說《Les paysans》<sup>①</sup>中說明法国农村內部关系时所描繪的图画同恩格尔加尔特的这个見解对比一下。在那里領導农民同地主斗争的正是农村资产者。誠然，巴尔扎克所描繪的法国农村內部关系的卓越图画是复辟时代的事情，但是这改变不了問題的性質：农村资产者正是在革命时代获得了自己对农民的影响。也許还有人說，法国农民起义本来只反对封建的貢賦，而沒有触犯过地主的土地。但这是不对的。他們也触犯过土地。只要讀一讀泰納的书就容易相信这一点。泰納在自己的名著《Les origines de la France contemporaine》<sup>②</sup>第一卷中引用了許多证据确凿的、起义的农民夺取地主土地的事例。順便指出，同一位作者报道了如下的一个有趣的情况：农民在夺取了地主的磨坊<sup>③</sup>以后，把它变成了自己乡村的公有财产。如果民粹派生活在法国革命时代的話，他們会对法国农民的“法律观点”作出多少壮丽的結論啊！但是他們那时还不存在，这种情况也沒有給关于“社会化”等等的任何幻想提供过借口。必須使俄国发生的各种农民夺取地主土地的行为不引起类似的幻想。至少我們社会民

① 《农民》。——譯者注

② 《現代法兰西的淵源》。——譯者注

③ 我是凭記憶引证的，因此我不能确信磨坊正是从地主手里夺去的：也許它屬於农村资产者，但要知道这反正是一样的。——著者注

主党人不要去支持这些幻想，也不在任何情况下散播这些幻想。我們应当清醒地观察种种事件，从它們全部客观历史面貌来把握它們。我們应当記住，如果俄国农民早就在談論而七十年代很大一部分俄国革命者也曾梦想过的那个“黑土平分”的确实行了，那么在这个事实里根本不会有什么社会主义的东西。恰恰相反，它会是资产阶级革命的最高峰，它会給早已开始了的和我在上文所指出的农村分化現象一个新的、极其强大的推动力。我在这里还要引证一下恩格尔加尔特：我之所以乐于引证他的話是因为他同已故的米海洛夫斯基、瓦·沃·先生<sup>①</sup>以及农村旧“基础”的其他保卫者一起在一家杂志社中工作过。

他指出：“絲毫不能怀疑，一旦农民分得足够数量的土地，生产率就会大大提高，国家就会变得非常富裕。但我还是认为，如果农民不过渡到劳动組合制經濟，而繼續单独地經營自己的一戶，那么即使有大量的土地在耕田的农民中間仍然会有无土地的人和雇农。更进一步，我认为将来农民在財產方面的差别还要比現在大得多。尽管土地由公社占有，除了有錢的人以外将有很多事实上沒有土地的雇农。如果我既沒有任何耕耘資本，又沒有任何耕耘工具，我有土地所有权对我或我的孩子們又有什么意义呢？这无异于把土地給瞎子，叫他以此为生。”<sup>②</sup>

恩格尔加尔特相信，农民中間不平等現象的增长可以通过发展农业劳动組合的道路来防止。这里表现了民粹主义的空想对这位一般說来很清醒的作家的影响。可是，我們已經永远拋棄了这些空想，把它們完全让給了社会革命党人。我們知道，农业合作社只有在通过资本主义以后才会走向社会主义，因此我們不能不看到，地主的土地轉交到农民手上会更多地加强农村的“分化”。

由是观之，民粹派过去当作一定要使我們国家避免“资本主义

① 瓦·沃·，即瓦西里·巴甫洛維奇·沃龙佐夫，他和米海洛夫斯基均民粹派理論主要代表人物。——譯者注

② Ibid(同上。——譯者注)，第423頁。——著者注

瘟疫”的弥赛亚来期待、而此时社会革命党人又这样来期待的“黑土平分”，实际上只会加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这个看法自然要使在自己革命热情的圣火上加热旧民粹派偏见的社会革命党人莫名其妙，但它一点也不会使我们困惑不解。

众所周知，我们完全不害怕资本主义的发展。我们坚决相信资本主义越是有力地发展，资本主义社会固有的矛盾越是大大地尖锐化，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就越会临近。

况且“黑土平分”一方面加剧农村固有的社会矛盾，同时也会大大促进它的经济繁荣，这无论对最贫困的农民或者经常由来自农村的人补充自己队伍的工业无产阶级说来都会产生极重要的后果。

因此必须承认，如果我们仍然漠不关心地对待现在正在农村中抬头的革命运动，我们就会犯可怕的、不可挽回的错误。作为无产阶级政党，作为当代俄国最革命的阶级的代表，我们有义务支持这个运动，正像我们有义务支持一切旨在反对我国现存的事物秩序的进步运动一样。

某些人把我们的土地纲领理解成这样的意思：我们希望拿著名的“割地”来满足农民的心愿，这就妨碍他们在同大土地占有者的斗争时向前迈出任何一步；说什么得到了“割地”，就和和平平地坐着，绝对不要“屠杀”了。这是由于不熟悉我们党的文献而造成的错误。请允许我引用我本人关于这个问题写过和说过的话以资证明。

在《俄国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登载在《曙光》第四期上）一文中，我在解释这个草案时说过，在革命的时代（我当时就在这几个字下面加了着重点）剥夺大土地占有者可能成为我国革命政党胜利的必要条件<sup>①</sup>。我曾经补充说过，虽然“现在”（即革命时代到来以前）谈论这个问题为时过早，但“正是现在”应当注意到，在一定的

---

<sup>①</sup> 现在谈论剥夺小土地占有者是可笑的。——著者注

情況下將必須提出這個問題(这里的着重点也是我当时所加的)。

我在我們的第二次代表大會上也保衛了這個思想。有一位同志硬說“黑土平分”不會有任何革命意義，我在反駁他的看法的時候就曾這樣說過：

“有人對我們說：你們在提出歸還割地的要求時應當記住農民比這個要求走得更遠。這一點也吓不倒我們。事實上是：我們懂得黑土平分的意義。恩格爾加爾特在這個問題上的見解是有趣的(接着敘述恩格爾加爾特的觀點)。實際上這種有利於平分的運動會是有利於資產階級的運動。我們自然沒有替資產階級提出綱領的義務<sup>①</sup>，但是如果在反對農奴制關係的殘余的鬥爭中農民沿着這條道路前進了，那麼我們就不要去阻礙這個進步的運動。我們的作用只在於：和我們的論敵社會革命黨人不同，他們認為這個運動是‘社會化’的開始，我們則要把全部力量用來使無產階級不對這個運動的結果存任何幻想，並且要竭力揭露它的資產階級性質。我們在承認這個運動的可能性時應當對自己說，我們革命社會民主黨人不會試圖去阻礙這個過程，不會對它大喊大叫，像當年阿基米德對羅馬士兵喊叫一樣：‘停止吧！你在破壞我們的公式！’”<sup>②</sup>

現在，我的《曙光》上的文章當作可能的事情看待的那些情況已經部分地存在着。正是因為這樣，我現在要對當時我只能有條件地談論的同一個題目斷然表示：農村正在變成革命的；我們有義務支持革命的農村。

我國許多批評家對歸還割地的要求如此竭盡心力地發揮了自己的機智，但是這種要求完全不是如此次要的，像不熟悉我國地主

① 在代表大會會議記錄(第204頁(《普列漢諾夫全集》俄文版第十二卷第422頁。——譯者注))上作：“積極提出”。這是印錯了。積極一詞是談不上的。——著者注

② 會議記錄作：“我們革命社會民主黨人不會停止這個過程，不會對它大喊大叫，像當年喊叫過的一樣”……等等。思想完全是一樣的，但是在敘述它的時候那里混進了一些不正確的用詞，這是因為我必須為會議記錄擬寫自己的發言綱要的同時還得履行遠不容易的做主席的義務。——著者注

經濟狀況的人們可能覺得的那樣。我記得《民意導報》早就指出過，割地用“鐵環”把農民的份地包圍起來，從而大大促進農民受地主的奴役。再沒有比從最認真地研究我國人民生活的人的著作中摘錄一系列的言論來證實它的這個看法更為容易的了。但是現在在這個問題上引起爭論是不会有益處的。把割地歸還農民的要求在下列場合中可能具有相當重要的意義：如果我國舊制度的崩潰是在不大革命的環境下發生的話。現在革命的浪潮甚至在農村中也大大高漲起來。現在農民要求對地主實行剝奪，這對革命的事業就更有利了。

但是如果剝奪大土地所有者的過程在農村中開始，那麼它就只能在城市中結束，而且正是在召集我國立憲會議的我國兩個首都中的那一個首都中結束。只有這個會議才會徹底解決我國現代的土地問題，因為要知道每一個村社是不能單獨地解決這個問題的。參加立憲會議的自然會有許多黨派，他們中間幾乎每一個黨派都會提出自己的解決土地問題的方案。

試問：

(一)我們該從哪一種觀點來批評其他黨派的建議呢？

(二)我們自己提出什麼建議呢？

這些問題中間的第一個問題不難回答，因為答案早已找到了，它構成我們的“社會政策”的基本原理之一。它的內容是：如果我們不願意背叛我們所代表的那個革命階級的利益，那麼我們應當毫無例外地堅決抵抗一切停止歷史車輪的企圖，換句話說，也就是堅決抵抗一切阻礙資本主義發展的企圖。當倍倍爾在德國社會民主黨布列斯拉夫爾代表大會上發言時，他是相信這一原理的，他說：他在考察社會政治領域的任何措施的時候，首先問自己，它是否會妨礙資本主義的發展，如果他相信它會成為這種發展的障礙，他總是堅決地否定它。在現代社會里，任何一個社會民主黨人都不能拒絕這一標準，因為妨礙資本主義發展意味着支持經濟上和政治上的反動措施：不應該上資本主義的這一方面去找黃金時代。

而應該上它的那一方面去找黃金時代。自然，俄國社會民主黨也會牢固地堅持這個標準。它應當堅決起來反對所有那些好作空洞計劃的人，無論他們屬於哪一個陣營：“保守派”陣營，還是社會空想派陣營，他們想在確認土地屬於農民的幌子下確認農民屬於國家。正像我在上面所引證的拙著《綱領草案》一文中已經說過的那樣，我們黨應當很小心地對待土地國有化的要求，因為在具備一定的政治條件下，即在我國舊沙皇制度為類似普魯士半專制制度的某種制度所替代的那種場合下，這種措施就不會是革命的，而會是反動的，因為它會大大地促使半立憲制政府在它同革命黨派的鬥爭中取得勝利。我們的利益根本不在於增加小農的財產；但是如果我們沒有別的選擇，只能或者（一）把從大土地占有者手上奪來的土地變成“殷實農夫”的私有的——與資產階級生產方式相適應的——財產，或者（二）根據導致國家對土地占有者的奴役的條件把它變成國家財產，那麼，我們就毫不動搖地選擇前者。伊克斯<sup>①</sup>同志批評我們的土地綱領草案時主張把根據該草案應予沒收的土地，即把教堂、寺院、皇室的土地轉交“民主制國家所有，使得居民最便於使用它們”。但是要知道民主制國家暫時在我國還不存在。因此很明白，伊克斯同志的草案具有**完全相對的意義**；如果我們的國家不成為民主國家，那麼也就無需乎把沒收來的土地轉交它所有。

對於伊克斯同志的另一個草案可以更加明確地表示意見。按照這個草案，大土地占有者的土地應當轉交社會自治機關（如地方自治局）所有。這個草案既可以避免地主土地“國有化”的不利因素，又可以避免把它們轉交給小私有者的不利因素。如果立憲會議通過這個草案，“殷實的農夫”就會成為屬於地方自治局的土地的租佃者，於是問題就會歸結為一定的租佃條件。我們黨本來應當關心於：第一，使這些條件儘可能更多地保護僱傭勞動者的利

---

<sup>①</sup> 即馬斯洛夫。——譯者注

益，即农业无产者的利益；第二，不会成为剥削租佃者的工具；第三，使它们不会鼓励任何一个阶级损害另一个阶级，比方像现在的地方自治局就在征收土地税时帮助地主而损害农民。

一般说来，支持现在“进行暴动”的“农夫”，绝对不应该具有大卫之流如此热烈地向德国社会民主党推荐的那个《Bauernschutz》<sup>①</sup>的意义。

如果撇开靠出卖自己的劳力因而按其经济地位而非按其有时还很落后的意识属于无产阶级（他们的利益在我们的纲领中得到了十分明显的表现）的乡村贫农，我们可以说，我们应该支持农民：

第一，因为他们是低贱的、受压迫的和受侮辱的等级，他们的根本利益在于我国的分等级的国家制度的垮台。

第二，因为他们是新的、力求“往上爬”的小资产阶级生产者阶级，他们同旧的封建领地的贵族进行着殊死的斗争，这些贵族是根本不适应于农业生产的新条件的，而且由于自己的“广泛的”、而主要是游手好闲的“老爷派”的习惯，几乎丧失了适应这些条件的任何可能性。

农民现在是作为革命力量出现的，而我们正是应该把他们当作这样的力量来支持。

当小资产阶级生产者在新的社会条件下开始丧失自己的革命意义的时候，我们对他们的同情才会消失。从事农耕的小市民现在是以革命者的姿态出现的，如果超出这个界限还支持他们，那是自愿做傻子的人干的事，这种人甚至在“社会主义者”中间也还有；我们不在此数。

（译自《普列汉诺夫全集》第十三卷第 241—251 页）

---

① 保卫农民。——译者注



## 論我們的几点“不足”

本文也发表在第一期《日志》上。它暴露了普列汉諾夫的机会主义策略观点的一个理論根源——即对实践的錯誤理解。他說：“什么是理論呢？什么是实践呢？……費尔巴哈說：‘理論，这是仍然在我一个人头脑中的东西；实践則是深入到許多人头脑中去的東西，它把許多头脑团結起来，創造出群众，傳遍世界，并且为自己在世界中夺得一席之地。’这是毋庸置辯的真理。”正因为作者像費尔巴哈一样了解实践，所以他批評“馬克思指責費尔巴哈不了解‘实践批判’活动”“是不对的”（《普列汉諾夫哲学著作选集》第三卷三联书店一九六二年版第776頁），所以他經常抹煞馬克思主义的認識論和費尔巴哈的認識論之間的质的不同，为了理論上的差別而忽視政治实践的和階級的差別。

列宁在讀过第一、二期《日志》以后，曾經写信給卢那察尔斯基說：“您最好先別回答普列汉諾夫，让这个恼火的学理主义者自己去叫罵好了。在这种时候还专门钻哲学！应当全力以赴地为社会民主党工作……”（《列宁全集》第三十四卷第338頁）。

普列汉諾夫的言論表明他是一个半学究和半庸人。

一周半以前我收到下面一封这样的信：

敬爱的普列汉諾夫同志！

我們这些下面署名的人来到了日内瓦，希望听一听我們

的政治領袖們对社会民主党一些**基本問題**的提法和解答。我們在这里已經有几个月了，但是至今只听到我們的政治領袖們对組織問題的分析，而不是对原則問題的分析。就党内現狀說这当然有其原因。但是这对我們却不是快心的事。我們很快就要到俄国去，因此我們无论如何来不及目睹我們党同敌視社会民主党的各党派的原則斗争了。不久以前 Y. 先生作了一篇題为“集体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学术报告。我們曾經希望我們的哪一位領袖会出席并且予以反駁。但是我們的期待沒有实现。要知道 Y. 先生对我們的理想提出了种种严重的譴責：說社会民主党人反对在未来的国家中按照各人的需要分配财产；說社会民主党人希望在有利于熟练劳动的条件下保留它同非熟练劳动的不公平的分工，以致例如未来国家里的工厂厂长将拿走成千的东西；說社会民主党人甚至希望保存監獄来对付同他們的思想不相一致的人；他还从某个不很著名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人那里引证了一段話，說什么将給予被捕者以自由選擇監獄长的权利；Y. 先生还硬說改良主义真正的魁首不是伯恩施坦，而是考茨基，因为他在《爱尔弗特綱領》中否定貧困化理論；考茨基甚至希望向富人贖买土地和生产資料。总之，Y. 先生指出了社会民主党内許多不討人喜欢的事情；同时又拿盖德关于集体主义的小册子作为自己关于集体主义的判断的基础。

因此我們这些下面签名的人希望听听您对于同一些基本問題的有分量的話。我們应当以什么名义、以哪一种社会主义的名义号召工人进行革命呢？

如果您不觉得自己身体太弱的话，我們請求您在我們离开以前搞一次**公开**的学术报告，让我们的敌人也能出席。

####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党员**

接着是八个部分是潦草的、部分是不完全的签名。但問題不在签名。凡是把信稍微浏览一下的人一刻也不会怀疑，它的确是

同志們写的。这些同志补充說：“我們这八个党员表达着日內瓦絕大多数同志的願望。”我也不怀疑这一点。但是十分遺憾的是健康情况不允許我实现信中提出的請求。因此我請《火星报》任何一位編輯就 Y. 先生涉及的題目作一次学术报告。暂时我想向来信的作者說明几点由于他們的抱怨而把我引发出来的意見。但是因为这些作者沒有給我留下回信的地址，我就在刊物上答复吧，况且我也认为自己有权利这样做，因为这封信意义十分重大，对全党有普遍的吸引力。

我不打算在此地反駁 Y. 先生：这个工作由准备就**集体主义和共产主义**一題作讲演的那位同志来做。我甚至不打算断定在我所引用的信里是否正确地轉述了 Y. 先生的思想：誤会总可能有的。不过我假定，信的作者們正确地叙述了 Y. 先生加在国际社会民主党头上的主要的譴責，我可以告訴他們，坚持馬克思的观点的人一刻也不应当对这种譴責感到不安。

Y. 先生实际上譴責各国社会民主党什么呢？就是：它希望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建立值得否定的、不公正的产品分配方式。Y. 先生显然认为产品分配方式的好坏依賴于人們意志的善恶。但是馬克思主义者的看法則不同。馬克思說：“所謂分配关系适应于历史上一定的、生产过程的社会形式，适应于人們在再生产自己人类生命的过程中所結成的那些相互关系；它們就是从这些形式和关系中产生的。分配关系的历史性只是生产的历史过程的一个方面的表現，也是由这个过程决定的。资本主义分配不同于从其他生产方式中产生的分配方式，而且每一种分配方式都是随着它由以产生并与之相适应的那个一定的生产方式一起消失的。”<sup>①</sup>

按照馬克思的理論，在特定历史时代占統治地位的生产方式

---

① 《Das Kapital》（《資本論》）第三卷第 420 頁。俄譯本第三卷中这个地方譯得不完全确切。——著者注（參看《資本論》，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八年版第三卷第 1157 頁。——譯者注）

是由什么决定的呢？生产力状况。<sup>①</sup> 因此很明显，不是人們意志的好坏，而是特定时代生产力的状况决定着該时代固有的产品分配方式。我不可能在这里来考察正是从怎样的生产力状况中产生了**资本主义**生产和分配方式的問題。我只指出，如果我們希望弄清楚在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下应当怎样分配产品，那么我們就应当首先記住，在这里，問題将取决于社会所支配的生产力的状况。差别仅仅在于，在其他社会結構下生产方式同分配方式之間的适应是“背着生产者”建立起来的，同时，建立这种适应关系的过程則常常至少使某些階級深受痛苦，而在社会主义社会下这种适应关系乃是人們自觉地决定自己本身相互关系的結果。不过可以看得出来，这是十分重大的区别。

为了使社会主义社会在分配产品时以各按所需的原则为指导，必須有生产力十分高度的发展。如果生产力的发展还没有达到这种程度，那么社会主义社会不管願不願意都必須对这个原则作一定的限制。限制，一般說来是不愉快的。但是在这个叫我們操心的場合下却不要归过于人的本性，也絕不要归过于社会民主党罪恶的意志，而是由于某种完全不同的緣故，即由于人对自然的控制的有限性。如果无政府主义者和“批評家”有像 Y. 先生样的，不懂得这个道理，那唯一是由于他們一般說来沒有能力提高到科学社会主义的观点。

共产主义社会不可能用“划一的精神”組織起来。在资本主义最后让位于共产主义以前，文明社会应当要经历一个过渡时期，在这个时期中旧社会将或快或慢地为新社会所取代。**集体主义者**关于不可能按需分配的意见即是就这个过渡时期說的。要是高兴的話，你們可以称他們的意見太絕對了，你們可以假定，在过渡时期生产力的状况已經可以使社会对某部分产品实行共产主义分配原

---

① 請看俄国馬克思主义文献中經常从《Zur Kritik der politischen Oekonomie》（《政治经济学批判》。——譯者注）序言中引证的与此相关的那段有名的話。——著者注

則，——不过这将只是一个假定而已，它正不正确只有由經驗来檢驗，現在爭論這個問題完全沒有益处。<sup>①</sup>要是无政府主义者、半无政府主义者以及其他空想主义者还是爭論這個問題，那是因为，正像我上面已經說过的，他們对科学社会主义的观点一窍不通。

总之，我在这里所叙述的看法足以說明 Y. 先生对社会民主党提出的那些“严重的譴責”到底有多少道理。不过我这里所叙述的看法你們可以在我們的文献中找到。或者說得更确切一些，你們在这种文献中可以找到必然要得出我所叙述的看法的那些基本原理。而如果 Y. 先生毕竟使得你們感到不安，那就让我直率地、同志式地对你們說，这部分地應該怪你們自己。你們在自己的信中說：“我們在这里已經有几个月了，但是至今只听到我們的政治領袖們对組織問題的分析，而不是对原則問題的分析。”这自然是很遺憾的，我自己也知道，我們这里現在已經成为习惯的关于“少数派”和“多数派”的无休止的爭論是多么令人厌膩。这些爭論真是“陈腔濫調”，我决不責备你們，說你們願意听一些别的、不是这样单調的、而主要是比較有原則意义的演說。但是俄羅斯的諺語說，沒有也只好沒有，如果沒有任何人對你們发表过这样的演說，那你們必須自己动手解决这些使你們感到兴趣的原則問題。在这种場合下你們会得到我們的有原則意义的文献的巨大帮助，这种文献，据我所能判断的來說，現在远不是“幸而得之”的。現在，人們都局限在組織問題的爭論上，而凡是有更大的求知欲的人，都进而注意策略問題，然后就止步了，不允許自己把時間浪費在像可以用来輕易地解决策略問題和組織問題的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这样的不必要的事情上。我們的实际工作人員对理論可不是很賞識的。而他們是完全不对的，因为的确，同志們，什么是理論呢？什么是實踐呢？怎样在它們中間划分界綫呢？在我們的事業中，在把自己一切实际希望归根到底都建立在提高无产階級覺悟的基础上的人們

<sup>①</sup> 我也沒有討論被捕者。这簡直是胡說八道，不管是什么人捏造出来的。——  
著者注

的事业中，要找出这个分界线，是比任何别的事业更加困难的。费尔巴哈说：“理论，这是仍然在我一个人头脑中的东西；实践则是深入到许多人头脑中去的東西，它把许多头脑团结起来，创造出群众，传遍世界，并且为自己在世界中夺得一席之地。”这是毋庸置疑的真理。但如果这是真理，然则怎么可以轻视理论呢？怎么可以把它放在比实践次要的地位上呢？须知理论决定着“创造群众”的质量。

但愿不会有人对我说：我言过其实了；我所指出的罪恶并不若此之甚；我们这里并没有谁轻视理论。要是真能证明我言过其实，那倒很叫我高兴。但是可惜不能。听听我们这里说的什么吧，读读我们这里写的什么吧，这里谈的是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发展呢。通常都把我们的党本身的产生，即把那时以前在俄国各地分散地进行活动的社会民主主义组织统一起来的时刻宣布是这个发展的始点。但是这些小组毕竟不是从天而降的，鼓舞他们的思想毕竟都有自己的历史，而这个历史已经用鲜艳夺目、无法磨灭的文字载入俄国文献的史册了。我们这里对这段历史谈得如此少，写得如此少，这是什么道理呢？道理很简单。因为对思想本身兴趣索然的人，当然不可能对它们的历史发生强烈的兴趣。我们的人忘怀了：橡实是长在橡树上的，如果橡树的根受损坏了，橡实就会不再生长。也正是因为如此，每每几乎不到两年，我们就要出现一个发现早就发现的亚美利加的什么哥仑布，他决心为了支持自己的所谓新“思想”而分裂党。也正是因为如此，我们这里现在出现了凑着芦草吹唱的黄雀，就是说出现了一些“用马克思主义精神”写作、捍卫“正统思想”、同时又为着某个什么马赫和阿万那留斯而否定马克思的人。我们的读者们也准备向这样一些黄雀拍手叫好。不久前我本人就有幸同这些读者中间的一位谈过话：他嘴角挂着调皮的微笑央请我在我国某些“经验批判主义”门徒的政论著作中找出任何一点最小的离开“马克思”的地方。这真是登峰造极，无以复加了；谁假定马克思的学说不过是各个理论简单的机械的混合物；

哲学理論、历史理論、經濟理論等等，可以拿掉其中一个組成部分而无害于其余部分，誰就不了解馬克思，誰就枉然接受他的偉大的名字。不管黃雀模仿誰，它絕對成不了金絲雀。馬克思主義是一回事，馬赫主義又是一回事。

同志們，請注意，我指出的巨大的罪惡并限于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範圍。不，我們比其他人吃它的苦頭更大一些，但它几乎存在所有其他国家里。理論处处都給所謂**實踐**利益带来損害。还在不久以前，我們就在伯恩施坦先生和他的門徒所挑起的爭論中看到了这种气人的事例。伯恩施坦先生企图从馬克思主義中清除它的革命本质的举动，在国际社会民主党人中間远沒有引起它应当受到的那种巨大的憤慨。这是什么緣故呢？难道是像无政府主义者坚决认为的那样，因为国际社会民主党的确不再是**革命政党**了么？根本不是！簡單的原因是：伯恩施坦先生談到了**理論**，而絕大多数国际的**实际工作者**却对理論漠不关心。伯恩施坦先生的“批評的”謬論只有在它們涉及一些**策略問題**、即同一个**實踐**的一些概括的問題时才受到了严厉的指責。这就說明为什么伯恩施坦先生給国际社会民主党的實踐所能造成的損害要比在国际社会民主党对理論不那么漠不关心的場合下他所能給它造成的損害大得无法相提并論。“伯恩施坦風”具体地表明，国际社会民主党沿着漠不关心地对待自身活动的理論基础的斜坡多么迅速地向下直滾。举一个突出的例子。

奥国社会民主党著名領袖維克多·阿德勒，在恩格斯安葬的那天，即一八九五年八月十日，写了一篇題为《恩格斯的包罗万象》的文章，文章說道：

“馬克思和恩格斯所理解的社会主义，是包罗万象的學說，而不光是經濟學說。革命无产階級的运动只是构成我們时代的特征的精神革命的一部分。”<sup>①</sup>如果这是对的（而这无疑是对的），那么似乎維克多·阿德勒应当严厉地对待把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包罗万象的**和**严格彻底的**學說歪曲成半唯心主义半“实在主义”的各种不

同理論的折衷主义大杂糅的一切企图，而这些理論的出現則应当归因于資產階級的墮落。但是并未有过这样的事！維克多·阿德勒很严厉地对待的不是这些批評的企图，而是以馬克思主义“正統思想”的名义起来反对它們的那些人。他硬說这些人发起一場完全不必要的、而因此是有害的爭論。要知道恩格斯死后才不过两年半，伯恩施坦先生的批評运动就开始了，所以維克多·阿德勒也許还没有来得及穿坏他为自己包罗万象的导师去送殯时所披的那件常礼服！况且維克多·阿德勒不是沒有来头的人，他賦有很大的才智，受过教养，而且毫无疑问是热烈忠实于无产階級利益的。既然如此，那么从更不出色也更无禀賦的人們那里又能够期待什么呢？

国际社会民主党現在正为自己对理論問題的无动于衷付出珍貴的代价。将来它还要为此付出更多的东西。每念及此，輒不胜沉痛。但我現在說的不是“外国”，而是我們自己的“不足”。对理論的漠不关心給我党命运带来更加有害的影响，因为它比西欧各党更加年青，因为知識分子在党内至今都起着比西方更重要的作用。如果我国社会主义知識分子傳染着資產階級的理論，那么甚至在他加入无产階級的队伍的場合下（而且特別是在这种場合下）他也会給无产階級造成損害。我国的資產階級不会错过時間的。它的思想家对理論不是漠不关心的，相反，他們在积极地准备用来打击我們的武器。

摆脱这种不幸的局面的办法不能借助于个别的理論性的小册子、书籍或者任何不定期的刊物，而要**根本改变我們所有同志对待理論性的小册子、书籍和不定期刊物的态度**。在我們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人們对《火星报》贊誉备至，然而对《曙光》杂志誰也沒有說过任何一句話，的确沒有說过一句。这个事实我任何时候也不会

---

① 手边沒有这篇文章的德文原本，我的引文根据意大利文譯本，該譯文收載在小册子《*Frederico Engels, Economica politica—introduzione etc.*》（《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政治經济学——介紹等等》。——譯者注）中，米兰，一八九五年版。——著者注



忘記。除此之外還有另一個也是十分重要的事實：我們許多同志現在很夸奖納捷日津先生“為工人”寫的那些著作是“有才能的東西”。而這些“有才能的東西”實在庸俗透頂，把它們獻給無產階級無異於不尊重他們。<sup>①</sup>

再說一遍，只有我們整個全黨的輿論才能挽救這個巨大的罪惡，黨最後會了解從這一方面的危險多麼大，它最後也相信，輕視理論總是必然要損害它的實踐的。現在我們中間誰不知道我們的力量怎樣為我們無休止的、組織問題的爭論所削弱呢？而這些無休止的爭論的存在本身就是實踐因為我們輕視理論而加在我們身上的一種懲罰。如果我們不曾輕視理論，那麼列寧的小冊子《怎麼辦？》一出版，它的缺點立刻就會引起我們大家的注意，那時我們這裡就不會發生現在使我們痛心疾首的那種紛爭局面。

——但是現在顧得到理論么？——另一位同志喊道，——現在要打架，而不是學習。

——要打架，——我回答說，——但也要學習。隨時隨地都可以學習。只要珍惜自己的時間，只要利用一分一秒的空閒來充實自己的知識。不知不覺的空閒有時即使最忙碌的“實際工作者”也是有不少的；但是遠不是所有的“實際工作者”“實際上”都在利用自己的不知不覺的空閒。我們的實際工作者、有時（毋需隱瞞）理論工作者也愛“聊天”，天曉得有多少寶貴的光陰消耗在無窮無盡

---

① 納捷日津先生的大作多麼庸俗，可以從他的新出的小冊子《教會的演說》中摘出這樣一段話作為例子來加以說明。納捷日津先生堅信，士兵們並不認為日本人是需要從俄國方面接受基督教影響的多神教徒。根據納捷日津先生的確信，甚至不“自作聰明的”士兵都會說：

“的確我們自己就像多神教徒……他們比我們更是基督教徒……家什齊備的人民，這不是土耳其人……穆罕默德就是穆罕默德，在自己這裡什麼都沒有，而在那裡佛會把一切器皿都給你。”

你們怎麼會喜歡這種機智呢？馬努欣輩、列烏欣輩以及淺陋的通俗小冊子的其他出版者什麼時候也沒有出版過任何一本更加機智的作品。而這就是“社會民主主義的”出版物么？在“為工人”……的社會主義的借口下我們終於達到極端鄙俗不堪的境地。——著者注

的全俄的談天中！

而且不仅可以从书本学习。实际工作者直接接触的生活本身就是学习，而且是了不起的学习！但是生活是用自己特殊的語言說話的，这种語言如果没有理論的帮助常常是无法了解的，光凭这一点每一个实际工作者道义上就都必须获得理論上的修养。

著名的威廉·李卜克内西說过：Wissen ist Macht, Macht ist Wissen.<sup>①</sup>他是很好的实际工作者，因为他的知識很多。“**知識就是力量，力量就是知識。**”……

每一个社会民主党人都应当永远記住这句金玉良言。

請看同志們的来信引出了我的怎样一些思想。我把这些思想写下来了，我希望信的作者們会怀着某种兴趣去讀它們。它涉及的现象看来不止一次地使他們产生了忧郁的沉思。如果得到青年同志們的同情，那对我是十分快心的事。难怪常人說，青年拥护誰，生活本身就拥护誰，也就是說那整个“实践”拥护誰。

（譯自《普列汉諾夫全集》第十三卷第 252—260 頁）

---

① 原文后面引号里的那句話就是譯文。——譯者注

## 与友人通信选录

(致《无产者报》編輯部的信)

这封信发表在一九〇五年八月出版的第二期《社会民主党人日志》上。这是一篇暴露普列汉諾夫的机会主义策略路綫的重要文章。

作者在这封信里维护和发展了自己在《論夺取政权問題》中提出的机会主义观点，詳細地回答了列宁的《論临时革命政府》一文对他的这些观点所作的批評。他对无产阶级的革命领导权思想、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的思想采取了否定的态度。他教条主义地引证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认为无产阶级政党应当对小资产阶级革命政府持极端反对派的立場，应当严格不渝地遵循十八世紀法国大革命的逐步上升的路綫。他的这些观点后来构成了《論革命的两条路綫》(一九一五年)一文的基础。在他看来，如果社会民主党参加临时革命政府，就一定“会导致小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专政”。因此，他攻击布尔什維克是“由布朗基主义和饒勒斯主义交配而产生的杂种”。

普列汉諾夫在这封信里还企图利用个别布尔什維克同情馬赫主义的錯誤，“把这方面的斗争和派別斗争拉扯在一起”(《列宁全集》第三十四卷第392頁)，借口反对馬赫主义而給布尔什維主义带来派別危害(同上第十四卷第376頁)。普列汉諾夫不了解，馬克思主义的策略要求党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根据斗争形势的具体需要把不同的

方面提到首位；有时是經濟斗争，有时是政治斗争，有时则是理論斗争。在当时的条件下，为了团结全党的力量进行武装起义的准备工作，必须把“唯物主义者和‘經驗……’者之間的这些哲学爭論同整个党的工作分开”（同上第三十四卷第388頁），必須“把哲学当做中立地区”（同上第十三卷第426頁）。

普列汉諾夫一方面承认孟什維克的“組織观点糟糕透了”，另一方面又认为他們的策略比布尔什維克的策略“好得无法比拟”。在他看来，布尔什維克的“組織观点和策略观点完全不符合馬克思主义”。

列宁讀到这封信后，认为普列汉諾夫的“論据”是“毫无根据的”，必須把他“痛罵一頓”（同上第三十四卷第532頁）。可惜答复沒有写成。因为偉大的一九〇五年革命已經迫在眉睫了。不过对普列汉諾夫的这些“論据”实际上已在《論临时革命政府》和《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等著作中詳細批判过了。

### 尊敬的同志們！

你們对我不滿意。你們不喜欢我在我們党过去的中央机关报第九十六号上提出的“历史证据”<sup>①</sup>，而且你們的小品文作者为此把我——像格·伊·烏斯賓斯基的商人所說的——“狠狠地”罵了一頓。原来我同你們論战的时候使用了最不能容忍的手段：我“暗中替換”和“故意歪曲”云云。真是登峰造极，无以复加；我在他的心目中原来是某个像文坛騙子一样的人物。既然他这样严格地对待我，你們自然要以为我定会（用上面說到的那个商人的話說）憤憤不平，定会像你們的小品文作者一样在自己的答复中使用同样坚决的言詞。但是我不这样做。其所以如此，原因很多。第一，因为要是我論战的时候絕不怕判断尖銳，那么我始終避免言詞粗魯。

<sup>①</sup> 指《論夺取政权問題》一文，見本书第146—156頁。——譯者注

我认为言詞粗魯是一个稍具文学趣味的人所不当有的。第二，因为一般說来我是像果戈理的市长一样“不記仇的”<sup>①</sup>。第三，因为一般說来要为你們严格的（且不用别的說法吧）措詞而对你們生气，特别是要为此而对你們的小品文作者生气，那是困难的；这些措詞对任何人早就“不起作用”了，因为你們太經常地使用它們了，对于所有在什麼問題上同你們意見不一的人你們都大量使用它們。第四，因为尽管我认为你們的議論和你們的行动方式在很多方面損害着我們党的利益，但我仍然把你們看成是同志。最后第五，因为我不值得……为你們的严格性而对你們生气。我敢說，甚至在現在跟着你們走的那些社会民主党人中間也找不到很多的人會怀疑我在文壇上有欺騙行为。鉴于所有这些原因，我就用严格性来回答你們的严格性，我只平心靜气地考察一下在我們之間引起意見分歧而且从一切方面看来現在很使我們的讀者发生兴趣的各种爭論問題。

我从一些細小的問題开始，以便尽快地解决它們，把它們从我們的視野內清除掉。

我在自己的《证据》中表示了一个真誠的願望，希望你們的馬赫們和阿万那留斯們来帮助你們。你們談到這個問題时写道：“既然普列汉諾夫不能从《前进报》的真正論断中給自己找出攻击对象，而必須从既与《前进报》絲毫无关又与所考察的問題絲毫无关的題目中来捏造攻击对象，那末他的立場必定是糟糕的了。”<sup>②</sup>在这里，在我們之間，似乎有某种誤会。我完全准备承认：类似馬赫和阿万那留斯的“題目”是同《前进报》“无关的”。但是我过去认为，現在也认为：这些“題目”同过去在这份严格的報紙上写作的而現在又在《无产者报》上写作的很多人士并不是无关的。試問，这个看法难道不对么？你們反駁不了这个看法。凡是稍微熟悉我們党内情况的同志，誰不知道过去在《前进报》中工作而現在在《无

① 参看果戈理《欽差大臣》，作家出版社一九五四年版第122頁。——譯者注

② 参看《列宁全集》第八卷第439頁。——譯者注

产者报》中工作的作家集团里面有这样一些人，对于他们说来馬赫和阿万那留斯完全不是域外的“題目”呢？我曾經假定，在馬克思主义的基础本身方面脱离馬克思主义如此遙远的这些人支持过而且将来也会支持我认为錯誤的关于“革命专政”的議論。我曾經希望，当这些人进一步从科学社会主义理論立場退却的时候，他們所珍惜的思想家們帮助了他們。換句話說，我曾經希望他們貫徹到底。請問，这个良好的願望怎么会是我的立場軟弱的即使間接的证明呢？真不明白！

我清楚地了解，《前进报》著作集团并非仅仅是由一些馬克思的“批評者”組成的。我很好地知道，这个集团的中心人物是列宁。对于他說，馬赫和阿万那留斯的确是无关的“題目”。但是要知道，对他說来一切其他的哲学題目也是无关的，因为他对哲学問題始終是根本不关心的。因此在这方面就用不着去管他。这是第一点。第二，——誰知道呢？——也許馬克思主义者列宁本人已經逐渐开始接受了他周圍的馬赫主义者的影响了。至于我，我承认，我(用法国諺語說：Ce sont les enfants des autres qui gâtent les nôtres.<sup>①</sup>)正是用团結在他周圍的“馬克思的批判者們”对“本身”〔按指“他”，即列宁。——譯者注〕的这种有害影响來說明《前进报》和《无产者报》的許多失策的。請不要說，我的假定是完全不可思議的。例如在你們報紙的第三号和第四号<sup>②</sup>的小品文中（甚至也許是你們的報紙“本身”）給了我答复的那位人物，即如此坚决地拒絕馬赫和阿万那留斯的那位人物，看来本来应当十分坚毅地維護馬克思主义的“正統”，然而实际上他身上实在有相当大的“不足”。請看他对我的一个“三段論法”是怎样諷刺的吧。

“讀者們，你們觉得可笑吧？的确，普列汉諾夫三段論法，是有点……(怎么說得客气一些呢?)……‘辩证’味道。因为馬克思

① 是別人的孩子帶坏了我們的孩子。——譯者注

② 疑有誤。列宁的《論临时革命政府》一文不是登載在《无产者报》第三、四号上，而是登載在第二、三号上。——譯者注

在相应的具体关头”云云<sup>①</sup>。在这里，究竟是怎样一种“三段論法”引起作者的嘲笑对我是不重要的；在这里，这个“三段論法”在何种程度上值得嘲笑的問題也沒有意义。我并不忙于要說明这一点，我牢牢地記着另一句法国諺語，这句諺語說：rira bien, qui rira le dernier（誰笑在最后，誰笑得最好）。但是我認為指出这里的嘲笑采取怎樣的形态是有益处的；为了“說得客气一些”，作者管我的三段論法是辯证的。难道“辯证法”、“辯证的”这样的字眼是很坚定的判断的客气的說法嗎？只有“馬克思的批判者”才能有这样的想法，而且正是他的那些起来反对他的理論的哲学基础的“批評者”才能这样想，換句話說，也就是只有那些过去栖身于《前进报》編輯部而現在又栖身于《无产者报》編輯部中的馬赫和阿万那留斯的拥护者才能这样想。不久以前我在《俄国革命通报》<sup>②</sup>第四期上偶然发现这样一段話：“現時只有不多的馬克思主义者（而首先是普列汉諾夫先生）頑强地坚持用以粉飾馬克思学說的黑格尔学派，即坚持所謂辯证方法。未必可以怀疑德国哲学这一特殊遗产的最后痕迹不会在新兴的一代人身上消失。普列汉諾夫先生用以坚持辯证方法的那种頑强性（这在理論上是自然的；我們完全不想責备普列汉諾夫先生，說他也是按照辯证的方式进行思考），說明他缺乏独立性”等等<sup>③</sup>。当我讀到这段話的时候，我首先就在书的末尾找勘誤表，因为“学派粉飾学說”的說法太荒謬了，但是那里並沒有这样的表。看了一看书的开头，那里也沒有。于是我只好承认，《俄国革命通报》的一位撰稿人认为似乎黑格尔学派粉飾着馬克思的学說。这自然是有点儿奇怪的撰稿人。不过这位奇怪的撰稿人在嘲弄辯证法的时候絲毫沒有背叛自己。然而如果我的《无产者报》中的論敌一方面自认为是馬克思主义者，同时又觉得可以为了“客气”起見而向他认为过去值得对之投以更坚定的什么話的那些人

① 參看《列宁全集》第八卷第433頁。——譯者注

② 一九〇一至一九〇五年在日內瓦出版的社会革命党人的杂志。——譯者注

③ 第356頁，注釋。——著者注

投以“辯证的”字眼，那么他的做法就是极不彻底的。怎么說明他的这种不彻底性呢？我耽心这里表现着他的战斗中的同志們对他的影响，他的这些同志既然支持馬赫和阿万那留斯，自然会（和社会革命党人一起）把辯证法看成是某种值得坚定的嘲笑的字眼。

不过話又說回来了。我的論敌把“辯证法”一詞加上了一个引号。这大概不是沒有用意的。莫非这些“引号”中有什么“暗示”么？它是不是表示这位作者的話中无疑包含着的嘲笑不是針對他所珍視（哼！）、理解（哼！哼！）和善于掌握（哼！哼！哼！）的一般的辯证法，而是某种特別的、虛假的，因此也是值得蔑視的辯证法呢？假定是这样吧。其次，假定，——你們可以看得出来，尊敬的同志們，我是何等地溫順和热心于自我牺牲，——假定罪該万死的下官所坚持的那个辯证法正是这种虛假的、值得嘲笑的辯证法。然而在这种場合下，对于馬克思主义者說来，是不允許在文坛上的礼貌要求（按照他的意見）用客气的話代替坚定的判断的地方（而且是帶有暗示地）使用“辯证的”字眼。我举一个明显的例子來說明这一点。坦白地“凭良心”說，我有时觉得你們、尊敬的同志們，是不大好的馬克思主义者<sup>①</sup>。你們的組織观点和策略观点完全不符合馬克思主义，——但是如果我在同你們爭論的时候根据这一点写道：这个結論，是有点……（怎么說得客气一些呢？）……“馬克思主义”味道，你們会說什么呢？你們就会有充分的理由假定，我也淪落到“馬克思的批評者”之列去了，但是我不会这样写，因为只有不是真正嘲笑馬克思主义就是完全不善于辯論的那种人才能这样写。我責备你們的不是馬克思主义，也不是“馬克思主义”，恰恰相反，而是你們在发表关于革命专政的議論时离开了馬克思主义，甚

<sup>①</sup> 《俄国革命通报》或者《革命俄国报》的某个撰稿人看到我这样承认时也許会像已故的尼·米海洛夫斯基一样兴高采烈地大声喊叫道：“他們中間誰是真正的馬克思主义者尙待分辨。”这的确不是如此容易分辨的事，对于那些居然能够把对馬克思的无知变成自己世界观的主要特点的人說来尤其是这样。但是应当容忍这种情况。費·陀思妥耶夫斯基公正地說过：“只有习惯了的思想才是容易了解的。”社会革命党人的思想即屬此类。——著者注



至也离开了“馬克思主义”，換句話說，不仅离开了正确理解的馬克思的理論，甚至也离开了对这种理論多少庸俗化了的解釋，而我們社会民主党队伍中所謂強硬派同志們至今一直都坚持这种解釋。

下面我就要力图向你們說明这一点。不过我首先还要作一点評論。

在《論夺取政权問題》（《火星报》第九十六号）一文中，我提出自己的“历史证据”时对我的《前进报》論敌們說道：“假使您有任何一分钟設想，仿佛我們认为我們的证据可以說明一切問題，那就大錯特錯了。絕對不是这样。我們决不认为，我們應該在所有的問題上都盲目地模仿馬克思的榜样。”<sup>①</sup> 我的文章的这个地方使你們的小品文作者产生了这样一个想法：我自己感觉到我的立場的缺点。小品文作者写道：“他（即我。——格·普·）預先謹慎地声明說，他并不企图以自己的证据来把問題彻底弄清，——虽然他……，作出詳尽无遺的絕對結論”云云。<sup>②</sup> 总之，我的論敌深信，我之所以預先“謹慎地”声明，唯一的原因就是我意識到我对馬克思所作的解釋的确是錯誤的。我的論敌希望猜測我的心思；不过他的猜測并不使他博得馬克思主义者的荣名。的确，同志們，請想一想，难道我們每一个人不应当每时每刻都記住，哪怕我們只有一次承认，简单地指出馬克思的論断如何如何，指出 *magister dixit*<sup>③</sup>，就可以說明我們的理論上的和实践上的一切爭論，我們就会变成馬克思主义的可怜的学究和可笑的书蠹，我們就会根本上背叛自己學說的精神，就会有損于这个學說么？难道要了解当我写出上面所引的一段話时正是本乎这个考虑，竟是那么困难么？况且我还补充說过：“只有用心不良的或者愚蠢的人才敢于断言，‘正統的’馬克思主义者对自己的导师不容許任何批評。”<sup>④</sup> 难道这

① 參看本书第 152 頁。——譯者注

② 參看《列宁全集》第八卷第 439 頁。——譯者注

③ 老夫子如此說。——譯者注

④ 參看本书第 152 頁。——譯者注

不是明明白白的么？在我們对待馬克思的全部态度上需要有怎样的无知才会用我不相信自己的正确性來說明我的預先声明啊！哎呀呀，同志們，你們的小品文作者辯論的本領真不高明啊！

繼續往下說。这位小品文作者断言，我立意要恢复馬尔丁諾夫的名譽，并且不恰当地替他辯护。<sup>①</sup>在另一个地方他引证了我的話：“馬克思主义是一回事，馬赫主义又是一回事。”<sup>②</sup>以后用教訓的口吻指出：“馬克思主义是一回事，馬尔丁諾夫主义是另一回事。”<sup>③</sup>对于这一点我的回答是：你們的小品文作者自然有最充分的权利认为我的理由是不恰当的，但是他不应当过于經常地沉湎于自己的猜測心思的癖好。而他之理解所讀过的文章并不胜于果戈理的彼特魯什卡，則是尤其不应当的。早在民意党人主張革命家“夺取政权”的理論的时候，我就駁斥过这种理論了，如果我現在认为必須再次出来反对它，那完全不是因为希望替馬尔丁諾夫同志辯护，——他自己会替自己辯护，这是《火星报》第一〇二和一〇三号无可爭辯地证明了的，——而唯一是因为你們用自己对“革命专政”的解釋在恢复，而且是很不成功地恢复民意党人的阴謀家的旧偏見。我在我的《我們的意見分歧》一书（一八八五年一月出版于日内瓦）里从恩格斯的著作《Der deutsche Bauernkrieg》<sup>④</sup>中引证了一段話<sup>⑤</sup>，这段話說明还没有成熟到夺取政权的階級的代表如果采取这种政治行动，其后果是可悲的。馬尔丁諾夫在自己的小册子（一八九四年末出版）中也引用了这段話。我有根据认为馬尔丁諾夫正是从我的书里借用了这段引文。显然，这等于把我同你們的辯論說成是由于我简单地同情“馬尔丁諾夫主义”的結果，

① 參看《列宁全集》第八卷第 431、433 頁。——譯者注

② 參看本书第 182 頁。列宁的《論临时革命政府》并未直接引证这句话。——譯者注

③ 參看《列宁全集》第八卷第 437 頁。——譯者注

④ 《德国农民战争》。——譯者注

⑤ 參看《普列汉諾夫哲学著作选集》，三联书店一九六二年版第一卷第 379—380 頁。——譯者注

等于采取毫无根据的手法，这种手法甚至对于（而特别是对于）采取这种手法的人说来也是不方便的。因为要是我想仿效我的論敌的榜样，并且提出他**为什么**忽然硬要說我傾心于“馬尔丁諾夫主义”的問題<sup>①</sup>，那么我也許会想出这样一种答复：

“列宁曾經在自己的小册子《怎么办》中同馬尔丁諾夫爭論过。尽管他根本不善于暴露这位同志**当时**观点的弱点在什么地方，甚至他本人在其关于知識分子同工人阶级的关系的議論中經常文不对題乱說一气，但是他毕竟成功地反对过馬尔丁諾夫，說出了一些虽然略为粗笨、也不雅致、但是尖銳有力、甚得我国某部分不挑剔的讀者群众的喜爱的話，这些話大大地損害了他們对馬尔丁諾夫的看法，馬尔丁諾夫的名字对这部分讀者說来同所謂（用我們的拙劣的党内行話來說）**工人事业派**联結起来了。結果竟然弄到‘馬尔丁諾夫主义’一詞在这部分讀者身上开始产生了像‘稻草人’和‘金屬’两詞在奥斯特罗夫斯基的著名的商人妇身上产生的那种令人抑郁不欢的印象。于是列宁就利用了这种对他极其重要的情况，除了哲学問題以外，几乎每一个同志都要在这个或那个問題上同他发生分歧；在哲学上列宁甚至同經驗一元論者和平共处，——他現在大声疾呼：‘女士們，金屬！’……对不起，我的意思是說：‘同志們，馬尔丁諾夫主义！’于是因无知而胆怯的‘女士’便驚訝憤慨起来，他們叉手祈禱，悲戚地呻吟道：‘列宁老爷，行善的神父，积积德吧；你是我这个孱弱的、沒有經驗的女人唯一的希望，你瞧，这多么可怕啊！’于是行善的神父就来‘积积德’，他特別害怕某个心地慈悲的人向他的商人妇說明他的胆怯是何等的荒唐可笑。只要他觉得我們中間有什么人願意做这样一个心地慈悲的人，他就会再次拿起喇叭叫喊：‘稻草人，金屬！’于是他的商人妇就会再次心惊胆战，再次变得十分的痴呆，再次无依无靠地呻吟着。《无产者报》的編者就喜欢这种控制商人妇的方式；他們借口‘馬尔丁諾夫主

<sup>①</sup> 为了避免誤会起見，我要指出，在这个場合下，馬尔丁諾夫主义同我二十年前直到現在所理解的馬克思主义是完全一致的。——著者注

义’把我也給算进等闲之列去了。好狡猾！真是十足的馬基雅夫里派！”

再說一遍：对于为什么把我算作虛构的“馬尔丁諾夫主义”的同情者之列的这种答复无非是一种简单的可能性；假使我希望仿效你們的小品文作者的榜样猜測心思的話，它就会在我的脑袋里面产生。但既然我对于这等事情沒有癖嗜，那么我对这个问题的答复也就完全不同了。我认为《无产者报》其所以宣布我是“馬尔丁諾夫主义”的保卫者唯一是因为它笨拙，不善于辯論。我干嗎要去怀疑自己的論敌处心阴險呢？著作上的正直精神禁止我朝坏的方面去設想他的意图。我这才假定他虽然笨拙，然而心地純真。

……虽然叫声有些刺耳，  
但是到底不会喝酒……

馬尔丁諾夫究竟說了些什么呢？这位傳染上“馬尔丁諾夫主义”的同志說出了哪一些“金屬”呢？我的論敌是这样叙述这个问题的：

“馬尔丁諾夫在他有名的《两个专政》中首先提出了这个问题。他断定：如果我党以领导者身分参加起义，那么在胜利时，我党就必须参加临时革命政府，而这种参加在原則上是不能容許的，并且只能产生遭致灭亡和丢臉的結局。”<sup>①</sup>馬尔丁諾夫的观点被叙述得的确像要产生“金屬”了。有人认为我們党参加临时政府是不能容許的，因此他不願意它領導起义。好一个革命者！如果他希望貫徹到底，那他就应当告誡社会民主党千万別参加当代的革命运动。輕信的讀者就是这样对自己說的。他对“馬尔丁諾夫主义”充滿着高尙的仇恨，对它的所有“保卫者”充滿着有益的憤怒。但是問題也就在此：我的論敌在这里让自己稍微放纵了些，对于这点馬尔丁諾夫可以用涅克拉索夫的話喊道：

---

① 參看《列宁全集》第八卷第 430 頁。——譯者注

檢查官啊，你沒有翻改我的論文，

却翻改了我的靈魂！

請注意，馬爾丁諾夫根本沒有談到社會民主黨。倘若你們定要堅持的話，也可以說是有條件地談到社會民主黨，即他假定它從工人階級的政黨變成了陰謀家的秘密團體。正是對這個假定的“黨”，對這個背叛了自己固有的本性的社會民主黨，對這個秘密團體，他曾經說過：根據所有的陰謀家組織的習慣，它一定會力求在預先確定的日子裡號召起義，而且如果這個預先確定的起義成功了，那麼號召起義的陰謀分子就必然要把政權奪到自己的手上来，即必然要實現一切陰謀分子所幻想的行動，而這對革命往後的進程是會產生不利影響的。你可以看得出來，費多特不是這樣的，甚至根本不是這樣的，他甚至根本不是費多特<sup>①</sup>！如果要譴責像馬爾丁諾夫一樣有這種議論的人是傳播反革命思想，那麼也應當向我們的導師恩格斯提出這種譴責，因為他在說明布朗基的特點時寫道：“他在政治活動方面實質上是‘實幹的人’，這種人深信為數不多而組織得好的人既然力圖在順利的時刻發動起義，那麼，只要靠著自己最初幾次成功就可以把人民群眾吸引到自己方面來，這樣就能實現革命……根據布朗基把任何革命都看成是人數很少的革命者的 Handstreich<sup>②</sup>，自然應當得出成功以後必須實行專政的結論，不過這不是無產階級整個革命階級的專政，而是為數很少的人的專政，他們發動了起義，而且早就預先組織在一個或幾個人的專政的權力之下了。”<sup>③</sup>恩格斯補充說：“你們可以看得出來，布朗基是老一輩的革命家。”<sup>④</sup>但是他立即預先聲明說，法國的布朗基主義者至今（這是恩格斯在一八七四年寫的。——格·普·）仍然承認那個基本原則：一般說來革命不是自然形成的，而是人為的；人數比較不多的少數人按照預先擬定的計劃製造出革命；最後，它可

① 這裡的意思是說：列寧歪曲了馬爾丁諾夫的观点，把它弄得面目全非。——譯者注

② 爆發。——譯者注

以在任何时候“迅速地开始”。<sup>⑤</sup>

巴黎公社以后，当时在倫敦过着流亡生活的法国布朗基主义者既然持这种看法，自然变成了（按照恩格斯的意見）“流亡者所固有的一切自我陶醉行为的毫无援助的牺牲者”<sup>⑥</sup>。

尊敬的同志們，你們怎么会认为《前进报》借口向馬尔丁諾夫发动了企图使之成为激烈可怕的东西的那些攻击的这个真正的“馬尔丁諾夫主义”不是这样的呢？依我看来，就是这样的。依我看来，恩格斯对布朗基主义所做的說明很像馬尔丁諾夫对列宁的策略概念所做的說明。如果我是对的（讀者会看到：我是对的），那么对于你們这些《无产者报》同志們來說就只有从两条路中选择一条了：要么承认自己对馬尔丁諾夫的攻击是没有根据的，而他對你們的策略的批評是正确的，要么就再次恐吓自己的商人妇和再次号叫：“金屬！”不过这一次是針對着恩格斯本人。請选择吧。

不过，在选择的时候你們这些譎怪異常的人也喜欢仿效海涅所叙述的那种人：他被判处死刑；当人們問他願意击毙呢还是願意吊死时，他却回答說：“我宁願喝牛奶。”我知道，你們也宁願喝“牛奶”；你們会着手证明：恩格斯說的完全是跟馬尔丁諾夫不同的另外一回事；《反杜林論》的作者实际上也是很贊成阴谋家的 Handstreich 和阴谋家的专政的，——一言以蔽之，他也是“强硬派”。我在第九十六号《火星报》上发表的文章促使你們“宁願喝牛奶”。現在我請你們賞光尝尝这盘营养丰富的菜肴。

且回顧一下从什么地方“开始”的。在《前进报》（第十四期）上我遇到以下一段放肆的冗长的話：

---

③④⑤ 恩格斯：《流亡者的文献》第二篇《公社的布朗基主义流亡者的綱領》。參看《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論巴黎公社》人民出版社一九六一年版第 275、276 頁。文字有出入。普列汉諾夫在《我們的意見分歧》第一章第一节中也引证了这段話。——譯者注

⑥ 《Internationales aus dem Volksstaat》（《人民国家报》国际論丛）（一八七一——一八七五），柏林一八九四年德文版，第 41—42 頁。——著者注（參看上书第 276 頁。——譯者注）

“只有像小学生那样了解历史的人，才能把事情想像成緩慢而均匀的、沒有‘飞跃’的上升的直綫：先是自由派大資產階級爭取专制制度退让，然后是革命小資產階級爭取民主共和国，最后是无产階級爭取社会主义变革。这幅图景一般和整个說来是正确的，像法国人所說，‘从长远看来’，从整整一个世紀（例如，法国从一七八九年到一九〇五年）的期間看来，是正确的，但是只有庸俗透頂的人才會按照这幅图景来制定自己在革命时期的活动計劃。”<sup>①</sup>

我在回答这段冗长的話的时候說道，馬克思在一八五〇年初写的告共产主义联盟盟員“书”中恰恰把这个过程看成是緩慢上升的直綫：起先，一八四八——一八四九年的运动使自由資產階級夺得政权，他們从专制制度那里取得“让步”以后暴露了同封建党派联合起来进行反对新的革命企图的决心，但是他們的努力沒有什么結果：迅速来临的新的革命把統治权交到民主派小資產階級手中，在同这个小資產階級的斗争中，**工人階級**应当走向自己本身的**共产主义革命**。我从这里作出了一条必不可免的結論：如果放肆的報紙的放肆的政論家是正确的，那么科学社会主义的奠基人应当归入“庸俗透頂的人”，他們的历史观点就应当承认是“小学生式的”。

你們的小品文作家反駁我的結論，称它是沒有证据的。

他問道：“证据何在呢？证据就是：在一八五〇年，当德国的革命人民在一八四八——一八四九年的斗争中遭到了失敗，未能粉碎专制制度的时候，当自由資產階級已經获得了一种残缺不全的宪法并投到反动派方面去的时候，——总之，当德国的民主主义革命运动仅只上升到第一个梯級就停住了，再也无力上升的时候，正是在这时候……馬克思說过，新的革命高潮将是向第二个梯級上升的高潮。讀者們，你們觉得可笑吧？的确，普列汉諾夫的三段論法，是有点……（怎么說得客气一些呢？）……‘辩证’味道。因为上

<sup>①</sup> 参看《列宁全集》第八卷第 269 頁。——譯者注

升到第一个梯級以后接着便是向第二个梯級的上升这句话，是馬克思在具体民主革命中相应的具体关头說的，所以只有馬克思的‘批評者’才会把那些用一下子跃过（在特別成功地組織和实行起义时）两个梯級的可怕前途来恐吓我們的人称为庸人。”<sup>①</sup>

我故意作出很长的摘录，因为短了就不可能抓住我这位挖苦人的作者的思维的全部独特面貌。請切实地想一想引文的前一部分：“当德国的民主主义革命运动仅只上升到第一个梯級就停住了，再也无力上升的时候，正是在这时候……馬克思說过，新的革命高潮将是向第二个梯級上升的高潮。”怎样理解这句话呢？試問，如果上升到第一个梯級的运动不是“由于无力而停住了”，难道那时馬克思不会說新的革命高潮将使德国人民走上第二个梯級么？多么奇怪的邏輯啊！可以毫不夸大地說，在这里沒有任何一点辯证法的味道，不管是不是带括号的辯证法！它会把讀者弄得根本莫名其妙。但是就在这里，这段冗长的引文的第二部分就搭救了<sup>②</sup>他。

馬克思的确說过上升到第一个梯級以后接着便是向第二个梯級的上升这句话。但是他在具体民主革命中相应的具体关头这样說的。因此，当我从这里作出結論說，只有馬克思的批評者才能认为害怕云云的人是庸人时，我的三段論法的結構就是糟糕的。

現在根据我的有才智的論敌的意見才明白我的錯誤何在。也才明白为什么在我摘录的这段引文的前半段中指出一八四八——一八四九年的革命运动上升到第一个梯級以后由于軟弱无力便停住了：如果它更强大，那么它就会一下子跳跃到第二个梯級上去。自然，在运动停住以后，馬克思是清楚地看到这种軟弱无力的。但是在可悲的事件发生以前馬克思可以指望事件朝更坚决的道路前进。因此，在一八四八年革命的前夕，他本人大概幻想过一下子跃过两个阶段，他本人也大概会把认为一个一个梯級逐步过渡是比較正常的和比較有利于革命事业的人，看作是庸俗透頂的人。一

① 參看《列宁全集》第八卷第433頁。——譯者注

② *выручать*——双关詞：搭救、出賣。——譯者注



句話，可以认为在一八四八年以前馬克思以全部精力力求做德国的列宁，并且只有在这次革命“由于軟弱无力便停住了”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奠基人不得不对自己說“很想进天堂，但是罪孽放不过”的时候才放棄了这个最高的理想。

这对列宁說来……是很好的和很愉快的。但是不幸就在这里。我希望，你們这些尊敬的同志們不是不知道的同一个馬克思的著作，《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会使这种愉快心情失去任何严正的根据。

在这本著作中我們讀到：

“在第一次法国革命中，立宪派統治以后是吉倫特派的統治；吉倫特派統治以后是雅各宾派的統治。这些党派中的每一个党派，都是以更先进的党派为依靠。每当某一个党派把革命推进得很远，以致它既不能跟上，更不能领导的时候，这个党派就要被站在它后面的更勇敢的同盟者推开并且送上断头台。革命就这样沿着上升的路綫行进。一八四八年革命的情形却剛剛相反。当时无产阶级的政党是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附屬物。后者背叛了它，并使它在四月十六日、五月十五日和六月的日子里遭受了失敗。民主派又全靠资产阶级共和派双肩的支持。资产阶级共和派还没有感到自己站稳脚跟，它就把这个麻煩的伙伴拋棄，自己又去依靠秩序党双肩的支持。但是秩序党聳了聳肩膀，抛开资产阶级共和派，自己赶忙站到武装力量的双肩上去；它还一直以为它是坐在武装力量的肩膀上，却忽然有一天发现肩膀已經变成了刺刀。每个党派都向后踢那挤着它向前的党派而向前伏在挤着它后退的党派身上。无怪乎它們在这种可笑的姿态中失去平衡，并且装出一副无可奈何的鬼臉，奇怪地跳几下，就倒下去了。革命就这样沿着下降的路綫行进。二月革命的最后街垒还没有拆除，第一个革命政权还没有建立，革命就已經这样开起倒車来了。”<sup>①</sup>

① 《雾月十八日》，勃·克里車夫斯基的譯本，第33—34頁。——著者注〔參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八卷第145—146頁。——譯者注〕

在十八世紀末期偉大的革命中，运动从一个梯級上升到一个梯級。这种情况使得它完成了最有益的历史工作。二月革命一下子跃过了几个梯級……然后沿着下降路綫行进，而参加这次革命的各党派則做出了可笑的姿态，开始向后退，失去了平衡，倒下去了，抽起筋来，扮出一副鬼臉。多么可悲的景象啊！多么扫兴的事变进程啊？它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是由于当时资产阶级社会的各个組成部分的部署。这种部署对革命是不利的，它决定了革命的軟弱无力。难道不是这样么？自然是的。假若是如此，难道那些以为“一下子”上升“几个梯級”就证明革命运动的力量的人不是錯了么？难道他們不是迷醉于过去的偏見么？难道他們不是“老一輩”的革命者么？很像是这样。

現在要問：我們有沒有权利认为，甚至在一八四八年爆发前夕馬克思曾經认为临来的革命运动注定要遭到半途而廢的結局，像这位历史学家心目中所描繪的一样呢？否，我們沒有这种权利。恰恰相反，《共产党宣言》证明，馬克思像当时所有的共产主义者一样，对就要来临的革命的力量充滿着蓬勃的信心。法国政党的“可笑的姿态”在当时的馬克思主义者看来乃是令人失望的意外情形。他們对于革命运动的条件和进程的了解，据恩格斯的证实，是以过去的历史經驗为依凭的，特别是以法国大革命的經驗为依凭的<sup>①</sup>。由此可以明白，当时他們正是认为事变的进程会从一个梯級上升到一个梯級，而不会一下子跃过几个梯級，这在他們看来乃是可能的，自然也是合乎願望的。

但是，根据《前进报》的权威裁决，这样的了解仅仅是庸俗透頂的人所固有的。因此，科学社会主义的奠基人屬於庸人之列。此证。

現在再往下讲。为什么我們在法国大革命中所看到的那个运

---

<sup>①</sup> 参看恩格斯为馬克思的著作《一八四八年至一八五〇年的法兰西階級斗争》写的序言，一九〇三年日内瓦俄文版，第6—7頁。——著者注（参看中譯本第5頁。——譯者注）

动过程保证了逐个依次出現的多少进步的党派进行最有益的历史工作呢？这从馬克思本人的話中可以明白。在还没有达到第一个“梯級”的时候，即将在达到这一梯級时占統治地位的党派曾經把自己的主要力量用来同旧制度作斗争，而不是用来使它所依靠的更进步的党向后退。因此它的工作获得了肯定的意义，而不是否定的意义。至于更进步的党派，虽然它們一开始同溫和的革命分子进行了或多或少的殘酷斗争，但是他們的斗争推动了这些分子前进，从而大大有助于破坏旧制度的事业。但这还不是一切。他們同溫和分子的斗争充实了他們自己的革命經驗，扩大了他們自己的革命观点，推进了他們自己的革命教育，从而使他們容易解决他們自己的革命任务。所以他們的这一斗争不仅扩大了革命运动的規模，同时給了它新的力量。所以指望跃过中間的梯級的策略，同自己的所謂革命性的外表相反（无政府主义的策略在外表上更要革命一些），实质上远不是像你們——尊敬的同志們——以为是庸俗透頂的人的那些人的与此相反的策略那样革命的。所以团結在《前进报》周圍的同志們，而現在則团結在《无产者报》左右的同志們，同团結在《火星报》周圍的同志們比較起来，乃是“老一輩的革命者”。这是不能（用德国話說）wegschwätzen<sup>①</sup>的事实。請不要以为我偏袒《火星报》的拥护者。一点也不偏袒！他們有許多的缺点。他們的組織观点糟糕透了。但是他們的策略比“强硬派”的策略要好得无法比拟。

但是书归正傳吧。除非馬克思产生了这样一个极端荒謬的信念，說沿下降的路綫运动比沿上升的路綫运动更有益于革命事业，因而也更合乎革命者的願望，那时他才能預先幻想“一下子上升两个梯級”。請記住这个結論，并且听听我的了不起的論敵的話。

他繼續道：“馬克思在其著名的《告同盟书》中根本没有涉及无产阶级参加临时革命政府在原則上是否可以容許的問題。馬克思

---

① 用空話搪塞过去。——譯者注

只是研究了一八五〇年德国的具体形势。馬克思当时之所以只字不談共产主义者同盟参加革命政府的问题，是因为在当时的条件下，甚至不可能产生以工人政党名义为了民主专政的目的而参加革命政府的思想。”①

然则为什么不可能呢？因为当时德国无产阶级的力量软弱。我的論敌是这样认为的。他說：

“在革命时期的两个年头里，馬克思公开出版了工人政党的最革命的报纸达九个月，在这以后他不得不认定：工人政党完全解体，在总的潮流中完全没有多少明显的无产阶级水流……无产阶级不仅完全落到受资产阶级支配的地位，而且落到受资产阶级领导的地位！显然，当时经济关系还很不发达，几乎没有大工业，没有任何规模稍大的独立工人运动，小资产阶级独占统治地位。不言而喻，在这样的条件下，了解具体形势的作家，甚至根本不能去想工人政党参加临时政府的可能性。”②

很好，或者至少是很明白。现在我們且看看有一个人关于当时共产党人对当时无产阶级的希望說些什么話，这个人本身就同情这些希望，并且在当时的工人运动中本身就起过十分杰出的作用。

恩格斯指出，即使稍微懂得无产阶级解放运动可能在怎样的条件下发生的人甚至在一八四八年的巴黎也是屈指可数的，然后他继续說：“然而运动终究是已经存在着——这是本能的、自发的和不可抑止的运动。难道这不正是保证革命——虽然是由少数人所领导，但这一次已不是为了少数人的利益，而是为了多数人的真正利益进行的革命，——一定要获得成功的形势嗎？”不錯，这些話只是表現和說明馬克思和恩格斯在一八四八年前夕的心情。但是請費心往下念：“从一八四八年‘社会’革命中产生的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发展，到一八五〇年春季（即到写作成为我們爭論的根据的《告同盟书》的那个时候。——格·普·）已使实际統治权集中于大资产

① 參看《列宁全集》第八卷第437頁。——譯者注

② 同上，第436頁。——譯者注

階級掌握，並且是集中于懷有君主主義思想的大資產階級掌握；反之，所有其他的社會階級，即農民和小資產階級，則已團結到無產階級周圍，因而在共同勝利時和在共同勝利後，應該成為決定因素的**不是他們，而是已經充分受過經驗教訓的無產階級**。難道在這些條件下，還不可以完全期望少數人的革命變成多數人的革命嗎？”<sup>①</sup>

《無產者報》的小品文作者硬說，當時**不可能相信無產階級的力量**。反之，恩格斯則斷言，當時**不可能不相信這些力量**。<sup>②</sup>誰說得對呢？

也許有人會對我說（在我的論敵的這篇小品文以後什麼都可能發生），我引用的地方講的是法國，而不是德國。不過情況並不如此。恩格斯只是從法國生活中借用了一些例子來說明自己的思想，他對共產黨人的心情所作的描述**不只是針對法國而言**，這一點從往下一段話中可以看出來：“歷史沒有證實我們的期待和所有同情我們的觀點的那些人的期待。它表明，**大陸經濟的發展還遠沒有成熟到足以鏟除資本主義**。”<sup>③</sup>

很明顯，我的小品文作家定然確凿無疑地失算了。

同一個思想可以用另一種方式來證明。請回憶一下馬克思在自己的《告同盟書》中向德國無產階級提出什麼樣的綱領。他建議他們（他認為自己完全能夠這樣做），第一，迫使民主派用革命的方式干預現存的社會關係，第二，推動這些只想實行社會改革而不想進行社會革命的民主派前進。簡言之，馬克思認為（並且直接指出），德國無產階級已經成熟到可以**不斷地進行革命**，鋪設一條通向無產階級專政的很短的道路。因此他似乎可以給自己提出無產階級參加小資產階級專政的問題。倘若他不曾這樣做，則其原因

---

① 參看恩格斯為馬克思的著作《一八四八年至一八五〇年的法蘭西階級鬥爭》寫的序言，一九〇三年日內瓦俄文版，第9—10頁。——著者注（參看中譯本第8頁。——譯者注）

② 着重號是我加的。——著者注

③ 同上，第10頁。着重號仍然是我加的。——著者注

唯一在于，連想一想可能作这类参加也是他所不允許的。

当我为《火星报》第九十六号写社論的时候，我很懂得（这是不言而喻的事），我对《告同盟书》所作的引证，無論按其实质說来多么令人信服，永远可以用法国人在說明“形势”变化时称之为 *une fin de non recevoir*<sup>①</sup> 的理由来加以反駁。誠然，我不曾容許像我的論敌所做的那样把类似的說明弄得如此怪誕无稽。然而我毕竟預見到了形势的变化，因为我清楚地記得米勒兰主义者在同盖德主义者爭論时的論据，因此我从恩格斯致屠拉梯的信中引证了一段話預先防止了这种說明。这封信是一八九四年写的，即当“形势”根本不同于一八四八年的“形势”时写的；而且关于不允許无产階級参加小資产階級政府的思想在那里是作为一般的策略原則說出来的，这种策略原則对于工人階級还没有成熟到可以自己实行专政的所有那些国家都同样适用。我的小品文作家在回答我这段引证时說道：“从普列汉諾夫对这封信的叙述中可以看出（可惜，普列汉諾夫沒有引用这封信的全文，也沒有指出，这封信是否发表过和究竟发表在哪里），恩格斯那时必須向屠拉梯证明社会主义革命与小資产階級革命之間的区别。”<sup>②</sup>

在恩格斯逝世后，他給屠拉梯的这封信立即就刊登在《*Critica Sociale*》<sup>③</sup> 上；后来它作为附录出现在其中收有恩格斯的著名論文《*Umrisse zu einer Kritik der politischen Oekonomie*》<sup>④</sup> 的譯文的小册子《*Economica politica*》<sup>⑤</sup> 上，后来在“社会主义中的危机”所引起的論战时期考茨基在《*Neue Zeit*》<sup>⑥</sup> 上引证过它。它可以說是已經尽人皆知了；这是一篇說明科学社会主义奠基人对革命无产階級策略的观点的极其重要的文件，即恰恰是說明《前进报》开

① 法律用語，直譯是“拒絕合法地辦理訴訟案件”。——譯者注

② 參看《列宁全集》第八卷第440頁。——譯者注

③ 《社会批評》。——譯者注

④ 《政治經濟学批判大綱》。——譯者注

⑤ 《政治經濟学》。——譯者注

⑥ 《新时代》。——譯者注

始同《火星报》进行爭論的那个問題的观点的文件，而我的了不起的論敌却只是从“普列汉諾夫的叙述”中知道它的！尊敬的同志們，請說說，究竟从什么时候起——和你們自然知道的公理相反——无知获得了論据的意义呢①？但是这还只是一段引子，好戏却在下面。小品文作者繼續說道：“屠拉梯是意大利的米勒兰，是伯恩施坦主义者，乔利蒂曾請他在自己的內閣中担任部长。”②就算这样吧！但是当恩格斯写这封信的时候，誰也沒有听到过关于什么伯恩施坦主义者的話，而屠拉梯乃是最忠实的和最革命的馬克思主义者。这同部长职位有什么相干，这同乔利蒂有什么相干呢？小品文作者显然不了解十年以前国际社会民主党曾經处在怎样的环境下。然而这太岂有此理了。社会民主党的出版物达到这样的“水平”是不能允許的。

小品文作者想对我的“辯证法”說几句挖苦話。我現在却毫不挖苦地想起的并不是黑格尔的辯证法，而是謝林的“自乘法”。《无产者报》的小品文作者同志所固有的无知，在自己每一次客观化以后就自乘一次，换言之就是提高到更高的“梯級”，有时还“一下子提高几个梯級”。为什么“自己”这样看呢？因为他手里現在“集中了”如此多的权力！

不过我們还是来看信。那里說道：“法国社会民主派犯了錯誤”，他們在临时政府中担任了职务。“作为政府中的少数派，他們心甘情愿地为純系共和主义者組成的多数派对工人階級作出的一切无耻行为和叛卖变节担負責任。同时，他們加入这种政府就会完全麻痹工人階級的革命活动，而在那里这些先生們都自命为代表工人階級的。”③这本身就已經够有教育意义了。但是还請注意，这里所說的“形势”和列宁所断定的一八五〇年德国的那种形势完全不相像。一八四八年二月运动并不是“軟弱无力”的，当时

① 无知不是证据，語出斯宾諾莎，由于已成为众所周知的名言，故云。——譯者注

② 參看《列宁全集》第八卷第440頁。——譯者注

③ 參看《馬克思恩格斯书信选集》第523頁。——譯者注

法国无产阶级完全陶醉在胜利之中，他们充分地认识到自己的强大力量。但他们的代表毕竟（按照恩格斯的意见）犯了错误，参加了临时政府。显然，引证一八五〇年德国“形势”的独特性质是完全没有根据的，这只能说明，做这种引证的小品文作家本身就处在左右为难的“形势”下，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反驳我的“历史证据”。

其次，正如我在《火星报》上已经说过一样，恩格斯不仅劝告意大利的社会党人不要参加小资产阶级革命政府。他不仅在这里引证一八四八年法国“社会主义民主派”的事例。他还用一般的策略见解来证实自己的劝告。这些见解的正确性，用他的话来说，已经由他的全部生活经验证明了，它们一次也没有使他犯过错误。这已经不是永远可以拿另一种“形势”与之对抗的“形势”了，而恰好是一般的原则，自然这原则可以批评（这是我在自己的论文中也乐意地承认过的），但不能借口“形势”而“用空话搪塞过去”。现在请来评判我的论敌的政治上的灵活性吧，他恰恰“在这个地方”转入攻击，他宣称道：“如果他〔按指普列汉诺夫。——译者注〕认为无产阶级在为共和制度而斗争的时候，即在民主主义变革的时候，任何一种参加革命政府都是根本不能容许的，那末我们就可以向他证明，这是恩格斯所痛斥过的无政府主义的‘原则’。”<sup>①</sup>

真是越来越糟！起先我替“马尔丁诺夫主义”“辩护”，现在又堕落成了无政府主义者。我的小品文作家原来还是一名喜剧演员呢！要是无政府主义者知道加在我头上的是怎样一种不可思议的责难，真会笑话的！

然而最叫人惊讶的是我的论敌希望利用连听也不愿意听无产阶级参加小资产阶级革命政府的话的同一位恩格斯来驳倒我。《无产者报》的令人叹为观止的小品文作家没有料到，倘若他果然证明了自己的论题，他因而也就证明了恩格斯宣传他这位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最坚决地谴责过的”无政府主义原则，真是无奇不

---

① 参看《列宁全集》第八卷第441页。——译者注。



有！果戈理談到諾斯德列夫時說：“这个人根本不知道怀疑。”我的傳教師也根本不知道怀疑。諾斯德列夫由于自己这种品性，“撒出了”种种惊人的“謊話”。《无产者报》的小品文作家撒出的謊話也是同样惊人的，要不是更惊人的話。

在自己的論文《Bakunisten an der Arbeit》<sup>①</sup>中，恩格斯狠狠地嘲笑巴枯宁的後繼者們，这些无政府主义者在一八七三年西班牙革命事变时期干下了許多愚蠢行为。他指明，西班牙的巴枯宁主义者用自己的行动違反了自己固有的原則，而凡在他們仍然忠实于这些原則的地方，他們就只是用自己的彻底性削弱了自己本身的力量。当西班牙宣布成立了共和国的时候，还談不到立即完全解放工人階級，因为这个国家的經濟关系太不发达了。为了使得工人階級的完全解放成为可能，恩格斯說，西班牙应当通过各种准备的发展阶段和鏟除擋在社会主义革命道路上的一系列的障碍。在社会主义者看来，最好的場合是利用共和国来縮短通过这些阶段的时间 and 加速鏟除这些障碍的过程。但是要利用宣布成立共和国来达到这一目的，必须具备一个必要的条件，即西班牙无产阶级坚决地干預自己国内的政治生活。当时无产阶级已經認識到了这点；他們到处都力求积极参加正在发生的事变。在这种局势下，領導西班牙工人运动的国际工人协会应当采取怎样的策略呢？它应当尽一切力量促使无产阶级作为积极的和独立的政党出現。假使国际西班牙支部沒有处在巴枯宁最强大的影响下，他們是会这样行动的。这种影响妨碍了国际协会的西班牙會員选择正确的行动方式。恩格斯十分詳細地描述了西班牙的巴枯宁主义者在当时事变中被迫所起的那种可悲的作用，并且得出了以下的結論：

“(一)巴枯宁主义者一經遇到严重的革命形势，就不得不拋棄他們先前的整个綱領。首先，他們牺牲了以不參預政治特別是不参加选举为职責的理論。接着牺牲了无政府主义，即廢除国家；他

---

<sup>①</sup> 《巴枯宁主义者动起来了》。——譯者注

們不去廢除國家，而致力於建立許多新的小國家。然後，他們拋棄了工人不應該參加任何不以無產階級的立即的和完全的解放為目標的革命這個原則，而參加了一個明明白白是純粹資產階級的運動。最後，他們以下述的行徑拋棄了他們剛剛宣布的教條，即建立革命政府只是對工人階級的一種新的欺騙和新的出賣行為：他們十分滿足地參加了各個（起義的——格·普·）城市的政府委員會，並且差不多在每一處都成為一個被資產階級的票數所壓倒和在政治上被利用的軟弱無力的少數。

（二）但是對於以前所宣布的原則的這種背棄，是以最怯懦和最虛偽的形式，並且是在有愧良心的重負下作出的，所以無論巴枯寧主義者們自己或者是他們所領導的群眾，都是沒有任何綱領或者完全不知道他們究竟想要些什麼就參加了這個運動的。自然的結果是什麼呢？巴枯寧主義者或者是阻礙了每一個運動，如在巴塞羅那；他們或者被迫而發動孤立的、無計劃的、愚蠢的暴動，如在阿爾柯和桑·路卡·德·巴拉米達；或者是暴動的領導權落到不妥協派的資產階級手中，如在差不多所有的暴動中那樣。所以，一旦行動的時候到來，巴枯寧主義者的極端革命的叫囂，就具體化為阻撓的行動，或者是事先就注定要失敗的暴動，或者是和一個使工人受到極端可恥的政治利用並且把他們踢來踢去的資產階級政黨沉淪一氣。

（三）無政府、獨立團體的自由聯合等等‘偉大的’原則，都蕩然無存了，剩下的只是對革命鬥爭的力量的無節制、無理由的分散消耗，這使得政府得以用少量的軍隊把一個又一個城市鎮壓下去而差不多不會遇到什麼抵抗。

（四）這一段故事的結局是：不僅組織良好和人數眾多的西班牙的國際——偽的和真的都一樣——被不妥協派的崩潰所牽累，現在實際上又已經解体，而且有無數虛構的暴行記在它的名下——沒有這無數虛構的暴行，一切國家的俗物們簡直就無從想像工人的暴動；而且因此，西班牙無產階級要在國際規模上重新組

織起来，在未来的若干年内也許是不可能的。

(五)总而言之，巴枯宁主义者在西班牙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不应当怎样进行革命的无可倫比的例子。”①

现在我請即使对什么是巴枯宁的学說只掌握最起碼的知識的讀者告訴我，这些結論同使我们发生兴趣的問題有什么关系，而且它們在怎样的程度上证实了我的論敌的观点。我肯定认为，它們同我們的爭論只有一种关系：就是它們告訴我們，社会党人以少数派資格参加資產階級革命政府不仅是可笑的和沒有作用的，而且簡直是不能容許的，因为这就使得資產階級有可能从政治上剝削无產階級的代表。不过請不要以为这个結論会使我不安。我要說的恰恰就是这个意思。依我看来，社会民主党人参加資產階級政府(或者說参加小資產階級政府，这反正一样)，一般說来只能以少数派的資格，因为如果他們是多数，則政府就成了无產階級的，而不是資產階級的，那时摆在他們面前的就完全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問題了。但是《前进报》坚决地采取这样的观点：我們所面临的革命，說得更正确一些，已經开始了的革命，現在并不具有无產階級的性质，而是具有資產階級的性质。它的一位政論家在反駁帕尔烏斯时写道：

“目前俄国无產階級在俄国人口中还是少数。它只有和半无产者、半小业主群众，即和城乡貧民小資產階級联合起来，才能成为絕對多数。我們所希望的和可能的这种革命民主专政的社会基础的成分，自然要反映到革命政府的成分上，使革命民主派中形形色色的代表必然要参加这个政府，或者甚至在这个政府中占优势。”②(《社会民主党和临时革命政府》，《前进报》第十四期)

这些議論的确使人想起恩格斯对巴枯宁主义者的嘲笑。《前进

---

① 《Internationales aus dem Volksstaat》(《人民国家报》国际論丛)，柏林一八九四年版第32—33頁。——著者注(參看《馬克思恩格斯論西班牙革命》，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九年版第187—188頁。——譯者注)

② 參看《列宁全集》第八卷第261頁。——譯者注

报》政論家要求社会民主党人参加革命政府，即使政府中占优势的是“革命民主派中形形色色的代表”即小資產階級也好，即使这些“半小业主”不願意也不可能接受社会主义无产階級的观点也好。不过他恰巧忘記告訴我們，在这种場合下我們怎样才能避免西班牙的巴枯宁主义者的可笑而且可悲的处境，亦即怎样才能不会受多数派的控制，才不会受到政治上的剝削，才不致受到“形形色色的”小資產者的拳打脚踢。他大概深信，如果“自己”进了政府，就会完全“控制”“半小业主”的政治代表。不过这种信念（如果它存在的话），只是以对“自己”的魔术般的力量信仰为依据的，并没有为任何理由所证实。因此我有充分的根据不支持它，并且在指出参加資產階級政府的西班牙巴枯宁主义者的例子以后对自己的同志們說：“請記住：不应当这样进行革命。”

指出这一点的确是十分适宜的。但是这种适宜性并不决定于我們的观点，而是取决于現在的《无产者报》所保卫的《前进报》的观点。至于恩格斯的其他結論，它們根本不适用于我和同意我的观点的那些同志。难道我們什么时候宣傳过工人的政治节制么？难道我們說过应当消灭国家么？难道我們曾經认为无产階級不应参加不会使他們立即获得完全解放的那些革命么？最后，难道我們什么时候断言过建立革命政府是对工人的欺騙和对他們事业的背叛么？任何这一类的东西，即使沾一点点边也好，我們都沒有宣傳过，也沒有說过，也沒有认为过，也沒有断言过。倘或我的論敌竟然把我們的观点同西班牙巴枯宁主义者的观点混为一談，那么造成这种現象的唯一原因就是他的、自己固有的无知的……自乘法。

当恩格斯說就在他描述的事件以前不久有人鼓吹无政府主义信条时，他指的是什么人呢？要是我的論敌知道这一点，他就不会把我比作无政府主义者了。既然他不知道这一点，我就来告訴他真相何在吧。

自从巴枯宁做了国际工人协会的會員以后，他拚命地在工人大会和工人報紙上宣揚了无产階級不干預政治的原則。这种說教

阻碍了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发展；因此马克思认为必须向第二届伦敦代表会议（一八七一年九月）提出一项决议，指出国际工人协会的纲领承认政治斗争是工人阶级取得经济上的解放的一种手段。其次，决议指出了，无产阶级不但必须自己进行政治斗争，而且还必须支持有助于使他们达到自己最终目的的一切政治运动。可以看得出来，这项决议只不过重申了《共产党宣言》中已经说过的话。但是正是这一情况使巴枯宁主义者找到了一种借口，叫嚷马克思把自己本身的政治观点强加在国际头上。伦敦代表会议通过的马克思的决议，遭到了巴枯宁主义者的深恶痛绝，于是关于无产阶级政治任务的问题重新提到海牙国际代表大会上去了。大家知道，在海牙，马克思主义者和巴枯宁主义者之间发生了一场壁垒分明的大会战。和伦敦代表会议比较起来，海牙代表大会更加尖锐地谴责了政治节制原则。根据瓦扬的提议，代表大会通过了下述决议：“工人阶级在自己的解放斗争中，只有在他们团结为一个同有产阶级建立的一切旧党派相分离和对立的特殊党派的情况下，才能作为一个阶级行动。工人阶级这样团结为政党是社会革命的胜利和达到它的最終目的即消灭一切阶级所需要的。工人阶级在自己的经济斗争中已经达到的力量的团结，同样应该成为他们反对土地占有者和资本家的政权的斗争的杠杆。在工人阶级所进行的战争中，经济运动和政治行动是不断结合着的。”<sup>①</sup> 不言自明，这项决议和以前的决议一样，是不合乎巴枯宁主义者的口味的。在圣提米耶（一八七二年九月）的巴枯宁主义者的代表大会上通过了一项决议，决议声称：“任何组织所谓临时的或者革命的政权的行动都无非是一种欺骗，它和一切现存的政府一样对无产阶级会是危险

---

①（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巴黎公社》，人民出版社一九六一年版第263页。——译者注）顺便指出，这恰恰是我在同经济主义者争论时发挥过的同一个思想（参看我的论文：《再论社会主义和政治斗争》，收载在论文集《在两条战线上》中）（见《普列汉诺夫全集》俄文版第十二卷。——译者注），这个思想在经济主义者看来是不够无产阶级的。——著者注

的。”西班牙的巴枯宁主义者在恩格斯的論文所談到的那些事件的前夕，发表了精神完全相同的言論。当这些事件开始发生的时候，他們的行动則完全另一样了。他們不但支持了“不妥协派的”资产阶级民主派在西班牙起义的“各县”中的革命政府（“委员会”），而且自己也出席了这些“委员会”。这是一个惊人的矛盾。恩格斯曾經指出过和嘲笑过这个矛盾。当时，不久前国际内部的分裂对他还记忆犹新。但是恩格斯的嘲笑同我和我对社会民主党人参加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的看法有什么相干呢？要知道圣提米耶通过的決議所指的不是参加这件事。決議是用无政府主义者的旧皮囊装上了这样的新酒：政治革命不可能是无产阶级經濟解放的手段；它譴責了馬克思主义者所理解的无产阶级专政和这个阶级所有一般的政治活动。和它針鋒相对的就是我們已經知道的海牙代表大会的決議，而完全不是关于无产阶级代表可以钻进临时革命政府而不致陷于錯誤的境地的思想。这种思想，正如我們已經看到的一样，受到了恩格斯绝对肯定的駁斥，必須有我的論敌的全部令人叹为观止的无知才会从《Die Bakunisten an der Arbeit》中發現它。

在恩格斯看来，他談到的所有那些地方起义都完全是荒謬的，沒有任何重大的目的，只代表西班牙小资产阶级某一部分人最微小的利益。他认为，如果西班牙无产阶级不干预这种起义，他們的行动会更合理得多。按照恩格斯的意見，工人应当支持庇·依·馬戈尔的內閣，因为这个內閣答应向他們实行一系列为社会革命开辟道路的社会改革。恩格斯指出：“然而巴枯宁主义者认为自己的职责在于拒絕采取甚至最革命的措施，如果这些措施是由‘国家’提出来的話，他們宁願支持不妥协派中間不顾一切的欺詐之徒，而不願支持一个內閣总理。”<sup>①</sup> 这些話清楚地說明他本人对于在当时情况下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应该怎样行动的看法：支持部长比同不顾一切的资产阶级的欺詐之徒一起从事政治冒險好些。如

---

① 參看《馬克思恩格斯論西班牙革命》第173頁。——譯者注

果我的論敵希望把我的意見同科学社会主义奠基人之一的权威論点对立起来，那么他首先應該考虑恩格斯的这个观点，并且問問自己：它是不是意味着无产阶级的代表不仅可以支持庇·依·馬戈尔，而且也可以参加他的內閣呢？可以想像得到，只要稍加思索他就会独立地对这个问题得出否定的答复。一旦得出了这样的結論，他就会很容易懂得在一定情况下支持某个资产阶级政府是一回事，而作为成員参加进去則是另一回事。前者是可能的，而对于馬克思主义者說来有时簡直是必須的；后者只有对于饒勒斯主义者說来才是可以設想的，而对于主張我的論敵的看法的那些最新变种的社会党人說来則尤其如此，这些人可以称之为**由布朗基主义和饒勒斯主义交配而产生的杂种**。

我的論敵硬說，如果我們（在自己对待革命的资产阶级党派的态度上）宣布了“分开走，一起打”的規則，我們就不能拒絕参加资产阶级临时政府，除非自己打自己的耳光。用他的話說，不但需要一起打，而且需要打退，即需要对付反革命。这是无容置辯的。但要知道我們所爭論的完全不是这一点。如果一起打，就要一起打退，——在这里我同意我的論敵的意見。但是他认为：“如果一起打退，那就要一起出席……政府。”我反对这种看法，因为这是鬼話；为了一起打退反动派，根本不需要一起坐。只有当我们想同资产者一起打退革命的无产阶级时，我們才需要同他們一起出席。

我們势必要同他們的代表一起参加临时政府的这些“半小业主”、这些小资产者是什么样的人呢？这是一个阶级，馬克思在他致书施韦澤評論蒲魯东时非常出色地說明过他們的特征：“小资产者像历史学家劳斐一样是由‘一方面’和‘另一方面’构成的。他在自己的經濟利益上是如此，因而在自己的政治上、在自己的宗教观点、科学观点和艺术观点上也是如此。他在自己的道德上是如此，在一切事情上都是如此。他是活生生的矛盾。”<sup>①</sup>但是正因为他是活生生的矛盾，我們对待他的态度就不能不是**两重性的**。我們將

<sup>①</sup> 參看《馬克思恩格斯书信选集》第165頁。——譯者注

支持他的革命意图；如果他在同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斗争中提出反动的要求，我们就反对他。因此我们不能同他一起参加一个政府。

《前进报》的一位“前进人士”说过（见第十二期）：“无产阶级乐意……支持农民，但是必须观察和注意它的临时同盟者——业主农民，看他是不是伸出了他的业主的毒手。”<sup>①</sup>这是正确的。但是要“注意”到“毒手”就必须采取反对派立场，其实米勒兰也打算“注意”呢，他参加了瓦利德科-卢梭内阁，不过走这条路是没有得到什么好结果的。

我的论敌责备马尔丁诺夫，说他好像不了解我们的最低纲领的高度的活生生的意义。且不管这个不公正的责备的公正性问题，我倒要指出的是：如果我们在争取实现我们的最低纲领时应当变成小资产阶级，那么对我们社会民主党人来说，它的意义就不会是活生生的，而是僵直直的。如果我们不要变成小资产阶级，那么甚至在为这个纲领而斗争的时候，我们也不能不经常同小资产阶级发生冲突。只有我们的永志不忘的民粹主义者才会不理解这一点；但是社会民主党人不理解这个道理则是完全不能原谅的。

这是千真万确的。只要我们的团结在《前进报》周围的同志们开始抱有参加小资产阶级革命政府的理想，他们就开始用同民粹派的旧术语相像的语言说话。在他们那里，代名词“我们”的意思就是指“革命的人民”，无产阶级和农民（《前进报》第十四期），即其经济利益在很多方面彼此都根本不同（这正是旧《火星报》在一系列的文章和小品文中竭力说明过的）的那两个居民阶层的总和。我们的论敌们“为了避免可能发生的误会……预先声明”<sup>②</sup>，他们所了解的共和国，即他们希望通过如此紧密地同小资产阶级结成联盟来为之而斗争的共和国，“不仅仅是指政体，甚至与其说是指政体，不如说是指我们最低纲领所规定的民主主义改造的全部总和。”<sup>③</sup>

① 参看《列宁全集》第八卷第220页。——译者注

②③ 同上，第269页。——译者注



但是正是我們的最低綱領小資產階級根本沒有義務來堅持，因為它是這樣一些人寫出來的；在這些人看來，“我們”一詞的意思就是指無產階級。在經濟領域中，小資產階級（只要他們還沒有接受無產階級的观点）對民主制的了解完全不同於“我們”對它的了解。在他們看來，民主制意味着同瓦·沃·<sup>①</sup>先生之流如此天真如此笨拙地加以美化的已經仙逝的“人民生產”相類似的某種東西。我們的民主制同這種民主制是沒有任何共同之處的，也不可能有任何共同之處。我們能不能挑起類似的民主制政府的這副担子呢？

《前進報》的一位政論家寫道（第十四期）：“爭取共和國而又拒絕革命民主專政，這正像大山一方面決定同庫羅帕特金在瀋陽會戰，同時卻又事先決定自己不想進占瀋陽一樣。”<sup>②</sup>對於這一點令人想起法國的一句俗話：comparaison n'est pas raison（比方並非證明）。但是比方表明打比方的人的思想方式，從這方面說它甚至可以獲得很有說服力的證明的意義。《前進報》政論家深信，拒絕參加小資產階級革命意味着拒絕革命民主專政，而後面這種拒絕在他看來又無異於拒絕共和國。但是要知道這恰好是尚待證明的東西。依我之見，我們拒絕參加“民主”專政（這種參加實際上只會意味着無產階級從屬於小資產階級專政者）不但不會削弱革命運動的力量，而且會大大地增加革命運動的力量，而且正是因為如此，它就會大大地擴大共和國取得勝利的機會。自然，可以不同意我的意見，也可以設法駁倒我的意見。但是為此就應當想出一個比無非是 *petitio principii*<sup>③</sup> 的“瀋陽”更加嚴肅的什麼理由來。不過既然已經打過比方，也可以放開瀋陽，想一想莫斯科媽媽。軍事專家們肯定說，拿破侖只有在這樣的場合下才能征服俄

---

① 即瓦西里·巴夫洛維奇·沃龍佐夫（一八四七——一九一八），著名的民粹派理論家、經濟學家和政論家，普列漢諾夫曾經寫過一系列的著作批判過他的观点。——譯者注

② 參看《列寧全集》第八卷第268—269頁。——譯者注

③ 一種預期理由。——譯者注

羅斯：即如果他沒有受到荒謬的“進”白宮的誘惑。我認為，我們之參加我的論敵如此喜愛的專政恰好就會成為我們的莫斯科進軍。

我們的論敵們希望實行“普通平民”專政。這是只有在民粹派看來才是確定的社會政治範疇。我們追求的是無產階級專政。當不可能有這種專政時，我們就要求代表俄國（其他各國也一樣）這個最革命的階級的利益的黨派仍然保持一切資產階級黨派、一切業主、小業主和半小業主的反對派立場，只有在他們是革命的場合下才支持他們。

我的論敵完全擁護的《前進報》把爭論的問題理解成這樣，好像我們只有在我們着手實現我們的“最高綱領”的場合下，我們才會同革命的小資產階級發生矛盾。《前進報》堅決地聲稱，如果它的擁護者參加臨時政府，他們就不超過最低綱領的範圍。但是同一家報紙的一位政論家的上面引用過的關於“業主的毒手”的意見會使我們的“專政者”產生這樣一個極其簡單的思想：我們和小資產者（手工業、工業和農業的）之間的意見分歧必然比提出社會主義“最終目的”的問題要產生得更早得多，因此，我們不可能成為他們的革命政府的組成部分。

正是因為甚至於實現我們的最低綱領的時候，無產階級也絕對不能同小業主和半小業主取得完全一致的意見，所以工人階級的代表一旦參加小業主的和半小業主的政府，他們就會處在麻煩的境地，像恩格斯在《Der deutsche Bauernkrieg》一書中如此清楚地說明過的一樣。他們可能做到的事情都要依賴於物質生活條件即生產關係和交換關係的發展程度，因之也就是依賴於這種發展程度上小業主和半小業主所固有的那些社會意圖。而他們所希望的和認為必須的事情並不取決於這種發展程度，並不取決於業主和半業主的理想，而是由他們這些社會民主黨人所代表的那些無產階級的利益所決定的，這些利益同小資產階級的利益不可能是同一的。他們面臨着非解決不可、然而又無法解決的嚴重抉擇；他

們能够做到的事情在許多場合下違反无产階級的直接利益；他們必須要做的事情在更多的場合下却无法實現。“誰一旦落到这种錯誤的处境，誰就永远倒霉。”

我說过：馬克思和恩格斯越是深信資本主义还没有像他們在一八四八年所以为的那样瀕臨灭亡，他們就越不会允許无产階級参加小資產階級政府。我的論敌宣称这个意見是不正确的。其实它是完全正确的，不过对他，即对我的論敌不方便罢了。可以說这是一个无可爭辯的普遍規則；資本主义越是接近自己的終点，小資產者就越願意接受无产階級的观点。而它越是願意轉到无产階級方面来，无产階級在同它結成联盟的时候就越容易坚持自己本身的綱領的革命性质。反之，資本主义离开自己的最終灭亡越远，則小資產階級就会更加頑強地坚持自己的矛盾的观点，它就会更加堅決地拒絕无产階級的观点，甚至在進行他反对居民中間的封建分子的斗争时所提出的自己的那个革命綱領中，他也会成为更加强烈的保守主义分子。而想要参加他的政府的社会民主党人的处境就越是困难、荒唐、有害。

在我們俄国，資本主义还远沒有发展到瀕臨灭亡的时候。因此我們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在小資產階級政府中除了失望和……脚踢之外期待不到任何东西。贊成参加这个政府的思想的同志們希望实行小資產階級和无产階級的专政；他們的努力只会导致小資產階級对无产階級代表的专政。

只有对愚昧无知有所喜好的人才会追求后一种专政，我們却不在此列。

我的論敌們很喜欢用从他們的“稻草人”和“金屬”的武庫中拿来的不堪入耳的名詞“尾巴主义”来吓唬自己的商人妇。我不喜欢这个不雅致的名詞。但是既然我已經提到了它，我就要說，正是他們即我的論敌們傳染上了“尾巴主义”；正是他們，而不是任何別的同志們要我們去扮演“小業主”和“半小業主”的尾巴的角色。<sup>①</sup>

如果去追求这样的专政，如果在政治上达到这样的严重的糊

塗思想和无法控制自己的状态，那时就用不着害怕自己本身的願望的邏輯，那时就必須把全部策略适应这一目的，那时就应当貫徹

- ① 当我在第八号上讀到《巴黎公社和民主专政的任务》一文时〔这篇文章登載在《无产者报》第八号上，作者沒有署名。但列宁对该文手稿作了重大修改。——譯者注〕，我对你們报纸的小品文作者的答复已經付排了。这篇文章也是一篇历史证据，它好像要說明，虽然巴黎公社正如恩格斯称呼它的那样，也是无产阶级专政，但“就它的成員由純粹的社会民主党人組成以及它的实际任务的性质而言”这却不是“真正的、純粹的无产阶级专政”。不过問題并不在于成員的組成，虽然馬克思也說，“它（即公社。——格·普·）的絕大多数成員自然是由工人或者由公认的工人階級代表組成的。”〔參看《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論巴黎公社》第58頁。——譯者注〕問題在于当时巴黎小資产階級同无产階級的关系是怎样的，对于這個問題，同一个馬克思作了明白的答复：“这終究是工人階級被公认为能够發揮社会首倡作用的唯一階級的第一次革命；这是除了富有的資本家以外的巴黎中等階級的广大阶层——小舖子老板、小販和商人都一致公认的。”〔參看同上书第63頁。——譯者注〕是否可以指望在我們所面臨的革命中我国无产阶级会得到我国小資产階級的这种承认呢？我认为不可以。你們认为怎样呢，同志們哪？如果你們也认为不可以，則你們的“证据”就什么也沒有证明。如果你們认为可以，那就請直率地說：就要来临的革命会使对自己本身的力量，对自己本身表現社会主动性的能力失去信心的小資产階級所支持的无产阶级取得統治地位。而那时你們就要更彻底些，不要害怕承认这将是社会主义革命，它不但会实现我們的最低綱領，而且也会使我們达到我們的最終目的。要知道，在馬克思看来，巴黎公社正是这样的——即社会主义的——革命。你們的政論家不正確地、不完整地引証馬克思。他忘記了引用他下面这段含义丰富的話：“是的，諸位先生，公社曾想消灭那种将多数人的劳动变为少数人的劳动的財富的階級所有权。它曾想剝夺剝夺者。它曾想把現在主要用作劳役和剝削劳动的工具的生产資料、土地和資本变成自由集体劳动的簡單的工具，把个人所有权变成真理。”〔參看同上书第61—62頁。——譯者注〕往下馬克思直接称共产主义是巴黎公社的目的。好一个“最低綱領”！好一个“民主”专政！任何人都可以看到，那里所說的正是关于我們的最終目的。當我們相信我們接近这样的革命，那时我們就不会起来反对夺取政权的思想，那时我們會說，——正如我早在小册子《社会主义与政治斗争》中就說过的一样，——«den Teufel halte, wer ihn hält.»〔“誰擒住魔鬼，誰就不会放他”。參看《普列汉諾夫哲学著作选集》第一卷第105頁。——譯者注〕不过目前我們面臨的是資产階級革命，所以对我們談論夺取政权就无异于正是把我們变成布朗基主义和讓勒斯主义的杂种。而这种混合物本身根本不包含任何惹人喜爱的內容，而且任何“证据”也粉飾不了它，即使你們——同志們——的机关报第八号提出的那个证据較为严肃些也是一样。——著者注

到底。我的論敵說：分开走，一起打，并且一起打退。实质上他认为，正如我們已經看到的，主要之点在于沒有包括在这个公式內的如下一句話：**而且一起出席革命政府**。既然如此，先生們，那就出席吧，如果你們有願望，也有……可能出席的話，或者就宣傳出席政府的思想吧，就去为此作准备吧，因为要知道，即使有同出席的可能性一起产生的願望，真正出席暂时还是多少或然的未来的事情；不过在这里請彻底一些，大胆地和坦率地对自己和別人說：

**一起出席，这也就是說一起行进。**

啊，我知道，當你們讀到我這些話的時候，你們會怒從心起的，你們會忿忿不已地無情地嘲笑我向你們推薦的這種徹底態度。但是**其他的**徹底態度你們又沒有，也不可能有，故而只有它才符合你們的企圖的**真正客觀意義**。只要你們的這些企圖在我們黨內占着上風，只要我們大多數的俄國同志主張你們的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聯合專政思想，那時就會必不可免地採取現在你們中間許多人似乎覺得不必要和不可能**的步驟**。

你們就會同“**社會革命黨人**”一起走，你們就會同俄國革命大軍中現在已經在**業主和無產階級聯合專政**的旗幟下行進的那支隊伍一起走。

不止是在某些革命行動中同“**社會革命黨人**”一致，——這種一致“**在現時**”是完全可以容許的、甚至還是必需的，——而恰恰是同他們結成緊密的聯盟，齊步並肩地一起行進。那時“**社會革命黨人**”就會揚揚得意地喊道：“**社會民主黨不再存在了！**”只要別的戰士、仍然忠實於自己革命義務的馬克思主義者沒有取代你們的地位，沒有取代背叛工人階級的代表**的直接而且明顯的義務的人們的地位**，沒有取代布朗基主義和饒勒斯主義的混血種的地位……那他們就沒有撒謊。

然而，可幸的是這種人現在已經存在着；可幸的是你們的思想現在已經在我們社會民主黨內遇到強有力的反擊。而且我堅信反對它的人的數目將與日俱增。因此我對我們黨的未來並不絕望。

它正經歷着严重的危机；它正遭遇着巨大的危險。但是事物的邏輯本身会挽救它；“工人大軍的有节奏的步伐”会促使它苏醒过来……

暂时我們都还坚持我們每个人认为是真理的那种观点，我們还要爭論。但是进行爭論的时候，可別忘記自己的**社会民主党人的聲望**。辯論是好事情。无怪乎一个睿智的希腊人<sup>①</sup>說过：爭論（斗争）是万物之父。世界文学（литература）史可以举出許多杰出人物的姓名，他們的全部文学活动都是一个連續不断的論战过程。但他們都是运用思想的大才子、大匠师。論战中精彩而且卓有成效的現象正是思想斗争，而在思想斗争中只允許（我再說一遍：）**判断尖銳**，而完全不允許**表达粗魯**。其中不允許的事情还有很多很多別的。黑格尔曾經說过：“由自命机智的恶毒誹謗和无聊胡說构成的論战太沒有价值了，——我不知道管它叫坏透了的（schäbig zu nennen）是不是会太过分了，——只有厌恶地把它一脚踢开。”如果你們、尊敬的同志們，掌握着黑格尔的这个思想，那你們就会——我深信这一点——像以前一样精力充沛地进行辯論，不过……風格稍許不同，也沒有先前的一股气味。

此祝

健康

你們的格·普列汉諾夫

（譯自《普列汉諾夫全集》第十三卷第 273—304 頁）

---

① 參看本书第 22 頁注①。——譯者注

## 相仇的弟兄

这是一篇在組織問題上攻击布尔什維主义的文章，发表在第二期《日志》上。

作者要求党内統一，要求两派和好，制止分裂。但是他理解分裂的根本原因何在。他站在調和主义立場“一味抱怨、指責、非难、感叹、哀伤”，用一些“痛切的言詞”来支吾搪塞，粉飾分歧的实质，“空談‘和好’而不能为和好作出一点实际事情来”，想要尽快制止分裂，但不知道怎样制止，不知道应该采取怎样的組織原則作为团結的基础，甚至自己就采取分裂的措施，公开号召成立第三党。他用一些“毫无价值的論据”对布尔什維克“作了不厌其多的攻击”，譴責他們是“形而上学者”、“个人主义者”、“宗派主义者”、“分裂”派、“馬基雅弗里”分子、“沽名釣誉之徒”、“超人”等等。他的这“許多卑鄙行为”对党产生了“恶劣的影响”(均列宁語)。

列宁曾經准备“答复普列汉諾夫”(《列宁全集》第三十四卷第332頁)，但未写成。然而在一九〇五年七月的一些文章中(如《色厉內荏》、《〈工人論党内分裂〉一书序言的初稿》和《〈工人論党内分裂〉一书序言》等，均載《列宁全集》第九卷)，列宁批評了普列汉諾夫的一些論点，分析了摆脱分裂的真实道路，同时也指出了他的“左右搖摆”，肯定了他对孟什維克所作的批評。

Es ist kein Zufall und blindes Loos,  
Dass die Brüder sich wütend selbst zerstören.

Schiller, Die Braut von Messina, oder  
die feindlichen Brüder.①

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今茲于此，詳申言之……

阿·托尔斯泰：

瓦西里·席班諾夫

(稍有改动)。

去年八月在阿姆斯特丹举行的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同时通过了一项决议，决议说，在每一个国家里只应有一个**社会民主党**，正像在每一个国家里只有一个**无产阶级**一样。作为我们党在代表大会上的代表，我们很赞成这项决议；我们为它鼓了掌，但是我们……分裂成了两个敌对的组织。没有同其他国家社会民主党内的同志们见过面的读者甚至很难设想，我们的分裂对国际无产阶级产生了怎样沉痛的印象。在我们同社会革命党人的争论中最真诚地同情我们马克思主义者的人，都认为我们自己队伍里的内訌不仅没有任何严正的根据，而且简直是犯罪的。他们中间有些人承认，他们不得不替**俄国社会民主党**害羞。但愿俄国的同志不拿这样的想法来宽慰自己，说我们的西欧兄弟对我们的事态不够了解。第一，他们对我们的情况的熟悉一般说来并不像我们许多人所想像的那样差。第二，难道他们不对么？国际社会民主党对我们的分裂所作的那个尖锐的谴责难道没有根据么？可惜得很！根本不可能对他们的确有根据提出异议。我们的确犯了政治罪行：在我们必须团结起来的时候，我们分裂了，在俄国工人阶级开始同专制制度进行

① 兄弟鬩牆，毀謗猖狂：

豈云突忽、天命茫茫？

(席勒：《麦西那的未婚妻，或敌对的弟兄》)。——譯者注



坚决斗争的时候，在他们用自己的大量鲜血洒遍大地的时候，在我们必须用一切力量设法援助他们的时候，我们却把自己的大部分力量浪费在党内纠纷上。事变的进程对我们是极端有利的，我们却不善于利用它。我们有可能大大增加自己在国内的政治影响，我们却由于自己的内部斗争而削弱了它。这一切都怪谁呢？原因何在呢？伊克斯的顽固性格么？伊格列克的个人主义么？伊万的不让步么？彼得的放荡不羁么？自然，对于我们党的巨大不幸可以指出不少类似的根据多少可疑的原因。但是，是不是值得把这些原因找出来呢？这岂不是给新的不满制造借口么？在党内生活中个别党员的个人缺点是不是起很大的作用呢？难道**意识**不是由**存在**决定，政治活动家的心理不是由他们所归属的那个社会阶级的性质决定的么？

俄国社会民主党称自己是工人的党。这并不是冒名顶替。它无疑是工人的党，因为它站在工人阶级利益的观点上，并且在主观和客观的可能条件下保卫这些利益。但是假如有人问我们，工人在党内生活中起着什么作用，那么我们并不想掩盖真理，我们会回答说：**几乎不起任何作用**。它的命运的主要宰制者至今都是所谓**知识分子**，而且凡是想了解党的历史的人，首先都应当了解我们的“**知识分子**”是何等样人。

知识分子，这是从事脑力劳动的人。自然这并不妨碍他沉湎于智力上的**懒惰**。作为从事脑力劳动的人，他（就他的智力上的懒惰对他没有妨碍而言）很容易抓住一般的观念，也乐于向他周围的人传播这些观念。应当承认他的这些特性是极其有益的，而在一定的社会政治条件下甚至是不可替代的“**进步因素**”。但是，大家知道，太阳上面也有斑点，有知识的“**进步因素**”同样有巨大的缺点，这些缺点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削弱了他的优点的意义。为了弄清这些缺点的渊源，——不是伊克斯或伊格列克、彼得或伊万的个人的缺点，而是整个社会阶层的缺点，——回忆一下叔本华关于教育的下述见解是有裨益的。

叔本華說，我們的觀念是從我們的知覺中產生的，後者應當先於前者。當人以經驗為導師的時候，教育就沿着這條自然的道路進行。在這種場合下，人清楚地知道他的每一個觀念是以怎樣的知覺為根據的，他也善於正確地把這些觀念應用到他周圍所有的事物上去。當他的頭腦里充滿着他獲得經驗以前從書本中學來的觀念的時候，結果就完全不同了。那時他就不善於應用自己的觀念，他不恰當地使用它們，錯誤地判斷事物和人，行動也不合時宜。所以，叔本華補充說，我們遇到許多這樣的學者，他們完全沒有不學無術者身上如此常見的良知。<sup>①</sup>我們這裡同學者毫不相干，而是涉及知識分子，然則不能不承認，他的社會教育是沿着叔本華所指出的第二條道路進行的。知識分子很容易掌握涉及他周圍社會中存在的那些關係的一般觀念。但是這些觀念不是以“知識分子”自身經驗為依據，因此它們始終是膚淺的。“有知識的”人不屬於任何一個社會階級，而這些社會階級的鬥爭則決定着社會的整個內部生活；他不是資本家，不是工人，不是土地占有者，不是經營工業或從事農作的小資產者。他的生活不受這些階級保障，雖然有時也靠攏它們，如果他判斷它們的地位和它們的相互關係，他正是按照書本進行判斷的，而不是以自身經驗為根據。僅憑這一個情況就足以使他的判斷和行動產生極大的錯誤因素。對於這一點應當補充說，的確，由於智力上的懶惰，知識分子通常書都讀得很少，而且他越是力求成為“實際工作者”，他的書就讀得越少，他就越懶惰。但是這種……在讀書方面的溫和態度絲毫不減少他犯錯誤的機會。既然他的觀念始終是從書本中來的，而不是從經驗中取得的，那麼他越是讀書少，他的議論就越抽象，換句話說，他犯錯誤的危險性就越大。在我們的革命隊伍里，特別是“實際工作者”的判斷具有抽象的特點。這些“實際工作者”是世界上最抽象的人。但是抽象的思維是這樣一種思維方法，即黑格爾，而繼黑格爾

① 《Parerga und Paralipomena》（《附錄和補遺》）第二卷，XXVIII，《Ueber die Erziehung》（《論教育》）。——著者注

以后恩格斯也称之为形而上学的思维方法。形而上学者的思想公式是“是是否否，余皆鬼话”。他不懂得没有抽象的真理，真理总是具体的，一切都依赖于时间和地点的情况。他是从僵死的抽象观点脱离时间和地点的情况来看真理的。如果情况改变，真理可以变成谬误，谬误也可以成为真理，这种意识对他是格格不入的。他只知道真理和谬误之间抽象的对立。因此他像《智者纳旦》<sup>①</sup>中的萨拉丁一样，对探求真理很没有耐心；他希望它一成不变，“好像钱币的真理一样”现成地存在着。一旦他获得了某种数量的真理，一旦他把若干“钱币”放在自己的脑子里，他就以为掌握了全世界的一切财富，如果您要向他证明他的精神财产的价值是很有限的，那只是白白浪费精力和时间。他认为它具有绝对的意义，并且宣布一切超出他所获得的真理的狭窄范围的观点都是错误的。凡是了解我国革命思想史（特别是“实际工作者”所具有的那些思想）的人都知道，我的话一点也没有夸大的意思。当偶然落到“实际工作者”脑子里去了的“钱币”上盖着“宣传”的图章的时候，任何“鼓动”的企图都被革出教门；当“鼓动”铸成钱币以后，“宣传”的拥护者好像都成了牛头马面，如此等等，如此等等。从我们的“实际”观念看来，事情恰恰像歌德在诗作《Politica》<sup>②</sup>中所说的那样：

Bei einer grossen Wassernot  
Rief man zu Hilfe das Feuer;  
Da ward sogleich der Himmel rot,  
Und nirgend war es geheuer...<sup>③</sup>

我清楚地记得，不久以前，我不得不向我的社会民主党员同志们证明：没有组织，任何严肃的工作都不可能。有人反驳我说，没有组织可以防止“垮台”，而我之对这种叹为观止的高见不表赞同却被人认为是我还没有完全摆脱七十年代革命者的偏见。这个时

① 《Nathan der Weise》(1779)，莱辛的第三部名剧。——译者注

② 《权谋》。——译者注

③ 水奇缺兮求火神；苍穹顿赤兮无以栖身。——译者注

代急剧地为另一个时代替换了，于时人人言必称組織，于时人人都希望有一个組織計劃，而且是一个十分完善的計劃。人人都希望在自己的脑袋里藏着一个組織計劃，“像錢袋里藏着硬幣一样”。一当出現了这样的計劃，人們就死勁地抓住它，稍有背离即視為異端、“机会主义”。由此造成了一种局面：**对組織的追求使我們走向分裂，也就是說瓦解了我們的力量。**然而，如果在哪里狹隘的排他主义精神是有害的，那就正是在提出“搜罗人才”、“建党”問題的地方，这似乎是容易理解的。这里根本用不上形而上学的“是是否否余皆鬼話”的公式。組織者一定要是一个辯证法家。辯证思維的偉大匠師柏拉圖很好地懂得这个道理，他认为事物合法的秩序的不利方面是：“法律像頑固而且粗魯的人永远以同一个东西为目的，这种人不允許任何同他的安排相反的东西，即使在誰想出了某种比他所确立的秩序更好的秩序的时候，他也不会听取反面的意見。”我們的“法律”、我們的小組章程和黨章沒有任何強制力，因此它們应当具有特別的靈活性的特点；如果它們像“頑固而且粗魯的人”一样，它們一定会成为分裂的根源。但是在我們这里，不允許有絲毫違反自己的安排<sup>①</sup>的頑固性和粗魯性，被认为是政治上明智的特征和性格堅定的表現。我永世也忘不了同一位屬於所謂**多数派**的青年“实际工作者”的一次談話使我产生的印象。在我們的代表大会以后不久，我曾試圖使他相信，我們党的利益要求我尽可能迅速地消除我們同所謂**少数派**的种种誤会。我的这位青年同志坚持主張：**应当把他們（即把“少数派”）赶出去**，而且無論我引用了怎样的理由說明这种政策是不适当的，他却靜靜地、但是固執地重复說：“赶出去！赶出去！”你得在如此……精练的思想方式之下把什么东西組織起来！

在这种性质的思維指导下，革命思想只有通过从一个极端过渡到另一个极端才能向前运动。对于这一点也許可以說人类的一

---

① распоряжение, 双关詞: 安排、指示。——譯者注

切运动都是通过对立面而实现的吧。但是阶级利益的斗争所产生的伟大的有历史意义的对立面是一回事，只是由于“有知识的”宗派主义者不能采取任何伟大的社会阶级的观点而产生的、这些宗派主义者的狭隘的极端态度又是一回事，“知识分子”思维的狭隘的片面性会把我们的纠纷永恒化，因为一种色彩的思想的胜利，一个小组、一个派别的胜利本身就必然会产生新色彩的思想、新的派别、新的小组、新的分裂。所有这些分裂都会延缓我们的前进运动。它们只是提高庸碌之徒的收获量的一种粪肥。

不言而喻，在说明类似的“不成熟的思想的过失”的时候，不仅应该注意一定社会环境的特殊性质，而且也要注意一定历史时刻的特点。在各个享有政治自由的福利的国家里，最抽象的“知识分子”懂得，根据精练的“赶走！”公式是不可能“建党”的。假使我们许多同志在自己的“组织者”的活动中很像谢德林的一位行政首长，他在研究如何使居住在玛玛底什斯基县的异族人的福利得到提高的措施的时候，发现一些异族人应当杀掉，另一些人应当囚禁，这样，地方无疑会繁荣起来；假使我们的组织者主要表现了瓦解组织的能力，那么这里许多过错就在于俄国人所受的一般的政治教育不够。但是在使我们感到兴趣的这个场合，历史时刻的特殊性使“知识分子”一般固有的那些特点具有极端突出的性质、几乎是漫画式的突出性。“知识分子”随时随地都倾向于形而上学式的思维；无论什么时候和什么地方，“知识分子”单凭本身的力量是不能超出小组习气和宗派主义的狭小范围的。我国“有知识的”人精神性格上的这些缺点比任何地方都表现得突出些。这原因很简单，因为俄国知识分子不得不比任何地方的知识分子更多地在跟“人民”没有密切联系的条件下进行自己的繁重的历史工作，然而唯一能够使他的活动得到牢固的社会基础的只有“人民”。

“知识分子”极端抽象地进行思想。他是彻头彻尾的形而上学者。这并不是他唯一的过错。此外他还是一个大大的个人主义者。而且无论他怎样倾心于社会主义，他仍然是一个个人主义者。

甚至当他为“社会理想”赴湯蹈火的时候，他也不善于丢开过时的观念。他的“意識”的这一特点是同他的“存在”的性质紧密联系着的。工人和自己的同类一起劳动，同他們一起为更好的生活条件而斗争。他主要是在同其他的人并步行进的时候，才感到自己是强大有力的，才意識到自己是人。亚里士多德所謂人是社会动物的定义最适合工人不过了。这个定义只有在极其有限的意义下才适用于“知識分子”。自然“知識分子”也需要社会；但社会只有作为显出他的“个性”的背景，只有作为歌颂他的功业的合唱才是他所需要的。知識分子几乎完全是由微小至极的超人組成的。然而大家知道，超人是职业的个人主义者。个人主义在“知識分子”心理中的这个統治权是由他的劳动的性质和他在社会中的地位决定的。“知識分子”是用“头脑”来工作的(当他工作的时候)，而“头脑”的工作是**单个人的工作**。自然这里也有例外，但是誰不知道例外者是凤毛麟角呢？当人单独工作的时候，其他的人只有作为他的劳动成品的評价者才是他所需要的，而他的“同事”，即跟他在一个专业內进行工作的人，与其說是他的同志，不如說是他的竞争者。他的 point d'honneur<sup>①</sup> 不在于支持別人，而在于超过別人。而且他会給自己的竞争者同志們以什么支持呢？当工人为了改善劳动条件而同自己的雇主展开斗争的时候，即使他們仍然坚持純粹的工联主义观点，他們也是在創造重要的历史事业，因为雇佣劳动同資本斗争的客观邏輯会使得資本主义生产关系归于消灭。任何一个工联主义者也都模糊地意識到自己事业的偉大。然而，如果律师为了从自己的“雇主”手上得到較高的“酬金”而暗相勾結，那会有什么变化呢？如果大夫們开始对自己的病人要求更加苛刻，那会有什么变化呢？除了律师和医生的收入以外，別无变化。他們的斗争会引起的那种新的收入分配不可能使得生产关系发生改变，也就是說，对于归根到底决定整个社会制度的那个基础不会有

---

① “荣誉点”。——譯者注

任何影响。所以，在“知識分子”爭取更好的劳动条件的斗争中（无论这个斗争有时是多么必要，例如在涉及小学教师的劳动报酬的地方）不可能有任何“理想的东西”。所以，当“知識分子”倾向于理想的激情的时候，他就不是为自己的利益而斗争，而是为他人的利益而斗争，現時就是为工人阶级的利益斗争。他把这个不容置疑的事实說成是自己的大公无私；而其实这是由于他的劳动的性质和他的社会地位的特殊性，这些性质使得他的心理具有这样一些突出的个人主义特征。正是由于他不是为自己奋斗而是为别人奋斗这个情况，才使得他自认为了不起，才使得他像福音书里的法利赛人一样說道：“主啊，感謝你使我不像稅吏。”<sup>①</sup>而当人开始认为自己了不起并且陶醉在自己胜过“稅吏”一筹的意識中的时候，他绝对不会忘記看看自己那些正在接受被侮辱的和被損害的人的观点的同志。他怀着嫉妒的心情問自己：他是不是在自我牺牲方面、在能力方面、在見識的广大方面或者在任何其他方面比不上自己的同志。总而言之，那时他的同志定会成为他的竞争者。超人的心理就是在他們捍卫人类偉大利益时也要表现一番。莱辛称演員为世界上最为光注意表面細节的一种人。他对待演員是不公平的，因为他还没有遇到过出身于知識界的“职业革命家”。在这些职业革命家身上，光注意表面細节的作风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結果使得以他們为基础来“建立”党的企图成了十足的空想，就好像用“散”沙建立类似埃菲尔塔的某种东西的想法之为虛妄一样。

党的全部活动都受到“知識分子”刺激性的光注意表面細节的作风的威胁，招人咒罵，这种作风使得知識分子革命力量不可能达到任何像样的团结，使得由于“知識分子”思維狹隘的片面性而造成的糾紛变本加厉起来，而如果这些糾紛成为提高权势兴隆和自鳴得意的庸碌之徒的收获量的糞肥，那么它們就会使奉行“不擇手段”原則的、小小的、小組的馬基雅弗里輩和把抬高自己的珍貴的

<sup>①</sup> 原为：“上帝阿，我感謝你，我不像別人，勒索，不义，奸淫，也不像这个稅吏”（《路加福音》第十八章第十一节）。——譯者注

“我”的地位当作自己革命工作的主要目的的、渺小的、小組的沽名釣譽分子大有用武之地。对这种情况的抱怨声自从知識分子的革命运动发轫以来就在我們中間傳开了。已故的維·斯米尔諾夫早在七十年代初期就描写过知識分子小組里的“活动”，他說道：

“小組經常成为它的最腐敗、最讲究虛榮和要强好胜的成員勾心斗角的場所。希望做个即便是乡村里的国王，希望做邻近地区的头号叫鸡，博得所有近邻的母鸡的青睞，令所有近邻的叫鸡艳羨妒忌，这种願望在这些人身上都十分强烈的，以致他們甚至再也想不起他們曾經着手进行的那个事业。互相爭斗的‘活动家’，用只有俄国地方自治会和杜馬代表才具备的那种热情，在使絆儿、設圈套的技巧方面，在施展权术和彼此进行复杂的‘秘密活动’方面，在互相攻击的力量和准确性方面，都力求竞相超越。小組中其余的成員并没有袖手旁观，他們急忙抛开小組的全部活动，专搞这种斗争，因为这是他們比較容易理解的题目，从他們身上除了被利己主义道德腐化得无以复加的特权人物的非遺傳的和遺傳的品质以外得不到任何东西。小組分成为两大陣营，其中每一个都自认为受互相撕斗的一个叫鸡的庇护，并且用自己的母鸡的全部爱情来保护它。在全体群斗的时候，每边都力求使对方沉陷在恶臭冲天的秽水里，每边都力求咬着对方最疼的地方。謠言毀謗，甚囂尘上。这种活动的結局是明白易見的，这些令人齿冷的活动家的、道德最敗坏的小組分裂成两半，这两半又迅速再次分裂成两半，如此递演，不知所止。”①

可惜的是我們每一个人曾經看到这种不惹人喜好的景象，而且不仅可以在遙远的“外圍”，在“青年工作小組”那里看到，不，我們看到它完全是在靠近“中央”的地方……凡是注意研究“多数派”同“少数派”的爭吵的人，現在都可以看到这种爭吵的全部色采。一

① 《前进》，不定期的評論，一八七四年第二号，第一部分，第140頁。——著者注（《前进》系拉甫洛夫在慕尼黑和倫敦出版的具有民粹派傾向的不定期杂志（一八七三——一八七七年）。——譯者注）



年一年过去了，一件一件事发生了，过去在已故的維·斯米爾諾夫撰写自己的关于“出身于特权社会的革命者”的文章的时候还处于襁褓之中的无产阶级、这个居民中的新的阶级，已经在俄国成长起来了，并且在政治上觉醒了，然而“有知识的”俄国人的性格还是依然故我，真所谓本性难移。

假若我国社会民主党的命运只是抓在知识分子的手里，它就根本不会有任何未来。所幸它不只是由知识分子来摆布。社会民主党是**工人群众的党**。它在俄国所经历的那个历史时期（这个时期的特点是知识分子占优势）其实是德国人所谓的 *Vorgeschichte*，即史前史，說得更得当些就是：**史前生活**。当社会主义运动成为**群众性**运动的时候，这种生活，连同它的杯中風浪<sup>①</sup>，连同它的来自超人们的勾心斗角，就会寿終正寝。这个时期已经不是遙遙在望，它已經近在咫尺，它已經行将到来了。

請看我們祖国正在发生的事情吧：知识分子所建立的党组织的狭小框框已經装不下工人群众的革命运动了；这些狭小的框框正在吱吱炸裂，到处露出破綻，不过是昨天还认为工人尚未成熟到可以登上“委员会”的殿堂的“知识分子”领导人，正在开始認識到，像用来玩耍的鏟子、耙子、叉子丝毫不适应于成年农民耕种土地的需要一样，旧式的革命組織也丝毫不适应于当代革命的需要。現在无产阶级自己正在力求找出适合于他們的組織形式，他們正在摧毁束縛他們的警方的障碍，建立起公开的联合会。我們未来的广大空間也就在这里了；“知识分子”的組織连同他們的“中央”和“外圍”，连同他們的小小的“英雄”，而且连同他們的傀儡般的“群氓”一起，都会成为历史的陈述，不管这些組織里的事情有时弄得多么糟糕，不管相仇的弟兄彼此多么猛烈地揪打，不管他們的兄弟相煎的仇恨多么損害我們共同的事业；然而要使我们灰心丧气毕竟是没有根据的。現在我們的 *Vorgeschichte* 已經即将告終了，

① буря в стакане воды: 口語，直譯作“杯中風浪”，意思是小題大作，因一点小事而动气吵鬧。——譯者注

我們的“前夜”正在結束，“真正的白天”正在臨近。現在“知識分子”超人們作威作福的時期已經不長了，現在無產階級出場了……

我說的所有這些話的意思，我想是不需要作進一步解釋的；席勒的《麥西那的未婚妻》中下面這句合唱的歌詞就很好地說明了我的意思：兄弟們猛烈地互相殲滅，這完全不是偶然的。<sup>①</sup>但是席勒的合唱是用這樣一種情況來說明的，即生養他們的母親的胞胎是可詛咒的；而在我們這裡事情是用比較接近散文的方式來說明的，即是由本身又決定於知識分子在社會中的地位 and 作用的“知識分子”的心理說明的。一說到心理，也許可能有人向我提出下述的反駁。

他們會對我說：“請看看社會革命黨人吧，在他們那裡‘知識分子’的優勢比你們這裡還要強大得無比；這主要是一個‘知識分子’的黨，但是在他們中間根本聽不到什麼糾紛。”

答曰：“社會革命黨人”按其觀點和習慣說來一般都是保守分子。他們比我們更好地遵守着“古老的”革命的“宗教虔信”規矩；大家知道，這些規矩是禁止從革命的木房裡把垃圾送出去的。<sup>②</sup>但是如果垃圾仍然留在木房裡，那還不等於說沒有垃圾。的確，在“社會革命黨人”中間大概存在着的糾紛不會導致分裂，這個事實就說明他們更加虛弱。我認為這是因為“社會革命黨人”不僅是革命中的保守分子，而且還是被戰敗的保守分子。對於把他們從“占統治地位的黨”的舊陣地上趕走的革新者的不友好態度使得他們互相間更加團結一致。“社會革命黨人”對我們的不友好態度不可能對我們發生什麼抑制性的影響，因為我們並不（根本不）重視他們，我們把他們看成是舊東西的殘余。

這還不是一切。我們的糾紛多少充滿着一切革新者固有的革新精神和熱情，這是社會民主黨在思想方面的特點。可能有人覺

① 原文見本篇題辭。普列漢諾夫把它譯成了散文。——譯者注

② выносить сор из избы：口語，直譯是“從木房裡把垃圾送出去”，意思是播揚家丑，洩漏內幕。——譯者注

得这是奇談怪論，但事情的确这样。要起来反对“古老的宗教虔信”規矩，要破坏僵硬的革命教条，我們就必需有甚至极端革命者也远不是始終具备的那种特殊的勇敢精神和特殊的热情，我們必需敢于实现**革命中的革命**。这个革命我們早就实现了；但是实现这个特殊的革命热情仍然充分存在。我們希望繼續革命，虽然在我們現時的情况下繼續革命意味着削弱自己原有的障地。这甚至反映在我們的作風和我們对待人們的态度上。我們許多同志，特别是那些动作更敏捷的人都用这种坚决的甚至是威胁的語調說話和写作，好像他們（用果戈里的說法）要把什么人压下去似的。我們今天从事革命活动的革命者忘記了事变是不会重复的，忘記了凡是企图第二次重演已經演过的悲劇的人都有表演笑劇的危險。<sup>①</sup>在这种情况下我們將为自己以前的胜利付出代价。我們为它們付出的代价将是昂貴的；但这个昂貴的代价不过证明我在上面对知識分子的心理和超人所說的話罢了，因为如果这种心理是另样的，那么他們中間願意通过模仿注定要参加偉大悲劇的人来表演毫无价值的笑劇的人就会少些，少得不能相提并論。

然而無論如何，随着无产階級出現在俄国历史舞台，迄今都如此严重地妨碍我們利用当前對我們这样有利的环境的“知識分子”小組习气精神就会消失（不过也許不是一下子的事），这却是不容置辯的。我們有充分的权利期待更好的未来。如果我国社会民主党“知識分子”的品质損害着革命的事业，这个党就应当受到严厉的譴責。但是在譴責它的时候不应当忘記它的长处是什么和它在革命界取得了統治地位。無論它对馬克思的思想掌握得多么狹隘、多么片面，然而这些偉大的思想畢竟曾經使它得到了預見事变的能力。黑格尔說：“任何个别的人都是世界在据以发展的絕對必然性鏈条中盲目的环节。任何人只有在他認識到偉大的必然性朝

<sup>①</sup> “黑格尔在某个地方說过，一切偉大的世界历史事变和人物，可以說都出現两次。他忘記补充一点：第一次是作为悲劇出現，第二次是作为笑劇出現”（《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八卷第121頁）。——譯者注

何处进行并且能够利用这种認識說出喚起这种必然性的形象的有魔力的話的时候，才能提高到对这个鏈条的重要的片段的控制。”我国社会民主党認識了我們国家經濟发展的偉大必然性是朝何处进行的。如果由于自己的“知識分子”的本性过去它不善于提高到它可能做到的对事变的控制，那么，它毕竟成功地說出了一些保证现实終归不会辜負它的期望的有魔力的話。

再說一遍，我們有充分的权利期待更好的未来。但是我們沒有权利安閑地把手叉在胸前期待未来。易卜生在自己的一封信中說道：“我不希望我的衣服被街上的污泥弄髒。我希望穿着干淨的节日服装迎接第二天。”对于有坚强信念的社会民主党人說来，节日前的这种行为簡直是不能容許的。他有义务不理睬小組的爭吵、誹謗和冲突的污泥而进行工作。其所以不要理会，正是因为沒有任何必要去理会它們。如果为它們操心，那就无異于用空胡桃去賭空胡桃<sup>①</sup>，像席勒某次所說的一样（mit hohlen Nüssen um hohle Nüsse spielen）。对于严肃的人說来，这样消磨時間是絕對得不到絲毫滿足的。但是可以用另一种方式来利用自己的時間，可以为减少喜欢賭空胡桃的游戏給我們带来的那种損失。尤其可能的是：正在日益扩大日益加深的无产階級运动一定会使出身特权社会的职业革命家受到自己良好的影响，多少总会改变他們的习惯。为了朝这个方向更有效地工作，必須弄清楚从我們的由知識分子的沙拉建立俄国社会民主党的企图中我們得到了什么。

从我們的第二次代表大会的时代起，正如我已經說过的，俄国社会民主党內的知識分子就在組織的旗帜下进行了瓦解組織的活动。同时在这届代表大会以后不久就明白地确定了两种意图：一种意图我称之为追求极端的阴謀家的集中化；另一种意图，在所謂第一届全俄代表會議通过的決議以后可以称之为追求极端的非集中化。正是这两种意图的斗争分裂了我們的党。現在我們有两个

① 意思是做毫无意义的、沒有价值的事情。——譯者注

組織，可以想像得到，他們中間每一個按其氣質都完全符合自己成員的理想。“布尔什維克們”在黨的名義下組成了陰謀家的組織，我對它的看法就像過去黑格爾對符騰堡的憲法的看法一樣：“歸根到底其中所有的人都圍繞着一個人旋轉，他 *ex providentia majorum*<sup>①</sup> 把全部權力都集中于一身。”把全部組織權力集于一身的人肯定地說，他使黨擺脫了“國外分子”的壓制；而實際上正是現在“黨”（即它的一部分）遭到了國外分子的壓制。因為國外分子作為國外分子將比自己在中央委員會內所有其他同志更要長久得無比。那些同志遲早會被捕，而他則始終留在自己的崗位上。時間過去了，他卻不過去。既然他不過去，既然改變符騰堡的憲法完全不符合他的利益，那就不可能指望其中會發生任何變化。“布尔什維克”的組織在這裡達到了結晶體一般的“強硬性”。

另一方面，所謂孟什維克在自己的代表會議上為自己的無限地追求非集中化的意圖創造了最廣泛的場地。他們多少有點像童話中的那個青蛙公主，當伊萬王子無論如何必需在第二天早晨縫好一件禮服時，她就拿出一段珍貴的料子，把它裁成了一些小的碎片，拋到窗外，然後安祥地說道：“明天早晨一切都會是現成的。”童話肯定地認為，第二天早晨真的有一件現成的衣服從窗口飛進來了。我不知道在“孟什維克”那裡會不會發生這樣的奇蹟；我擔心不會發生，因為在我們這個時代，奇蹟是寥若晨星的，而青蛙們只會呱呱叫，更不會有任何神妙的力量。我們的敵視集中制的伊萬王子們可能會根本沒有衣服穿。但是事情無論如何已經做了前半了；料子已經裁成碎片，並且拋到街上去了。孟什維克的組織現在已經達到了模糊的群眾所固有的那種非集中化的狀態。

然則如此長久地互相爭鬥的兩方可能知足了。誰知足了，誰就用不着急躁，他可以心平氣和地想想自己的下一步。

某個時候，在納沙泰爾對於彼岸世界的罪犯們所面臨的那些

---

① 很有先見地。——譯者注

苦难应不应当认为是永恒的問題在宗教界发生过激烈的爭論。在对这个有趣的和重要的問題进行爭論的人們中間，一定要使苦难是永恒的教派特別表現了自己的“頑固性格”。当时納沙泰尔屬普魯士管，所以狀子告到了普魯士王那里。这时国王是腓得烈大帝。这位哲学家国王十分合理地处理了它。他回答說，虽然他热爱自己的臣民，很希望他們在彼岸世界不受永恒的苦难，但是如果他們硬要受这种苦难，那就 *«qu'à cela ne tienne»*（让他們按自己的意思办好了），那就让他們来世的苦难成为永恒的吧。依我看来，我們这些既不屬于“孟什維克”也不屬于“布尔什維克”的人就應該用这样的合理态度对待互相敌視的兄弟的組織意图。若是“布尔什維克”一定要使列宁的集中主义遭受永恒的苦难，那就让它去受苦难好了；若是“孟什維克”一定要充分地享受馬尔托夫的非集中化的永恒的幸福，*qu'à cela ne tienne*，那就让他們去充分享受好了。但是，自己的意图得到滿足，自己的組織理想得到实现以后，互相敌視的弟兄各人都必須回顾一下周圍的現實，并且問問自己，同他并存的所有革命組織中間哪一个組織比所有其余的組織同自己更接近呢？对于這個問題，“孟什維克”不能不回答說：“布尔什維克”組織，而“布尔什維克”則不能不回答說：“孟什維克”組織。如果这样，那么两个組織就应当考虑彼此接近。

我說的正是接近，而不是結合，不是恢复遭到破坏的統一。在現時条件下，結合会成为无法实现的幻想，然而尽管有一切組織的甚至策略的意見分歧，接近、建立联邦式的联系还是可能的。在策略上的种种意見分歧中，占最大地位的自然是《前进报》編輯部所虛构的专政，追求这种专政就有使列宁的这部分党变成 *à la*① 布朗基們和布朗基主义者們一样的阴谋家的团体的危險。自然，不能要求不贊成这种有害的意图的社会民主党人支持它。但是可以想像得到，“布尔什維克們”并不是把自己的全部力量和錢財都用

① 俄。——譯者注

来实现自己的虛幻的策略。应当认为，他們也还是在工人群众中从事积极的革命的鼓动工作。在这个积极工作的基础上可以也应该同孟什維克結成联邦。

我知道，这不是輕而易举的事；我記得

Es ist kein Zufall und blindes Loos,  
Dass die Brüder sich wüthend selbst zerstören.

駱駝穿过針眼要比俄国知識分子忘記小組的“意气之爭”容易些<sup>①</sup>。無論在“布尔什維克”中間，也無論在“孟什維克”中間都有“一些同志”千方百計地支持和鼓勵組織与組織之間現存的敌視态度。但是無論这一派或那一派那里都有具备另一种道德品质的人在焉，他們对待我們党的不幸不是无动于衷的，他們痛心地看着，我們的影响由于分裂而一落千丈。这些人唯一有权称为社会民主党人，他們應該公开地和无条件地主張接近。現在他們的沉默就会是一种不可原諒的軟弱表現。

要是他們的努力得不出任何結果呢？要是分离的影响仍然更强大呢？要知道鉴于我上边所說明的“俄国社会民主主义工人”……知識分子的心理，这是很可能的。那时又怎么办？

那时只有一条出路：不願意支持、加强和扩大我們的爭吵的同志們，应当从自己的脚上擲掉“知識分子”的灰尘，并且向工人群众中最有觉悟的分子靠攏，在积极工作的基础上團結起来，让“布尔什維克們”和“孟什維克們”去互相厮打和咬架，直到两者一条尾巴都不留下，就像著名神話中两只互相厮打的猫一样。挽救俄国社会民主党的荣誉，人人有責！

（譯自《普列汉諾夫全集》第十三卷第 305—319 頁）

① 這句話脫胎于《聖經》《馬太福音》第十九章第二十四节：“駱駝穿过針眼比財主进天国还容易些。”据說西欧各国《聖經》譯本中的“駱駝”一詞系原希伯來文“粗大的船索”一詞之誤譯；或說該詞本身即作“索”解；另一說則謂“針眼”一詞原指耶路撒冷的一些极其低矮狹窄的城門。這句話的意思都是表示不能做到某件事。——譯者注

## 我們的处境

这篇文章登載在一九〇五年十一月出版的第三期《日志》上。它主要是討論党的策略。对待自由资产阶级的态度問題实际上是本文的中心。作者在这里进一步发挥了在《論我們对待自由资产阶级反沙皇制度斗争的策略》和《分开走，一起打》等文中所提出的基本观点。他說：“尽管自由资产阶级的观点是反无产阶级的和反革命的，但是由于它采取反政府的立場，它就可能給革命的无产阶级带来利益，因此，如果我們拋棄了这个资产阶级，……我們……就会違反革命的直接的和明显的利益。”根据这种观点，作者得出了他的平行领导論，从而彻底否定了无产阶级革命领导权的思想。在他看来，既然俄国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那末俄国资产阶级就是革命的阶级。所以，只应当限于揭露资产阶级社会政治意識形态的反无产阶级的和反革命的性质，而不要从政治上使自己同它对立起来。換言之，只应当同它进行理論斗争，不应当同它进行政治斗争，否則就会犯“巨大的錯誤”。作者在《分开走，一起打》一文中提出的应当同反革命的资产阶级“互相亲善”的原理，在这里得到了充分的論证和运用。他公然抹煞自己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提出的关于资产阶级的決議案同斯塔罗維尔決議案之間的本質区别。同对资产阶级的錯誤观点直接联系着的是他貶抑农民的偉大革命作用的思想。他认为，只有当资产阶级丧失革命性的时候，农民才会“代替资产阶级出现在历史舞



台上”。

在具体策略問題上，作者也采取了反布尔什維主义的立場；反对抵制国家杜馬；主張“更加审慎地談論武装起义”；夸大軍官在起义中的作用。

还应当注意的是，普列汉諾夫在这里公开主張“必須学会掌握武器，必須武装起来”（《列宁全集》第十二卷第101頁），这同一个月以后所謂“本来就不需要拿起武器”（参看本书《再論我們的处境》一文）的說教成了很有意思的对比。

政治自由的事业很快就会在我們祖国获得胜利；这一点現在已經不能怀疑了；可以深信这一点而不会陷于空想的乐观主义，我們其所以有这种可喜的信念應該归因于我国英勇的无产阶级。現在政府向所謂俄国社会輿論所作的那些让步乃是俄国无产阶级的第一个政治上的胜利。

对于我們社会民主党人說来，这个胜利中根本沒有絲毫意外的东西。我們早就預見过它，我們早就預言过它。当七十年代初反动派击潰了当时的革命党即著名的“民意党”时，当沙皇制度的敌人們惶惑地問自己“現在該怎么办？”的时候，我們就以坚定不移的信念指出无产阶级是能够消灭意气昂揚的反动派的我国唯一的社会力量。俄国第一个社会民主主义团体《劳动解放社》的綱領声称：推翻沙皇制度应当是俄国工人运动的第一个巨大的步驟<sup>①</sup>。我在自己早期的一篇著作中曾經用这个綱領的精神重述了馬克思的話（自然馬克思是从另一个角度來說的），我說过：一旦社会民主主义思想深入到无产阶级的队伍，一旦兴起現代意义下的即革命的工人运动，这个运动就会摧毁沙皇制度腐敗的建筑物，像地震摧毁某个什么鸡窝一样。我在一八八九年巴黎国际代表大会上也

<sup>①</sup> 参看《普列汉諾夫哲学著作选集》第一卷，三联书店一九六二年版第412頁。——譯者注

完全是用同样的精神說过：俄国革命运动将作为工人运动而获得胜利，否則就根本不会胜利<sup>①</sup>。

我的这一部分或那一部分同志們經常在某个个別問題上同我发生意見分歧，但是对于这个思想任何一个俄国社会民主党人都跟我沒有不同的意見。它始終构成了我們的政治信条的基础。正是因为說它构成了我們的政治信条的基础，人們曾經責备我們狹隘、教条主义和冷酷无情；有人對我們說，我們選擇了过分緩慢的道路。但是生活是自然而然地进行的，当流傳的反对我們的殘酷的譴責还没有来得及靜息下来的时候，所有的人或者几乎所有的人（因为生而盲目的人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不会絕迹的）都开始明白了：如果我們这些俄国各族人民的儿女可以有夺取自由的政治机构的希望，那么这种希望就应当以我国无产阶级解放运动的发展为依据。現在这种希望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得到了证实。我們的敌人还远沒有完全被战胜；但他們已經在退却，他們的队伍已經分崩离析了，陣地仍然在无产阶级手中，整个文明世界都屏声息气地注視着战斗的进行。这是一次巨大的政治胜利，这是俄国历史上空前未有的事件。

但是請讀者注意（我想我这个“狹隘的”馬克思主义者有权怀着合法的自豪感作这个补充），这个巨大的政治胜利同时也是我們的理論方法的胜利，因为正是这个方法曾經使我們有可能老早以前就預見到現在在我們祖国所发生的事情。从实际工作的同志們，請你們不要輕視我們的理論吧，因为它是使实际工作获得成功的不可替代的工具！

我說过，整个文明世界曾經仔細地注視着我国无产阶级同沙皇制度进行搏斗的过程。这是千真万确的。其所以如此，是由于两个十分重大的原因。第一，早就扮演全欧宪兵角色的我国沙皇政府早就敌視各个文明国家中所有逐渐进步的居民阶层。第二，认

---

<sup>①</sup> 參看《普列汉諾夫哲学著作选集》第一卷第54、467、469頁。——譯者注

真对待我国正在进行的斗争的这种态度还由于这样一个重要的情况：这个斗争正好是无产阶级进行的。根据《共产党宣言》十分中肯的说法，无产阶级如果不摧毁压在自己背上的全部上层建筑，他就不能挺起腰来，不能动弹<sup>①</sup>。资产阶级很懂得这个道理，因此每当无产阶级伸直自己弯着的腰的时候（不过他们这样做并不是为了直接同资产阶级斗争，而是为了同反对他们本身利益的那些统治者斗争），资产阶级就担心，他们的腰挺得太直了。现在的情况也是如此。

为了同沙皇制度进行斗争，我国无产阶级采取了**总政治罢工**，换句话说，他们正是采取了现代西方无产阶级当作自己在反对资产阶级的解放斗争中最有效的（在现在的条件下）手段看待的那种斗争手段。总罢工在西欧早就实行过了（例如在比利时、荷兰、瑞典、意大利）。不过在瑞典和意大利与其说它是用来进行坚决的攻击，不如说它用来示威，而在比利时和荷兰它得到了否定的结果。不错，一八九三年比利时的无产阶级利用总罢工夺得了**选举权**。但是我们的比利时同志们自己就承认，他们所领导的工人阶级当时其所以得到了胜利，主要是因为资产阶级遭到了出其不意的突然袭击。一九〇二年，当比利时无产阶级因为不满意他们九年前从资产阶级那里得到的政治上的让步而重新举行总罢工来夺取普遍和平等的选举权的时候，资产阶级已经作好了反击的准备，他们善于坚守住自己的保守主义立场。一九〇三年四月五——十日荷兰总罢工以更彻底的失败而告终。俄国的总罢工在莫斯科工人的发轫下开始了，短期间内它就伸展到我国西疆地区，同时也蔓延到西伯利亚和土尔克斯坦，而且坚决地采取空前未有的规模，所以这次规模宏大的罢工的意义就在于它具有极其重要的社会政治经验。这个经验，即无产阶级同不习惯于作让步而且有准备反击的时间的政府进行斗争的经验，在各国社会民主党人对总政治罢工问题

---

<sup>①</sup>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卷第477页。——译者注

所发生的爭論中当会提供出肯定的或否定的理由。而我国的总罢工越是普遍展开，它越是破坏社会生活的一切机能，它越是清楚地证明无产阶级不可一世的革命能力，甚至衷心願意政治自由在俄国取得胜利的那一部分西欧资产阶级也会摇头摆脑地表示怀疑。至于这个资产阶级中間更保守的部分，則很快就丧失了对我国“无政府状态”的任何同情。几个星期以前，这个资产阶级的一家机关报曾經把我国的所謂无政府状态称为整个文明世界的大不幸。假使我們采取这个机关报的观点，我們就会要承认，我国的总罢工对于保守的资产阶级說来确乎是很大的不幸。它具体地表明了无产阶级在现代社会生活中的全部巨大意义，它增加了各国无产者豪迈的自信心。还没有哪一个地方发生过像我們这样規模如此宏大、像俄国这样成就如此輝煌的总政治罢工。俄国无产阶级奋不顾身地跟沙皇制度作斗争，同时也为全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开辟了道路。这就說明，为什么保守的资产阶级认为他們的不断增长的成就是一种不幸，这也說明，为什么国际无产阶级怀着如此热烈的同情欢迎这个不断增长的成就。

在这里我想起阿姆斯特丹国际社会党人代表會議上发生的一件不愉快的事情。当所謂的社会主义新方法的拥护者們看到著名的德累斯登決議很可能为大多数出席代表會議的各国代表所接受的时候，他們就企图預先減輕阿姆斯特丹決議的分量。我們的比利时同志安塞尔大声說道：“难道像俄国、波兰、西班牙、保加利亚和日本这样一些国家会給欧洲无产阶级指明道路么？”

我們、被安塞尔所指名的国家的代表，对他的奇怪的攻訐提出了抗議。第二天，当社会党国际局开会的时候，我同其他一些国家的代表就这件不愉快的事情交談过，我对他們說：“現在，俄国无产阶级的运动对于欧洲的进步說来早就比安塞尔同志由于迷恋合作社而打算用来摧毁資本主义社会的那些大圓面包和馬鈴薯具有不能相提并論的巨大意义。”

最近两周的事件证明我的看法沒有錯。

我想到这件事并不是因为要再一次指出安塞尔同志的說法是很不妥当的，尽管这个很不妥当的說法应当受到最严厉的譴責。我想起这件事是因为国际无产阶级現在对我国工人阶级的极端同情的态度告訴我們，和上述安塞尔的判断类似的判断由以产生的那个心理基础是从哪里来的。这个同志之所以想撇开俄国是因为他不了解俄国工人运动的发展情况，而他之所以不了解这个运动，又是因为对于俄国和俄国国内发生的一切事件都被沙皇政府用中国式的长城把文明世界的視線擋住了。国际代表會議期間在阿姆斯特丹举行的一次群众大会上，我对自己的听众說过：“如果我要你們相信北冰洋的白熊为了保卫自己的利益建立了工会，那么你們对待这个消息的态度就不会像对待俄国現在正发生着强大的工人运动的消息一样觉得可疑。你們大家都以为在我們国家里产生工人运动是完全不能設想的，然而它存在着，它一天一天在发展，由于自己有工人阶级，俄国正在进入文明民族的大家庭，而且——天曉得！——也許不久以后我們会在莫斯科或者彼得堡召开国际社会党人代表會議。”我的听众們向我表示了自己的贊成意見，然而我认为他們中間只有少数人对我的话是深信不疑的。那时許許多多的西欧社会主义者都像安塞尔同志那样不大相信俄国的工人运动。現在所有的人，無論是朋友或者是敌人，都相信它了，因为現在不相信它是不可能的，因为現在我国无产阶级在整个文明世界面前表現了自己巨大的力量，尽管我还不知道我們是不是会很快地在彼得堡召开社会党人代表會議，但是我不怀疑（而且任何人都不能怀疑这一点），由于我国无产阶级的存在，我們国家的确进入了文明民族的家庭。

再說一遍：最近一些日子的事件乃是我国工人阶级的偉大胜利，而且我們有完全合法的权利为这个胜利高兴，因为早就严重损伤了我們肩膀的那个挽輓终于折裂了。但我們沒有权利忘記，而是必須記住，挽輓还只是折裂，如果在第一次胜利以后不繼續使沙皇制度遭到新的和更有决定意义的失敗，反动派的奴僕們就会很

快从无产阶级手上把它第一次胜利的果实夺回去。还是拉薩尔說得对，他說，反动派的奴僕們不是夸夸其談的人，他們善于坚持自己的意見。我国反动的奸臣佞党現在惊慌失措了，但是他們的第一次受惊很快就会过去，他們会重新着手制造反对自由的阴谋。我們大家、所有珍惜这个自由的利益的人，現在都应该准备着尽量迅速地扩大和始終不渝地巩固自由的成果。

現在幻想比任何时候都要對我們有害。我們同他打交道的人是一个类似沙皇制度的智多星烏里斯<sup>①</sup>那样的人。他用敷衍的手段沒有把款賠給日本人，这样就爭得了尼古拉二世的寵愛。現在他受托同革命进行外交談判，其目的在于把我国专制君主应当要付出的那个賠款降低到最小限度。維特伯爵看来是希望成功的，他拟定了一个不坏的計劃；但是俄国革命不会上他的圈套，如果尼古拉二世不付給革命巨額的賠款，那就除非他出奔国外。而这种出走就会是革命的最大胜利，因为这就等于是沙皇宝座的复灭。

机智的伯爵的計劃究竟是怎样的呢？这位老练而且聪明的大臣对全俄国的专制君主說过：“不要害怕政治自由，它不会引起革命，而会預防革命，因为革命不符合社会利益，因为社会一旦得到政治权利，就会同我們締結反对革命者的联盟。”在这些話中間包含着很大一部分真理。

我国的社会，即我国的資產階級，即我国真正的資產者和我国資產階級化了的地主，这些市民阶层中的貴族，希望有政治自由，但是不希望革命，为了避免革命他們可以牺牲很多东西。

在最近时期，我国許多人士談到国家杜馬时叫喊什么資產階級叛变。但是資產階級究竟能够叛什么变呢？無論如何不是背叛革命，因為他們任何时候都沒有为革命思想服务过。我国的資產階級絲毫不打算成为革命軍队的战士，这一点我們早就應該从他

<sup>①</sup> 羅馬人对奧德賽的称呼。《伊里亚特》和《奧德賽》中的主角。圍攻特洛依城时行木馬計，遂有“智多星”之称。此处系指維特伯爵。——譯者注

們的 moderne style<sup>①</sup> 思想家的理論活動中深信不疑了，這些思想家把自己智慧的主要力量都集中在使讀者群眾相信革命概念本身的毫無根據。只要引證一下現在主編《解放》雜誌的彼得·司徒盧威用俄文和德文寫的文章就可資證明。的確，這位自由派思想家消滅了原來意義的社會主義革命概念。的確，並不是社會主義革命的任何敵人都會成為任何一般的革命的敵人。但是司徒盧威先生和他這一類高談哲理的政論家曾經如此努力地證明和平發展的優點，他們曾經如此小心地和溫和地批評我國現存的制度，以至連普列韋<sup>②</sup> 即使在自己最糊塗的時刻也未必會把他們算作革命者。我國資產階級早就成熟得足以不同沙皇制度和睦相處了。因此要是以為他們會滿足於始終根本不觸及沙皇政權的一切特權的布里根杜馬，那是可笑的。但同時他們又害怕革命，因為革命一定會把無產階級和農民提到我國歷史舞台的前台。因此他們高高兴兴地表示願意接受我國這位新受封的伯爵現在用來引誘他們的那些讓步。從這方面看來全部問題在於維特先生能夠在何種程度上實現他許下的諾言。對於這個問題彼得堡的特列波夫將軍閣下和敖得薩的考里巴爾斯將軍閣下對他們作了十分確定的回答：我們要盡我們所有的一切力量使他不能實現這些諾言。維特先生賜給我們“全部自由”<sup>③</sup>，而特列波夫先生和考里巴爾斯先生（而且不止是特列波夫和考里巴爾斯，任何一個警察所長、任何一個哥薩克大尉也都一樣）則槍殺示威遊行的人，毫無理由地襲擊“猶太佬”，這種奇怪的两重局面實際上意味着什麼呢？這就是說，維特的影響遠不是萬能的，它在相當大的程度上為反動的宮廷黨羽的影響所削弱。而維特先生的影響越是被削弱，實現他的機智的計劃的機會就會減少。為了使資產階級同尼古拉二世締結和平，必須使我國的

① 有現代風格的。——譯者注

② 全俄憲兵團的首腦、一九〇二年四月以後的內政部長、沙皇政府實際上的決策人。——譯者注

③ 《晨報》的說法。——著者注

政治制度即使部分地，即使一半地适应我国的以資本統治为特征的經濟关系。資本按其本质說來是机会主义者。它不会浪費一个戈比去爭取思想的胜利，它甚至鄙視自己本身的思想家，也許鄙視他們比鄙視所有其他的人更甚，但是它很懂得它自己的利益，它很好地知道現在沙皇专制制度是橫在俄国整个經濟发展道路上的障碍，因而也危害它的最重要的經濟利益。所以它不能不力求取得政治权利，只要特列波夫之流的先生們仍然妨碍維特先生实现他的計劃，我国資產階級就总是不滿的。我們在自己的策略中应当記住这一点。我国資產階級在政治上的不滿对于俄国革命事业是大有利益的，如果我們不全神貫注地利用它，我們就会犯巨大的錯誤。

自然，可以因为我的这个結論責备我本人有机会主义思想，也可以因此用一大堆革命的詞句对我进行猛烈的抨击。但是，并不是任何說“上帝上帝”的人都会进天国，也不是任何叫嚷“革命革命！”的人都在为革命事业服务。恩格斯在七十年代分析法国布朗基主义者的一篇声明时，曾經坚决地警告自己的門人不要迷恋于革命的空談，說只有无政府主义者才会这样迷恋，他指出，在从事革命空談方面，无政府主义者早就实现了人类的最高纪录。此刻，在剛剛醉心于我們的第一个巨大的胜利的时候，我們特別要記住我們的导师这个一針見血的評語。沉湎于革命空談对社会民主党人說來是可耻的。社会民主党人坚持唯物主义历史观的立場。

从唯物主义历史观看来，任何特定的政治斗争的进程和結局都取决于社会力量的对比，这种力量对比反过来又是建立在社会階級利益的相互关系的基础上。

我們首先应当考虑利益的相互关系。

如果我們利用了这种相互关系就可以促使本来会联合起来同我們斗争的那些社会力量分离开来，那么我們就履行了自己作为革命者的直接义务。如果誰忽然想要譴責我們有“政客作風”，那只是证明他完全沒有把握我們学說的精神。



我在我們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說过：salus revolutiae——suprema lex<sup>①</sup>。現在，鉴于俄国发生的事情，我要重申：salus revolutiae——suprema lex.为了革命的成功，我們必須善于利用宮廷奸党的反动阴谋、特列波夫之流的反动暴行在资产階級队伍中将要引起的所有那些不滿情緒。我們越是更好地利用这些阴谋，我們就越会妨碍維特先生实现狡猾的計劃，而这位可敬的伯爵要逃避支付对自由的賠償就会越困难。

很可能，我的話会使我的某些同志感到惊讶，也許甚至会使我的許多同志感到惊讶。关于对待自由资产階級的問題在我們这里現在流傳着一种奇怪的观点，即认为这种态度在任何条件下都应当是绝对否定的。但这是一个很大的錯誤，在这里指出这个錯誤是有益的。科学社会主义的奠基人——馬克思和恩格斯——任何时候也沒有贊成过这种态度。《共产党宣言》上的一頁文字就证实了这一点，在那里，他們痛斥当时德国“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对德国自由资产階級的不适时的攻訐。这一頁文字从策略的观点看来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現在我們的同志們應該把它讀得烂熟。

宣言的两位作者說道：“德国的特别是普魯士的资产階級反对封建主和君主专制的斗争——簡短些說，自由主义的运动——已愈来愈严重了。

于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就有了盼望已久的机会，把社会主义的要求同政治运动对立起来，因循慣例地詛咒自由主义、代議制国家、资产階級的竞争、资产階級的出版自由、资产階級的法、资产階級的自由和平等，并且向人民群众大力鼓吹，說什么在这个资产階級运动中，人民群众不仅一无所得，而且还有失掉一切的危险。德国的社会主义恰好忘記了，法国的批評（德国的社会主义不过是这种批評的可怜回声）原是以現代的资产階級社会和与它相适应的物质生存条件和相当的政治机构为前提的，而这一切前提当时在

---

① “革命的利益是最高的法律”。——譯者注

德国正是尚待爭取的。”<sup>①</sup>

我國現在的問題正是夺取《共产党宣言》問世时德国曾經为之而斗争的那些社会条件，我們也应当避免当时德国“真正的”社会主义者所犯的、受到馬克思和恩格斯如此激烈嘲笑过的錯誤。

不錯，我們并不完全是像他們那样行动的。我們并不咒罵資產階級自由；我們已經懂得，資產階級自由对于工人运动的进一步发展是必要的。但是我們还没有懂得，如果資產階級自由对于工人运动的进一步发展是必要的，則自由主义的反政府立場对于夺取資產階級自由也是必要的。因此我們利用每一个适当的場合，甚至(那就更坏得多)每一个不适当的場合，来詛咒自由派。我們管这种做法叫做**把自己同資產階級对立起来**。不过要知道，德国真正的社会主义者也把自己同資產階級对立起来，但是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自己必須尖銳地譴責他們所采取的对立方式。为甚么他們这样认为呢？原因很简单，就是德国“真正的”社会主义所实行的这种对立方式損害了夺取資產階級政治自由的事业：“这种社会主义就成为德意志各邦专制政府及其一班随从——僧侶、学監、頑固守旧的容克和官僚順手抓来吓唬那来势汹汹的資產階級的一个稻草人。”<sup>②</sup>

“既然‘真正的’社会主义就这样成为德意志各邦政府手中用以对付德国資產階級的一种武器，那么它同时也就成为直接表現反动的利益，即表現德国市儈的利益的一种手段。”<sup>③</sup>

很明白，在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心目中，**只有不加强德国专制政府及其一班保守的和反动的随从的陣地的那种社会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对立才是好的**。然則我們可不可以肯定說，**我們把自己同資產階級对立起来这种方式任何时候也不会有这种不可原諒的缺点呢？**可惜，我們不能这样肯定說。举一个明显的例子。

① 參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卷第 496 頁。——譯者注

② 同上，第 496—497 頁。——譯者注

③ 同上，第 497 頁。——譯者注

我們的一个委员会(讀者自然会了解不能指出它的名字,而且也不需要这样做),在給我的一封信中这样描述它不得不采取行动的那个偏僻地方的可悲的局面。

“您自然很了解現在外省我們社会民主党人不得不在那里进行工作的环境是多么艰苦。横行霸道的反动派用一切手段力求铲除深入俄国一切角落的‘叛逆精神’。环境被流氓行为、种种暴行、出售的书刊所散布的謊言弄得烏烟瘴气。有組織的‘黑帮分子’直接对居民使用恐怖手段。最糟糕的自然是在像我們这样的地区沒有大工业企业的无产阶级,而不得不在手工业者——帮工和碼頭工人中間进行工作。这里的人的心理也不一样,而且远离大的中心地区使得生活的脉搏跳动得更加緩慢。在这种环境下組織宣傳鼓动工作是相当困难的……不得不从旁观察着‘打倒专制制度’的口号怎样在无产者中間引起一陣狂怒,人們怎样連看也不看就把傳单撕掉。更糟糕的是:社会民主党在許許多多的工人眼里只是一个同工人阶级的利益根本沒有共同点的政党。”

这样的局面无疑是可悲的,应当用一切力量来改进这个局面。但是您以为我們各地的同志們为了使当地的工人群众對我們党有一个正确的了解做了些什么工作呢?我敢打賭:您絕對猜不着。听我告訴您吧!他們从当地的报刊上利用了某些借口开展了强大的反对……自由派的运动。您看,这岂不是再恰当不过了么?破坏了自由派在当地工人群众眼中的威信以后,我們的同志們現在大概可以毫无畏惧地高呼“打倒专制制度”了吧!

想出这种異常恰当的行动方式的同志們很像永垂不朽的德国真正社会主义者。《共产党宣言》对后者所作的分析對他們說来也是完全适用的。我之所以特別认为自己必須大声地說出自己的这个信念,是因为这些同志极其錯誤地把我的名字同自己的文坛伙伴們胡乱地拉扯在一起。

作为极有能力的革命者的民意党人曾經力图使我們的社会相信,“在党的任务的現代提法下”,自由派的利益同革命运动的利益

是一致的<sup>①</sup>。对于他們說来，这样做是很不容易的，因为他們对党的任务的提法同这个論断是根本矛盾的；因为在他們看来，应该在推翻我国沙皇制度的革命那里“期待”（他們当时的“理論家”列·吉荷米洛夫先生的著名說法）**俄国社会主义組織的开始**。不用說，这样的“組織”是完全不符合自由派的利益的。不錯，自由派始終在一定的程度上同情“民意党人”，但是这种情况之所以发生，唯一原因是民意派关于社会主义組織的預言在他們看来乃是幼稚的空想，它不是威胁**资产階級經濟制度**的任何严重的危險，这种制度的利益要求我国旧政治制度的崩潰。既然自由派**認真地**接受了民意派的綱領，所以他們当然产生了这样一种信念，即认为他們的利益本身同革命者的利益是有最根本的分歧的。对待我們的綱領就不是这样。我們中間誰也不“期待”，現在在俄国开始的革命将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因此我們更容易实現在可靠的革命本能和对革命运动需要的正确了解的推动下的民意党人所追求的东西。

早在一九〇一年登載在《曙光》第二——三期上而且得到我們当时**全体編輯部**同人同意和贊成的《往后怎么办？》一文中，我就指出了这个极端重要的情况。<sup>②</sup>

我在那里說过：“从現代科学社会主义的观点看来，任何关于**社会主义变革**是俄国革命运动的最近目的的空談都是完全和絕對沒有根据的。革命运动的最近目的是**推翻专制制度**，推翻了专制制度就可以保证俄国无产階級的政治权利和政治自由，使他們有广泛的机会生长、成熟、发展和組織起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的胜利不能同专制制度的崩潰同时并举**。这两个时刻之間必需有一个相当长的時間間隔互相分离开来。而正是因为它們在時間上是互相分离的，**社会民主党人**在自己同专制制度的不可調和的斗争就有充分的权利而且毫不反对自己地向所有应当知道和懂得这个道理的人指出，他們的利益現在同我国社会中主張自

① 参看《人民意志日历》上登載的便覽“党的准备工作”。——著者注

② 这篇文章曾經在俄国的一个地方委员会秘密印刷所里重印过。——著者注

由思想的那一部分人的利益是一致的。”<sup>①</sup>

我在同一篇文章中繼續說道：“只要自由主义的社会真正成熟到理解我們祖国現存的那种政治力量对比情况，它就不能要求我們放棄我們的最終目的，因为这种放棄会严重地危害解放运动。它應該懂得，而且已經部分地懂得，我們喚醒和提高工人的階級觉悟的工作現在乃是在俄国人民中建立革命力量的最正确的方法和俄国的政治解放运动的最可靠的保证。它應該懂得，而且已經部分懂得，社会民主主义的宣傳在工人中間每一次新的成功都相当于沙皇制度的新的失敗。它應該懂得，而且大概已經部分地懂得，夺得政治自由給它带来的直接利益会比給工人階級的大得多，但是斗争的主要重担却会落在工人階級身上。我們的最終目的并不会使我們离开我国社会的先进分子，除非我們不善于好好地向他們說明自己最近的政治任务。工人出来救援受到警察攻击的大学生，这种行为很容易使我們的社会正确地了解我們的这种任务。”<sup>②</sup> 我們应当利用这种情况。現在也許只有某些人了解我們。这样做就会使所有的人都了解我們。那时一定会有許多人同情我們。”<sup>③</sup>

如果現在，写完这几行文字以后又經過了几年的現在，我們問問自己，我国自由社会中是不是有許多人同情社会民主党，我們就不得不否定地回答說：不，不很多。为什么会这样呢？

这有两个原因。

第一，自由派和資產階級民主派的本能必然会叫他們产生使无产階級从屬於自己本身的影响的願望，从而迫使他們用仇視的态度对待作为无产階級革命意图的天然表达者的社会民主党人。

有时我們看到，正是自由主义和資產階級民主派的最有觉悟

---

① 參看《普列汉諾夫全集》，俄文版第十二卷第162—163頁。——譯者注

② 指一九〇一年二月十一(二十四)日的莫斯科事件。当时莫斯科的工人包圍了練馬場，想救出关在里面的大学生。——著者注

③ 參看《普列汉諾夫全集》，俄文版第十二卷第164—165頁。——譯者注

的代表用最大的仇視态度对待社会民主党。在这里可以說，階級的偏見蒙蔽着他們的理智，从而妨害他們依遵正确的政治計算的指示。無論这种現象怎么令人失望，然而我們不能用我們不能拋棄社会民主主义观点这样一个簡單的原因来消除它。进而言之，我們也不可能从这一方面去对待消除它的过程，因为这正是我們不能不把自己同資產階級对立起来的那个方面，也正是我們为了不可耻地背叛自己而应当使自己同它对立起来的那个方面。当資產階級的代表企图用自己的观点来控制工人的观点时，我們就应当揭露資產階級社会政治意識形态的反无產階級和反革命的性質。因此我在我向我們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提出并且为它所通过的決議中建議我們的同志們在无產階級面前揭露彼·司徒卢威先生的宣傳的真正性質。但是为了从这方面使自己同資產階級对立起来，就应当发展工人的整个的世界观；应当向他們叙述我們的理論的主要原理，——一句話，应当占領一般說来我們的实际工作者們极不願意占領的那个領域。我們本身对于我們理論的基本原理就掌握得不好；我們本身就不善于把自己的思想体系同資產階級的思想体系对立起来。证据就是：所謂經驗一元論者——輩新的馬克思“批評家”装扮成最革命的模样，至今一直在我們的队伍中效劳。如果我們认真地分析一下“把自己同資產階級对立起来”一語，那就会完全不可思議了。但問題也就在于：我們对这些話的了解是十分肤淺的。因此就出現一种初看起来完全不可了解的現象：我們那些比一切人都更高声地叫嚷反对机会主义的同志跟这些馬克思的批評家訂立着实践上的联盟，这就是說，他們本身原来就是有害的机会主义者。因此，我們极端肤淺地了解“把自己同資產階級对立起来”这句話，凡是为了事业的利益我們本应当把我們的自由派和我們的民主派吸引到自己方面来的地方，我們都使他們离开自己。

說到这里，我要指出妨碍自由的和民主的資產階級深切地同情我們社会民主党人的第二个原因。

上面我举出的我們的一个偏僻的委员会的例子說明，在企图喚醒我国工人阶级的政治思想的时候，我們的行动远不是始終合理的和合乎策略的。为了挽回那种因以使工人准备同敢于高呼“打倒专制制度！”的人断絕关系的可悲的局面而攻击自由派，这种做法无异于(用民間的說法)不拿耗子倒咬鸡。敌視资产阶级的无产阶级远不是始終以专制制度敌人的姿态出現。維特先生看来比我們更好地懂得这一点，他在同铁路工人和職員的著名談話中曾經竭力唆使他們反对自由资产阶级。我們，由于自己政治上的不策略行为，曾經有多少次不拿敌視我們的“耗子”而咬鸡啊！然而可以认为我們的代表之离开今年七月二十三至二十五日在莫斯科举行的铁路工人全俄联盟第二次代表大会这个事实，恐怕是我們惊人的灵活性的最杰出的表現。为了边区的个别代表會議的問題而离开这次代表大会，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孟什維克”这一次同“布尔什維克”一道行动)就达到了他們希望予以避免的直接相反的結果：他們扩大了资产阶级民主派对工人阶级的影响。可以想像得到，在不久前的铁路罢工时期，他們已經明白了自己的錯誤，并且对它深表过遺憾。<sup>①</sup>

某些人所謂的我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实际上它是这个党的一部分的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对待自由派的态度”的下列決議：

“鉴于

(一)如果资产阶级是革命的或者仅是站在反政府立場同沙皇政府斗争，社会民主党就应当加以支持；

(二)因此社会民主党就应当欢迎俄国资产阶级政治意識的觉

---

① 当我在伯尔尼俄国侨民會議上向我們的同志們提出这个責备的时候，崩得分子 T. 企图抓住我的矛盾。他說：“您承认边区的个别代表权，因为您承认民族自决。然而您反对崩得支持犹太人文化自治的意图。”時間不允許我詳細答复 T-н 同志。这位同志承认民族自决权。但是他反对犹太复国主义这样一种形式的自决。这是 T-н 同志在譴責我的矛盾以前必須摆脱的一种矛盾！——著者注

醒。但是另一方面，資產階級解放運動所具有的局限性和不充分性，不論在何處表現出來，社會民主黨都有責任在無產階級面前予以揭露；

因此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第三次代表大會堅決地勸告同志們：

(1) 要向工人們說明，所有各種色彩的資產階級民主派，從代表着廣泛的土地所有者和工廠主的溫和自由派起，到以‘解放’社和許許多多自由職業者團體為代表的急進派止，都具有反革命和反無產階級的性質；

(2) 據上所述，就要進行堅決的鬥爭以反對資產階級民主派的掌握工人運動並代表無產階級或無產階級某些團體進行活動的任何企圖。”<sup>①</sup>

我們應當用全力（不過自然是用有分寸的方式）起來反對大資產階級或小資產階級使無產階級服從自己的影響的任何企圖，這是不會有絲毫懷疑的，也是絲毫不能懷疑的；如果我們不這樣想，我們就不會是社會主義者。如果我譴責了我們的離開七月鐵路代表大會的莫斯科同志，那正是因為他們的所謂不妥協性為急進的資產階級之影響工人掃清了道路。但是這一結論的正確性不會改正決議中這個結論以前的那個結論的片面性。

前面的那個結論的明白的意思是：一切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派別”都具有反革命的 and 反無產階級的性質。但是如果這樣，則為什麼我們應當歡迎（像同一個決議前面所說的一樣）俄國資產階級政治意識的覺醒呢？為什麼我們又要支持這個資產階級呢？不錯，決議只是要我們在它是革命的那個限度內支持它。但是要知道甚至資產階級的革命運動也不能不是反無產階級的，因之也就是反革命的，像決議所說的那個意思。因為資產階級的革命運動不能成為無產階級的革命運動。就是說兩者必居其一；或者我們違背《共產黨宣言》，一般而言不應當支持革命的“或僅僅是反政府

<sup>①</sup> 參看《蘇共決議選輯》（三），人民大學出版社，一九五六年版第 57—58 頁。——譯者注



的資產階級”，或者我們应当支持，而不問它的反無產階級的和反革命的性質。真理究竟何在呢？無論如何不在我所分析的決議那邊，因為這個決議（它重復着已經記熟的、但是它的作者們消化得不好的詞句）只會把事情搞亂。

有人可能向我說，我向第二次代表大會提出的並且為大會所通過的決議同所謂第三次代表大會通過的而我却不贊成的決議很相像。外表上的確相像，不過只是外表罷了。我的決議沒有一般的性質；它沒有作過一般的“指示”；它是專門反對彼·司徒盧威先生的，因為還在不久以前他就以馬克思主義者的身分出現，他的資產階級說教可能被某些沒有經驗的無產者當作溫和的社會民主主義傾向的宣傳加以接受。<sup>①</sup>同時我的決議卻為所謂第三次代表大會簡簡單單地加以“廢除”的斯塔羅維爾的決議所補充。

為了辨明真理，且舉一個明顯的例子。

在第一〇六三七號《新時報》（一九〇五年十月十四/二十七日）上我發現了如下一則電訊：

“薩拉托夫，十月十三日（СІІА）。昨天的事件詳細情形。昨天，當城外舉行的群眾大會散會的時候，哥薩克同群眾發生了衝突。群眾開槍擊傷了兩匹馬。這時向第二警察區進發的兩百人被捕了，現在其中有一百七十人得到釋放，但是一走出該區就在門外和街上遭到哥薩克的毒打。當杜馬全體成員來到第二區的時候，已經只有三十名被捕者了，他們表示說自己並未挨打，但是被釋放的人挨了打。警察局長答應給杜馬一份供調查用的釋放者的名單。在恢復了會議以後，杜馬決定：（一）選舉一個委員會調查這次可悲的事故，（二）提出立即把會引起風潮的哥薩克調離薩拉托夫的請求，（三）停止城市對哥薩克的住房供應，（四）發電詢問當各地都準備在城里開大會的時候為什麼薩拉托夫不讓開這樣的會議，以及（五）選舉一個委員會處理當前局勢所產生的一切事情。全體議員

<sup>①</sup> 我的決議不過是我在《曙光》上針對彼·司徒盧威先生而發表的一些論文的結束語罷了。——著者注

都参加这个委员会。”

我要问，萨拉托夫杜马上列行动具有怎样的性质呢？可不可以管它们叫反革命的和反无产阶级的呢？我们又是不是应该支持这类行动呢？

显然，在杜马的这些行动中没有任何反革命的和反无产阶级的东西。恰恰相反，这些行动是有利于革命无产阶级的。因之为了自己事业的利益，我们不仅有义务支持这类行动，而且要尽可能引起这类行动。这是明明白白的。

但是另一方面，萨拉托夫杜马的这些行动还完全不表明，它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或者即便只是革命的立场也好。这也是明明白白的。这也不需要证明。萨拉托夫杜马的自由主义至今都有过分温和的特点，以致很象是保守主义。而且它的情绪大概已经是反无产阶级的了。但是这种情况并没有妨碍它采取若干有利于革命无产阶级的行动，这些行动我们必须用我们所有的一切手段加以支持。

由此可以得出一个不容争辩的和对于我们的实际活动很重要的结论：尽管自由资产阶级的观点是反无产阶级的和反革命的，但是由于它采取反政府的立场，它就可能给革命的无产阶级带来利益，因此，如果我们一成不变地抛弃这个资产阶级，对自己和别人说，现在根本不能期待它会为自由的事业作出什么成绩来，那么我们这样做就会违反革命的直接的和明显的利益。

前几天在一次大会上，有人用问题的形式向我提出了下面的反驳：但是究竟谁应当跟着谁走呢？资产阶级跟着无产阶级，还是无产阶级跟着资产阶级呢？

向我提出这个反驳意见的人表明他对科学社会主义没有丝毫概念。

如果我们对无产阶级说：“跟着资产阶级走吧”，那我们就等于给社会民主党签署了死刑判决书。社会民主党只有在无产阶级不愿意跟着资产阶级走的时候才能存在。

如果我們对資產階級說：“跟着无产階級走吧”，那我們的聲音一定会成为荒漠的呼聲，也等于向壁清談，毫无意义。資產階級不可能跟着无产階級走，否則就是給自己簽署死刑判決書，它自然沒有也不可能有絲毫願望这样做。

我們不会自杀，也不会要資產階級去自杀，而应当告訴和提醒資產階級，它本身的利益在于专制制度的崩潰，因此它应当支持无产階級的革命活动，因为这些活动的鋒芒是指向我国現存的政治制度的。

怎样做到这点呢？

請用心想想下面这篇登載在《工人代表苏維埃消息》第二号上的呼聲书的意义吧。

“告工商业全体雇主书

“整个俄国都在罢工。律師、医生开始了罢業，官吏停止了办公，銀行職員开始了罢工，宗教学校和中学校的学生开始了罢課。整个俄国都在罢工。他們罢工反对专制制度，反对官僚制度，反对沙皇和朝廷朋党如此长期地用以控制俄国人民的奴隶制度。現在报复的时刻来到了。人民要从世世代代的枷鎖下解放出来。雇主們，专制的沙皇曾經不止一次地沉重地压迫过你們。警察掠夺过你們，不公正的法庭使你們破过产，高級官吏欺侮过你們。雇主們！如果你們希望过更好的生活，如果你們希望不再做奴隶，而要做人 and 公民，你們就应当参加全俄总罢工。少忍受压迫和屈辱比終身忍受好些。請支持为全体人民的自由和幸福而奋斗的战士吧，同我們联合吧，关闭工厂、工場、商店和所有的工商企业吧。

“如果你們不同意这样做，你們就是出来反对全体人民，那时任何警察、任何軍隊都保卫不了你們。連自己也救不了的专制制度，是不会把你們从人民的报复下救出来的。罢工無論如何应当是全面的，因此总工人代表會議决定要求你們立即关闭所有的工商企业。如果你們不执行这一要求，你們的商店將被打破，你們的机器將受到损坏。

“关闭工厂、工场、商店吧。立即关闭吧，关闭吧，不然就晚了，不然你们就成了人民的怒火的牺牲者。”

这里有威胁。这种威胁是否适宜，我此地不拟评判。也许它是不得不然的。然而无可怀疑的是，进行报复，一般说来，总比受到有可能妨碍报复的威胁要好一些。但是，指出专制制度的沉重压迫和警察的匪盗行为，说明无产阶级的胜利会把雇主自身变成人和公民，这应当承认是完全适宜的和非常成功的。我认为指出这个情况和说明这个道理不会没有影响。如果我们不愿意像“真正的”德国社会主义者那样不合时宜地随意“咒骂”资产阶级，我们就应当正是用这种语调同资产阶级说话。

现在，当警察所组织的不断发生的大规模的匪盗行为又向我国自由派指出，不能相信沙皇政府的奴僕，而且甚至是維特所作的那些毫无价值的让步明天就可能被特列波夫或者任何其他赤裸裸的专制制度的拥护者夺回去的时候，我们特别需要这种语调。

从这个意义说来，大规模的警察匪盗式的“暴行”大大地损害了維特的计划，同时也损害了统治我国的王朝的利益。我们应当利用反动佞党的这个可恶的错误，而不要用反对自由资产阶级的不策略的越轨行为使它得到改正。

现在有许多人在谈论武装起义。但是为了使武装起义取得胜利，必须要有当局所谓的军心涣散。为了“涣散”军心，必须使得即便是一部分军官站到自己方面来。为了使他们站到自己方面来，必须使“社会”同情武装起义，而军官也就属于这个“社会”。所以任何减少社会对“极端党派”的同情的不策略的（因之也是不必要的）越轨行为，同时就会减少武装起义胜利的机会。不妨记住这一点。

但是不言而喻，tempora mutantur<sup>①</sup>。我国资本主义现在已经发展到使我国资产阶级根本用不着同专制制度和解。他们最迫切的经济利益不允许他们这样做。沙皇将要同他们分享政权。现在

---

① 时代在变化。——译者注

他們还不相信，也沒有理由相信，沙皇政府的让步是真心誠意的。但是如果他們看到沙皇的确決定作出让步，那么他們从自己方面也会让步的，那时我們就連他們的輕微的同情也根本不会指望了。那时他們本身就会要求建立秩序。这一点也需要知道，这一点需要預見到，但不要因此感到不安。

如果我們根据目前資產階級是保守的，而拒絕为了政治自由的利益去利用它现在的反政府的情緒，那么我們这样做只会表明我們在自己的政策中采取和馬克思主义者完全不相称的“主观方法”。資產階級現时的反政府的情緒将来（也許是不久的将来）会让位于保守的情緒，这种情况决不当妨碍我們在当前这个时刻利用它。

“但是这是机会主义”，——另一个同志說。

为什么是机会主义呢？——我問他。而且什么是机会主义呢？在使用这个名詞以前，应当理解它的意义。

这种意义可以拿典型的和无可怀疑的机会主义者伯恩施坦的例子來說明。他说过：“对我說来，运动是一切，最終目的是沒有的。”这就是說，他准备为了运动的暫时的、片刻的利益而牺牲它的全部的根本內容。我們可以說，机会主义者是为了运动的片刻的成功而牺牲它的根本內容、最終目的的人。但是在我向自己的同志們提出的建議中是不是有这种“行为”的任何微弱的特征呢？难道我国工人运动的根本內容不允許它的領導者为了它的成功利用資產階級同沙皇制度的不和么？我提出的策略大大地增加着我們运动的力量，这种力量的增加又会促进无产階級階級觉悟的提高，而无产階級运动的全部根本內容恰好就在于提高他們的階級觉悟。因此用不着去重复由于简单地不了解馬克思主义而造成的荒誕的反駁意見。

再說一遍：資產階級滿足于得到某些他們认为必需的和足够的让步，这种情况無論如何不应当使我們感到不安。我們利用它的反政府的情緒，因为这对革命的事业是有益的和必需的。当这

种情緒消失时，我們自然就不再利用它，——沒有了也就沒有了，——但是一切都使人有理由认为，那时就会有另一个活动家即**农民**代替**资产階級**出現在历史舞台上，而他，即**农民**，現在已經用十分响亮的声音报告自己的来临了。

过去有人、而且至今还有人喜欢硬說我們社会民主党人想把农民放到“工厂的鍋炉里”去熬煮；但这是百分之百的冤枉。我們认为自己有义务支持一切旨在反对現存制度的革命的 and 反政府的运动。現代社会一切階級中間只有革命的无产階級才能給予起来用快刀斬乱麻的办法解决当前我国土地問題的农民以重大的支持。<sup>①</sup>及时举行的铁路罢工就可以保证大規模的农民起义获得胜利的結局。地主的土地轉移到农民手中完全不会使后者成为社会主义者，像空想社会主义者所希望的那样，但是会使得他們变成坚决的**革命者**。这就足以使我們不为俄国革命的命运担心。对于得到革命农民的支持而且有一切理由可以指望国际无产階級的支持的革命无产階級說来，無論是“国内的”，也無論是**国外的敌人**，無論是土生土长的反革命分子，也無論是現在大概很同情自己不幸的俄国“老表”<sup>②</sup>的德国皇帝，都沒有什么可怕的！

現在我們应当加紧注意农民。农民是俄国革命的极其强大的后备力量，如果我們不关心在这个后备力量和革命主力軍即无产階級之間建立經常的联系，就会違反軍事艺术的全部要求。

不过对农民显然不能应用我們中間許多人认为在城市中完全适当的那些策略方式。假定新近不久在我們中間引起了如此热烈的爭論的抵制国家杜馬的策略在城市人民特定的情緒的条件下的确是最好的策略。然而对农村說来，这个假定显然是不可能的。

---

① 我說当前是因为地主的土地轉移到农民手里絕對預防不了我国也产生西方各資本主义社会必不可免的、一定要予以重視的、不过形式各不相同的那个土地問題。我在第一期《日志》的《农夫們在暴动》一文中叙述了自己对农民問題的看法(參看本书第165—176頁。——譯者注)。——著者注

② 指沙皇尼古拉三世。——譯者注

人人都了解，农民的政治觉悟非常低，他们根本不能理解抵制思想，而且人人也都应当了解，只要善于影响各乡选举的进程，我们就可以引起农民同行政当局一系列的冲突，这些冲突会在最近期间使农村产生出自觉的反政府派。仅此一端就有足够的理由拒绝抵制。其次应当记住，农村中的选举宣传会提出土地问题，这个问题的尖锐化会一下子使整个事情发生革命性的转变。如果真要重视“抵制”这个伟大的字眼，那就可以说，对布里根杜马的思想实行抵制的最好方法是草拟给选举人的农民委托书，要求他们只选举会同意把土地转移到人民手上和同意召开以调节转移的过程和制定转移的法律为任务的立宪会议的那些人。这样的“抵制”会使布里根杜马化为泡影，然而如果我们想要解散农民选举人大会，那就只会增加黑帮分子的势力。如果我们党在由于改变选举法而必将进行的、关于我们参加选举宣传运动问题的新的讨论时注意到这个意见，那就做对了。

向农民呼吁是我们必需做的工作，这也是由于反革命党的阴谋：它力求把人民拉到自己方面来。迄今为止，反革命的“人民”的基本核心是同警察、密探以及其他属“官”者流团结友爱的著名的流氓。近来报纸报道说，由一群头戴大礼帽、衣着文雅的先们陪伴的某枢密官，以黑帮分子首领之一的身分出现在彼得堡。自然我们同所有这些衣着文雅和不文雅的败类是没有任何干系的。我们对付他们只能承认有一种方法，即恐怖。但是遗憾的是人民群众落后阶层的许多代表人物跟着流氓、间谍和“戴大礼帽的先们”走。例如《伏尔加河沿岸区报》直接地说，在十月十七日宣言公布后攻击革命者的一伙人中间有许多黑帮工人。黑帮工人应当同我们在一起；他们的地位不在黑帮分子中；他们之所以偶然到了那里只是由于可悲的历史误会。这种误会必须解除。但是在解除它的时候应当记住，黑帮工人往往是还没有来得及接受现代无产阶级思想、抱有农民的一切偏见、但因此也为他们的一切痛苦感到忧虑的人。这种人准备打击暴动分子，同时他本身也准备为了土地

而进行暴动<sup>①</sup>。要使他相信，反对把土地交给人民支配的不是他所打击的那些暴动分子，而是唆使他攻击暴动分子的那个政府，于是他就会自己起来以不可遏制的刚毅精神解散黑帮分子。革命的思想越是深入农村，它越是在那里同土地平分的思想结合起来，打击“犹太佬和学生”的匪徒队伍里的黑帮工人就会越少。

但是不言而喻，在对下层居民阶层说话的时候，应当断然坚决地放弃我们知识分子干瘪死板的腔调：搬来一大堆外国字，引证各式各样的“进化”（资本主义的等等），无休止地加进种种附属句。这样的腔调，无论黑帮工人或者农民，都是不了解的。应当用简单的、但是非常动人的“莫斯科烤圣饼女人”的语言同他们说话，伟大的修辞家亚·赛·普希金早就劝告我们学习这种语言。<sup>②</sup>

同黑帮分子作斗争使武装问题变成了最迫切的实践问题之

---

① 无怪乎第一号《新生活报》上转载的黑帮分子的一篇呼吁书中不仅唆使群众攻击“犹太佬”，而且也唆使他们攻击“паны”（波兰语：“先生们”。——译者注）。顺便说说，在这篇告示中有一个无疑是来自波兰文的用词：“这样的维特”。大概这个告示是“布尔加林的幽灵”写的。——著者注

② 当我谈到第一〇六四二号《新时报》上下面一段消息的时候，这几行字已经写好了：

“在莫斯科省内有人恶意地对待组织群众大会、向农民发表讲话的地方自治会派任的某些教师和医生。在某些地区，全体教师和医生事实上都已经吃了苦头。”

人们招募农民参加黑帮。但是可以同这种情况进行斗争。我们在同一号报纸上读到：“必须指出，这种现象不是普遍的；在某些地方就恰好相反，那里的农民都跑到教师和医生面前去请求对他们说明宣言的意思。”所以在这里就应当提出土地问题，并且同召开立宪会议的要求一起提出土地要求。这个要求具有怎样尖锐的性质，这从登载在同一号《新时报》上的下列电讯中可以看出来：

薩拉托夫，十月二十五日（PA）。据《薩拉托夫傳单》說，上周在阿特卡尔斯克县，农民们搶劫了二十多个土地占有者的庄园。晚上打开了火药仓库，搶走了三普特火药。罪犯不知去向。

农民正在武装起来。黑帮分子的唆使会在土地要求上碰得粉碎 *Ceci tuera cela*。〔真是天网恢恢。——译者注〕。——著者注



一。并且不只是武装问题而已。

获得左轮手枪或匕首是不够的，还应当学会掌握它们。七十年代的革命者在这方面都是行家，我们的同志们和他们比起来还差得很远。我们必须尽可能迅速地弥补自己的革命训练中的这个空白。善于使用武器的本领在我们的队伍里应该成为掌握这种本领的那些人理所当然地引为骄傲的对象，也应该成为引起还没有掌握这种本领的那些人的羡慕心理的对象。面对着反革命分子所干下的空前未有的野兽行为，我们本身应当作好对付一切的准备。自然，除了黑帮分子中间性情凶暴和酒气醺醺的大猩猩（Горилла）以外，谁也不能有杀人流血的嗜好；然而流血的事情不是我们首先搞起来的，已故的彼·拉·拉甫罗夫在向俄国革命者呼吁的时候早就公正地说过：

在战斗中，无辜的鲜血横流，  
但这并不是你的罪尤！  
没有牺牲，没有流血，没有斗争，  
人民的幸福便无从以求。

然而，我们越是武装得好，我们越是有准备给黑帮分子以坚决的、无情的、如果必要甚至是残酷的反击，无论在我们自己示威游行的时候，或者在我国保皇派示威游行的时候，我们都必须采取更加合乎策略的行动。各通讯社向全世界发送的电讯硬说，在许多场合下革命者都首先开始射击思想相反的示威群众，因而引起了人民的痛恨。自然，这是对革命者的恶毒的诽谤。但是如果这是实情，那就必须说，我们自己严重地损害了自己本身的事业。这种失策对我们说来较之警察的所有阴谋更要无比的危险。要知道，由于公布十月十七日宣言而引起的保皇派的示威游行常常同时就是推崇宪法的示威游行。示威居民的情绪看来同已经夺取了巴士底狱的巴黎居民当路易十六每作一个让步时一再所怀抱的情绪差不多。对于这样的居民说来，任何尖锐的攻击和任何革命性的演说都不会使他们接受共和派的意图。应当通过若干次同他们暂时还

准备予以支持的那个君主制度的冲突逐渐地埋葬他们接受共和派的观点。法国的雅各宾党人、这些运用革命策略的无与伦比的大师，过去正是这样行动的。我们应当效法他们的榜样，而不要使保皇派立宪主义者起来反对自己。

自然，我们目前正处在这样的时代，这时，用著名的法国话说，火枪，而因此以及左轮手枪，都是自动射击的，但正是在这样的时代，火枪（以及左轮手枪）的自动射击对我们的事业可能有直接致命的危害。彼得堡工人代表苏维埃很好地懂得了这个道理。在它的《公报》上登载的一篇文章里，我们读到：

“同志们啊！维特先生知道，无产阶级和正在觉醒的农民利用着政府的每一个让步，以便走上街头，提出自己的要求。但是他也知道，人民群众还没有来得及组织，还没有来得及武装起来，街头的群众大会、示威游行还是没有秩序的，没有组织的群众很容易从英勇果敢变得胆小如鼠。你们自己知道，很多人听到喊一声‘哥萨克’就吓坏了，纷纷向四面八方奔跑。维特也知道这一点，他还知道，没有好好组织起来的群众很容易激动，他们中间每时每刻都可以找到决心应战和不是在十分必要的时候开始同黑帮分子、同警察等等进行斗争的个别的人和集团。他知道这一切，所以赶紧匆匆忙忙地号召人民到街头去，使人民陷于混乱状态，以便现在，当人民没有组织好和武装好的时候射击他们。此刻对维特是十分‘适宜的’！”

这样对待维特是不公正的。号召人民到街头去，现在未必符合他的利益。然而说反动的奸党有这种态度则是公正的，他们在行政当局的主要代表人物至今都是根本没有想过作出让步的特列波夫，如果人民出动到“街头”，那他是再高兴不过了。所以现在必须比我们许多同志所说的更加审慎地谈论武装起义。伟大的历史问题归根到底只有由火和剑来解决，不仅俄国无产阶级不能避免“用武器作批判”，而且西欧无产阶级也不能避免“用武器作批判”，这个真理我早在一九〇〇年夏天出版的拙译《共产党宣言》第二版序

言中就已經证明过了<sup>①</sup>。但是武装起义不是鬧着玩的事情，它决定着运动往后的整个命运，因此，輕率地空談武装起义乃是对革命无产阶级真正的犯罪。然而我們某些同志在这个場合暴露出几乎令人难以想像的輕率态度。他們的头脑变成了专彈武装起义的調子的特殊的“自动机械乐箱”。他們整个策略智慧的全套伎俩都在这种起义里。然而正是因为这样，他們的策略智慧变成了策略荒唐。

現在我国某些人士輕率地空談武装起义到何种程度，某个沃依諾夫<sup>②</sup>先生的例子可以說明。

在所謂我們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其实只是它的一半的代表大会）上，这位“同志”說过这样一段話：

“我认为不妨让代表大会知道我們偉大的导师卡尔·馬克思关于武装起义的見解。这就是关于这个問題的小小的历史证据（我引证的是馬克思的《革命和反革命》一书）：‘起义是一种同軍事艺术或任何別的艺术完全一样的艺术。这种艺术照例有自己的种种規則，任何一个党都不能忽視它們而不受懲罰……首先，如果没有进行到底的决心，就絕對不能玩弄起义’”等等<sup>③</sup>。對我們說來，下面的話是不重要的。我认为自己的义务只是指出：沃依諾夫先生**不正确地引证“自己的”偉大导师卡尔·馬克思的話**，其实，在馬克思世界观的最重要的一部分上他就反对这个世界观（好一个学生！）：在馬克思那里，起义科学的第一个規則，**在英文原本中是这样說的**：Firstly never play with insurrection unless you are fully prepared to face the consequences of your play.<sup>④</sup> 这就是說：

① 參看《普列汉諾夫哲学著作选集》第二卷第 562—568 頁。——譯者注

② 指卢那察尔斯基。——譯者注

③ 《第三次例常代表大会》，日內瓦一九〇五年版第 88 頁。——著者注

④ 《Revolution and contre-revolution of Germany in 1848 by Karl Marx》（《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爱琳娜·馬克思-艾威林編。倫敦一八九六年英文版，第 120 頁。——著者注（这本书其实是恩格斯写的。这句话的譯文是：“第一，不要玩弄起义，除非你有充分的准备来应付因此而招致的后果。”參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八卷第 102 頁。——譯者注）

第一，在你們沒有准备好应付你們的游戏所引起的一切后果以前，絕對不要玩弄起义。在阿列克謝也娃出版的俄譯本中，這句話几乎逐字地譯成这样：“第一，在你們尚未完全准备好应付你們的游戏的种种后果的时候，請不要发动起义。”（第98頁）。但在沃依諾夫先生那里，正如我們所看到的，則完全是另一个样子。馬克思所讲的是起义的客观預备条件。在沃依諾夫先生的譯文里只是說到进行到底的主观預备条件。沃依諾夫先生对自己的“偉大导师”理解得很坏，这一点我不奇怪。但我不懂在代表大会上怎么会沒有一个願意或者善于糾正沃依諾夫先生的人发现这一点。很明显，出席大会的同志們中間沒有任何人了解馬克思对武装起义的真正观点。然而他們都是馬克思主义者，而且全都……按照馬克思的精神談論武装起义。如果这不是十分可悲的話，就会是很可笑的。

問題不在于我們是不是决定把起义进行到底，而在于工人階級是不是准备好了起义。这就是我們偉大的导师真正的意思。在第三次代表大会上集会的人不懂得这个道理。因此他們至今保持着对武装起义的最輕率的想法。而这个輕率的想法又成了他們的策略的基础。这已經不是笑話，而是災难！

这些人根据他們“决定”无終止地談論起义这一点就自以为是极端的革命者。但是，如果耶利哥的城牆靠耶和華的慈悲由于号角的声音而塌陷了<sup>①</sup>，那么我国的君主制度是不会因为革命的空談而塌陷的。在发动起义以前，必須准备好。

在一八七〇年战争前夕的法国，列伯夫元帅輕率地反复說：“Nous sommes prêts, archiprêts; quand la guerre devrait durer un an, il ne nous manquerait pas un bouton de guêtre.”<sup>②</sup>（我們准备好了，完全准备好了；如果战争要拖上整整一年，那时我們一

---

① 耶利哥为巴勒斯坦的古代城市。据《聖經》傳說，公元前第二千年下半期占領巴勒斯坦的以色列兵士用吹羊角的声音使耶利哥攻不破的城牆塌陷。——譯者注

② 括弧里的話就是譯文。——譯者注

切都会是現成的，乃至士兵护腿套上最后一顆鈕扣。)这位元帅大概自认为是大大的爱国者和十分坚决的統帥。而在同时的德国，毛奇元帅却不断地准备战争，他的不变的規則是：erst wägen, dann wagen.<sup>①</sup> (先称一称，然后才有胆量。)誰更好地为自己的事业服了务呢？誰更好地了解自己的事业呢？誰胜利了呢？

再說一遍：在开始武装起义以前，必須准备好。而要准备好，主要的是必須执行国际阿姆斯特丹代表會議的決議，即必須統一起来。在自己的第二期《日志》上，我曾建議彼此仇視的兄弟建立相互的联邦式的联系。不久以前的事件迫使他們正是这样做了，即建立了“联邦式的會議”。这已經是前进一大步了；但这是不够的。应当从联邦走向完全的統一。当工人組織宣布自己归并于統一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时候，你們以为他們究竟是为了什么呢？为了多数派还是为了少数派？

**都不是。他們正是为了統一的俄国社会民主党。**

旧的敌对的爭吵已經过时了。共同地积极工作的时刻已經到来了。

所謂布尔什維克說：当我们党两派中間有一派认为要参加临时政府而另一派认为不要参加临时政府的时候，他們怎么可以团结起来呢？

我的答复是：从原則的观点看来，参加临时政府的意图无疑是失策，是革命内部的机会主义。机会主义是一种罪过。但是要知道这个罪过是未来的事情。不知道它什么时候出現。甚至也不知道它是不是会在什么时候出現。第一，我們的“布尔什維克”同志們可能不会参加临时政府。第二，不知道这个政府本身是不是会存在。要知道法国大革命根本没有过这等事情。要是俄国大革命也沒有这等事情呢？要知道那时結果就是一个简单的假設妨碍了我們的統一。

---

① 括弧里的話就是譯文。——譯者注

不，同志們！干嗎說空話呢？干嗎为了一些空話而損害共同的事业呢？在我国，正如在任何其他国家一样，应当只有一个社会民主党，就像国内只有一个无产阶级一样。

（譯自《普列汉諾夫全集》第十三卷第 329—356 頁）

# 小 評

(摘 录)

普列汉諾夫在这一节小評中，一方面誣蔑列宁同馬赫主义者妥协，另一方面为孟什維克的著名領袖的机会主义辯护。本文发表在一九〇五年十一月出版的第三期《日志》上。

## 二 《新生活报》<sup>①</sup>

《新生活报》的出版声明是极有教益和发人深思的。声明上的名字很多都是至今依然敌視馬克思主义的人。列宁像蒼蝇跌在牛奶里一样淹沒在一大堆經驗一元論者和腐朽透頂的頹廢派分子中間。尼·明斯基先生和文格罗娃太太原来現在是我們的“同志”。你不由得要問自己：沃倫斯基“同志”是什么人呢？季·尼·基比烏斯“同志”是什么人呢？<sup>②</sup> 栖息在《蝎子》周圍的“同志們”是什么人呢？

列宁不願意同巴·阿克雪里罗得，維·查苏利奇，尔·馬尔托夫等人一起工作。在他看来，这些人都是机会主义者，而明斯基先生則不是机会主义者，季·文格罗娃太太也不是机会主义者。現在让讀者自己判断一下，列宁的不可調和性的实际內容究竟是什么东西。十分明显，这里一点对事业的原則性态度的影子都沒有。

(譯自《普列汉諾夫全集》第十三卷第358頁)

① 一九〇五年十月至十二月在彼得堡出版的第一个合法的布尔什維克報紙。——譯者注

② 明斯基：俄国頹廢派詩人；沃倫斯基：反动的艺术学家和批評家、頹廢派分子和“为艺术而艺术”理論的宣揚者；基比烏斯：女作家，老一輩的俄国象征主义代表。——譯者注

## 再論我們的处境

(致X.同志的信)

本文首次发表在一九〇五年十二月出版的第四期《日志》上。当时，莫斯科等地的武装起义遭到了失败，革命正处在严重的危机中。

这篇继续讨论当前形势和党的策略的文章暴露了作者在对待群众运动的态度问题上的机会主义观点。他反对第二次总罢工和第三次总罢工，认为它们都“是错误的”。他说：“开始得不合时宜的政治罢工已经引起了莫斯科……等地的武装起义。在这些起义中我国无产阶级……的力量还不足以取得胜利。这种情况是不难预料的。所以说，本来就不需要拿起武器。”他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党首先应当公开承认武装起义是一个错误，其次，应当采取新的策略，它的原则是“反动派力图孤立我们，我们应当用一切努力来孤立反动派”；这就是说，应该从日程上撤销起义的任务，把工会工作和经济斗争提到首位，应该反对抵制，参加杜马选举。

这一期《日志》出版后，立即受到列宁连续的严厉的批判。

列宁对普列汉诺夫所谓“本来不需要拿起武器”的说教进行了猛烈抨击，列宁的《卡·马克思致路·库格曼书信集俄译本序言》一文实际上是针对这个问题而写的。

列宁在《俄国的目前形势和工人政党的策略》、《俄国革命和无产阶级的任务》等著作中彻底批判了普列汉诺



夫在策略思想上的謬論，揭露了它們的實質。

列寧在詳細比較了普列漢諾夫的立場和布爾什維克的立場以後指出：“簡單地說：或者我們應當承認民主革命已經完成，把起義問題從日程上撤銷，走上‘立憲的’道路。或者我們承認民主革命還在繼續進行，我們要把完成民主革命的任務提到首要地位，宣傳並且在實際中運用起義的口號，公開宣布進行國內戰爭，並且無情地斥責一切立憲幻想。”（《列寧全集》第十卷第123頁）

親愛的同志！

您問我對俄國目前的處境有何看法。應當承認，我不是一點沒有動搖就決定答复這個問題的。我怕這答复不會使您喜歡，而且我堅信，它不會使其他絕大多數同志喜歡。有人告訴我，正當我們需要思想一致的時候，我却在俄國社會民主黨人的隊伍里製造意見分歧。

有人對我說，當這麼多不公正的責備，這麼多沉重的打擊紛紛落到我們黨的頭上的時候，現在提出批評是不合時宜的。我早就知道這些責難。听完它們是不容易的。但是怎麼辦呢？有些時候不僅需要講話，而且簡直必須講話。尤其是我不止一次地碰到這樣一種奇怪的局面：兩種截然相反的責難我都得聽。現在呢，有人勸我不要挑起爭論，不要把我和其他某些同我一起在黨內擔任一定職務的同志之間存在着的意見分歧公開出來。他們對我說：“意見分歧會自然過去的，把你們的意見互相交換交換，分歧就會消除。一年半載以後，這些分歧只會留下一種回憶，但是如果現在在刊物上公開出來，那對我們的事業是很有害的。”總之，有人堅決建議我讓步。但同時，還是這些人一想起我們運動的以前某個階段，就惋惜地指出：“不，您當時白讓步了；您應當講話；您的沉默對我們運動的進一步發展產生了有害的影響”，這就是說，他們責備我，說我讓步太多了。我有理由認為現在的情況也會如此：如果我認

为沉默比较好，对我现在所说的话感到不满意的那些人就会责备我过分沉默了。请看，我的处境是勉乎其难的。

但是，用拉薩尔的說法，誰把驢子背在自己身上，誰的处境就会更坏。我要說出我的看法，但凭別有想法的那些人去攻击我吧。涅克拉索夫說得对：

田野里忧郁的歌声  
禁止不了自由的風声……

然則我的看法究竟怎样呢？

在我看来，如果我們沒有犯过某些錯誤的話，我們的处境就不可能那样。

先談总罢工。

如果您記得阿姆斯特丹国际代表大会上关于总罢工問題所通过的決議，如果您熟悉国际社会民主党关于這個問題的文献，那么您就会看到，一切国家的社会民主党，与无政府主义者相反，都劝告无产階級在使用这柄伤人害己的武器时要极端謹慎。

国际阿姆斯特丹代表大会和全世界社会民主主义文献曾經一致坚决地告訴无产階級說，要取得总罢工的胜利，必須有一些社会条件的总和，这些条件远不是随时都存在，而不具备这些条件，罢工者就会遭到殘酷的失敗。这是的确的。只要回忆一下一九〇二年任何一次荷兰罢工史就足以相信这个道理。为什么这些罢工中間的第一次罢工成功了呢？为什么第二次沒有成功呢？因为第二次罢工不再使得政府感到措手不及了。为了在新的不利的条件下取得胜利，罢工者必須具有比它在第一次罢工时所拥有的那个力量更大得多的力量。然而他們的力量不仅沒有增加，到第二次罢工时甚至反而减少了，因为現在，由于危險增大，許多铁路工人已經不再表現出第一次罢工时他們所特有的毅力。应当克服的反抗力量大大增长了，而可以用来克服它的力量却又大量减少。結果是大家知道的。

荷兰的无产階級遭受了殘酷的失敗。他們长期不能从失敗中

恢复过来，現在同他們談論总罢工是无益的；他們現在不会理会它。

殷鉴不远，大家本当记忆犹新。但是可惜，我們那些主張搞第二次和第三次总罢工的同志們大概沒有及时地記住这次教訓。这些罢工是在缺乏应有的謹慎态度下采取的。成功的罢工所必需的那些社会心理条件当时如果不是根本不存在，就是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不存在。因此，罢工的結局就辜負了寄托在罢工身上的期望。我之所以說“辜負了寄托在罢工身上的期望”，是因为甚至我們中間那些认为这些罢工**成功了**的人也不能不承认它們的**成功并没有到达第一次罢工即十月罢工成功的那种程度**。我个人以为这两次罢工都遭到了失敗，而其所以遭到失敗正是因为它們是在缺乏謹慎态度的条件下从事的，这种謹慎态度是国际阿姆斯特丹代表大会和国际社会主义文献如此坚定地无产階級宣傳过的。

十月总罢工無論在俄国或者在国外都引起了极其强烈的印象。这种情况一般說来对无产階級，而特別对政治自由的事业是极其有利的。而这是“**定然不移的**”。为了产生这种强烈的印象，第二次总罢工的規模应当比**第一次更大得无比**。

結果不是如此：第二次罢工比第一次軟弱得多。因此，它产生了不利于无产階級的印象。的确，陆军和舰队的一般士兵中某些最敏感的人在这次罢工的影响下会理解到无产階級不是他們的敌人，而是他們最忠誠的保卫者。这是一个很大的正号。但是这个很大的正号**只是部分地抵銷了**我所指出的那个更大的**真号**。

我們的第三次总罢工即最后一次总罢工，正如您所知道的，导致了武装起义。我对这次起义的看法以前不止一次地說过。回头我必須再談一談这个問題，現在我还要指出一点。

尼古拉也夫铁路的罢工不是总罢工。运动在这条铁路上沒有停止过，而这个事实对莫斯科事件的进程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如果总罢工不可能成为真正的总罢工，那就不应当开始罢工。

也許您会說：“但是反动派逼得我們这样做。”我不否定这一

点。在我看来，问题的关键就在于**我們应当怎样回答反动派的挑畔**。为所謂恐怖作辯护的主要理由始終是这样一种考虑，即认为恐怖主义的行动是对反动派的橫行霸道的回答。这个理由虽然总是对政治上尚不成熟的人們发生强烈的影响，但任何时候也沒有使**我們社会民主党人**信服过。我們曾說，只可以用使社会力量对比朝有利于革命的方向改变的那些行动来回答反动派的挑畔，而妨碍在无产阶级中間进行工作的“恐怖”即不屬於此种行动。对于当前反动派为所欲为的暴行也必須如此。回答它当然必要。但是必須用可以巩固我們的陣地而不会削弱这陣地的行动去回答。

我們的陣地之所以强大完全在于无产阶级的組織性和明确的阶级觉悟。从这方面說，情况远不是像所需要和希望的那样好。我們說过：无产阶级是革命思想最可靠的和最彻底的代表。而当我們說这話的时候，我們絲毫沒有欺騙自己，除非这时我們忘記了：就整体說来，**所有的无产阶级仅仅在可能性上才是这样的代表，实际上暂时还只有它的某个阶层才是如此。**

这个阶层已經很大，而它的发展現在正可說是与时并进，而不是与日俱增。但这只是一个阶层而已，即只是工人阶级的一个部分，这个部分并不包括全体。

“黑帮分子”是由什么人組成的呢？他們的队伍中間有无产阶级的代表岂不是决无疑义的么？誰襲击过“犹太佬”呢？莫非只有一些慣盜和酒鬼么？可惜并不如此！鄙人就可以指出这样一些地区甚至工厂工人也参加过那些破坏活动。因此很明显，至今仍有許多无产者还没有接受革命的思想，反而不顾自身最迫切的利益，决心支持旧制度。我們社会民主党人应当立刻毅然着手在这些落后的无产阶级阶层中进行教育工作。这就是当前最重要的一项任务。我們越是毅然地因而也越是順利地着手进行这个工作，我們对反动派的挑撥的回答也就越会坚决有力。敢問閣下，同志，在这方面我們能够做的和应当做的一切工作我們是不是都做过呢？鄙人以为，沒有。而我們之所以沒有做过，是由于一个十分明

显的原因，这就是我們希望立即給反动派以最后的答复；但是这样的回答如果没有完成上述准备工作是断乎不可的。

而且不只是这个工作。除了暂时还敌視革命运动的那个无产階級阶层之外，还有另一个更广泛的阶层，他們对待革命运动完全是或者几乎完全是漠不关心的。为了发动一次比去年十月罢工的規模巨大无比的总罢工，我們絕對必須把这个漠不关心的或者几乎漠不关心的无产階級阶层吸引到政治运动中来。而当它还没有卷入运动以前，談論新的罢工即屬为时过早。

請注意，我們手上掌握着对这部分无产階級进行政治教育的强有力的手段。如果工人追求政治自由的斗爭在俄罗斯的大地上波瀾壯闊地开展了，那么他們积极地和齐心协力地捍卫自己的經濟利益的斗爭就更會波瀾壯闊地开展起来。似乎没有一个劳动部門，工会組織的思想打不进去。对于无产階級說来，这种組織一般都具有重大的意义。馬克思說过，工会是社会主义的学校，而且只有这些工会才能使工人階級在同强大的資本进行斗爭时得到必需的力量。在我国，除此以外它还注定有另一种作用：**即从政治上教育工人的作用**。从我国旧制度的观点看来，工人“成群結党地”保卫自己利益的任何企图都是犯罪行为。所以任何一种这样的企图一定会使工人同这个制度发生冲突。工人組織为工会的要求增长得越大，受到警察各式各样令人厌恶的刁难刺激的最落后的无产階級阶层的政治觉醒，就越会变得必不可免。我們应当有計劃地进行建立工会的宣傳工作，从而加速这个不可避免的过程。这方面的任何步骤都会使俄国社会民主党接近这样一个时刻：这时新的罢工才可能成为真正普遍和真正胜利的罢工。但是，由于它迷信現在可以給反动派以最后打击，它对这种活动的意义是估計不足的，并且在它的力量还过分弱小而无法取得决定性的胜利的时候，就采取了坚决的战斗行动。

我知道，当枪声呼嘯、血流如注的时候，像支持工会运动这样的“和平”工作可能显得是太沒有吸引力、太散文化的勾当。但正

是因为它可能显得是这样一种“了无兴趣的”勾当，我們党员作家才应当坚决认为必須开展这项工作。如果我們党开始輕視这种“散文”，虽然它可能得到斗争的诗篇，但是胜利的幸福仍然是不可达到的。正如安泰一接触大地就获得了新的力量一样，我們社会民主党只要依靠无产阶级的经济斗争也会获得新的力量。<sup>①</sup>

现在，当发动武装起义的企图遭到失败，俄国社会民主党不得不考虑以后怎么办时，记住这个道理是特别有益的。

当我们实际运用了只有在我们的力量十倍强大的场合下才会获得成功的那些斗争手段时，我们的来自资产阶级阵营的敌人并没有袖手等待，而是获得了对工会的影响。这对我们是很危险的步骤，因为这样一来我们就可能腹背受敌。我们的同志们很喜欢“把自己同资产阶级对立起来”。自然也应当这样做。但是把自己同资产阶级对立起来的最好方式却是向无产阶级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而对于用社会主义精神教育无产阶级说来，不管三七二十一地把资产阶级谩骂一通是根本无济于事的。只有不迴避无产阶级同它的剥削者的经济斗争的人才能教育无产阶级。

有人对我说：“但是我们中间谁也不否认工会在无产阶级解放运动事业中的意义。”这是对的。原则上所有的人都认识到它们的意义。但是我们很大一部分同志过分迷恋于武装起义的主张，因而没有能够稍微认真地支持工会运动。这也是不容置辩的。

---

① 恰好马克思说过：“如果工会希望履行自己的任务，它无论如何不应当同政治团体发生联系，也不应当依赖它。”（这段话没有找到出处，但普列汉诺夫自己有过说明，参看本书下册所附《奥古斯特·倍倍尔》（摘录）一文。——译者注）换句话说，马克思主张工会中立。现在卡·考茨基和他在德国党内的最亲近的同志们都出来反对这种中立性。在现时德国的条件下，他们可以反对它而不违背马克思学说的精神。我国的情况就不同了；我国没有德国人可以自豪的如此强大的和有威望的、组织得如此严密的社会民主党。我们党其实还只刚刚产生。因此，它应当用马克思一八六九年在德国党的童年时期对待工会的态度那样来对待它：它应当主张工会中立。否则就意味着企图人为地把工人阶级分裂成一些狭小的宗派。——著者注

繼續往下說吧。阿姆斯特丹代表大會和國際社會民主主義文獻告訴我們，強大的組織是總罷工獲得成功的必要條件。可是儘管我國工人階級的組織程度還很薄弱，我們的十月總罷工卻成功了。怎樣說明這個奇怪的現象呢？莫非阿姆斯特丹國際代表大會錯了麼？莫非國際社會民主主義文獻不對麼？

不，它們並沒有錯誤。在西歐無產階級被迫進行鬥爭的那些條件下，組織對它說來實際上是完全必要的條件。西方的無產階級可以依靠的僅僅是自己本身的力量；它不能寄希望於其他階級任何重大的革命支持；它是孤立的。而我國無產階級，只要它還在為同樣符合其他居民階級的利益的那個事業進行鬥爭，它就不是孤立的，它就可以得到其他某些階級的積極的幫助。的確如此！要知道，除了警察和舞文弄墨的反動分子以外，整個俄國都對十月總罷工表示了同情。正因為如此，它才取得了勝利。普遍的同情彌補了工人在組織上的缺點。

由此可以得出結論說：如果要使第二次總罷工獲得成功，必須把以前沒有參加過解放運動的無產階級的新階層吸引到鬥爭中來，那麼它獲得成功的第二個條件就是一些非無產階級對它的同情。這就是說，總罷工只有在無產階級同反動派發生一種可以保障使罷工者得到“社會人士”最廣泛的同情的衝突的場合下，才可能在我們獲得成功。

事件的經過說明，產生第二次罷工和第三次罷工的那些原因不足以引起人們對罷工者的普遍同情。這就是它們的所謂不完全的成功的神秘。現在木已成舟，也就翻悔不及了。但是很可以把事件給我們的教訓引為警戒和南針。很可以相信，總政治罷工並不是一種幾乎每周都可以採取的鬥爭手段。最後，很可以懂得我們應該重視非無產階級的反政府黨的支持，而不應該採取不機智的越禮行為使它們離開我們。

關於我的第三期《日誌》，一位同志從俄國向我寫道：“一般說來，我們大家都感到奇怪：您重新提出了‘資產階級自由’的重要性

的問題。在這方面我們現在沒有爭論和懷疑。宣傳的方式不妥當在個別的特殊的情況當然是有的，但是要從這裡回到過去否定政治的時代<sup>①</sup> 還是十分遙遠的。”

我沒有把**否定政治**強加於我的任何一位同志。我只是說，我們不是完全正確地“承認”政治，“承認政治”的人所發表的議論有時使我們想起四十年代德國的“真正的社會主義者”。其所以如此，倒不是由於個別的問題（“我否定政治”，“我承認政治”），而是由於他們思維的一般性質。“真正的”德國社會主義者的邏輯錯誤何在呢？錯誤就在於它們混淆了資本主義社會發展的两个不同階段。

用馬克思的話說，德國“真正的社會主義”忘記了，“法國的批評（德國的社會主義就是這種批評的不聰明的回聲）乃是針對現代資產階級社會和與它相適應的經濟關係和政治組織而發的，換言之，恰恰是針對德國當時正待爭取的那些社會條件而發的。”<sup>②</sup>

我們俄國的“真正的”社會民主黨人常常也就犯了這種忘記的過錯。在第三期《日誌》中，我曾提到我國外省同志的一個集團，他們除了向“自由派”宣布殘酷无情的戰爭以外，沒有找到任何更好的手段同當地無產階級政治上極端落后的狀態進行鬥爭。我完全深信，這些同志也“承認政治”。但這並不妨礙他們像兩滴水一樣和四十年代“真正的”德國社會主義者形態畢肖。<sup>③</sup>

我的通信人也許會說，這是“我們宣傳工作中不成功的方式的個別場合”。就算這樣吧！但可惜的是這些“個別場合”太司空見慣了。

---

① 按指反對經濟主義的那個時期。——譯者注

② 參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卷第496頁。——譯者注

③ 在這裡我要附帶聲明一句：要一勞永逸地結束這種反對自由派的征討。我的名字被人排在鋒芒針對着自由派的一些文章下面，不過我同這些文章風馬牛不相干。不言而喻，這是背着我不出來的勾當。——著者注



不很久以前，一家急进的报纸发表过一个思想，說我国社会民主党現在既然对工人阶级有如此巨大的影响，就可以把全部民主派的反政府分子团结在自己的周围。結果怎样呢？这家急进的报纸得到了回答（这一次却不是来自偏僻地方），根据这个回答可以直接得出結論說，这种思想乃是资产阶级的愚蠢观念，并不需要去預期这种团结。几天以后，第三次总罢工开始了，而彼得堡工人代表苏維埃在自己的关于总罢工的呼吁书中写道，无产阶级所捍卫的事业是全社会都对它的胜利表示关心的事业，因此它有权指望社会上一切热爱自由的人士的支持。彼得堡工人代表苏維埃是完全正确的。但是，如果它是完全正确的，則著文尖銳駁斥那家急进报纸的同志就完全不正确了。这确乎是殊堪惋惜的“不成功的方式的个别場合等等”啊！

对那家急进的报纸进行抨击的同志在自己的文章中肯定地认为，发展的連續不断的鏈条会把我們当前的政治局势同未来的社会主义革命联系起来。这是对的。俄国的全部历史、人类的全部历史、地球的全部历史、宇宙的全部历史都是发展的連續不断的过程。但是从这个今天科学市場上价格非常低廉的真理中究竟应当得出什么結論呢？絕對不能得出結論說，发展过程的連續不断性使我們有权忽視它的个别阶段的特点。馬克思很好地知道，德国历史过去是、而且現在仍然是連續不断的过程。他也深信德国的资产阶级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直接的序幕。但是他严厉地指斥了“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因为他們在资产阶级革命前夕使用了只有在这个革命以后才是适宜的那种語言。

个别場合！我的天！这些个别場合如此众多，險些儿我們的全部对待非无产阶级政党的策略都以它們为中心，而且它們还妨碍俄国社会民主党获得它应有的政治影响。正是因为它們妨碍这个党获得它可能取得的影响，所以就加强着资产阶级政党的影响。

产生这些“个别場合”的根源在于一种完全合情合理的、不过

理解得很坏的敌视机会主义的心理。但是它們恰恰是为机会主义效劳。“个别的場合”的作者們本来想走进一个房間，結果却走进了另一个房間。我們早就該結束这些謬誤了。但是我們是否可以很快地結束它們呢？我不知道。这是一种沉疴痼疾。

开始得不合时宜的政治罢工已經引起了莫斯科、索尔莫夫、巴赫姆特等地的武装起义。在这些起义中我国无产階級表现了强大的力量、英勇的气概和舍身忘我的精神。但是他們的力量还不足以取得胜利。这种情况是不难預料的。所以說，本来就用不着拿起武器。据說：无产階級曾經强迫社会民主党拿起武器。但如果这是事实，则起义就更是自发的，而不是自觉的。在这种場合下就产生一个問題：既然錯誤是在自发性占优势的情况下产生的，然則我国工人运动的觉悟分子当今的实际任务究竟何在呢？

它就在于向无产階級指出他們的錯誤，向他們說明这种——用馬克思的說法——叫作武装起义的游戏的全部冒險性。官僚派喜欢重复一句話：“一切都称心如意。”我們是官僚派的死对头，我們不应当效法它。我們应当向无产階級說明真理，說明全部真理，而且仅仅是真理。我們应当有勇气向他們指出他们和我們本身的錯誤。

也許您会对我說，我想阻擋运动。我不会爭辯，也不会反駁。为甚么不阻擋它呢？阻擋的角色并不是永远应当受到譴責的。罗伯斯庇尔在同不合时宜地号召武装起义的吉侖特派斗争时扮演过这种角色。天性难移的阴谋家和桀驁不馴的革命者布朗基在一八四八年扮演过这种角色。馬克思领导下的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也扮演过这种角色，它在一八七〇年九月九日的呼吁书中曾經警告巴黎无产階級不要进行不合时宜的发动。<sup>①</sup>

的确，阻擋的角色是不討好的和大煞風景的角色。它不允許任何空談。但是，我們社会民主党人一般說来不是革命空談的爱

<sup>①</sup> Gustav Jaechh, Die Internationale (古斯塔夫·埃克：《国际》。——譯者注)，第119頁。——著者注

好者。无怪乎我們的导师恩格斯說过，我們应当把革命空談的宝地完全让給在这方面早就达到登峰造极的成就的无政府主义者。

其次，請不要責备我用自己的批評在我們的队伍中散布灰心丧气的情緒。一般說来我不认为我們的队伍会陷入灰心丧气的状态。灰心丧气和革命空談一样同社会民主党人无緣。要使参加那个实质上不可战胜的运动的人灰心丧气，是不可能的事。参加者只会对他們所犯的这些或那些錯誤感到惋惜，而这种惋惜乃是将来成功的保证。車尔尼雪夫斯基說过：“让未来的来吧，未来在我們的街上仍然会有喜庆的事！”我們有一切理由怀着同样坚定的信心重复这两句話。但是喜庆的事越是来得快，我們就越要仔細地对待生活的教訓。

生活已經表明我們党最近几个月所奉行的策略是毫无根据的。現在我們正处在新的失敗的威胁下，我們必須掌握新的策略手段。

反动派力图孤立我們，我們应当用一切努力来孤立反动派。

反动派竭力想依靠的也就是无产阶级的落后阶层；我們应当用双倍的精力来提高这些阶层的觉悟，而主要的是我們應該立刻加强对工会运动的注意。这才是胜利的 *conditio sine qua non*<sup>①</sup>。一旦这个条件存在，那时我們街道上出現自家的喜庆事就一定为期不远了。

至今还只有**某一部分**无产阶级的参加了解放运动；現在**全体**工人阶级应当起来夺取自由。

农民是我国解放运动的后备軍。全部战斗的結局取决于这支軍队的运动。奇怪的是我們的某些同志至今还弄不清我們社会民主党应当对当前我国的土地运动采取什么态度。

如果报纸消息可信，則社会民主党代表在第一次全俄农民代表大会上指出社会主义革命的时代尚未到来时，“曾經宣布說，像

① 必要条件。——譯者注

夺回土地这样的社会主义措施是不可能的。”但是問題在于現代我国农民之力求夺回土地根本不是社会主义措施。这种“夺回土地”会給俄国資本主义的发展以新的推动力。馬克思还在四十年代就对北美的土地国有化运动指出过：这个运动的成功会加强“現代資產階級社会的工业化”。无怪乎把英国自由資產階級的全部精华联合在一起的科布頓俱乐部主張英国实现土地国有化。农民的“夺回土地”仅仅从政治方面說才可能有某种不方便。

土地之变为尚未拋棄旧警察制度的那种国家的财产可能为我国解放运动造成新的障碍。但这却不是夺回土地的問題，而是分配土地的問題；夺回土地的問題我們只能在肯定的意义上加以解决。誰害怕肯定地解决这个問題，誰就表明，他的思想实际上在公式主义的令人心寒的行为下石化了。<sup>①</sup>

如果我們的同志們在关于这个問題的爭論中有时竟然会为“社会革命党人”所駁倒，那只是表明这些同志甚至沒有完全領会我們党的決議。早在去年，無論“布尔什維克”的代表大会或者“孟什維克”的代表會議就已經贊成“夺回土地”了。

就我能够判断的說，这些決議對我們的实际工作者的宣傳活动至今尚未发生巨大的影响。現在該是貫徹这些決議的时候了。

在农民中間进行宣傳活动已經成了日程上的实际問題。現在誰也不会否认这点。<sup>②</sup>但是如果說必須在农民中間进行宣傳活动，那就必須使宣傳方式适应于农民的心理。例如，我們这里有人主

---

① 參看我的第一期《日志》中《“农夫們在暴动”》一文。——著者注（參看本书第165—176頁。——譯者注）

② 連在《新时报》上写文章的人都承认这一点。格·弗·伯尼格遜在該报一〇七〇二號上說：“农民要求土地是一种一旦被激发就不可遏止的自发力量。它已經激发起来了——这是毫无疑义的，而現在必須做的不是徒劳无益地討論这个力量在自己的运动中沒有重視西歐改善农民經濟的刻板公式，而是說明怎样調整它，并使之同表現在社会生活中的其他企图相一致。这就是我們現在要做的工作，除非我們希望在这个問題上让极端的政党又来警告我們。”——著者注

張抵制國家杜馬。但是農民群眾並不理解這種抵制，於是我們的所謂急進策略只會使得我們錯過影響農民政治意識的不可替代的大好時機。

在农村中进行选举的宣傳活動會直截了當地提出土地問題。而一旦提出了這個問題，農民就不難看到，誰是他們的朋友，誰是他們的敵人。

光是考慮到這一點就已經可以懂得抵制思想是毫無根據的。此外還可以舉出其他許多理由。但限於篇幅，不能這樣做，我只好簡略地表述一下從抵制杜馬的爭論開始以來，我在和同志們的個別談話中不止一次地說過的那個看法。

我們參加選舉宣傳活動不僅在农村而且在城市都會使我們有可能把我們對廣大勞動居民階層的影響擴展到最大限度。

**因此我反對抵制。**

我知道，我可能因此被宣布為人民公敵；請回憶一下我們某些組織的某些決議吧。但是有各式各樣的人民公敵。易卜生的斯多克芒醫生也曾被宣布為人民公敵<sup>①</sup>，其實他却未損害過人民的一根毫毛。

您希望知道我的意見；我把它說出來了。現在，對它開火吧，如果您認為這是有益的！任憑尊斷。

您的格·普列漢諾夫

（譯自《普列漢諾夫全集》第十五卷第3—15頁）

---

① 參看《易卜生戲劇四種》，人民文學出版社一九五九年版第287—394頁。——

譯者注

## 論俄国土地問題

本文登載在一九〇六年三月出版的第五期《日志》上。它进一步論证了《“农夫們在暴动”》一文中的思想。但它只是“沒有提供出現成綱領草案的意見和見解”（《列宁全集》第十卷第146頁）。其中对于党的“土地綱領要作一定修改的問題，……只字未提。他批評馬斯洛夫时，只是一般地主張‘灵活的政策’，他引用《曙光》杂志的旧論据来反对‘国有’，而好像傾向于在农民中間分配地主的土地。”（同上第147—148頁）

列宁在《修改工人政党的土地綱領》中駁斥了普列汉諾夫在土地問題上的机会主义观点。

这些观点在斯德哥尔摩統一代表大会上作者的发言中得到了更明确的闡述。

馬斯洛夫同志在十一月号《真理》杂志<sup>①</sup>上同尤·納查罗夫就土地問題进行爭論。这是一场有趣的爭論。土地問題現在在我国不仅就社会方面說有巨大意义，而且就政治方面說也有巨大的意义；而馬斯洛夫同志在这个領域里无疑具有很多的知識。所以衡量一下爭論双方的理由将是有益的。

馬斯洛夫同志在自己的文章的末尾說道：

“所以，我的总结是：代表會議和第三次代表大会<sup>②</sup>都沒有把

① 孟什維克派办的杂志，一九〇四——一九〇六年在莫斯科出版。——譯者注

② 他指的是所謂少数派的代表會議和所謂多数派的代表大会。——著者注

点打在< i >上。我現在打上这个点①。”

这是一个不成功的总结。从外表方面說，它(但願这位同志原諒我)有点儿像著名的喊声：“不对，彼得·伊凡諾維奇，‘喂!’是我說的。”②而就意义說，它远沒有传达出馬斯洛夫同志这篇思想并不貧乏的文章的内容。同时这位同志本人在自己的文章的另一个地方就用不同的方式确定自己对待代表會議和代表大会的決議的态度。他在那里說道：

“無論代表會議或者代表大会都沒有給土地綱領提供具体的内容，而沒有这个内容实质上也就沒有綱領。說委员会或者立宪會議会解决土地問題这等于什么也沒有說。”

这就精确得多了。这里的意思是：代表會議和代表大会沒有說出过任何东西，即不仅沒有把点打在< i >上，而且甚至沒有写出这个字母本身，于是乎馬斯洛夫同志不得不說出一切。要是真的这样，那代表會議和代表大会就应该因为喜欢說空話大受斥責，而馬斯洛夫則应该由于“热爱劳动和技艺高超”大受贊揚。其然乎，其不然乎？愚意，不其然也。但是且让馬斯洛夫同志繼續說吧。

“因为每一个党的成員都应当明白：在农民委员会或立宪會議中他应该怎样行动，或者应该怎样对待这些或那些行动。”

对的就是对的！每一个党的每一个成員的确应当明白这一点。但是明白这一点还不等于“給土地綱領提供具体的内容”。这可能看起来是奇怪的，但这是无可爭論的。而且对于馬克思的繼承人來說，这应该是不言自明的。

馬斯洛夫同志把“土地綱領的具体内容”一語理解为在**当前俄**

---

① 原文是：конференция и третий съезд не поставили точку над «i». Я ставлю эту точку. 意思是：代表會議和第三次代表大会都沒有把話說完。我現在把它說完。普列漢諾夫這篇文章在< i >上費了許多筆墨。为了行文的方便，逐字直譯如上。——譯者注

② 這句話源出果戈理的《欽差大臣》(參看芳信譯本一九五四年版第22頁)，意思是為着微不足道的理由進行爭論。——譯者注

国的条件下对于摆在当前俄国各党派面前的土地問題的一定的要求，这从他的文章中可以看出來。馬斯洛夫同志所希望的要求應該是**类似我們社会民主党人解决当前我国土地問題的草案**的某种东西。我們現在可不可以制訂这样的草案呢？

也可以，也不可以。要制訂草案，自然可以；但是馬斯洛夫同志本人也同意，这个草案的实现将取决于在解决我国土地問題的那个历史时刻俄国社会力量的对比情况。如果在这个有决定意义的时刻我們做不了局势的主人，那我們就依然只是一个草案而已。

从这里絲毫不应当得出結論說，我們**不需要任何草案**。根本不是这个意思！但是我要問馬斯洛夫同志，那时究竟什么东西帮助“每一个党员”弄明白他将“怎样行动，或者怎样对待”将要解决土地問題的那些党派的“这些或那些行动”呢？还是同一个草案么？这是非常可疑的。

自然，假使我的小窗中的一綫光明只是这么个草案，那我就用不着去想在該草案原来不可能实现的那个場合下我将怎样行动了。那时我的策略就很簡單：我将对所有其他的草案一概予以否定。不过这种无政府主义的僵硬策略很少是合理的。

試从另一方面举个例子。設想某国議會討論所謂正常工作日問題，而在这个国家里工作日迄今为止都是十一小时。再設想社会民主党人要求一天八小时；資產階級民主派主張九小时；大土地占有者的党派为了拆資本家的台，又因为不是涉及农业，同意十小时，而工业家則坚持原有的十一小时。最后我們設想，社会民主党人提出的草案垮台了。現在請問，他們应当怎样对待其余的草案呢？投票反对其中每一个草案么？有时，在特殊情况下，例如为了表示抗議，这样做也許对工人不无好处；但在絕大多数場合下，这对他們是有害的，至少在可能的情况下如此，換言之，如果由于社会民主党人的这种策略，資產階級民主派未能通过自己的草案，結果让土地占有者或者甚至工业家取得了胜利，在这种場合下，这样做就会給工人帶來实际的損害。



这就是說，公式：“或者是我們的草案，或者是任何其他的草案”所表达的策略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不中用的。究竟需要用怎样的策略来代替它呢？这是容易懂得的！符合工人階級利益的策略应当是比較灵活的；它应当考虑到每一个特定时刻社会力量的配置情况，以便根据这个情况为工人階級爭取最大的利益。然則为了使策略具有这种灵活性需要什么呢？需要它不以党对某个特定的（“具体的”）草案的迷恋为根据，而以党对它所代表的階級的利益的全部总和的正确理解为根据。而党对这种总和的利益的正確理解則取决于作为它的实践活动的基础的那些一般原則的正确性。看来这是不言自明的道理：如果存在着这样一些原則，如果它善于无誤地应用它們来評价社会現象（后面这个条件是 *conditio sine qua non*<sup>①</sup>，否則正确的原則除了导致錯誤以外不会得到任何結果），那么，無論“每一个”个别“党员”，也無論整个党就可以毫不困难地决定：在特定的个别場合应该怎样行动。

因此，我們得出了下面一个对某些人說来也許是十分意外的結論。在正确論证党的策略的事业中重要的倒不尽是解决这些或另一些社会問題的“具体”草案，而是一般的指导原則。

把这个意思翻譯成馬斯洛夫同志的語言，我們可以說，在正确論证党的策略的事业中，重要的倒不尽是在「i」上打点，而是「i」本身。

再說一遍，这个結論在某个什么人看来，也許正是因为自己的“点”而如此驕傲的馬斯洛夫同志看来，可能是十分意外的。但是它完全符合我們的学說的全部精神。

其次，它只是重复着恩格斯在自己著述生涯初期关于方法同利用方法得到的結論的关系所說过的話<sup>②</sup>。方法，这是主要的东

---

① 必要条件。——譯者注

② 参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第 642 頁。恩格斯在这里論述了方法論上一个极重要的原理。但是这个原理在普列汉諾夫手里經常成了进行詭辯的工具。——譯者注

西；如果它正确，則它得出的那些結論也必将是正确的。誰忘記这一点，誰也就不能理解結論，因此結論在他手里就几乎会失去一切意义。恩格斯說（他从卡莱尔那里借用了自己的这个說法），在这个場合下結論就好像莫里逊氏丸（当时某些經驗主义者认为是一种包医百病的药丸）。然而“莫里逊氏丸”在我們心目中正像在恩格斯的心目中一样应当是没有什么意义的。

但願馬斯洛夫同志不认为我对“結論”完全不感兴趣，因此也完全不珍視他的“点”。說真心話：我觉得它有很大的弱點。至于“結論”，恩格斯早就正确地指出过：“結論仍然应当采取一定的形式；发展应当从模稜两可的不确定性中得出結論，并使它們变成明白的思想。”<sup>①</sup> 結論对任何社会活动家說来都是有兴趣的，正像它們对把自己的全部生命都献給了为无产階級解放的斗争的恩格斯本人說来也是有兴趣的一样。但是如果社会活动家不是滿足于“莫里逊氏丸”或其他任何药丸的經驗主义者，那他就会从方法的高度，根据自己綱領各个要点的“具体内容”，即从自己学說的基本原則的观点来看待“結論”。而在他自己和他的同志中的任何人尚未明白地了解方法同結論、“綱領的具体内容”同学說的基本原則的联系的时候，他首先就会力求闡明这个模糊的要点。

究竟應該到哪里去找一个观点，以便我們从它的高度来評价我們所有一般的“結論”和“点”，以及个别說来評价我們的土地綱領呢？这个观点就在于把社会主义看成是資本主义社会中生产力发展的結果。我說这話的时候根本没有絲毫的意思想恢复所有的民族是否都应当通过資本主义的旧爭論。如果澳洲的部落在自己的野蛮时期中一直活到社会主义在文明世界取得胜利的那个时候，則他們一定会避免“資本主义阶段”。但是他們之所以能避免它（即逐漸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仍然是因为資本主义各国生产力达到了这样一个发展阶段，在这个阶段上他們同資本主义生产关系、同資本主义所有制完全不可能共存了。同时对于俄国說来，上述爭論

<sup>①</sup> 參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第 642 頁。文字略有出入。——譯者注

現在已經失去了任何意义，因为它已經进入了“資本主义阶段”。

不过，虽然完全沒有想恢复这个爭論的意思，我还是认为必須指出它。

过去有个时候，它在我国社会主义者的心目中具有重大的意义。俄国社会主义者的綱領的“具体内容”在其主要点上曾經取决于爭論的每一方得出了怎樣的結論。七十年代的民粹派和他們在以后两个十年中的后裔們坚持俄国可能避免資本主义阶段的信念；因此他們提出了一系列会妨碍我国資本主义发展的要求。反之，社会民主党人曾經坚决地认为沒有必要談論俄国避免資本主义，原因很簡單，因为俄国資本主义并不是假設，而是事实，不是希望，而是现实；因此民粹派的这种要求在他們看来就是反动的。我国社会民主党人說过，妨碍資本主义发展意味着企图把历史的车輪拉向后轉。当爭論还在繼續的时候，西方所有的社会民主党人在这方面都同意我們的看法。現在西方出現了所謂修正主义者，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在这个問題上也許不得不听到一些反对意見：伯恩施坦先生、大卫先生等人或許会說（我之所以用“或許”二字，因为我不是确信这一点），民粹派“部分說来”是对的。但是那到底是修正主义者！西方正派的社会民主党人現在也是絕對同意我們的看法的。在一八九五年布列斯拉夫尔代表大会上倍倍尔說过，当他必須考虑自己党的任何一項实际要求时，他首先問自己：它是不是会妨碍資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如果他相信会妨碍的話，那就否定它，认为是不合乎社会民主主义精神的东西。这就是对問題的唯一正确的态度。只有反动分子和反犹太主义者（这些人其实也是最不容置疑的反动分子）才会坚持阻碍資本主义发展的措施。

像倍倍尔一样，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絕對不会同意妨碍資本主义发展的措施。他們坚持了正确的原則。然而我已經說过，光有正确的原則是不够的，还需要善于正确地利用它們。可惜这种本領并不总是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所具有的。他們曾經把許多事实上不仅同反动措施毫无共同点而且在它們得到实现的場合下还会給

俄国经济发展以新的推动力的措施都算作反动的、因此也是不适宜的措施。这曾经使得他们的观点具有狭隘的、宗派主义的性质。举一个突出的例子。一八九一年饥荒的时候我在小册子《全俄的破产》中说明了一个完全自然的、而且可以说是必不可免的思想：社会民主党人应当发动要求国家大力帮助遭受饥荒的农民的宣传工作。结果怎样呢？我们有部分在俄国工作的同志认为这是对我原来的观点的背叛，他们曾经写信对我说，他们仍然忠于“劳动解放社”的“旧”纲领。我国的这些同志深信，帮助饥民意味着阻碍我国过时的经济制度的崩溃。不管我怎样设法说服他们，我至今还不能确信他们同意了我的看法而不再认为我是背弃原有信念的人。<sup>①</sup>应当意识到，——说来可耻，不说又有罪，——这完全不是独一无二的现象。一般说来，我国大多数同志都是用极端僵硬的态度来解决“农民问题”的。任何关于提高农民福利水平的思想（如果可以把福利一词用于我国农民群众的生活的话）都把他们许多人吓坏了，认为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背离，认为是对经济进步的威胁。因此，当一九〇二年着手制订我们现行纲领草案的时候，最大的困难正是发生在“土地问题”上面，那就毫不奇怪了。无怪乎散文式的<sup>②</sup>列宁几乎诗意地（无论如何是形象地）向读者提出了社会民主党人在着手解决俄国土地问题的时候所遇到的那些困难<sup>③</sup>。主要的困难恰恰在于把地主的土地交给农民引起了一场关于“俄国资本主义命运”的大争论。著名的“割地”因此也就得到了很多人的喜欢，被看成是这样一种措施：一方面它多少能够给农民一些帮助，另一方面它不但不会阻碍资本主义的发展，甚至还会促进它

① 读者在我的小册子《论社会主义者在和俄国饥荒作斗争中的任务》（一八九二年出版）的附言中可以找到这个说明的迹象（这本小册子后来收在《普列汉诺夫全集》俄文版第三卷中。——译者注）。——著者注

② прозаический——双关词：散文的、毫无诗意的；务实利的、庸庸碌碌的。——译者注

③ 参看他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土地纲领》一文，载第四期《曙光》杂志（参看《列宁全集》第六卷第87—126页。——译者注）。——著者注

的发展，廢除土地占有者和土地耕作者之間的奴役关系。因此我們有很多人甚至在农民起来按照自己的方式解决土地問題、并没有把割地同地主的其他土地加以区别、也没有考虑到“資本主义的命运”的时候，仍然死抓着“割地”。就这一点而言，我在“孟什維克”的代表會議上被彻底說服了。参加會議的某些同志絲毫沒有隱藏农民运动使他們产生的一些担忧。这些同志认为，要是他們同意“不反对”这个运动，那就表現着很大的让步。好像对于不在內政部服务的人說来（更不要說：对于社会民主党人說来）可能存在“反对”或者“不反对”的問題似的！

我听了这些同志的发言以后，唯一只能把这样一个情况看成是他們的寬容精神的表現；他們沒有根据我在《曙光》杂志上、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在我的第一期《日志》上，以及最后在同一次代表會議上就这个問題所发表的異端观点而怀疑我背叛了馬克思主义。

代表會議上这种样式的“正統派分子”并不多，他們也处于少数地位。但这并没有妨碍他們影响会上进行的討論的过程和結局。由于他們，这些討論才主要集中在“黑土平分”的各种經濟后果問題上面。为了党的利益，为了使它不犯最大的历史錯誤，不致让自己蒙受可笑的、同时又是严重的学究气的耻辱，必須坚持代表會議的这个主張：即社会民主党不仅應該“不反对”，而且还要推动。也必須以此为限。其所以不可能作更确切的断定就是因为有上述維護曲解了的“正統思想”的人的抵抗。所以，< i > 仍然沒有点。①

---

① 另一个社会革命党人也許会說：但是究竟为什么党提出了割地的要求呢？我来作答复。割地是“和平”时期提出来的要求。我在《曙光》杂志上早就指出过：在革命时代应当要提出更加广泛得多的問題。我們沒有給无产階級提出过两重性的要求，一种是供和平时期用的，另一种是供革命时期用的。这是因为无产階級不能不提出革命的要求；因为他們的运动从本质上說始終是革命的，而农民則不可能成为革命的。——著者注

在“布尔什維克”的代表大会上表现了(这从它的會議記錄中可以看出)同一个經濟偏見。因此它的結果也沒有点。

現在讀者看到，馬斯洛夫是严格的，但是……是不公正的。认为代表大会和代表會議什么話也沒有說过，这是不正确的。它們曾經說道：应当支持农民，不要因为担心資本主义的命运而感到不安；认为当前我国土地运动的胜利会使我国旧經濟“基础”恢复新的生命的看法，不过是旧日民粹派的偏見。說明这一点乃是絕對必要的。

現在談一談納查罗夫同志和馬斯洛夫同志之間本來爭論的“点”。

納查罗夫同志看来甚至不是进行爭論，而是簡單地請馬斯洛夫同志解除他的若干疑竇。但对手却以他固有的严格性作答。

馬斯洛夫同志的土地綱領要求把地主的土地轉交給各省地方自治局，而后者将把这些土地拿去出租；这个綱領在納查罗夫同志的心里引起如下的怀疑：

“农民将看到，恰恰像以前他从老爷那里租佃土地一样，在实行您建議的改革以后，他将从某个‘省方’組織那里租佃它。但这不是他所希望的……和‘社会革命党人’的訴苦相反，他希望有自己的土地、自己的财产。这是我的第一个問題。”

馬斯洛夫同志对这个問題的答复是：“即便假定农民运动中土地分配的傾向占优势，社会民主党人也不能提出蠱惑性的市僧口号，来适应愚昧的农民群众。”其次，馬斯洛夫同志指出，无产阶级的綱領应当把工人阶级的利益作为自己的基础，他繼續說道：

“把土地作为私有财产分給农民，或者把土地分給各个公社(土地社会化)，从工人阶级利益的观点看来是不合乎願望的，因为这就是把人民革命、而主要是工人革命的成果交到私有财产者手里。因此誰要是迷恋‘现实主义’政策而建議分配土地，誰就是采取反对工人阶级利益的行动，誰就是主張剝夺无产阶级参与支配全部土地的权利，因为分配絕對排斥除土地私有者以外任何人参与

支配土地的行为。”

我不知道納查罗夫同志是否滿意这种答复。要是我处在他的地位，我就不会认为滿意。

其实，就我对納查罗夫同志所能理解的来说，他問的不是在他看来最合乎願望的是什么，而是究竟应当认为什么是最可能的。馬斯洛夫同志觉得这个問题是机会主义的；但这完全是徒然的。

我个人承认，从社会民主党人的观点看来，把土地轉交給省議會是最合乎願望的。因此我充分估計馬斯洛夫的“点”的价值。但是我肯定地认为这个“点”在涉及社会民主党人应当怎样“在农民委员会或等等中行动或者对待这些或那些行动”的問题时还有很多“观点”不明白。要知道这个問题是同一个馬斯洛夫同志即“点”的作者向我們提出的。

我且举一个和上面所引的正常工作日相像的例子。設想在“委员会”或者另一个类似的机构中社会民主党人未能使自己的、按照馬斯洛夫的“点”的精神制訂的法律草案获得通过。剩下其他三个法案：(一)社会民粹派的“社会化”；(二)把沒收来的土地分为私有财产，以及(三)土地国有化。应当怎样对待其中的每一个呢？其中的哪一个比較好一些呢？

“点”沉默着。这就表明，在它那里并不是一切都妥妥貼貼，它上面也需要打个什么新的“点”。但是到底是怎样的“点”呢？

馬斯洛夫同志說：“无产阶级的綱領应当以工人阶级的利益作为自己的基础。”这是正确的，不过不十分新鮮。但这不是一切。工人阶级的利益不但应该成为无产阶级綱領的基础，而且也應該成为无产阶级策略的基础。这里，我以无产阶级利益的名义請問馬斯洛夫同志，哪一个更好些呢：土地社会化？土地国有化？最后，还是把它分为私有财产呢？

你既然待人仁愛，  
就可以大胆訓誨，  
我們当洗耳以对。

无论我对“点”的尊敬多么巨大，但我应当承认，它并未使我们对这些“棘手的问题”得到“直率的答复”。

究竟到哪里去寻找这些答复呢？显然不要在某个个别的“点”上寻找它们，而要在能够用一个公式把握住许多“点”、许多个别场合的某个一般原则中去寻找。大家知道，一个点定不了线的方向。

当“每一个党员”懂得了这个一般原则，那时（而且只有那时）他就会明白，他应当怎样“在委员会等等中行动或者对待这些或那些行动”。这是“点”不足以办到的。“点”是好的，但马斯洛夫同志夸大了它的意义，就象父母夸大自己子女的长处一样。

在指出（说得更正确些是：**提醒注意**）这个一般原则何在以前，我还要对马斯洛夫同志的文章作若干述评。

他说，把地主的土地转交到农民手里，“可能具有极大的进步意义，也可能具有极大的反动意义，视土地转交到何人手中而定。在法国，被革命没收的土地之转变为小资产阶级的私产，曾经从这个阶级中造就出无数波拿巴主义和资产阶级‘制度’的拥护者的反动骨干。土地的分配或零卖仅能消灭几万个地主，而造就出几十万新出茅庐的地主，这自然只会帮助反动派。”

先谈法国。我认为，说手中掌握了被革命没收的一部分土地（而不是**这些土地的全部**，象马斯洛夫同志大概认为的那样）的小资产阶级后来经常起了反动的作用，这是正确的。但是既然已经谈到这个资产阶级，我认为马斯洛夫同志就应该向“每一个党员”说明它在**革命时代**究竟起了什么作用。此刻这是更加重要的事情。其次，要是这位同志把法国革命所实现的没收土地的历史意义究竟是怎样的告诉了我们，那就做对了。

应不应该认为这个意义是反动的呢？若说是的，那我们就必须改变自己对待伟大的法国风暴的经济意义的全部观点。我们就必须对给旧制度的经济基础以如此严重打击的没收措施所实现的事业表示惋惜。我们就必须对小资产阶级所有制曾经代替了封建大地产一事表示惋惜。我们也许必须对一般说来发生了这次革命



表示惋惜。但这到底无疑“只会帮助反动派”。

或許我們該抱憾的完全是另外的东西么？即法国大革命曾經是資產階級的革命么？为什么在那个离我們已經十分遙远的时月里既不會有馬斯洛夫同志存在，亦不會有他的“点”存在呢？但这到底“只会帮助”……空想主义历史观。

十八世紀末期法国所实现的变革，無論在城市或者在农村都具有极大的进步意义。無論在那里或者在这里它都消灭了“旧制度”所固有的、过时的生产关系，而用新的、資產階級的关系代替了它們。这就最大地推动了法国整个的經濟发展，而通过經濟也就推动了政治发展。馬斯洛夫同志不是反动分子（这大概是不需要說明的），也不是空想主义者。因此，他本人也懂得“为什么这是重要的”。如果懂得，那就应当同意：假使現在某个国家处在类似十八世紀末期法国所处的那种状况下，假使历史直截了当地向她提出了偉大的抉择：要么是“旧制度”固有的生产关系，要么是地主的土地轉交到小資產階級手中，那么，任何一个社会民主党人在任何一分钟内都不会在选择时动摇不定，也沒有权利像本丢·彼拉多一样洗自己的手<sup>①</sup>。他有义务要用他所有的一切手段促进半封建生产关系的崩潰和用資產階級的生产关系代替它們。

如果俄国正好处在这种状况下，那又怎样呢？也許有人要反駁我說，和十八世紀法国不同，俄国有无產階級政党，在它的土地綱領中，馬斯洛夫同志在“i”上打了点。我不会忘記这一点。但是我明明已經假定在“委员会”中，或者一般說来在解决土地問題的机构中，无產階級政党代表的建議垮台了，結果只有在其他非无產階級党派的各种建議中間去作选择。現在为了把問題更加簡化，我暫且假定，臭名昭彰的“社会化”也垮台了。就是說变成这样一个問

<sup>①</sup> 語出《聖經》，意思是袖手旁觀，推諉責任，不解決問題。《馬太福音》第二十七章：祭司長和長老挑唆眾人請求彼拉多把耶穌釘十字架。彼拉多見勸說無效，就拿水在眾人面前洗手，說道：“洗這義人的血，罪不在我，你們承當吧。”接着命人釘死耶穌。又請參看《路加福音》第二十三章。——譯者注

題：要么国有化，要么使沒收过来的土地轉化为农民的私有財產。您怎么来解决这个問題呢，馬斯洛夫同志？您的“点”給您什么启示呢？

在同一期的《真理》杂志上尼古拉·瓦連廷諾夫先生出面反对国有化，但不认为需要列举已有的反对它的“踏实可靠的論据”，因为考茨基和馬斯洛夫已經做过这个工作了。尼·瓦連廷諾夫先生大概不知道已有的反对国有化的“踏实可靠的論据”在馬斯洛夫同志論及此事以前《曙光》杂志就曾經指出过了<sup>①</sup>。不过这无关宏旨。主要的問題是已有的反对国有化的論据的的确确是踏实可靠的，而且馬斯洛夫同志自己也深信不疑地重述了这些論据。然則他剩下什么呢？剩下的是忘記自己的“点”，而表示贊成把地主的土地分为私有財產。

如果不重視現时的局面，剩下的就只是这一点。馬斯洛夫同志說，分配土地只会帮助反动派，因为它会使小地主代替大地主，这就使人有某种理由认为，他似乎重視現时的局面，而輕視分配。如果他的确有这种想法，其結果就是，在作上述选择时他将会轉到保守分子的陣营中去。这将是了了不起的“现实政策”。要是以为馬斯洛夫同志会迷恋这种政策，那是冤枉地和他为难。可我們毕竟是用完全合乎邏輯的方法得出我們的結論的。这到底說明什么呢？这說明我們从馬斯洛夫同志那里拿来的前提是不正确的，也就是說，他不确切地表达了自己的思想，即他认为在农民中間分配地主的土地同現时的局面比較起来完全不会是后退一步。

也不可能不这样。要知道連他自己都承认，地主对他們的土地的所有权只不过是剝削租佃者的一种表現。但如果这是对的，則剝夺地主就只会提高租佃地主土地的农民的福利水平。这种提高不仅絲毫不会損害国内的經濟生活，而且反之，它将大大促进它的进一步发展。

<sup>①</sup> 普列汉諾夫这里是指他在一九〇二年八月第四期《曙光》杂志上发表的文章《俄国社会民主党綱領草案說明》說的。——譯者注

再总起来說一句。如果我們必須在国有化和分配之間作選擇，則我們应当選擇**分配**。

从我們的观点看来，分配无疑会有許多不方便的因素。但是同国有化比較起来，它会有一个巨大的优点，就是它会彻底地打击我国的旧制度，在这种制度下，無論土地或农耕者都是国家的财产，这种制度不过是作为所有强大的东方专制制度基础的經濟制度的莫斯科版本而已。土地国有化会是使这个早在十八世紀即已受到几次严重的打击而为十九世紀下半叶的經濟发展进程所大大动搖的制度在我国复辟的一种企图。

如果当前我国的农民运动对俄国經濟进一步发展說来是一种危險，那就恰恰只是由于它可能导致上述制度的复辟。既然其中有这种傾向，所以耽心它的后果的同志們是正确的。可幸的是这种无疑存在着的傾向很少胜利的机会。

应当說明这个道理。

您是不是有机会讀过埃利澤·邵可侶地理学第七卷中关于中国的篇頁呢？要是讀过的話，您大概記得关于“在引起革命和朝代递嬗的各种变故以后”，中国的“社会主义者”怎样拋棄了公社所有制的思想（“因为它以前存在过”）和“企图实行新制度”的有趣故事。一〇六九年，当时中国神宗皇帝的朋友和**大臣王安石**頒布了廢除私有制的法令。由于这道命令，国家变成了唯一的所有者，掌握了一切产品的分配权，而这些产品的生产則应当由国家的官吏来管理。这个措施引起了**滿大人**<sup>①</sup>和原来的封建大地主最强烈的反抗，但是埃·邵可侶說道，王安石善于把自己的国家共产主义制度保持十五年之久。“但是，只要改朝换代就足以推翻新的制度，因为这种制度根本不符合人民的願望，也不符合身居显贵者的意图，而且它又創造出变成了真正的土地占有者的整整一个殘酷者

① 滿大人（манدارин）：过去葡萄牙人对清朝大員的称呼，后因以泛称中国封建朝代的高級官吏。普列汉諾夫这里指的是以**司馬光**为首的旧派官吏。——譯者注

(инквизитор)階級。”<sup>①</sup>

邵可侶說，中国大臣的这个“共产主义的”試驗是古今各国政府为了社会改革的目的而采取的一切企图中最偉大的企图。他的这个見解不是无意间作出来的。无政府主义者邵可侶在这里对准着社会民主党人，因为无政府主义者在脑袋里把他們的意图了解成中国“共产主义”的样子。同时叙述王安石变法的历史的目的看来是为了作为反对所謂国际社会主义的国家社会主义的新理由。可惜的只是这个理由根本經不起认真的批判。

我用不着說明，社会民主党人希望用来实现自己的意图的那些方式同多少热爱人民的大臣頒布的法令沒有任何共同之处。但是拿中国內政史与十九世紀西欧社会史作类比的企图本身，就說明是十分天真的。邵可侶是很好的地理学家，但却是很坏的社会学家。他毫无批判地借用了(要是我没有弄錯，是从查哈罗夫那里)关于十一世紀中国“共产主义”革命的故事。然而在他自己的叙述中就有足够的材料可以把这个故事中所包含的真理恰如其分地归結出来。

从他的叙述中可以看出，在一千多年的时期里，中国內政史“是同土地占有史相符合的”，而后者的主要特点則是人民和“封建”土地占有者之間爭夺土地的斗争。从同一个叙述中可以看出，早在公元九世紀就已經頒布过一項宣布一切土地是**国家财产**的法令。这是和王安石宰相的“企图”一样的“共产主义”革命。不过据邵可侶說，王安石的“企图”也包括了动产。但这是极端可疑的。最可靠的是：关于王安石所实现的革命的报道反映着类似我国当局有时用共耕地来平息皇室領地上农民的巨大不滿那样的措施。不过这些措施看来是在更大得多的規模上采取的，而且在这以前大概在全国实行了土地重新分配，这种分配大大触犯根据采邑权經營土地的土地占有者的利益。无论如何，根据中国的經濟条件，这

① «Nouvelle Géographie» (《新地理》。——譯者注)，第七卷第 577 頁。——著者注

个革命只能是土地革命，而且只应当看做中国国家經濟史中的一段插曲。而社会民主党之絲毫不会被这类“企图”所吸引，讀者可以从我們对土地国有化的极端否定态度中看出来。普希金說（我現在記不得是在哪首詩里）：

我不会把自己的希望，  
寄托在基謝廖夫將軍身上……

像普希金一样，我們不会把自己的希望寄托“在基謝廖夫將軍身上”，順便說說，不久以前我国某些“进步的”政論家曾經把这位將軍說成是好像全俄国的格拉古<sup>①</sup>。我們从俄国的王安石的企图中除了罪恶之外不但不期待任何东西，而且要用一切努力使得这些企图在經濟上和政治上都不可能实现。

但是应当承认，在莫斯科俄国土地史上中国制度可惜太多了。在許多不順利的历史条件的影响下（其中俄国这个地区經濟上的落后性和蒙古人的压迫起了重要的作用），土地私有权从土地占有者手里逐渐轉到了大公手里，最后轉到了沙皇手里，于是后者就开始把它当作滿足国家需要的本錢来使用。我們帝国的彼得堡时期曾經完成了莫斯科时期所肇造的事业，并且把它定成了制度。經過著名的“通向欧洲的窗戶”<sup>②</sup>以后，政府的土地政策就它之損害土地耕作者的利益而言并没有发生任何根本的变化。反之，在涉及土地占有者的地方却发生了十分重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对农民心理具有无可怀疑的影响。但是在談到这种变化以前，为了了解它的影响，必須記住，在相当长的时期內，国家控制土地耕作者的过程是和土地占有者、世襲大地主的权利的縮减过程同时进行的，后者慢慢慢慢就同地主<sup>③</sup>即同应当服兵役的人处于平等地位了。

① 蒂伯里·格拉古和盖·格拉古，同胞兄弟，古羅馬政治家，奴隶制时代民主政治的代表人物，反对貴族大地主，主張实行有利于意大利农民的土地法，但其最終目的还是为了巩固奴隶制的国家。——譯者注

② 指彼得一世的改革。——譯者注

③ 大家知道，伊凡雷帝在这方面做了許多工作。——著者注

因此据柯斯托馬罗夫的说法，全国的居民分成为国家的孤儿（农民和一般有赋役的人）、国王的奴僕（有公职的人）和国王的祈禱者（僧侶）。克柳切夫斯基在談到俄国等級史的时候說道：“在当时国民經济和国家經济的状况下，土地占有是像初建軍役制时那样认真服軍役的必要条件。”这不仅用于軍役是正确的，而且用于任何其他服役也是正确的。同样正确的是：在当时国民經济的条件下，土地是“有赋役的人”认真履行自己对国家的义务的必要条件。

于是俄罗斯国家逐渐地变成了托馬斯·霍布斯梦想过的那个利維坦<sup>①</sup>，它按照每个人的职务和地位分給他一块土地。大概不需要在这里指出，我国大名鼎鼎的、經過重新分配的农村公社是作为国家控制土地和土地耕作者的自然結果而产生的。对重分后的农村公社的旧偏見，現在在俄国和西欧科学中已經破产了。但是指出下面一个重要的情况則完全不是多余的。

如果土地构成有赋役的人认真履行自己对国家的义务的必要条件，則完全自然的是，每当“国王的孤儿”受到“土地的压迫”的时候，他們就会要求（按照自己的方式要求，按照“孤儿”的方式要求，但是毕竟是要要求）再次重新分配土地。同样自然的是，国家为了自己本身的利益力求尽可能实现这个要求，分給农民新的“空闲”地，使他迁到“新的地方”去，或者就用重新分配的办法消弭他們中間所产生的土地上的不平等現象。大家知道，人口調查在国家农民生活中具有过怎样的意义。在农奴制依附关系消灭以后，农民在很多地方都不认为在人口調查以前自己有权着手重新分配自己公社的土地。当他們終於在某些地方重分了自己的土地，而沒有等到新的人口調查，这就证明重新分配完全沒有消除过沉重的土地压迫。那时“国王的孤儿”的世世代代所感受的忍耐性已經消耗尽淨了，于是他們騷动起来……

这不是一切。如果土地占有是“国王的奴僕”认真服軍役的必

<sup>①</sup> 原系聖經上的海兽名。霍布斯曾著《利維坦》一书叙述自己的哲学观点和社会政治学說。——譯者注

要条件，那么另一方面，从沒有服过軍役的那个“奴僕”手上夺回土地就是完全合乎邏輯的。所有封邑的貴族，从他們的“特权”使得他們免除了应服的軍役以来，就一直处在这种未服役的“奴僕”的地位。于是“孤儿”的头脑中就开始翻动着一个問題：为什么“老爷們”繼續霸占着自己的封邑呢？随着他們对土地的需要的增长，“孤儿們”越来越倾向于用这样的观点来回答这个問題：封邑的土地占有制是极不公正的現象，这种不公正的現象很快就將結束。这样就产生了“黑土重分”的願望。当这个願望已經无足指靠的时候，“孤儿們”就自己动手夺取地主的土地，正像他們曾經不等到人口調查就重分了自己的公社土地一样。

有人說，当前我国的土地騷动是革命宣傳的影响所造成的。但是第一，这种影响完全不是大得足以說明所有的土地“混乱”場合。第二，試問究竟为什么革命者在这个場合下可以影响农民呢？誰使得革命者有这种可能性呢？我的答复是：在我概略地說明过的土地“国有化”的基础上历史地形成起来的农民心理。这种心理的存在比农民开始沉湎于革命的影响要早得不能相提并論。它不是革命者制造出来的，而是“俄罗斯国家的历史”所創造的。

“俄罗斯国家的历史”所創造的这种农民心理甚至在去年著名的农民代表大会上也表現出来了。如果絕大多数代表都輕易地同意了不应当給地主土地以贖金的主張，那是因为农民深信土地是地主从国家手里得到的，斯摩棱斯克的一位代表說：“无偿地得去，也应该无偿地交出来。”但是非常有趣的是，頓河区域的农民主張付贖金，他們“为自己的被收买的土地而斗争”<sup>①</sup>。在这个区域里，新的、资产阶级的影响在农民生活中更强烈得多。

当沒有接受革命宣傳的农民（要知道目前受到这种宣傳的毕竟是不大的少数）談論必須从地主手里夺回土地的时候，他的头脑里并沒有想到他正在震动某个基础。完全相反！他认为自己是他

---

① 《真理》杂志，一九〇五年十一月，第363頁。——譯者注

世世代代目为神物的那个經濟基础的**保守者**，因为俄罗斯国家在整整若干世紀的过程中都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所以他真誠地认为反对重新分配的地主是**暴动分子**。在某种意义上，即在有自觉意图的意义上，他的确也是保守者。其次，如果他成功地恢复我国旧国家制度的經濟基础，那么俄国历史的車輪就会大大、大大地向后轉。

因此，我們在支持农民要求的同时，一刻也不应当忘記农民运动的这个**反动**的方面。不言而喻，我們**必須“反对”它**，不过我們不是为內政部服务。而正是因为我們必須“反对”它，我們在一定的情况下（不仅是在我上面指出的情况下）就应当要拥护使得馬斯洛夫同志如此害怕的分配。这是工人階級的利益和俄国整个社会政治发展的利益對我們的要求。

在一次农民代表大会上，一个斯摩棱斯克的代表說过：“沙皇們掌握了公共的土地，把它分給了亲信的人。”必須怎么办呢？从“**亲信的人**”那里夺回土地。代表大会实质上沒有說过任何一句比这更多的話。在这以后，他們的決議中就开始了一个由烏托邦占統治地位的領域，不过这个烏托邦也是生长在对我国旧經濟生活的回忆的基础上的：每一个人都“得到”他需要的那么多的土地等等。但是要知道，中国式的政治变革在于土地从“亲信的人”手里夺了回去，并且交还給了利維坦即国家，接着历史又重演了：产生了新的“亲信的人”，引起了新的变革，恢复了旧的中国制度。

我們不需要中国制度。因此**只有在农民运动破坏旧制度的情况下**，而不是当它力求恢复較这个旧制度似乎更旧、更落后的某个制度时，我們才支持它。我不会說，农民运动的两重性要求我們采取两重的策略，因为再也沒有比这种策略更坏的了。不会的。恰恰相反，我們必須仔細地注意，不要使我們的策略在农民运动的两重性的影响下变成**两重的**，不要使它帶一点反动的精神，不要使它去支持把俄国經濟史拉向后轉的企图。



而这是我們比較容易做到的，因为現代农民生活方式远远超过了他的思想方式。如果农民不惜恢复改革前的旧事物，那么改革后的关系就要給他的生活带来很多同这个旧事物处于不可調和的矛盾状况的傾向。我們需要弄清这些傾向，并且在它們成为經濟进一步发展的必要条件和恢复我国經濟的中国制度的道路上的障碍的那个場合下支持它們，而不要因为它們的資产階級性质感到不安。

正像在任何其他問題上一样，无产階級的利益也应当是我們在土地問題上的策略的基础。而无产階級的利益要求不断向前运动，要求同一切过时的东西进行不妥协的斗争。

現在我們就不难确定我們“經濟政策”的一般指导原則了。

凡是已經有可能用另一种更高的生产关系来代替資产階級生产关系的地方，我們就力求消灭資产階級生产关系；凡是我們只能在这种关系和过时的前資产階級生产关系之間作一选择的地方，我們則为它扫清道路。

不妨补充說明：少数派的代表會議正是以这个原則为指南的，它在自己的決議中指出，应当怎样把农民的經濟运动同我們时代的民主主义意图联系起来。馬斯洛夫同志对于問題的这一方面沒有給予任何注意。真是一“点”障目，不識泰山。

### POST-SCRIPTUM<sup>①</sup>

当我在姗姗来迟的十二月号《真理》杂志上讀到彼·馬斯洛夫同志的《土地綱領草案》和弗·格罗曼同志的《論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土地綱領》一文时，此文已經付排了。

馬斯洛夫同志的《草案》最初出現在刊物上是在两年以前。但是我手边沒有它的初版本，因之我不能說它現在轉載在《真理》上

① 附記。——譯者注

是否未經修改，或許馬斯洛夫同志對它作了什麼補充也未可知。假使他沒有作補充，那我應當對我曾經忘卻了他的《草案》中以下一個很具特色的地方表示遺憾：

“工人政党的最終目的是組織社会主义制度，因此它不會直接參加旨在擴大各個等級的土地所有權的鬥爭。只有在可能依靠個人財產來擴大公共財產的條件下，它才會參加這個鬥爭。”

這够明白了。如果不可能“依靠個人財產來擴大公共財產”，我們就根本不應當參加鬥爭。這就是說，在這個否定的條件下我們應當保持中立，不再參加偉大的農民運動，**让它同我們交臂而過**。我們能不能這樣做呢？不，不能。

其所以不能，是因為在這個否定的場合下（即如果不可能擴大公共財產）無產階級對於兩個“等級”中間哪一個等級仍然是勝利者遠不能無動於衷。

**農民的勝利意味着資產階級關係的勝利，他的失敗等於是保存農村中不僅不會促進生產力的發展，而且會大大地阻礙這種發展的那些生產關係，這些關係是舊制度遺留下來的，它們本身也是殘余的社會政治制度的支柱。**

在這個鬥爭中如果我們黨守中立，那就說明譴責我們是教條主義的那些人是對的。

馬斯洛夫同志的這個錯誤再次證實一個（不過不需要新的證明的）真理，就是一個“點”決定不了綫在空間的方向以及……黨在政策中的方向。

再談格羅曼同志。

他在自己的文章里從我的第一期《日志》中引用了下面一段話：

**“那時（即地主土地轉交給省所有）土地問題就會歸結為一定的租賃條件……我們黨本來應當關心於：第一，使這些條件尽可能更多地保衛僱傭勞動者的利益，即農業無產者的利益；第二，使它們不會成為剝削租佃者的工具；第三，使它們不會鼓勵任何一個階**

級損害另一个階級<sup>①</sup>，像我国現時的地方自治局在征收土地稅时帮助地主而損害农民。”

格罗曼同志认为不可能完全同意我的看法。

他說：“我承认第一二两点关心，但是在第三点上我应当表示否定的态度。否……我认为必須使我們党現在……关心于首先使那些需要土地才不致餓毙，才可以摆脱极端的贫困的人以及那些为土地洒出了大量鮮血的人得到土地……普列汉諾夫同志主張守中立，这在商品社会中除了表示把土地交給为土地付出更多代价的人以外不能有別的意思。”

好极，好极！那么格罗曼同志有何良策呢？支持一个租佃者階級反对另一个么？支持小租佃者反对大租佃者么？但是这种支持无异于支持小生产損害大生产。格罗曼同志恰好在为了說明我的看法必須从我的《日志》中繼續作引证的地方中断了自己的引证。我恰好說过，我們党不应当培植农业中的小市民。格罗曼同志不同意我的看法。那么，他认为我們应当培植这样的小市民么？这不是新思想。意大利的加蒂同志就有过这种想法，不过相当犹豫罢了；德国的大卫同志則十分坚决地宣揚这种思想。我国的所謂社会革命党人也坚持同样的思想，大家知道，他們不仅站在无产阶级立場上，而且“也”站在（这是些思想广大的人！）小生产者的立場上。但是格罗曼同志看来不屬於修正主义者流，看来他也懂得像不可能一屁股坐两条板凳一样，不可能一次站在两个階級的立場上，因为在这两个場合下邏輯的或身体的塌陷都是逃不掉的。为什么我的“第三点关心”使他惊奇呢？誰有本領誰去理解。

格罗曼同志繼續道：

“普列汉諾夫同志认为只有殷实农夫需要它（即土地。——格·普·）。不，無論农村中的富人和兼做生意的企业主，也無論是半业主半工人的人都表示需要它……我們必須站在特定的一

<sup>①</sup> 这段話中的着重点是格罗曼同志加的。——著者注（參看本书第175頁。——譯者注）

边……”

好。且住。往后呢？这是不是說，我們应当力求从省所有的土地的租佃者数目中把农村里的富人和兼做生意的企业主一笔勾銷么？格罗曼同志是不是有此願望呢？大概沒有吧。他同意我的“第一点关心”（見上），因此也就是說，他承认省所有的土地上不仅可以經營商品經濟，而且也可以經營以剝削雇佣劳动为基础的**資本主义經濟**。因此他本人就是“中立的”，而且还是在涉及問題的**最本质的方面**时守“中立的”。果若如此，那么他从他“站在特定的一边”这个立場中期待着怎样的結果呢？我饒有兴趣想知道这一点。但是我耽心就連他自己也不是那么知道这一点。

他希望支持“半业主半工人的人”。但是第一，这种人不属于农业小市民，而我談的正好是不應該支持小市民。第二，这种人可以**或者**作为业主，**或者**作为工人加以支持。我的一般說来針对农业工人的“第一点关心”自然也包括“半工人”。但是格罗曼同志显然希望从另一方面帮助他們。他引证馬斯洛夫同志的話。馬斯洛夫肯定地說，很多属于使我們感到兴趣的社会阶层的人专门只經營农业。我也沒有忘記他們。我的“第二点关心”要求保护他們这些租佃属于省所有的土地的人不受剝削。格罗曼同志贊成这一点；但是他认为这是不够的。那么他希望什么呢？他的“偶像端坐在”哪儿呢？無論我們怎么自我搏斗，还是得出同一个結論（不过是通过另一条道路）：他希望培植农业小市民，損害大市民。而在这里我要同他分道揚鑣，我把他归入修正主义者光荣的一伙。我自己則仍然坚守崗位。

应当善于区别按其本性互不相同的那些事物、現象和情况。不能既在葬礼上也在婚礼上都唱“永远安息吧”。

在地主的土地过渡为省所有以前，和馬斯洛夫同志相反，我认为在一定的、我上面所指出的条件下甚至必須支持农民的小資產階級意图。他的这些意图，就共同在我国旧式农艺的基础上生长起来的农村旧生产关系相对立而言是进步的。

但是在这种过渡以后，我(抱歉得很)坚决认为不需要支持农业小市民。就共同大市民相对立而言，他是保守的，甚至是反动的。他力求阻碍资本主义的发展；他强使历史的車輪向后轉。不用說，如果我們忽然想着要去帮助他这样做，那才真高明呢！

(譯自《普列汉諾夫全集》第十五卷第 19—40 頁)

## 論黑幫分子

這篇文章登載在第五期《日志》上。一九〇六年三月，正是一九〇五年革命失敗後的第三個月，反動的沙皇政府採取了最後的手段即最殘暴、最野蠻、最瘋狂的手段來維護自己的生存。在保衛反動統治的事業中，黑幫分子扮演了“出鞘的寶劍”的角色。

普列漢諾夫對待黑幫分子的階級作用採取了完全非階級的態度。他不是把黑幫分子的暴行看成是“政府開始採取軍事行動反對人民的極為鮮明的實例”（參看《列寧全集》第十卷第482頁），不是“公開地、大聲疾呼地控訴政府，號召人民組織民警和自衛隊，作為防止暴行的唯一手段”（同上第484頁），而是“害怕把反動政權同凶手們聯在一起！”（同上第486頁）列寧寫道：“分明是卑鄙的煽動、收買以及用灌酒的辦法來慫恿我們那該死的資本主義‘文明’的敗類，分明是有武器的人們毒打赤手空拳的人們……而有一些人在看到俄國生活中的這種現象時，還認為或者還公開說，這是因為某些人‘輕率’地號召了人民採取‘極端的手段’！”（同上第482頁）普列漢諾夫就是這樣的人。他用“十足的學究態度”（同上第483頁）說：黑幫分子“十分之九是由無產者或半無產者組成的”，“太陽之女”“沒有他們的幫助”就“走不遠”；“黑幫分子”之所以“不擁護你們（指革命的人民）而反對你們”，因為布爾什維克領導的革命運動是“為少數人謀利益的少數人的運動”！普列漢諾夫對“黑幫分子”一詞作了迂腐的

詞义学解釋，这种解釋进一步暴露出他对自由资产阶级的反革命本性何等无知。在这篇文章的末尾，作者还用自己固有的孟什維主义观点歪曲了高尔基的剧本《太阳之子》的基本思想。

我面前摆着一位积极参加我們俄国最近几月来的事变的一位同志写来的信。这封信是非常值得注意的。它表现出敏銳的观察力和我們这里罕見的政治思想的成熟性。我本来非常乐意在这里把它整个刊登出来，但由于許多原因目前这样做是不恰当的。我只从其中摘引短短的几段。

事情讲的是“黑帮分子”。信的作者坚决地反对那些宣傳“对黑帮分子实行恐怖”的人。他喊道：“在农村中实行恐怖啊！对黑帮的头目实行恐怖啊！要是在两年以前，我就会毙几个党的优秀工作人員、我的同志、农民和工人。这的确会是大卫同哥利亚的斗争。”<sup>①</sup>接着作者說，“由于經驗而变得聪明了的”他，从他那方面說，根本沒有想到要对某一个村里的“业主农民”采取恐怖手段，虽然他們大概是因为他的解放言論而狠狠地揍过他。然后他又补充說：“一位遭到黑帮分子杀害的同志（我曾經把他教育成社会民主党人，并且曾从他那里学会了如何在农村中进行工作和理解农民）經常对我說：从一听到你的話就滿口同意的人始終不过是一些不三不四的人，而你有前言他有后語的人，这才是最可靠的人。所以你只要說服一个这样的人，他就会給你带来一百个人。”

最后，非常值得注意的是信的作者认为黑帮分子“十分之九都是无产者和半无产者。至少黑帮分子中积极活动的那一部分人正是他們。牵綫的资产者都暗地里进行活动，他們都是爱惜性命的。”

我觉得，不应当把关于恐怖的这段話理解为来信者反对任何保卫自己不受黑帮分子侵害的企图。如果他不对那些曾把自己的政治高見教給他的“业主农民”进行自卫，那末原因自然在于进行

<sup>①</sup> “大卫同哥利亚的斗争”，事出《聖經》《撒母耳記上》第十七章。——譯者注

这种教导时的特殊情况。自卫或者哪怕以自卫相威胁，从政治上說来有时是必不可免的和很有益的。在罗加里同志的一篇登載在去年十二月号《真理》杂志上的文章《莫斯科农村中的黑帮分子》中，可以發現几段关于这个问题的非常有說服力的例子。請看其中的一个。

“在哥洛赫沃斯托夫村……早就有由教师主持的星期讲座。十月十七日宣言公布以后，这篇宣言以及与之相关的国家体制問題就成了談話的主题。先前早就鼓动反对教师的当地黑帮分子十倍地增加了自己的力量；他們的活动不是沒有成效的；准备在黑帮头目們一声号召下就去破坏学校的民众增多了；形势已經变得越来越危急，甚至变得毫无希望了，以致在他这个决不是胆小怕事的人看来，离开当地逃走乃是摆脱不可避免的灾难的唯一办法。但是曾几何时，事情就发生了乍看起来完全出乎意外的轉变。黑帮的头目們（当地的两个小飯館老板）认为自己已处在受威胁的、甚至危急的状态下。他們向当局呼吁，請求保护他們不受威胁着要搗毀他們的小飯館的民众的侵害。其实根本沒有什么东西直接威胁他們；只是有一批农民随便地向他們說，要是有破坏学校或毒打教师的事情发生，他們就会被当成禍首。进攻的地位……迅速地变成了防御的地位。昨天还是学校和师生員工的命运的可怖主宰者，現在却低声下气地向教师‘建議友誼和平’了。”

再說一遍，不进行自卫是不行的，但这絲毫沒有駁倒信的作者。我还要說，他的思想最好不过地为我从罗加里同志的文章中借用来的例子所证实。在这个例子中威胁并非对准农民。反之，它来自农民。它倒是对准着信中称为**牽綫的资产者**并且形容为**暗地里进行活动的胆小鬼**的那些人。同这些人打交道时使用公认的自卫权利是可以允許的和合理的。至于信的作者称之为无产者和半无产者的那些人，則对这些人即便使用这种权利也必須非常謹慎，更确切些說，必須有很大的政治上的明智。也許明天意識之光就会照进他們的头脑，而他們会因此变成解放运动的热烈的拥护



者。对于“业主农民”几乎也可以同样說。他們受了官僚制度很多气，他們也屬於可能拥护自由的人之列。不应当吓唬他們，而应当开导他們(我是从政治意义上使用“开导”一詞的)。而且現在开导他們已經不那么困难了。农民联合会的經驗就說明了这一点。信的作者也证实了这一点。他說：“为了在农民中間进行工作，完全不需要屈服于他們的偏見……只是自己要好好地弄清楚自己所說的話……要把一切都說清楚，而不要夸夸其談。”可惜的是我們并非总是具有自知之明，并非总是能不犯夸夸其談的毛病，并且几乎总是很不善于說明。就拿我們的一些宣言來說吧。其中絕大多數是用很拙劣的、只有“职业革命家”才懂得的、充滿着人民語言中极少使用的那种又臭又长的从屬句的語言写成的。再沒有比这种語言更糟的了。普希金当年說过，我們的作家应当向莫斯科烤圣餅的女人学习俄罗斯語言。要是莫斯科烤圣餅的女人同意給我們宣言的执笔人上几堂俄語課，那該多好啊！

而且請注意，岂有此理的文体并不是这些宣言的唯一缺陷。其中的議論也和語言一样地拙劣；它們使人产生这样一种印象，仿佛它們的作者执笔为文时有些畏首畏尾，生怕写出什么离經叛道的、不完全符合正統的言論来。因此这些宣言充斥着宣言中完全不該有的种种“論点”。每一篇这样的宣言都类似描繪俄国社会发展的图式的什么东西，而描繪这种图式的目的就在于給作者证明，他建議自己的讀者采取的那个步驟是正确的。在这里，什么都“考虑到了”，唯独沒有考虑“广大”讀者的心理，对于这些讀者說来，所有这些拙劣的、常常是不得体的和学究气的图式自然是根本沒有任何用处的。讀者像对待某种毫不相干的东西一样对这些宣言敬而远之。然而全部事业都在于广大的讀者。俄国的命运取决于群众的运动。

誠然，我国人民意識的成熟現在不是与日俱增，而是与时俱进的。但它成熟的过程尚未完結，因此就产生出这样一个事实，即黑帮分子十分之九——用我所引证的信的作者的語來說——都是无

产者和半无产者。我們的直接义务就在于使这些无产者和半无产者从反动分子的影响下解脫出来。

俄国知識分子对待“黑帮分子”(черная сотня)的态度是完全不正确的。“黑帮分子”这个名詞本身就說明了这一点。这个名詞是从哪里来的呢？它是历史遺留給我們的。克柳切夫斯基說：“同业公会的平民(черная сотня)和关厢的平民构成首都的工商业居民群众，他們相当于后世的市民。”我要問一問，我国民主派把城市居民中瘋狂地敌視自由的那些分子称为黑帮分子究竟有什么根据呢？难道“工商业居民群众”自然而然地敌視自由么？难道我国解放运动是为少数人謀利益的少数人的运动么？难道它本质上同“工商业居民群众”的利益是敌对的么？如果是，那怎么能談得上是民主派呢？如果不是，如果我国某一部分“工商业”人士对待自由的这种敌对的态度是出于誤解，那就很明显，民主派——特别是社会民主派——应当用一切力量来消除这种可悲的誤解：否則我国的解放斗争本身就会在某种程度上像过去多少存在过的那种情况一样仍然是无产者分子和半无产者分子内部的某种閹墙之爭。

当民众开始毆击知識分子，当人民动手屠杀那些准备为他們的幸福而牺牲一切的人时，人們就說：“这是黑帮分子干的”，并且认为这已經說明了一切。但是我們已經看到，这句话什么也沒有說明。相反，这里却产生一个迫切需要立即解决的問題：**为什么黑帮分子不拥护你們而反对你們呢？**

只有认真对待“黑帮分子”的**經濟需要和心理状态**才能解决这个問題。且撇开那从自由的获胜与其說有所失不如說有所得的不大一部分“工商业群众”不談，我們可以大胆地肯定說，黑帮无产者分子和半无产者分子的經濟地位无可爭論地一定会使他們产生对解放运动的同情。然則为什么沒有这种同情呢？

其所以沒有，是因为在这些黑帮分子看来，我国解放运动是为少数人謀利益的少数人的运动。他們习惯于把“知識分子”看成是“比土耳其人和韃靼人更加”危害我国人民的官吏。官吏們采取的

一切措施都是**反对**人民的。无怪乎人民不喜欢他们，不相信他们，而宁愿一有机会就“打击”和“痛骂”那些被人民看成是官吏或候补官吏的人，因为这些人虽然也反抗自己的上司，却丝毫不放弃自己那种剥削者的习气，丝毫不放弃自己对人民的恶意和蔑视。

过去有个时期，——而且这个时期离我们并不那么遥远，我国民粹派的老战士还能记得它，——**整个无产阶级都对知识分子抱着这种不信任的态度**。现在**无产阶级的先进部分**已经学会了大致不错地区别自己的敌人和朋友。然而**它的落后部分**还没有提高到能作这种区别。这部分无产阶级不仅不相信知识分子热爱人民的意向，而且把已经提高到能够自觉地观察这个问题的先进无产者看成是人民事业的背叛者。还有什么可说的呢。不过对付这种不幸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向无产阶级的落后阶层说明他们的正确理解的利益要求什么，他们的社会地位要求什么。

然则“半无产者”呢？凡是了解这种贫民是怎样生活的人，都懂得他们心里一定积蓄了许许多多的委屈和忿恨。**我国黑帮分子之所以有许多非常残忍的举动，其原因应当到这种委屈和这种忿恨中去寻找**。当这些人殴打“学生”或“罢工者”时，他们以为这是在直接或间接地对自己的压迫者进行报复。深知人民心理的馬克西姆·高尔基不无原因地使《太阳之子》中的丽札在谈到“愚昧无知的钳工”叶哥尔时，——他后来也打了知识分子——，说他有一双**受委屈的眼睛**。当类似这个“愚昧无知的钳工”的人猛烈地攻击自由保卫者时，他们的行动就是出于许多世纪来痛苦的“委屈”，这种“委屈”一旦被**意識的光芒所照亮，本身就会成为热爱自由的精神的最丰富的泉源**。因此，全部问题正在于让这光芒照射起来。

回头重读了我刚才所写的这几段话以后，我发现，当我說无产者的落后阶层（自然半无产者的落后阶层也是一样）完全不相信知识分子，认为他们是自己的敌人的时候，我是讲得过于绝对了。现在应当再补充說，甚至这个落后阶层的某些代表也已经开始不再一味地不信任和怀疑自己这种不信任态度的正确性了。同一位高

尔基鲜明地描写过这种情况。他笔下的那个愚昧无知的、有一双受委屈的眼睛的钳工对普罗塔索夫说：“听我说，我尊敬你……因为我看到，你是特殊的人……这我感觉到了……你希望我跪在你面前吗？”而当普罗塔索夫答应到他家里去的时候，他高兴地问道：“噢？你会来吗？”普罗塔索夫本来可以轻而易举地把他完全置于自己的影响之下。但普罗塔索夫不是人，——愚昧无知的钳工错了，——用科兹马·普鲁特科夫的话说，他是一个像助熔剂一样的只能派一种用场的专家。他像白痴一样同叶哥尔说话，而后来当他的妻子打算去看得了霍乱病的叶哥尔妻子时，他就暴露出自己全部狭隘的利己主义，他说：“你上哪儿去？不要去，莲娜，我请求你。为甚么呢？……你又不是医生……这可不是开玩笑……这危险！”，于是叶哥尔忿恨地反驳说：“那就要咽气的人不更危险么？”其余的“太阳之子”对待叶哥尔更坏。車普尔内当面管他叫狗；在中了“超人”说的毒的艺术家瓦根看来（他觉得这个学说是智慧的顶峰），愚昧无知的钳工也不是人。他用忿恨的口吻谈到这些人时说道：“叫他们去见鬼吧，不要为了他们开倒车！”毫不奇怪，叶哥尔开始时对普罗塔索夫所抱有的那种尊敬感在他的心里被强烈的仇恨心所代替了。后来当他入了凶徒一伙，掐住普罗塔索夫的脖子时，他就幸灾乐祸地喊道：“啊哈，化学家！落到我手里了吧？”

谁的罪过呢？罪过显然在历史老人，由于它，我们的“太阳之子”至今还像古老的铜币那样暗淡无光。我想，我国的评论界理解得如此之坏的、高尔基的剧本的基本思想就在这里。

不过，我们要说得更加确切些。只有作为嘲笑才可以把普罗塔索夫这一流人叫作太阳之子。代表无产阶级利益的政党有充分的权利取得太阳之女的称号。但遗憾的是，它不可能说，它的大多数成员已完全没有普罗塔索夫辈、瓦根辈、車普尔内辈及其一伙人对愚昧无知的、有一双受委屈的眼睛的钳工所抱的那种极端错误的态度。瓦根说：“不要为了他们开倒车！”我们也不希望为了黑帮分子而“开倒车”。我们顾不上他们，我们急于要前进。而且这是非

常值得贊揚的。可惜的只是同一个瓦根說得完全正确，他說，像叶哥尔一类的人会使太阳之子坐着去航行的那只船的运轉增加困难。的确会如此！而且这困难是如此之大，以致太阳的女儿沒有他們的帮助会前进到多远还是一个問題。我耽心，她走不很远。而且怎么能不耽心呢？要知道只有叶蓮娜·普罗塔索娃才能輕松愉快地說这种話：“他們已經死啦”。我們則应当懂得，他們的死亡對我們說來会是一个巨大的不幸。他們的死亡会大大地增加反动派胜利的机会。但幸运的是他們只是看起来似乎死了，他們不过在沉睡，因此为了我們事业的巨大利益，我們可以喚醒他們过自觉的生活。而且这并不是难事。“只是自己要好好地弄清楚自己所說的話，要把一切都說清楚，而不要夸夸其談。”

（譯自《普列汉諾夫全集》第十五卷第 48—54 頁）

## 論杜馬選舉

(答 C. 同志)

本文发表在第五期《日志》上。它詳細地論证了作者在《論我們的处境》和《再論我們的处境》两文中提出的策略观点：反对抵制国家杜馬，主張参加杜馬選舉。在他看来，抵制杜馬是一个錯誤。因为第一，“馬克思主义策略哲学的基本原理是：比其他一切手段更有助于提高我們所关心的居民阶层的觉悟的那个策略手段乃是最好的策略。”参加当前这届杜馬選舉比不参加更会加剧階級斗争，提高人民的政治觉悟。第二，和抵制派所依据的理由相反，人民并没有要求根据普遍、直接、平等和不記名的選舉原則召开立宪會議，抵制策略是建立在“把願望当作现实”的“心理錯觉”的基础上的。

列宁在《我們的目前形势和工人政党的策略》、《立宪民主党的胜利和工人政党的任务》等著作中詳細駁斥了普列汉諾夫的种种謬論。列宁指出，普列汉諾夫在杜馬策略問題上采取了最右的立場，他的立場实际上同立宪民主党的立場是一致的。

尊敬的同志！您觉得我在自己的第四期《日志》上关于我們是否参加杜馬選舉問題所說的話<sup>①</sup>不明白。这并不使我感到驚訝。我的看法还没有詳細發揮出来，原因簡單：我本来就认为我們党不会接受这种看法。而我之所以这样觉得，是因为我在判断我們的策

<sup>①</sup> 參看本书第 272—285 頁《再論我們的处境》一文。——譯者注

略时所持的标准，和我的大部分同志的标准太不相似了。

举一个明显的例子。当我们的同志们想证明我们应当抵制杜馬选举，他们首先依据而且主要依据这样一种情况：我国无产阶级和一般说来我国的劳动人民几乎完全被剥夺了选举权，而且仅凭这一点，就已经不可能从杜馬那里期望任何重大的让步。这当然是公正的。不过我依然坚持自己的看法：**抵制是一个错误**。为什么我这样认为呢？因为我有另外一个标准。我的推理方式不同，得出的结论自然也就另一样。

在我看来，我们在这种场合下，正如在所有谈到我们的策略的那些场合下一样，用来作为指导方针的所有那些理由中间最主要的理由应当是：我们所采取的步骤对于提高我国人民即无产阶级和农民阶级的政治觉悟会发生怎样的影响。试把抵制杜馬会进一步提高这种觉悟的证据拿给我看看，我马上举双手赞成抵制，同时丝毫不改于初衷，因为我仍然相信那个我大概要称之为马克思主义策略哲学的基本原理：**比其他一切手段更有助于提高我们所关心的居民阶层的觉悟的那个策略手段乃是最好的策略手段**。然而这个基本策略原则正好是我们经常遗忘的。

前不久，帕·奥尔洛夫斯基在其刊登于《我们的思想报》第一——二号上的一篇论文《国家杜馬》中尖锐地批判了关于这届杜馬的新法律，他证明，这法律比起八月六日的旧法律来几乎无所进步，它并不符合人民的要求。文章写得生动有致，对杜馬所发挥的见解也完全正确。但我却认为它根本不能满足惯于用马克思的观点看问题的读者的要求。

新法律不能令人满意么？当然。这是一望而知的。要证明也不难。用法国人的说法，叫做 *c'est pas malin*<sup>①</sup>。不过关键不在这里。应该这样来表述我们所感到兴趣的主要问题：**参加这届根据完全不能令人满意的法律而召开的杜馬的选举，对于提高人民觉**

① 并不难。——译者注

悟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呢？而这个问题文章里甚至根本没有提出来，所以它才使人产生不满意的印象。好像帕·奥尔洛夫斯基本来的意思是说，既然杜馬是根据不能令人满意的法律召开的，那就不应当参加选举。可是这样一种推论，如果彻底地运用到我们的策略问题上去的话，就会理所当然地使我们推出地道的无政府主义的结论。

我之所以说理应参加选举，是因为这样做会提高人民的政治意识。帕·奥尔洛夫斯基自己就间接地（不过是不自觉地）证实了我的看法。他写道：“政府……正在解散集会和工会，它查封所有不受警察机关控制的报纸，逮捕成百的人民之友，禁止人民的政党在选举前进行宣传活动，而让黑帮分子的政党进行鼓动。政府想在暴力控制下进行杜馬选举，但是它这样做只会使斗争尖锐化。”这是有道理的。但正是因为它有道理，正是因为警厅的因循会使斗争尖锐化，我们才理应参加选举，因为斗争的尖锐化符合我们的利益，因为我们参加选举时斗争会比我们不参加时更尖锐些。没有比证明这个道理更容易的了。在任何一期的任何反政府派报纸上都可以发现一些消息，如某某乡的农民集会进行选举，有人强迫解散他们，还向他们宣布说，复选人上级已经指定了；或者，农民选举一个候选人作为复选人，但是有人把他逮捕了，而且还逮捕了其他一些在选举大会上发言的农民，诸如此类。正像石铁相击产生火星一样，农民同反动的官僚制度的这种冲突也会使农民思想上产生对待我国的政治现实的自觉态度<sup>①</sup>。这时农民就受到了教育，这当然是我们的写得笨拙的传单无法代庖的。故而我才再三申明：我们理应参加选举。

不过我所说的和再三申明的这句话没有用直陈式，而是用假

---

<sup>①</sup> 不久前内政部发出的一份命令警察不得干预选举的通告，对这一点根本不会发生什么影响。但是，它却表明内閣的认识到选举“自由”对选民所产生的印象对它说来是多么危险。——著者注



定式：理應。我深信，我們將不會參加選舉<sup>①</sup>。掌握正確的馬克思主義策略一般說來並不容易，而對於像我們這樣一些年輕的黨簡直是不可能的；因為它們缺乏政治經驗，這使得它們在自己的策略推論中不善於採取正確的观点。換句話說，它們像當年幾乎所有的空想社會主義者一樣用形而上學的方法進行推論。我只有用缺乏政治經驗才弄清一個看來奇怪的事實：為什麼我們黨內出現了和成長了一個派別，這個派別同老“民意黨”的唯一區別只在於術語。

帕·奧爾洛夫斯基的論文可以為我們提供另一個明顯的例證。請看一看他是怎樣推論的。他的結論是說：人民要求“根據普遍、直接、平等和不記名的選舉權利召開立憲會議”，政府對這個要求的“答復”首先是八月六日的法律，後來是幾乎根本不改變局勢的十二月十一日法律。要是真正這樣，那麼我們之參加選舉也確實是完全多餘的，甚至是很有害的。在這種情況下，要求立憲會議的人民卻參加杜馬選舉，這當然只會使人驚訝。但是事情其實並不如此！帕·奧爾洛夫斯基把自己的願望當作現實。他希望全體人民都要求立憲會議，於是乎他就覺得全體人民當真有這個要求。這是心理上的錯覺。而抵制選舉的策略就建立在這麼一種心理錯覺的基礎上。同志，您自己評斷評斷看，以心理錯覺為依據的政治行動能不能是正確的。

真正說來，遠不是全體人民現在都有召開立憲會議的要求。必須使他們全都有這種要求。我國反動的官僚制度正在不遺余力地迫使人民要求立憲會議。而在人民中間一種可能使這種要求脫穎而出的情緒正在日益廣泛地瀰漫開來。不過目前還只在瀰漫。這

---

① 當得到我黨彼得堡全市代表會議（按指一九〇六年二月底（三月初）的第二次彼得堡市代表會議。——譯者注）以多數（不過數量不大）票通過了抵制杜馬選舉的決定的消息時，這封信已經寫好。因此，我的信念完全得到了證實。我對您的答復，同志，就更加沒有實踐意義了。現在，它只有從確定我們黨剛才所犯的那個錯誤的政治價值和研究這一錯誤的原因的角度來看，才會使人發生興趣。——著者注

是整整一个过程，我們还没有到瓜熟蒂落的时候，也許我們甚至还在半腰中間。但是我們可以用自己的行动大大加速这个过程，而参加选举却就有此效能。所以說我們**本来不应当拒絕参加选举**。

再說一遍，我知道我們不会参加，因此我整个的这封信如尼采所說，全都很 unzeitgemäss<sup>①</sup>。而您又要我答复，只好遵命。

我国的所謂**孟什維克**在自己的策略推論中始終是比較接近真理的。但是有两种情况一直妨碍他們达到真理：第一种情况是耽心“**布尔什維克**”宣布他們是“**机会主义者**”。这种耽心常常使得他們赋予自己的正确的决定以抽象的革命性的外貌，他們用一大堆扑朔迷离的华丽詞句把这些决定籠罩起来。有例为证：他們的赫赫有名的“**革命自治**”沒有对任何人說明任何东西，反而会把許多人弄糊塗。第二，他們的 esprits forts<sup>②</sup>有一个特点，就是非常爱好公式主义。这种爱好使得我在他們的代表會議上大吃一惊、渾身不快。某些“**孟什維克**”会上这样說过：“在某某某某決議中应当為我們未来的运动總結出一條公式。”不用說，在这种公式爱好癖中是沒有絲毫馬克思主义气味的。还不妨指出，正是这个爱好使他們的策略具有某种……（現在我还没有找到更妥貼的詞儿，也許就說）**学究气派**的外貌。例如他們决定参加选举。这很好。但是他們的脑袋里坐着一个**公式**，把我国未来的社会发展預先就定出几个不同的“**阶段**”。因此他們急忙补充說：我們要参加选举，但只是在某个时刻以前，而在这个时刻以后，我們又怎样怎样行动。于是就像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中——很不成功地——同拿破侖作斗争的將軍們的作战部署的情况一样：die erste Kolonne marschirt<sup>③</sup> 某某地方；die zweite Kolonne marschirt<sup>④</sup> 某某地方；die dritte Kolonne<sup>⑤</sup> ……等等，等等。正像这些將軍們的“**作战部署**”一样，

① 不得其时。——譯者注

② 强大的理智。——譯者注

③ 第一路纵队开到。——譯者注

④ 第二路纵队开到。——譯者注

⑤ 第三路纵队。——譯者注

“孟什維克”的策略公式主义絲毫无助于預見事变。它只是有損于基本上大多完全正确的观点的一种蛇足罢了。

同志，您了解，我是策略公式主义的敌人，我认为它違反我們的思維方式，所以我不可能在这里考虑我們在往后的“一刻”里应当要怎样行动。我說：“一刻”的难处一刻就够受了<sup>①</sup>。当前这一刻的难处要求我們参加选举，而这就够我受了。

您不要以为，我这样議論就会使自己的視野縮小。恰好相反！我的視野正在扩大，因为我把遮住“白日世界”并使我們的策略問題蒙上一层濃黑的阴影的一切公式主义建筑物都从視野內拆除了。

情况現在就是如此。我們在打仗，这是世界史上开辟一个新时代的那些偉大战争中的一次战争。我們的敌人被迫进行退却，不过为了把自己的退却掩飾起来，他們偶尔采取进攻的行动。他們在往哪一条路上逃窜呢？他們正在采取什么軍事詭計来迷惑我們呢？这是我們无从知曉的。連他們自己也不知道。他們毫无秩序。今天干这个，明天干那个。今天革除加邦神父的教籍，明天碰巧就收买他，利用他来作为反对无产階級政党的武器。今天他們赦免政治“罪犯”；明天又在監獄里关滿仅仅因为热爱自由而获罪的人們。他們左右搖摆，举棋不定。他們只知道自己行动的一个总方向。他們也知道必須奋斗到底，必須利用偶然落到自己手上的一切手段来保卫他們将要离开的那个地区上的每一寸土地。其次，他們也深深地知道，他們能够用来保卫自己抵抗我們的那一切手段中最好、最有效的手段就是同我們的活动針鋒相对的活动，即**麻痺人民中間現時正在覺醒的政治意識**。为了使用这种手段，他們不会在任何阻碍面前退让。但是他們到底怎样做，这是正在退却的他們或者正在进攻的我們都无从知曉的。怎么可以对这一点預先制定一个公式，写出一套詳細的作战部署，說：die erste Kolonne

① 語出《聖經》《馬太福音》第六章第三十四节。——譯者注

marschirt, die zweite marschirt 等等呢？我們可以確定的也只是自己宣傳方式的一般目的而已。

不特此也。如果毫無疑問，應當承認我們在同敵視我們的麻痺者的鬥爭中的主要武器是喚醒俄國人民的政治意識；如果很明顯，我們對我們的每一個策略手段都應當根據它在何種程度上有助於喚醒這種意識來加以評價；如果不容爭辯，還不是全體俄國人民都發展到能夠理解我們的哪怕只是最近的政治目的；而且如果即使這樣我國人民在政治方面還是在迅速地進步，那麼另一方面，我們並不能確切地說，人民運動的速度究竟如何，以及這個運動究竟在什麼時候可以達到實現我們的最近目的所必需的程度。我說：我們理應參加選舉。現在且假定我的同志們同意我的意見，——我知道他們暫時還不會這樣做；我知道，他們只有將來才會說“這是正確的”；但是我只不過請你這樣假定一下，說他們現在同意了；——而且還請您假定我們參加選舉的的確確大大有益於人民的政治教育。選舉以後怎麼辦呢？我現在不能對這個問題作出明確的答复。要回答這個問題，必須善於確切地預見到人民群眾達到什么样的自我發展程度。也許全體人民在剛剛結束選舉時就當真提出帕·奧爾洛夫斯基強加在他們身上的要求（像他已經提出的要求一樣）。那時，這個要求就比較容易實現了。也可能人民那時還只是處在心理上接近這個要求的過程中。那時就應當多多努力來加速這個心理過程。如果不陷入“無聊的幻想”，我就不可能預言這些努力將會採取何種形態。但是我深知，這些努力定然是必需的，事實的教訓比任何其他教訓有用得無比。這意思就是說：人民是有一定的政治偏見的，——比方有這樣一種偏見：根據十二月十一日法律而且在戒嚴對復選人的有利影響下選舉出來的杜馬可以改善人民的處境。怎麼打破這種偏見呢？通過事實的教訓，通過活生生的教育：“你覺得這個想法對嗎？試照着你的信仰實際上做做看，你就會明白，你錯了。”怎樣使要向火里伸手的兒童相信火會燙人呢？讓他同火接觸一下，他馬上就會懂得你們的意思。政

治上的事情亦复如是，至于打破人民的政治偏见自然不会例外。<sup>①</sup>

刚才一些外国报纸上出现了一则消息，说杜马中将有一半议员由政府任命。这也是一件意外新闻，俄国的官僚制度制造出这样多的意外新闻，对于人民的政治教育工作倒是良多裨益的。想出这种意外新闻的人士自然以为它将促进“国家的安宁”。其实，它只是种种新冲突的种子。因为这不过是序幕，压轴戏还在后头。时间蕴育着不测事件；我们不应当作茧自缚。<sup>②</sup>

所以我暂时坚持一点：我们理应参加选举；参加选举会有助于提高人民的政治意识。您觉得这话不明确。我倒认为不能说得更明确了。要把某个什么“公式”添补上去，当然也还可以。不过我已经说过，政治上的公式主义同马克思主义者对不上口径。现在我要补充的是：它既妨碍我们观看事物时不为偏见所蔽，这就会增加我们的错误，从而给俄国的专制政治制度提供更多的良机。

我想您会懂得，我虽然坚持要参加选举，却未同任何东西“妥协过”，也未曾“放弃过”任何什么。这简直不值一说。而我之同必须提高无产阶级和它现在的同盟者的政治觉悟“妥协”，那已经是很早很早的事了：当时我已经掌握了马克思的学说。但凡有助于提高这种觉悟的行动，我是决不会“不”举手赞成和支持的。<sup>③</sup>

所以，当达申斯基同志、这位波兰社会党党员在外国的一家波兰文机关报上说，我用悲观主义的眼光看待我国解放运动的未来，

① 在第四〇七号《俄罗斯报》上从《西北边区报》上转载了一个农民谈杜马选举的信。从信中可以明白地看出，甚至很先进的农民也多么强烈地相信杜马。只要这种信仰存在，我们党抵制选举就是一个巨大的错误。附言：召开杜马的期限的指定引起了交易所利息的下落。交易所的经纪人比社会民主党人更好地理解杜马选举和召开杜马的宣传意义。——著者注

② 原来这消息是假的。但这无改于问题的实质。等待着我们的意外新闻仍然有无数无数。我们不管在怎样的场合下毕竟不应当作茧自缚。——著者注

③ 只有不懂得马克思主义者的急进主义的精神实质的人，才能把抵制杜马看成是策略上的什么急进主义的表现。我们的“布尔什维克们”所捍卫的策略包含着明显的小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和小资产阶级假革命性的标记。不过这一点将另文说明。——著者注

說仅仅因为这个緣故，我对我們之参加选举得出了机会主义的結論的时候，他就大錯特錯了。要說**机会主义**，打从“伯恩施坦分子”剛冒头的时候起，我就习惯于用不同于达申斯基同志的另一种态度对待它了。若是說用**悲观主义的眼光看待俄国的运动**，那波兰社会党在这方面一貫所暴露的悲观主义，过去和現在我都觉得不但毫无根据，而且并非完全摆脱了民族主义。

話快完了。您还向我提出了关于对待非无产阶级政党的态度問題。但是限于篇幅，我不得不把答复擱到下一期《日志》的社論中去。我力求在那篇社論里一起答复彼得堡的一位同志，因为他在給我的一封信中援引了馬克思在一八四八——一八四九年所坚持的一种策略。

此刻我只想把我覺得根本不容置辯的一个思想重說一遍：

**反动派力图孤立我們。我們也应当力图孤立他們。**

奥国社会民主党在自己的爭取普选权的宣傳中表明，他們很清楚地懂得，政治上孤立反动派有时是多么重要，多么必需。我們应当向他們学习。

握手

您的格·普列汉諾夫

答 A—ko 同志。請原諒，同志，您讀恩格斯讀得馬虎了。比方他写道：«Wer nach den Erfahrungen der Februarregierungen——von unsern edlen deutschen provisorischen Regierungen und Reichsregentschaften nicht zu sprechen——noch auf offizielle Stellungen spekulieren kann, muss entweder über die Massen borniert sein oder der extrem-revolutionären Partei höchstens mit der Phrase angehören»。

这意思是說：“誰根据二月政府的經驗——不談我們的高貴的德国临时政府和帝国摄政——还能貪图官方地位，就必然或者是格外地愚蠢，或者至多是口头上的革命派罢了。”①

① 參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七卷第469頁。——譯者注

这是明明白白的。恩格斯所謂官方地位是指在临时政府中的职位。二月的經驗是路易·勃朗的經驗。这段話我是从小册子《Der deutsche Bauernkrieg》<sup>①</sup>第94頁中引来的。說起来早就該把这本小册子譯成俄文了。

我們所批駁的人恰恰是格外地愚蠢,我以为。

格·普·

答 №1. 同志。您好像責备我,說“自由資產階級”現在都在夸奖我。但是这种責备一点也不会使我心怀內疚。恰恰相反,只要无改于初衷,絲毫沒有背叛自己的世界观,然則在我們应当孤立反动派的这等历史时刻,我受到“自由”資產階級的称赞,那倒是一件美事。可您的策略得到无政府主义者的夸奖。这一类的夸奖对于社会民主党人說来,任何时候也不可能认为是光采的。

格·普·

(譯自《普列汉諾夫全集》第十五卷第55—63頁)

---

① 《德国农民战争》。——譯者注

## 在斯德哥尔摩統一代表 大会上的发言

一九〇六年夏天的革命形势向无产阶级提出了两项迫切的任务：把党的力量统一起来；制定正确的策略方针。四月二十三日至五月八日，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的統一代表大会在斯德哥尔摩举行。

大会胜利地完成了第一项任务。分裂现象不再存在了。組織上的意見分歧几乎完全消除了。民主集中制原则被全党公认为党組織的行動的基本准则。

但是第二项任务却远沒有完成。由于孟什维克在代表大会上拥有巩固的和稳定的优势，所以大会对三个主要問題——土地問題、杜馬問題和武装起义問題——都通过了孟什维主义性质的決議。

普列汉諾夫是孟什维克在代表大会上的“真正的思想領袖”(《列宁全集》第十卷第328頁)，是孟什维克的观点的主要表达者。他以特邀代表的身分代表孟什维克作了关于土地問題的副报告，起草了孟什维克的杜馬決議草案，他也是武装起义問題委员会主席、孟什维克派关于武装起义問題決議草案的主要提案人。

列宁在代表大会上、在会后关于大会的长篇报告中，以及在《社会民主党在俄国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綱領》一书(特别是該书第四章的第一、二、四、五、七节)中詳尽地分析了和批判了普列汉諾夫的一切論点和論据。

列宁指出：“資产者称赞伯恩施坦是因为他在社会主



义革命前夜緩和劳資之間的矛盾。资产階級称赞普列汉諾夫是因为他在资产階級民主革命时期緩和革命人民和专制制度之間的矛盾。他們称赞普列汉諾夫是因为他承认‘議會’斗争是斗争的主要形式，因为他指責了十——十二月斗争，特別是指責了武装起义。他們称赞普列汉諾夫是因为他在当前的策略問題上已經成了社会民主党右翼的領袖。”(同上第320頁)

一九〇六年十二月，列宁在《卡·考茨基一书的俄譯本序言》中对普列汉諾夫在革命时期的策略观点作了全面而且深刻的評价。他指出：“作为俄国资产階級革命中俄国社会民主党的政治領袖，作为一个策略家，普列汉諾夫却經不起任何批判。他在这方面表現的机会主义給俄国社会民主主义的工人带来的危害性，要比伯恩施坦的机会主义給德国工人带来的危害性大百倍。我們必須向普列汉諾夫这种立宪民主党式的政策展开最无情的斗争，因为他已經回到一八九九——一九〇〇年从社会民主党中清除出去的普罗柯波維奇先生之流的怀抱里去了。至于說普列汉諾夫的这种策略上的机会主义，則是对馬克思主义方法的原理的全盘否定……”(同上第十一卷第398—399頁)

以下摘譯的是普列汉諾夫在代表大会上的机会主义言論。

### 关于土地問題的发言

代表大会的任务是改正一九〇三年我們的土地綱領中存在的那个錯誤。錯誤，無疑是有的；我們應該承认这点，大可以放胆承认，因為我們是唯一有严整观点的党。我們要根据我們綱領的一般原理批評每一个个别的判断，并且消除一九〇三年綱領中存在

的誤解。我們許多同志都堅持割地，因為他們過去都害怕農民的土地革命。這個革命會阻止俄國資本主義的發展。我們的錯誤在於我們的綱領當時即已不像農民自己提出的要求一樣走得那麼遠。早在一九〇三年夏天，當舉行第二次代表大會的時候，奧波連斯基在俄國南部就因為農民的急進的土地綱領曾經殘酷地折磨過他們。現在我們應當懂得，在土地問題上我們不應該害怕農民要求土地的急進主義。實現這些要求並不會阻止資本主義的發展，但同時我們必須避免農民的要求所固有的兩重性。其中有一個因素，我在自己的《日志》中曾經把它稱為中國制度的因素；這個因素就是土地國有化。列寧同志發現我的觀點不明白，但我以為，他簡直是馬馬虎虎地對待我的文章。真是這樣，比方請看他在自己的小冊子《修改土地綱領》<sup>①</sup>第十一頁上所說的話吧：“普列漢諾夫同志在《日志》第五期中，關於我們的土地綱領要作一定修改的問題，同樣也只字未提。他批評馬斯洛夫時，只是一般地主張‘靈活的政策’，他（引用《曙光》雜誌的舊論據來）反對‘國有化’，而好像傾向於在農民中間分配地主的土地。”<sup>②</sup>

這種諷刺“靈活的政策”的說法使我驚訝，因為在社會民主黨人看來，死板的策略不可能是好策略。在同一本小冊子的第十六頁上他說道：“普列漢諾夫同志在《日志》第五期中警告俄國不要重蹈王安石的復轍（王安石是中國十一世紀的改革家，實行土地國有未遂），並力圖證明，農民的土地國有思想，按其根源來說是反動的。這種論據的牽強性是一目了然的。真所謂 *qui prouve trop, ne prouve rien*。”<sup>③</sup> 如果能夠把二十世紀的俄國和十一世紀的中國相比較的話，那麼我們同普列漢諾夫大概既不必談農民運動的革命民主主義性質，也不必談俄國的資本主義。”<sup>④</sup>

① 即《修改工人政党的土地綱領》。——譯者注

② 參看《列寧全集》第十卷第147—148頁。——譯者注

③ 誰過多地證明，誰就什麼也沒有證明。——譯者注

④ 參看《列寧全集》第十卷第152頁注②。——譯者注

这种爭論手法早在我們同社会革命党人論战的时候我就見識过了。每每引证一下历史，他們通常都要辯駁一番，說我国的情况風馬牛不相及，而且我清清楚楚地知道，在这个地方我国的情况根本不是十一世紀中国的情况。我在自己的《日志》中絕對肯定地談到这一点；但是尽管有区别，也还是有一些相似的特征，而这些特征是必須加以注意的。这就是土地国有化，它构成我們的土地問題历史的突出的特点。列宁同志接着說：“农民的土地国有思想的根源(或性质)固然反动，可是要知道就是在黑土平分的思想中，不仅有肯定无疑的反动根源的特征，而且現在这种思想也还有反动性质的特征。”<sup>①</sup>我也清楚地知道这一点。我恰恰也指出了这一点，而奇怪的是道士面前鬼唱歌，而且把这个歌当作对我的反駁。我說，在农民的黑土平分的思想中有反动的特征。也正是因为看到反映在我国全部政治史上的这一反动的特征，我才坚决反对土地国有化。怎么引证起这个特征当作反对我的理由来了呢？列宁用社会革命党人的眼光看待国有化。他甚而使用起他們的術語；例如他大談其臭名远揚的人民的創造性。旧識相逢，不亦乐乎，但是看到社会民主党人采取民粹派的观点亦不乐也。俄国土地問題的历史与其說同西欧的历史相像，倒不如說它同印度、埃及、中国和其他东方专制制度的历史相像。这里絲毫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因为每一个民族的經濟发展都是在特殊的历史环境中进行的。我国的情况是土地和耕田的人都受国家的束縛，而俄国的专制制度就是依靠这种束縛发展起来的。要粉碎专制制度，就必须消灭它的經濟基础。所以我反对現在提出土地国有化；当年我們同社会革命党人爭論这件事情的时候，列宁发现我的反駁是正确的。列宁說：“我們能消除国有化的弊端”，但是要消除国有化的弊端，就必须找到防止复辟的保障；然而这样的保障是沒有的，也不可能有。請回顾一下法国的历史吧；請回顾一下英国的历史吧；这

---

① 參看《列宁全集》第十卷第 152 頁注②。——譯者注

两个国家在波瀾壯闊的革命以后都发生过复辟。我們这里也可能发生这种情形；只要我們的綱領有可能实现，就应该把复辟可能产生的危害减少到最低限度。我們的綱領应该力求消灭沙皇制度的经济基础，但是在革命时期实行土地国有化却不能消灭这个基础。所以我认为，国有化的要求是反革命的要求。列宁的議論是这样的：好像他所追求的那个共和国一旦建立，就会永世长存。他的錯誤也就在这里。他用一些乐观主义的假定迴避問題的困难。这是烏托邦式的思想的慣技；例如无政府主义者說：“不需要任何强制性的組織”，而当我们反駁他們說，沒有强制性的組織就有可能使得个别的社会成員要想危害这个社会就能危害，这时无政府主义者回答我們：“这是不可能的事。”依我看来，这就是用乐观主义的假定迴避問題的困难。列宁就干这号事。他用整整一串乐观主义的“假定”掩飾他建議的措施可能产生的种种后果。我且引出列宁責备馬斯洛夫的一段話为证。他在自己的小册子第二十三頁上說：“其实，馬斯洛夫草案是默然假定我們最低政治綱領的要求不会充分实现，人民专政不被保证，常备軍不被消灭，民选官吏制度不会实行等等，——換句話說，就是假定我們的民主革命，也像欧洲大部分民主革命一样不进行到底，也像所有这些革命一样被弄得殘缺不全，違反常态，‘拖向后退’。馬斯洛夫的草案是專門給半途而廢的、不彻底的、不健全或者殘缺不全的、被反动派弄得‘不致为害的’那种民主革命設計的。”<sup>①</sup>假定他对馬斯洛夫的責备有根据，然而这段引文却表明，列宁自己的草案只有在他所指出的全部“假定”都得到实现的那个場合下才是好的。要是将来这些“假定”不存在的話，那么实现他的草案就会有害。我們可不需要这样的草案。我們的草案应该在四只脚上都釘上铁蹄，也就是說应该在“假定”不順利的場合下也能实现。一位几乎每战必胜的統帅——拿破侖——說过，只估計順利湊合起来的情况的那个軍事长官是糟糕的。我說，一个政治綱領如果只在这样湊合起来的情况下才是

<sup>①</sup> 參看《列宁全集》第十卷第 159 頁。——譯者注

好的，这个政治綱領也是糟糕的。因为这个道理，我才反对国有化。列宁的草案同革命家夺取政权的空想密切相关，所以你們中間凡是对这种空想沒有兴致的人都應該反对它。市有化則是另一回事。万一复辟，它决不把土地交給旧制度的政治代表人物；相反，在掌握土地的社会自治机关中，它能造成抵御反动势力的支柱。并且这将是一种很强大的支柱。拿我国哥薩克來說吧。論他們的言行是十足的反动分子，但是沙皇政府如果忽然想触动他們的土地，那他們会万众一心地起来为土地而斗争。可見，土地市有化的好处，就在于它甚至在发生复辟时也是有用的。也許会有人根据这一点責备我，說我不相信革命的胜利。如果我說过的話有不相信革命胜利的意思，那我的确犯了这种罪过。Mea culpa, mea maxima culpa! ① 我要继拿破侖之后重申：“只估計順利湊合起来的情况的那种人是糟糕的。”不过我并不无条件地拥护市有化。我认为，假使我們不可能实现市有化，假使我們不得不在国有化和分配中間作一选择，那么，为了革命的利益，宁可要分配。这就是我的观点和列宁的观点两者之間的区别之所在。你們可以同意前一种观点，也可以同意后一种观点，但是你們应当懂得，把两者拉在一起是不可能的。

### 关于土地問題的总结发言

未作总结性的发言以前，我想简单地答复一下某些同志們的說法：在現在这个时候我們根本沒有必要提出土地綱領。这个意見我絕對不能同意。原因是土地綱領应当成为我們的宣傳員和鼓動員的指导方針。在这样一个重要的历史时刻，这时他們中間每一个人所犯的每一个錯誤都可能在天平盘上放下一块沉重的砝碼，我們的同志們应当清楚地知道我們党的希望是什么。如果你們回忆一下，我們的同志們在向人民講話时已經不止一次地用各

① 吾之罪乎，罪莫大焉！——譯者注

种不同的方式对同一个問題发表了意見，并且还这样行动，因为他们对我们社会民主主义的思想方向还弄得不够清楚，那么你们就应当要承认，綱領是必需的。究竟会通过怎样一种綱領，明天的表决会告訴我們。不过无论如何，应当要一个綱領，如果我们希望避免錯誤的話。作了这一点說明之后，我就要談一談索斯諾夫斯基同志向我提出的一些反对意見。他直接向我提出一个問題：普列汉諾夫起来反对国有化是因为他不相信列宁的全部“假定”有实现的可能。要是所有这些“假定”都实现了，那么我是不是会贊成国有化呢？对于这个问题我认为必須回答說：不，即使在列宁的全部“假定”統統实现的場合下我也会反对它。索斯諾夫斯基同志不妨想一想，“列宁的全部‘假定’都实现了”这些话是什么意思。这意思就是說，俄国也如此牢固地建立了政治自由，像瑞士、英国或美国已經建立的政治自由一样。那时我們就不会有复辟的危險了。然則什么时候会有这种情况呢？显然还不会这样快。因此我們社会民主党人現在談不上国有化。如果我国如此牢固地建立了政治自由，像英国、瑞士或美国已經建立了的政治自由一样，那又会怎样呢？那时就沒有必要把它当作单独的要求提出来，在所有其余的生产資料国有化以前就沒有必要实行土地国有化。在英国，誰实行了土地国有化呢？亨利·乔治。誰出来反对亨利·乔治呢？英国 Social Democratic Federation<sup>①</sup>的領袖海得曼。結果是：如果列宁的“假定”实现不了，土地国有化就有危險，而当这些“假定”实现了，土地国有化作为特别的土地綱領的构成部分就不必要。現在我希望，索斯諾夫斯基同志懂得，为什么和在怎样的意义下我断然反对国有化。

現在来談沃依諾夫<sup>②</sup>同志。他把我的意思理解为：我所以宁願要約翰<sup>③</sup>同志的綱領只是因为它染上了灰顏色。沃依諾夫同志

① 社会民主联盟。——譯者注

② 即卢那察尔斯基。——譯者注

③ 即馬斯洛夫。——譯者注

大概以为我像公牛一样同紅色搏斗<sup>①</sup>。他錯了。我所以贊成約翰同志的綱領不是因为我觉得它是灰色的，而是因为它不会使我感觉到有政治上的危險，国有化就使我产生危險的感觉。如果沃依諾夫同志願意仔細地听一听我在第三天的发言<sup>②</sup>，那他就会容易懂得，我发言反对这个提案，不是因为我觉得它太革命了，而是因为我认为它不够革命，不能牢固地保障革命的成果。虽然这里有人說，在我的生命中已經到了秋天，但是我所經歷的秋天沒有使我觉得冷。在革命方面我正在經歷所謂 бабье лето<sup>③</sup>（笑声）。再讲一遍，我不害怕任何革命性，要是我出来反对列宁的草案，那是因为它的实现并不能足够牢固地保障革命的成果。这个草案中隐藏着一种傾向，它证明列宁正在降低革命思想的水平，他使我們的观点中掺杂进一种空想主义的因素。除非我过不了秋天，也过不了冬天，除非不可克服的自然力量强迫我沉默，否則我就要同这个因素斗争。事情就是这样；我和列宁之間存在着十分严重的意見分歧。不应当抹煞这些分歧。应当弄清楚它們的全部重要性，弄清楚它們的全部內容。我們党正在經歷着极其严重的时刻。你們今天或者明天對我們所探討的問題所通过的決議将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决定我們全党的命运，因此也将决定我們整个国家的命运。而这正是因为列宁同志的草案中不仅表現着他对我土地問題的个别看法，而且表現着他的革命思維的整个性质。布朗基主义还是馬克思主义——这就是我們今天要解決的問題。列宁同志自己就承认，他的土地問題草案是同他的夺取政权的思想密切联系着的。我很感謝他的坦白作風。某些同志昨天用显然气忿的語調反駁我。比方潘諾夫同志，如果我沒有錯，就反駁說：“普列汉諾夫想吓唬我們”，諸如此类。我认为我們分析重要的問題时不宜使用这一类的爭論

---

① 古代西俗：达官仕女云集斗牛場，令奴隶头纏紅巾，牯牛見紅色即以角击之。——譯者注

② 指“关于土地問題的发言”，參看本书第329—333頁。——譯者注

③ 意为：晴和的初秋。——譯者注

手法。我并不怕唇枪舌剑，——你们很多人都知道这一点。但是这样做会有什么结果呢？什么结果也不会有，除了杰米扬的鱼汤<sup>①</sup>以外，我们大家早就对这些争吵腻烦了。（笑声）我们不需要杰米扬的鱼汤；争吵应该停止，早就该把它们埋到坟墓里去了，早就该在这个坟墓上钉一个白杨树桩，像农民在巫师的坟墓上钉桩子一样<sup>②</sup>。应当心平气和地讲道理。请你们相信，无论同你们中间哪一位争论，我都不会使用吓唬的手段，也不会进行诡辩；我所以这样说，而不用别的方式说，因为 hier stehe ich und ich kann nicht anders……<sup>③</sup>

我和列宁的唇枪舌剑已经不是一次了。在开始反驳他的时候能够说一句恭维话，我更觉得高兴。他讲得很出色。听了他的发言，我回想起已故的拉甫罗夫对我说过的一句话：“您成了出色的律师”。的确，列宁同志成了出色的律师。列宁同志在保卫自己的草案时，凡是要说的话他都说了。但是假使辩护词仍然显得糟糕的话，那显然是这位出色的律师所辩护的那个案子糟糕的缘故。列宁同志可以称得上——用法国人常说的话——avocat d'une cause perdue。<sup>④</sup>他的案子在逻辑的法官面前是令人沮丧的。如果列宁同志讲了三刻钟话还不能说出任何实质性的论据来维护自己的草案，那么显然是说不出任何道理来论证它。请看一看他的做法吧。他懂得策略要求他不要限于防御，而要采取攻势。于是他就进攻了。然而他不对我的主要据点发起攻击，而是围着它转，但

① Демьянова уха——杰米扬的鱼汤，语出克雷洛夫寓言《杰米扬的鱼汤》篇。杰米扬一再要客人喝鲜鱼汤，客人吃得不想再吃，只好逃席而去。在这次统一代表大会上彼得堡代表伊·阿·泰奥多罗维奇（即潘诺夫）对普列汉诺夫的“模糊观点”作了“完全无法辩驳的”（列宁语）批判。泰奥多罗维奇的别名叫做杰米扬。——译者注

② 古代迷信，认为在坟墓上钉一个白杨树桩子就可以使鬼魂不致为害人类。——译者注

③ 我既站在这个地位上，也就不免要这样作。——译者注

④ 大意是：替本来没有理由的案件作辩护的律师。——译者注



不去碰它。我的主要据点就在于认为有可能复辟。

我答复他的話：“我們能消除国有化的弊端”的时候指出过这一点。我說：“要消除国有化的弊端，就必须找到防止复辟的保障，然而这种保障你們是不可能有的。”我繼續說：“既然你們不能拿出这样的保障，而且任何人类的力量也不能拿出这种保障，——那么你們的国有化思想在政治方面就是有害的和危險的思想。这是反革命的思想。”这就是我說过的話，列宁同志应当反駁这些話。他反駁了什么呢？什么也沒有。他在自己的长达三刻钟的发言中对于这一点什么也沒有說。他自己就承认，我們沒有防止复辟的绝对的保障，我們只能有相对的保障，就是人民实行无情的镇压；但是在一七九三年的法国，人民也实行过无情的镇压，可是沒有防止得了复辟。我知道法国革命的历史，我說：我們需要四只脚上釘上铁蹄的那样的綱領；我們的义务在于把复辟的有害后果减少到最低限度。怎样做到这一点呢？只有通过破坏我国旧制度的經濟基础的办法才能做到。这个制度的經濟基础是什么呢？正好就是我在我的《日志》中曾經称之为我国的中国制度的那个土地国有化<sup>①</sup>。一位同志反駁我說：“然而法国的复辟並沒有恢复旧制度”；对于这一点馬尔丁諾夫同志已經答复过了：这个論据是站不住脚的。复辟沒有恢复封建主义的残余，这是对的，但是在我国相应的封建主义残余，就是我国土地和农民一向受国家束縛，这是我国旧有的独特的土地国有化。既然你們自己要求土地国有化，原封不动地保存我国半亚洲式的旧制度的遗产，那我国的复辟势力就更加容易恢复这种国有化了。其次，大家知道，在革命时期的法国沒有脱售的那些貴族的土地、仍然留在国家手中的那些土地，曾經交还給他們过去的所有者去了。你們希望我国也发生同样的事情么？

再說一次。必須破坏使我国人民日益同亚洲各国人民接近的

---

① 參看本书第 299—301 頁。——譯者注

那个經濟基础；应当搞掉恩格斯早就称之为专制制度最重要的基础的那个經濟基础。其次，請注意，我們同列宁一方面很接近，另一方面又彼此相隔很远。列宁說：“我們应当把革命的事业进行到底。”对。但是問題在于我們中間誰在把这一事业进行到底呢？我肯定认为：不是他。

如果把革命事业进行到底意味着只限于替过去的民意党思想穿一身新式的服装，那列宁当然是极端的革命者。然而实际上这并不意味着前进，而是意味着后退，使我們的革命思想回复到它的过去的、空想主义的謬論。列宁同志很不滿意我用諷刺的口吻批評他的某些新名詞。我嘲笑过“人民的創造性”的說法，称这种說法是自己的老相識。我責备过列宁，說他在复辟民意党的夺取政权的思想。他回答我說，在十月十七日以后这个思想已不再是空想了。我懂得十月十七日的全部意义，但是我不懂它怎么可以改变我們对过去某些在邏輯上有重要价值的东西的評價。我們的民粹派分子和民意党人所謂人民的創造性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某种似乎存在在人民中間的經濟傾向，它可以使人民避免資本主义。我深信，列宁同志不会相信这种傾向的存在，但是不知为什么他使用一个表示这种思想的名詞，而这种思想在十月十七日以前是錯誤的，在以后也是錯誤的，将来永远是錯誤的。

馬克思曾經責备法国民主派說，他們把人民理想化了。我国的民粹派分子和民意党人也是这样做的。我們应当避免这个錯誤。我們必須記住，我們所說到的那个人民(不管十月十七日的偉大意义如何)是由、也只能由两种成分組成：即一方面是无产階級，另一方面是小資产階級。任何人民的創造性都改变不了我們当前的資产階級革命的基本性质。我們現在所追求的民主共和国是什么呢？这就是資产階級共和国。我认为，如果我們坚决地和明确地記住这个观点，如果我們懂得資产階級共和国所固有的階級矛盾的不可避免性，那我們就不会如此輕便地迷恋于把夺取政权理想化。列宁同志激烈地和坚决地对我說，在十月十七日以后，民意

主义的夺取政权的思想已經不再是空想了。但是这个思想的空想性质何在呢？在于民意党人曾經希望靠一小撮人的力量夺取政权嗎？不。只有像我們的某些戏剧批評家所做的一样，根据小歌剧中的阴谋来判断阴谋分子的那种人，只有这种人才会认为，民意党人曾經把自己的希望寄托在一小撮阴谋分子的努力上；不，他們也懂得革命者夺取政权应当是全体人民革命运动的結果。他們思維的空想性质在于他們认为革命政权可以解决它并不能解决的那些任务，可以消除那些不能消除的困难。空想主义者同我們馬克思主义者不同的地方在于他們用这些或另一些乐观主义的假定迴避問題的困难。而这种空想主义的手法現在正是列宁的革命思維的特色。他正好是利用一些乐观主义的假定迴避問題的困难。凡是认为这种手法的可靠性值得怀疑的人都会被列宁怀疑是用漠不关心的态度对待革命事业。

十月十七日以后夺取政权就不再是空想了么，列宁同志？但是您說到它却在十月十七日以前，而且我在十月十七日以前正是这样反駁过您。十月十七日絲毫不能改变我們对夺取政权的思想的評价。我們的看法是：我們必須夺取政权，但只有在我們进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候才是必須的。既然現在摆在我們面前的只能是小资产阶级革命，那我們就必須拒絕夺取政权。恩格斯說，誰在一八四八年的經驗以后认为社会党人可以参加革命的资产阶级政府，那他就或者格外地愚蠢，或者只是用革命的空談来对付革命的事业。我們的导师曾經是这样看待这个问题的，任何十月十七日都改变不了他的这个观点。

但是，如果我們认为夺取政权是不可能的，然則請問，我們应当怎样对待同夺取政权密切相关的那个綱領草案呢？假使我們否定夺取政权，那就也应该否定这个綱領。你們中間凡是贊成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的人，都应该坚决地反对列宁同志的草案。它同阴谋家的夺取政权的思想一样也会破产。

## 关于对待国家杜馬的态度問題的发言

同志們！有人對我們說，進行議會活動的時機還沒有到，但是對我們說來，我們的決議是重要的，它指出一條道路，可以加強現時在政府與杜馬之間存在的必不可免的種種衝突並且使之尖銳化。這對我們是最主要的事情；這是我們的草案的基本思想。如果從草案中刪除涉及杜馬中社會民主黨代表的這一點，那就等於使我們的決議失去任何實踐意義，就等於把決議連頭帶尾地砍掉。這大概是建議這樣做的同志們都清楚地知道的，但要知道，這樣做對於例如我們高加索的同志們說來是最大的不公正。他們參加選舉；他們也許會派自己的代表去杜馬。我們沒有權利說這不是我們的同志，他們不屬於我們的黨，因為這是不正確的，因為他們屬於黨。你們去監督他們吧，這是你們的義務。但是不要拋開這些鬥士，因為他們對革命有這麼多的功績。列寧攻擊我們的草案的一個地方，這個地方說：沙皇同杜馬的衝突會對軍隊發生革命化的影響。他不喜歡提到沙皇，提到政權。這很使我驚訝。我們不是唯心主義者，唯心主義者認為一般的法律和政權是一種神聖的東西或者是某種 *an und für sich*<sup>①</sup> 应当受到譴責的東西。在我們看來，法律、政權只是社會力量實際關係的表現；當這些實際關係改變到應有的程度時，舊的法律、舊的政權就會失去任何意義，它並不比一塊舊抹布更值錢。你們不喜歡現時的政權么？我們也是。要推翻它，應當改變俄國國內力量的實際關係。我們的決議指出怎麼辦，而你們卻叫嚷說我們崇拜政權。但是請記住，列寧同志攻擊的那一點是指軍隊。口口聲聲要武裝起義的那些人必須特別注意軍隊。當軍隊還擁護政府的時候，武裝起義就很少有勝利的机会。政府是凭借刺刀維持的，雖然危機四伏，但是它力圖尽可能牢固地凭借刺刀來維持。為了推翻它，應當動搖這些刺刀。我們的決議

<sup>①</sup> 本身。——譯者注

指出达到这个目的的許多途徑之一。杜馬同政府的冲突必然不只动摇一个兵士。这就是一切。那么你們在什么地方发现这里有反革命的異端邪說呢？我們的決議沒有提出这样的問題：要就是在杜馬中进行和平的工作，要就是革命。它說：杜馬是一种进行革命宣傳的武器，它可以促使我們得到立宪會議。这不是我們唯一的武器，这也不是主要的武器。但这是最重要的武器之一，輕視它，在政治上就要犯重大的錯誤。罗将科同志說过，他曾經在委员会中这样概述了我們的爭論：“我們应当确定，杜馬是不是站在革命的大道上”，而列宁同志对这个問題答复說，不是。事情的确是這樣。这就清楚地說明我們观点的區別。在我們看来，杜馬站在革命的大道上。不应当繞过它。列宁說：“杜馬中有許多天真的农民，他們除了最幼稚的要求以外还提出关于土地的急进的要求。”这是对的；但是我們怎样对待这些农民呢？讓他們仍然牺牲在自己的政治偏見、牺牲在自己的政治天真性下面呢？还是努力在斗争过程中破坏这些偏見呢？而对杜馬嗤之以鼻是不能努力这样做的。报纸上报道了一些关于农民的消息，說农民对自己的議員讲过：“你上杜馬去，为我們的事业死在那里，要是背叛我們，就别回来，回来我們就杀你。”难道你們不懂得我們必須紧紧地靠攏这些人，我們必須参加他們行将經歷的所有那些冲突，并利用这些冲突来提高他們的政治觉悟。当这些人放棄自己的政治天真性的时候，——而他們是在斗争过程中和由于斗争才放棄它的，——杜馬就会寿終正寢，那时，召开立宪會議的钟声就会响起来。

列宁同志責备我們，說我們在自己的決議中沒有說到对待立宪民主党人的态度，但是我看不出，既然我們在同一个決議中指出了自己对待一切資產階級政党的态度，为什么还要去說他們。是不是这样做不充分呢？是不是我們应当从資產階級政党中提出某些党派，对它們特別加以說明呢？我却不懂干嗎我們要喜欢淡黃发女人而不喜欢黑头发男子或者相反？为了对我国无产階級进行政治教育，必須支持政府和杜馬之間的冲突。

同志們，你們說这里到会的工人有多少？（喊声：“二十个”）喏，你們看，只有二十位。这很少。当然，这不是我們的过錯，我們虽然不屬於工人階級，但是站在社会民主党的旗帜下。这是我們的功劳。然而我們的这个功劳同时也是我們的不幸。为了摆脱这种不幸，应当教育无产阶级，引导它走上偉大历史冲突的康庄大道。我們的決議指出了进行这种教育的办法之一。你們应当接受我們的決議。（掌声）

### 普列汉諾夫草拟的对待国家杜馬的 态度問題的決議 起草委員會通过

鉴于：

一、沙皇政府在不产阶级的革命逼迫和资产阶级反对派的压力下，为了削弱革命的高漲和扞上伪宪制的旗帜以保证自己在自己的生存斗争中的胜利，而召集国家杜馬；

二、但是政府和它的反动同盟者这种不可調和地敌視人民政治上的自动性的任何表现的势力，为了頑强地保护旧制度的生存，将在国家杜馬一开始活动时就会向国家杜馬进行坚决的斗争，使它在改造俄国国家制度方面不可能试图进行任何一个稍微认真的工作；

三、俄国新的资产阶级社会的最迫切的利益和需要同束縛它的手脚的旧制度之間的敌对状态已是这样尖銳，以致第一个代議制會議和反动派之間的冲突必不可免，不管在杜馬中有代表的党派的反对立場和意图如何；

四、这些冲突既迫使国家杜馬在比至今更广泛的群众中寻找支持，就会使这些群众的注意力集中在同专制制度作斗争上，这样就会甚至把像杜馬这样的伪宪制机构从反革命的工具变为革命的工具；

五、在現代的革命气氛中，国家杜馬和政府的冲突同时对軍

队也会发生瓦解和革命化的影响，这些军队由于第一次在俄国土地上看到一个从民族内部产生出来、代表他们说话并横遭沙皇制度摧残的新权力，他们对皇上的忠诚就会动摇，

代表大会认为，社会民主党应当：

一、有计划地利用政府和杜马之间以及杜马内部发生的一切冲突，以便扩大和加深革命运动，为此就要：

(一)力图使议会的种种冲突扩大和尖锐化，直到有可能使它们变成旨在推翻现存的政治制度的广大群众运动的出发点；

(二)力图在每一个这样的时机，把运动的政治任务同工农群众的社会经济要求联系起来；

二、这样来进行自己的干预活动，以便使这些尖锐的冲突能够：

(一)在群众面前暴露在杜马中自封为人民意志的表达者的一切资产阶级政党的不彻底性，和

(二)使广大的人民群众（无产阶级、农民和城市市民）觉悟到杜马这个代议制机关是完全不中用的，必须根据普遍、平等、直接和无记名投票的原则召开全民立宪会议。

此外，代表大会认为最好是在有社会民主党议员在党组织中工作并服从其指示时，成立社会民主党议会党团，这个党团在杜马中将要起革命的作用，以自己的批评推动一切资产阶级党派采取比较坚决的反对派立场，把所有的革命分子团结在自己的周围，提出各种社会经济问题，并且特别是把这些问题同政治问题联系起来，使杜马和政府的冲突尖锐化，并通过党组织同广大工人群众保持经常的联系。

## 关于武装起义的发言

我对武装起义问题说几句话。首先我要指出，这是现时对我们最重要的实际问题之一；我们党往后的命运在相当大的程度上

就看我們怎么解決它。必須冷靜地討論它，然而報告人文特爾同志却很古怪；他不想辯論，可他自己今天却顯然充滿了極端好辯的情緒。他指摘我們的草案不真誠，偽善。真遺憾。不過我們不想吵嘴。我們且把這草案真誠不真誠的懷疑拿開，我們要反過來請文特爾同志，別上沒有偽善的地方去找偽善。他的極端多疑倒使我想起格列勃·烏斯賓斯基的一頁書：一位官太太同管院子的下人爭論。“劈柴在哪兒？”——官太太問。——“爐邊”，——管院子的下人回答說。“怎麼，我下流<sup>①</sup>！”——官太太大聲叫道；——“我兒子在波蘭當軍官”，等等。不能這樣爭論。文特爾同志認為我們的決議的以下一段是對他和他的同志的某種不愉快的暗示：“黨的義務是”等等（請看第三點<sup>②</sup>）。其次，文特爾說，他和他的同志們不認為全部革命任務的中心內容是無產階級組織從技術上準備起義的計劃。他說，這根本不是他們的看法。更好嘛，但是究竟誰告訴過你們，說我們就認為你們有這種看法呢？我們希望消除在評斷武裝起義時可能發生的一切誤解，我們也指出了這一類誤解。歷史充分地表明，陰謀分子不止一次地用極端輕率的態度看待武裝起義；我們應當避免陰謀分子輕率的行為；我們在自己的決議中指出這點，而你們卻認為這是要辯論，你們覺得自己受了侮辱。這是十分奇怪的。不過我要指明，文特爾同志的擁護者們顯然在很多方面不同意他的意見。他說，如果等到所有的軍隊都轉到人民方面來，那永遠也不會有起義。但是我們沒有說過，必須所有軍隊都轉到人民方面來，起義才會成功。請他回想一下法國革命史；請他在記憶里重現一下巴黎人民拿下巴士底獄的那個時刻。當時的情形如何呢？是不是所有的軍隊都轉到人民方面去了呢？不，沒有的

---

① “爐邊”——подле，“下流”——подлый，俄文發音相近。——譯者注

② 孟什維克的決議草案第三點的全文是：“（3）我們認為，並且建議代表大會認為……黨的義務是反對一切引誘無產階級在不利條件下作武裝衝突的企圖，不論這些企圖是什麼原因引起的：政府的挑撥計劃或者毫無意義的革命主義的暴動幻想”。——譯者注



事，然而有一部分軍隊已經站在起義者的方面。就是說局部的倒戈是可能的，我們的決議就指出這種情況。雅羅斯拉夫斯基同志在這裡同文特爾同志有分歧；他也是“布爾什維克”，他對我們說，在莫斯科起義的時候，Н—ская 炮隊急着想投入戰鬥，但是因為缺乏聯繫，不能用來解決問題。由此應當得出的結論是，第一，雅羅斯拉夫斯基同志完全不像文特爾同志那樣了解軍隊轉到人民方面來，而第二，必須加強我們在軍隊中的活動，並使之經常化，——而这也恰恰是我們的決議所要求的。隨後文特爾同志問：“哪一個‘布爾什維克’在什麼時候說過，黨可以擔負起武裝人民的義務呢？”但是雅羅斯拉夫爾的一個同志<sup>①</sup>說，黨應當擔負起這種義務；他責備我們，說我們沒有擔負起這個義務，這實質上就是主張非武裝的起義；顯然，雅羅斯拉夫爾的同志不像文特爾同志那樣看待這個問題。我們覺得黨不可能擔負這種義務，這在我們的決議中也有所說明。我們認為，情況是這樣的：人民只有用實力才能從反動派的愚蠢的擁護者們的手裡奪得政權，不過這種實力暫時還不像應有的那樣強大，應當通過宣傳來增加實力；因此我們的決議把主要的注意力放在必須進行革命的宣傳工作上面；反之，我們的論敵們認為，決定性的衝突時刻已經來到了，因此在他們的決議中中心問題是從技術上準備起義；我們的觀點的分歧點也就在這裡。所謂“布爾什維克”的決議直接聲稱，現在武裝起義不僅是爭取自由的必要鬥爭手段，而且是運動實際上已經達到的階段；我堅決否定這點，而且請注意，我們所反對的決議草案的作者們，違反自己的意志，也否定這點。他們一方面說，起義是運動實際上已經達到的階段，另一方面他們的決議又說，“人民群眾對必須爭取實際的政權的覺悟正在成熟，而人民只有同專制制度的力量進行公開的鬥爭才能把實際的政權掌握到手。”

如果這種覺悟正在成熟，那就是說，它還沒有成熟，就是說階

---

① 即雅羅斯拉夫斯基，他是參加這次代表大會的雅羅斯拉夫爾黨組織的唯一的代表。——譯者注



段还没有到来，也就是说必须大力注意于促进这个思想的成熟，而我们的论敌们，正如我说过，却认为中心的问题是技术，即一种活动，这种活动只有在上述阶段实际上已经达到的时候才是适当的。沃依诺夫同志引证了毛奇<sup>①</sup>的话；他说，我们很像这样一些人，他们听到一句格言说一个学校教师在萨多瓦赢得了一次战斗以后，就得出结论说，要在战争中取胜只需有学校就行了。我们根本不会说这类的话；我们只是断言，必须通过学校，而人民还远没有全部通过学校。你们要引证毛奇，那你们是不是知道耶拿战败以后普鲁士的军事史呢？当时普鲁士人是怎样行动的呢？他们认为，第一，必须同拿破仑斗争，第二，他们还没有足够的力量进行斗争，于是他们把自己的注意力全都放在准备居民群众去同法国人斗争的工作上面；他们缩短了兵役期，并且这样来组织军事，以致在短期内就使得相当大的一部分居民通过了普鲁士军团。我们也需要这样做；我们应当使居民接受我们的军事训练，而这并不是用技术准备办到的；为了做到这点必须进行广泛的革命宣传工作。一旦把自己的注意力放在技术准备工作上面，我们就必然会忽略宣传任务。吉荷米洛夫在同八十年代初期刚产生的社会民主主义团体<sup>②</sup>进行争论的时候写道：“你们关心的是捍卫社会主义纲领，而我们民意党人则主张夺取政权和武装起义的观点，而对于武装起义获得胜利说来，一个很好的军官比一个有觉悟的工人重要些。”既然你们专门从事技术准备，你们也就是采取这样的观点，而这个观点将会使整个无产阶级事业面临严重的危险。所以我建议代表大会否决“布尔什维克”的决议，而通过我们的决议。

（译自《普列汉诺夫全集》第十五卷第67—85页）

---

① 赫尔穆特·毛奇（一八〇〇——一八九一），伯爵、普鲁士元帅、著名的军事理论家。——译者注

② 指一八八三年在日内瓦成立的“劳动解放社”。——译者注